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百年香港大事快览/张晓辉主编,张永春副主编.—成都:
天地出版社,2007.7

ISBN 978-7-80726-580-1

I. 百… II. ①张… ②张… III. 香港—地方史—大事记—青少年读物
IV. K296.58-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98327 号

百年香港大事快览 BAINIAN XIANGGANG DASHI KUAI LAN

作 者	张晓辉	主 编	张永春	副主编
策 划	熊 宏		莫晓虹	段智玲
组 稿	莫晓虹			
责任编辑	莫晓虹		段智玲	
封面设计	彭趣思			
内文设计	羽 彦			
责任印制	桑 蓉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天地出版社
(成都市三洞桥路 12 号 邮政编码:610031)

网 址 <http://www.tdph.net>

电子邮箱 tiandicbs@vip.163.com

印 刷 成都蜀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07 年 7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7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成品尺寸 170mm×230mm

印 张 18.25

字 数 297 千

定 价 25.00 元

书 号 ISBN 978-7-80726-580-1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举报有奖! 举报电话 (028)87734601(市场营销部) 87734639(总编室)

因本社无法获得本书使用的部分摄影作品的作者姓名及地址,现已委托四川省版权事务中心代理许可使用及付酬事宜,请有关著作权人与该中心联系。敬请谅解。

四川省版权事务中心地址:成都市桂花巷 21 号 邮政编码:610015

联系电话:028-86696629

前言

香港地处我国南部海疆，位于珠江口东侧，域内群山相连，岗峦起伏，茂林满布，三面环海，是一天然良港。这里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繁衍生息的地方，是中国的领土。

自汉代起，香港即是中国对外贸易的通道，是重要的水路交通枢纽。从19世纪中叶开始，这里先后被割让与租借给英国，沦为被殖民统治的地位。

中国政府于1997年7月1日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香港终于回到了祖国母亲的怀抱。

香港回归祖国已10周年了，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和港人的努力下，经济强劲复苏，社会繁荣稳定，香港的国际经济、文化地位不断提升，这充分显示了“一国两制”基本国策在香港的成功实践，使我们对香港的前途更有信心。在此普天同庆之时，写作并出版本书，能为纪念活动献上一份薄礼，很有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希望本书能为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少年了解近现代香港历史开辟一个小小的窗口。

本书内容起自鸦片战争前夕，至1997年7月1日香港顺利回归祖国止，以63个典型事件为线索，把香港100余年波澜壮阔的社会发展历史浓缩于一个个小故事中，以故事观照政治、经济、中外关系、文化教育、社会生活、大众娱乐、民风民俗、城市建设等各个方面，从发展领略香港今日的繁荣。

本书条目基本按事件发生的顺序安排，设有骨干栏目和辅助栏目，从多角度揭示事件的本真。如“关键词”列具关键时间、关键地点、关键人物、关键事件及关键词汇。“背景扫描”紧紧围绕主题，概述事件发生的背景，简明扼要、直接入题。“脉络纵横”交代事件的前因后果，注意对亮点情节的精彩着墨。“历史回响”列具事件在香港产生的社会影响、历史后果或现实反映，并表明作者的基本评价。“一句话点评”，主要引用名人、政要、社会团体、新闻媒体或公众对于事件的著名点评，以起画龙点睛之效用。本书写作简明、通俗，叙述生动、流畅。为了增加观赏性，还根据具体内容配有大量精美图片。

本书主编为张晓辉，副主编为张永春，主要由暨南大学文学院教师及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的研究生分工编写。撰写人员有莫晓虹、张绍磊、张云、赵莎、刘楠楠、苏传文、林广荣、孙艳、李俊、刘绍军等。图片拍摄人员为叶明华和董艳玲。

在写作过程中，曾参考和吸收了国内外从事香港史研究的专家学者的科研成果，并于本书附录列出了主要参考文献目录，在此谨致以衷心的感谢。对于因篇幅有限及工作疏漏而未列举者，则深表歉意，并敬请见谅。此外，由于编者水平有限，成书时间较为仓促，书中内容及观点难免有错漏及不足，尚祈专家学者和读者不吝批评指正。



目录

CONTENTS



九龙销烟——近代反侵略战争第一战	/001
英军强行占领香港岛	/005
自由港的开端	/009
《南京条约》与香港的割让	/013
“总督的地位仅次于上帝”——香港殖民体制的初步确立	/017
人头税引起大罢市	/022
南北行——混沌时期的开拓者	/026
毒面包案	/031
港岛——19 世纪不沉的鸦片走私基地	/035
再一次得逞——英国割占九龙半岛	/039
汇丰银行——香港最大的商业银行	/044
大清海关“封锁”香港	/049
赌、赌——香港的一颗毒瘤	/054
保良局——香港三大传统慈善机构之一	/059
华工的血与泪	/063
乐善好施的东华医院	/067
沧海变桑田——中区填海计划	/072
皇仁书院育英才	/077
突如其来的人间悲剧——1894 年香港大鼠疫	/081
孙中山在香港的革命活动	/085



- 港英政府强租和接管新界 /090
- 泰山北斗——香港中华总商会 /094
- 中国百货公司的先驱——香港先施公司 /098
- 广九铁路话当年 /103
- 香港大学——英国远东殖民地第一所大学 /108
- 黄大仙祠——香港香火最旺的地方 /113
- 移风易俗废婢令 /118
- 近代罢工第一怒潮——香港海员罢工 /122
- “臭港” “饿港” “死港” /127
- “一碗饭运动” /132
- “文化沙漠”生“绿洲” /136
- “万金油大王”与《星岛日报》 /140
- “黑色圣诞夜”的降临——1941年底的香港保卫战 /144
- 百载繁荣一梦消——太阳旗下香港的悲惨岁月 /148
- “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抢救运动”
- 1942年抢救沦落香港的文化人 /153
- 又见米字旗——战后英军重占香港 /157
- 从头收拾旧山河——杨慕琦计划与战后香港的重建 /162
- 轰动国际的九龙城寨事件 /166
- 震惊中外的两航起义 /170
- 风靡影坛的武打片 /174
- “月儿弯弯照九州”——1952年以后香港流行曲的发展 /179



- 都是大火惹的祸——“三一事件” /184
- 聚财散财皆有道——霍英东首创卖“楼花” /188
- “毕生的事业与名誉”——金庸与《明报》 /193
- 不愿做人愿做马——香港赛马会与赌马 /198
- 粤港共饮东江水——东深供水工程的修建与改造 /203
- 邵逸夫与其影视王国 /208
- 香港学生保卫钓鱼岛运动 /213
- 亚洲最成功的反贪机构——廉政公署 /217
- 越南难民涌港和港英政府的“甄别政策” /222
- 利便民生的“居者有其屋计划” /226
- “英皇御准”的合法赌博——香港六合彩 /230
- 香港地方政制改革的新产品——区议会 /234
- 薪火相传，承先启后——香港电影金像奖 /239
- 当“铁娘子”遇上“钢小平” /243
- 日出沙头，月悬海角——沙头角中英街的开放 /247
- “黑色星期六” /251
- “谈”回来的香港 /255
- 香港经济恢复元气的三部曲 /260
- 美貌与智慧并重的香港小姐 /264
- 芝麻开花节节高——中银大厦的设计与建设 /268
- 彭定康“政改”风波 /273
- 香港回归与中英交接仪式 /278

九龙销烟

——近代反侵略战争第一战



赖恩爵

关键词

关键时间 1839年9月4日

关键事件 九龙海战

关键人物 赖恩爵 查理·义律 林维喜

背景扫描



在早期中英贸易中，中国始终处于贸易顺差的地位。为了扭转贸易逆差，自17世纪30年代起，英国商人就开始向中国输入鸦片。1757年英国占领了印度的鸦片产地孟加拉。1773年英印殖民政府确立了大量种植及向中国大量输入鸦片的政策后，输入中国的鸦片数量激增，到1838年竟达40 200箱（每箱重50公斤或60公斤）。当时中国有400万人吸食鸦片，每年流失的白银数百万两。

猖獗的鸦片走私，严重地影响国计民生，威胁着清王朝的统治。朝廷内部在经过激烈的争论之后，道光皇帝终于下决心查禁，并于1838年12月31日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广州查禁鸦片。1839年6月3日，在虎门海滩，林则徐当众销毁鸦片约6万公斤。虎门销烟，是清朝禁烟运动最辉煌的壮举，大长中国人的志气，大振中国国威。但是，

英国殖民主义者和嗜利成性的鸦片贩子们却从此耿耿于怀，不断寻机报复中国。

九龙半岛的地理位置极为重要，早在鸦片战争爆发之前，英国侵略者经过多次考察，认为九龙最南端的尖沙咀是广东沿海岛屿中最好的停泊处，于是密谋占领。虎门销烟之后，英国资本集团叫嚣：中国的禁烟运动，“给了我们一个战争的机会”。英国驻华商务总监义律和鸦片贩子频频挑起事端，1839年7月7日发生的“林维喜事件”，促成了九龙海战的爆发。

脉络纵横



1839年7月7日，英船“考奈蒂克”号和“满加洛尔”号的水手在九龙半岛南部尖沙咀上岸，向乡人强要酒喝，竟然用棍棒殴打村民林维喜，致其重伤而亡。村中还有几名老人也惨遭毒打。惨案发生后，英国驻华商务总监查理·义律力图掩盖事实真相，包庇杀人凶手，于7月10日赶赴出事地点，给死者家属1 500元作为丧葬费，同时诱骗林维喜之子立下字据，称林维喜之死是自己失足跌地而死，与洋人无关。另外，义律又拿出400元贿赂官吏，将1 200元分给其他村民。

林则徐获悉英国水手在尖沙咀行凶杀人，为捍卫中国的司法主权，坚决要求英方交出凶手，按中国法律治罪。他在得知义律擅自在中国境内设立法庭，并继续包庇凶手的行径后极为愤怒，于8月15日下午下令停止对在澳门的英国人的食品供应，撤其买办工人，并谕令澳门葡萄牙殖民当局驱逐英人出境。8月23日起，全体英商陆续登船离澳，但并未离开中国，而是转移到香港洋面。他们中间有许多怙恶不悛的鸦片贩子，继续从印度运来大量鸦片。

针对这种狂妄的侵略行径，林则徐一面传谕义律，要求速将新进鸦片查明全缴，一面下令断其接济，并派水师驻守尖沙咀一带严密监视。

义律恃强逞横，对林则徐的要求根本不理，他还企图用武力驱逐停泊在今香港维多利亚港内的中国水师。8月31日，英国海军驻华司令官、舰长史密斯大尉率英军巡洋舰“窝拉疑”号驶抵香港，与义律在尖沙咀村外的

海面上会合。义律有了援兵，气焰更加嚣张，决定直接向清廷挑衅，以摆脱尖沙咀英船缺乏食物的窘境。

1839年9月4日上午9时，义律率武装船队向九龙进发，中午时抵达九龙城外海岸边。义律的翻译郭士立乘小船上岸，向中国方面递交他用中文替义律写的两封信：一封是给清政府的，信中威胁说：此地数千英人缺乏食物接济，长此以往，冲突不可避免，清政府要对所发生的后果负责；另一封是写给沿海村民的，要求村民不要在水井里下毒。接见郭士立的中国官吏说，他们无权接受此类信件，并将郭士立赶了回去。

下午2时，义律向九龙城的中国守军下最后通牒：如果英国人在半小时内得不到食品供应，他们就要击沉停泊在九龙港内的中国水师战船。由于未达到目的，半小时后，义律便下令向最近的一艘中国战船发射了一颗炮弹，打响了战争的第一炮，中英九龙海战正式爆发。英国侵略军的野蛮行径激起了中国官兵的强烈义愤。驻守九龙寨炮台的大鹏营参将赖恩爵当即命令各水师船队奋勇回击，岸上九龙寨炮台同时猛烈轰击英船。



>> 九龙海战

在一份奏折中，大鹏营参将赖恩爵对九龙海战作了详细的描述：这一天（9月4日），赖恩爵带领三只师船，在九龙山口岸查禁接济，防护炮台，该处距尖沙咀约二十余里。中午时分，义律带大小船只五艘以买食品为名驶来，趁清军不备，开炮袭击。我军展开还击轰毙夷人多名。战斗一直进行到下午6时半，英船逃回尖沙咀，战事结束。

九龙海战历时5小时，中方士兵2名阵亡、2名重伤、4名轻伤，水师船稍有破损。英国侵略者受到了应得的惩罚，其伤亡情况，据新安县知县梁星源禀报：洋人捞起尸首17具，就近掩埋。“捞获夷人帽数顶”，另有一名假扮兵船船主的，“手腕被炮打断”，“英军受伤人数不计其数”。据说，义律的帽圈也被炮弹打掉，差点丧命。

历史回响



虽然九龙海战的规模较小，但它是鸦片战争前夕英国侵略者在中国第一次诉诸武力。从香港史的角度来看，这次海战标志着英国武装入侵香港地区的开端。由于当时中国水师船只小，武器装备十分落后，依然以冷兵器为主，热兵器都是些鸟枪、土炮，射程短，命中率低。而英国已拥有坚船利炮，武器十分先进，不仅射程远，命中率也高，杀伤力很大。因此，九龙海战是一次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之战。这次海战，狠狠地打击了英国侵略军的嚣张气焰，振奋了人心，充分显示了中国官兵为保卫祖国领土主权的力量和信念。九龙海战是中国近代史上反抗外来侵略并取得胜利的第一战，赖恩爵也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英雄，成为人民敬仰的将军。如今坐落在大鹏镇的“振威将军第”，成了人们瞻仰这位英雄的场所，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基地。

一句话点评



一名参加了九龙海战的英国士兵亚当·埃姆斯利在家信中写道：“我希望我绝对不再参加这种战斗。在这次战斗中，我们已经被揍得很够受的了。”

英军强行占领香港岛



琦善与英国人谈判

关键词

关键时间 1841年1月25日

关键事件 英军占领香港岛 琦善与义律谈判

关键人物 琦善 义律

背景扫描



英国侵略者对香港觊觎已久。1741年时，英国兵舰第一次到中国海，就曾在香港南面停泊修理。1793年和1816年，英政府先后派马戛尔尼使团和阿美士德使团两度访华，提出割让海岛的无理要求，均被清政府断然回绝。

从19世纪初起，英国侵略者就开始有计划地对香港地区海域和香港岛进行全面勘察和测绘，英国东印度公司测量员霍斯伯格还向英外交部报告说，汲水门西部是香港岛与南丫岛之间东博寮海峡的良好避风处与抛锚地，港岛南部的大潭港也是一个良好的避风港。同时，英国海军频繁出没于中国东南沿海一带，侵犯中国领海，并利用香港水域进行大规模的鸦片走私活动。

由于鸦片走私日益猖獗，英国在珠江口外占据一个岛屿的欲望愈发强烈。1820年4月清政府发布禁烟令后，英国烟船一时不敢再驶入黄埔，大量汇集到香港附近海域。1837年，英国船只未经许可私自在香港建立了“居留地”。

清政府钦差大臣林则徐在广东的禁烟行动引起了英国

朝野的恐慌。1840年2月，英政府决定向中国派出由乔治·懿律率领的东方远征军。6月，英军船舰40余艘及士兵4 000人云集香港岛北部海面（今维多利亚港），随即北上侵犯厦门、攻陷定海，7月抵达白河口，向清政府提出赔偿烟款、割让海岛等无理要求。

脉络纵横



1840年9月，道光皇帝下谕将林则徐和两广总督邓廷桢革职，派直隶总督大学士琦善为钦差大臣作为清廷代表，与英方进行谈判。12月，查理·义律成为英方全权公使，琦善接任两广总督，琦善和义律开始通过照会往来进行谈判。

12月11日，义律凭借武力，首次提出割让香港的无理要求。12月12日，义律一方面指挥英军舰队向珠江口内的穿鼻诸炮台靠近；另一方面则照会琦善，提出若要以开放广州、厦门、定海3处口岸去换取英军撤出定海，那么英国士兵将在香港暂屯，等各事商定后再撤回本国。琦善表示拒绝割让海岛的要求，义律就以派重兵攻打相要挟。12月15日，琦善照会义律，再次表示割地是“天朝从来未有之事，断不能行”，但可代奏朝廷，给予码头一处。12月17日，义律照会琦善，同意清廷赔款的数额为600万银圆，但要附加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5处口岸的条件，并于12月26日声称，若不答应所有条款，就用武力来解决。12月29日，义律提出在香港“竖旗自治”。对此，琦善于1841年1月2日照会义律，表示拒绝其要求。于是，义律与海军总司令伯麦分别通知琦善，限三日内答复，并以用武力来解决双方分歧相威胁。

1841年1月7日，义律率舰队突袭珠江要塞，攻陷虎门外围的沙角、大角炮台。三江协副将领陈连陞父子，以及沙角炮台总兵张清龄等数百名清军将士阵亡。虎门被占，省城屏障顿失，广州岌岌可危，琦善方寸大乱，自此对义律的照会，即到即复，完全陷于被动。1月8日，义律照会琦善，提出：将已经被英军占据的沙角一地留给英人据守，作为贸易寄寓之所；在广州开港贸易，所有贸易事务即在沙角办理等。1月10日，义律又在照会

中威胁琦善。琦善见英方真要动武，唯恐省城难保，赶紧于1月11日致函义律，答应考虑英方的要求并代奏清廷，给予其“寄居地”。

1月14日，义律照会琦善，将要求升格，即要清廷“将尖沙咀、香港等处，让给英国主治，为寄居贸易之所”。1月15日，琦善答复道：尖沙咀与香港之间只能择其一处“寄寓泊船”。义律于同日回复琦善：割让香港岛为英国寄居贸易之所，才归还定海和沙角、大角等地。1月20日，义律又照会琦善，表示愿意立即归还沙角、大角等地，但要英方撤走的兵船与军队集中至九龙附近的香港岛驻扎。

义律已经迫不及待，就在1月20日照会琦善的当天，单方面发布公告，指出双方已共同订立了一项草约，其条款有：割让香港岛屿和港口给英国君主；向英国政府赔款600万银圆等。

此公告就是所谓的《穿鼻草约》。其实，琦善并未在草约上签字，事后清政府也始终没有批准盖章，所以这个草约根本不具备法律效力，但草约仍被英国殖民主义者用作侵占香港的原始依据。1月24日，伯麦下令占领香港岛，并指派英舰“硫磺”号执行此项任务。据该舰舰长爱德华·贝尔彻回忆，“硫磺”号接到命令后，当天从大屿山西南部的港湾驶往香港，着手对该岛进行勘察。

1841年1月25日——一个普通的日子，但这是一个让华夏儿女铭心难忘的日子。当天上午，英舰“硫磺”号船员在舰长贝尔彻率领下在香港西北首先登陆且探测地形。贝尔彻舰长描述当时情况：“我们在1841年1月25日（星期一）上午8时15分登上陆地。作为真正的首批占领者，我们在占领峰上为女王陛下的健康三次干杯。舰队于26日到达，海军陆战队登陆，在我们的驻地升起英国国旗。司令官伯麦爵士在舰队的其他军官陪同下，在陆战队施



>>香港西区水坑口(1841年1月25日英国军队占领香港时，在此首次登陆)

放的礼炮和各军舰的隆隆礼炮声中，正式占领该岛。”贝尔彻提到的“占领峰”，又名“占领角”，是英国侵略者为纪念武装占领香港而命名的，中国名称是“大笪地”，在今天的上环水坑口街附近，因市政建设的发展，现已面目全非。为了给武力侵占香港岛的行径找借口，英国侵略者极力声称此事曾得到琦善的同意。

英军占据香港岛的当天，伯麦照会清军将领大鹏协副将赖恩爵，议将香港等处全岛地方让给英国主掌，清政府速将该岛所有官兵撤回。义律和伯麦于2月1日联名发布《安民告示》，要求香港居民“归顺英国，服从英国法令”等等。义律又于2月2日发布公告，重申清政府将香港岛割让给英国，宣布设立统治机构，规定所有香港海陆地方一切民众、财产，统归英国统理。

历史回响



义律因为急切要找一个英国商人可以泊舟定居的地方，而炮制出《穿鼻条约》这一纸毫无法律效力的空文，强行占领了香港。香港岛这个原来属于中国广东新安县管治的地方，终被英国人割占。香港岛被占的消息传到白金汉宫后，殖民商贾们兴奋异常，弹冠相庆，仿佛整个远东市场已成为他们的囊中之物。义律因此被盛赞为香港的“开埠英雄”。

一句话点评



义律于1841年6月致函印度总督，向他说明英国占领香港的重要性：“即使中国的君主在我们的胁迫下答应开放港口，那御玺并不能保障英人的性命和财产……我们的商人不能得到妥善有效的保护，使我急切地寻求一个在我国国旗保护下的安全商业据点。香港在我们的掌握中，驻有足够的海军，我认为实在无须在东岸（即江浙沿海）建立永久根据地。”

自由港的开端



查理·义律

关键词

关键时间 1841年6月7日

关键地点 香港中环

关键人物 查理·义律

关键事件 义律宣布香港为自由港 首次地皮拍卖

背景扫描



1841年1月25日，英国以武力侵占香港后，在这里建立起了殖民主义制度。在第一任港督璞鼎查就职前，香港实行半军事化殖民统治，由英国远东舰队司令伯麦与英国驻华全权代表兼商务总监义律共同负责。2月2日，义律宣布：在英国政府没有进一步指示之前，香港岛的统治权由商务监督署负责执行，因此实际主持香港事务的就是义律。义律获得英资洋行中的林赛洋行、渣甸洋行（现怡和财团的前身）等的支持，决定将这个岛辟为商埠。

要将香港建成商埠并非一件易事。香港当时只不过是英国向中国倾销鸦片的一个中转站。英国贵族们对它根本不屑一顾，因为这里既贫瘠落后又遥远；冒险家们也不太感兴趣，因为这里不像江浙沿海那样充满发财的机会。另外，这里海盗猖獗、瘟疫流行，夏天常有飓风肆虐，秋冬又常有火灾为患。义律深受亚当·斯密创立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影响，经过仔细分析影响香港发展的各种自然和社

会条件之后，他得出一个结论：只有实行自由港政策，香港才能发展繁荣。在取得英国政府同意后，1841年6月7日，义律宣布香港为远东第一个自由港。自此香港开始了英国殖民统治下自由港的发展进程。

所谓自由港，就是商品可以免征关税自由进出的港口、海港地区或海港城市。自由港政策，是英国在占领香港后不久所采取的一项极其重要的政策。

那么，义律及英国政府在当时为什么要选择香港作为自由港呢？首先，英国当年开辟香港为自由港是其殖民政策的产物。由于推行自由贸易政策可以使英国获得丰厚的利益，因此这一政策就成为它凭自己的商品优势进行对外扩张和掠夺殖民地财富的重要手段。其次，随着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中国在一定程度上也卷入了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链条中，资本主义列强已越来越看中中国这一物产丰富的宝库和市场。英国选中位于珠江口以东，水路直通广州，可以深入中国广大腹地的香港，作为向中国市场销售鸦片和从事其他贸易活动的跳板和门户就是可以理解的了。但是，香港地区狭小，缺乏自然资源，粮食和其他日用品大部分依赖进口，而且与内地的交通也不便，铁路、公路尚未修通以前，转口港作用的发挥受到限制；同时，当时尚处于风帆时代，没有万吨巨轮，深水港的优势也未显现。在这种情况下，要想把商人吸引进来，使香港成为英国在远东的一个贸易中心，唯一可供英国政府选择的，就是在香港实行自由港政策，允许商品自由进出，不收关税，否则，没有人愿意多费一道手续，把货物运到这里来再转口到其他地区。

脉络纵横



在取得英国政府同意后，1841年6月7日，也就是在香港被割占前一年多，义律正式发布公告，宣布香港为远东第一个自由港：船只可以自由进入香港港口，并且可以获得英国长官的充分保护；港英政府对进出货物一概不收捐税；中国人出入境来去自由，不受任何限制。

自由港政策实行不久，果然收到了成效，来港贸易的商船和商人与日

俱增。于是，港英当局即着手建立海港城市、仓库、码头等市政建设项目。香港建埠的地点原来选在南部的赤柱，这里虽然与北方有山岭相隔，在防卫上较为有利，但海风猛烈，疟疾流行。北部裙带路（今皇后大道西）一带虽人口稀少，地势高峻，可供建设的平地无几，但该地濒临维多利亚港，这一巨大的优越性是赤柱无可比拟的。因此，英国殖民者最终还是看中了港岛北部，决定在今维多利亚港岸边的中环一带开辟商业区。

除南部个别地区，港岛的全部土地均被殖民当局指为“公地”。为了更大程度地吸引英商和其他外国商人前来贸易、居住，同时增加港英当局的收入，义律决定采取拍卖香港土地的重大措施。1841年6月14日，港英政府将维多利亚湾划出40幅地段，首次进行公开拍卖。每幅底价很便宜，只需10英镑。英商竞相投买，竞投的结果，最低价投到每幅20英镑，最高价每幅投到265英镑，平均每幅地段价值71英镑，共售出33幅土地，全部面积9英亩，得3 431英镑。中标者绝大部分是英资洋行，有渣甸洋行（怡和洋行的前身）、颠地洋行（又称宝顺洋行）、林赛洋行和端拿洋行等。根据当日的规定，投得公地者必须在6个月内在地上兴建房



>>威廉·渣甸



>>中区海旁建筑。左第一间是渣甸洋行

屋或其他建筑物，费用不得少于222英镑或1 000银圆。另外，投得公地者只拥有该地的租用权，每年仍需向香港政府缴纳地租。香港政府每年从投地中可收地租3 032英镑。

在第一批投得土地的英资洋行中，渣甸洋行（即怡和洋行），可以说是洋行中首屈一指的代表，只有它至今仍拥有原来的大部分土地并不断发展。此后，大批英国商人陆续来到香港，开办了糖厂、酒厂、水泥厂、纺织厂、面粉厂等一批近代工厂。到1845年前后，一座新城市的轮廓已经在维多利亚港南岸出现。英国殖民主义者为了纪念他们的女王，把这个新的城市称为“维多利亚城”（Victoria City），成为东方的第一个欧洲人的城镇。

历史回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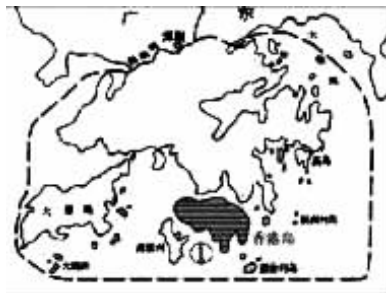
当时的自由港政策主要体现在贸易方面，它允许商品自由进出。这个政策当然是为英国殖民利益服务的，但它的效果是明显的。在该政策的吸引下，1841年以后，不仅英商，不少其他欧籍商人及东南亚商人都纷纷到港经商，世界各地的货物、资金、技术和人才都聚拢到这个渔岛上来。据记载，1841—1843年，仅两年时间，香港便有英国人开设的大商行12间，印度人开设的大商行6间，各国商人开办的小商行几十间，这些商行从事的多为货仓业、贸易等。其中，率先竞投港地的渣甸洋行（怡和洋行）对香港的影响尤为突出。

一句话点评



港英政府实行的自由港政策，使转口贸易发展起来了，围绕转口贸易的其他部门，如航运、船务、港口、码头、货仓、保险、银行、邮电通讯等行业也都应运兴起。可以说，自由港政策使香港经济发展步入了快车道。

《南京条约》与香港的割让



《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岛示意图

关键词

关键时间 1842年8月29日
关键地点 南京江面
关键人物 耆英 璞鼎查
关键词汇 《南京条约》 割让香港

背景扫描



1841年1月25日英军强占香港岛。对于香港失陷和琦善的软弱无能，道光皇帝极为愤怒，下旨将琦善革职，另派皇侄奕山为靖逆将军，户部尚书隆文和湖南提督杨芳为参赞大臣，调湖南、湖北等7省的“绿营兵”约2万人开赴广州与英军作战。与此同时，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也对《穿鼻草约》的内容十分不满：认为赔款太少，香港的地位也不甚明确；允许中国继续在香港征税，香港就不能算是英国的属地。于是，他立即召义律回国，另派璞鼎查为全权代表，企图逼迫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接受其全部侵略要求，包括割让香港岛，使英国对香港的非法占领合法化。

1841年8月20日，璞鼎查率领军舰37艘，兵士3 500人，北上进攻中国沿海城市，中英战事再起。面对英国军队的进攻，中国军民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由于道光皇帝在“战”“和”问题上摇摆不定，清军将领大多腐败无能，加之清军的武器落后，根本无法抵御英军的猛烈进攻，导致军

事上接连失利。1842年5月起，英军集中兵力攻击长江沿线城市，计划控制中国最富庶的长江中下游地区，迫使清政府接受其全部侵略要求。8月4日，英军兵临南京城下。道光皇帝惊慌失措，决意求和，遂命令钦差大臣、盛京将军耆英和原两江总督伊里布赶往南京与英国人谈判。标志近代中国屈辱历史开端的城下之盟就这样拉开了帷幕。

脉络纵横



1842年8月10日，英方大小舰艇共85艘齐集南京江面，以武力示威，摆出炮轰南京城的阵势，并提出割地、赔款（英军向两江总督牛鉴索取赎城费300万银圆）、开放通商口岸等作为停战的先决条件。已成惊弓之鸟的钦差大臣耆英、伊里布依照道光皇帝的喻令，与英方讨论议和问题。

8月12日，璞鼎查提出了割让香港岛的条款。在谈判过程中，璞鼎查盛气凌人，开列议和条款，声明必须一字不改地全部接受停战条件。而香港岛的割让在《南京条约》谈判中并未引起重大争议，因为这是城下之盟，中方完全处于任人宰割的地位。早在英军攻占镇江之前，道光皇帝在给耆英的密谕中，已表示可以“将香港一处，赏给尔（英）国堆积货物”。因此，清朝有关官员在接到璞鼎查的条约条款后，对割让香港并无半点犹豫。8月15日，耆英、伊里布、牛鉴等在致璞鼎查的照会中，轻易地答应英方说：“香港地方业经英国盖造房屋，应准寄居。”璞鼎查最初要求写明，割让香港是为了赎“侮辱”英国女王和扣留英国商务监督之“罪”，后来为了照顾清廷面子，才答应在措辞上作一些修改。在1842年8月11日至29日的条约谈判中，清朝代表在英方的军事压力下毫无反抗能力。英方不允许清方对其提出的条件做任何修改，屡屡以进攻南京相要挟。条约中的中英文本完全是英方一手制作的。

1842年8月29日，清政府的全权代表耆英、伊里布来到停泊在南京江面的英国军舰上签订了近代中国与外国之间的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南京当时称江宁，该条约又被称为《江宁条约》，今人惯称为《南京条约》。该条约共13款，其中第三款规定将香港割予英国：

“因英国商船远路涉洋，往往有损坏须修补者，自应给予沿海一处，以便修船及存贮所用物料。今大皇帝准将香港一岛给予英国君主暨嗣后世袭主位者，常远主掌，任便立法治理。”这便是英国割占香港岛的“法律依据”。而此时距英军强行占领香港，已过了1年零7个月的时间。

据史料记载，耆英在港待了4天，与璞鼎查相交甚善，有3事为证：其一，璞鼎查设宴招待他，他兴之所至，哼起满洲小调，璞鼎查亦以西洋歌曲对唱；其二，璞鼎查以全家福照片相赠，以示友谊，耆英亦认璞鼎查之子为义子；其三，耆英将所佩金环和书画纸扇一柄赠与璞鼎查，后者回赠西洋刀一把。会谈结束后，双方长时间相拥，耆英更是热泪盈眶。此情此景，倘若是在互换平等条约，自是外交佳话一段，但中国换出去的是主权，换回来的是屈辱，后人见此，该作何慨？

1843年6月，耆英自广州前往香港。6月26日，耆英与璞鼎查在香港举行了《南京条约》的换文仪式。仪式结束后，璞鼎查就任首任港督并正式宣布香港岛成为英国领土。至此，中国南海宝岛香港的割让遂成定局，英国实现了侵占香港地区的第一步。

自1839年英国派遣军舰东来，挑起鸦片战争及占领香港，实际上是英国殖民势力自18世纪下半叶以来向东扩展的延续。所以英国占领香港，不仅仅是建立了一块远东的殖民地，而且也拥有了远东地区的重要军事基地和扩大在华利益的前哨站。



>>>《南京条约》抄件

历史回响



《南京条约》是英国侵略者强迫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也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一个沉沦和屈辱的世纪从此开始。《南京条约》签订后，美国、法国相继效仿，胁迫清廷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规定美国、法国享受《南京条约》中除割地、赔款外的一切特权，后来，沙俄、葡萄牙、荷兰等国也争相要求各种特权，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从此，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对于香港来说，《南京条约》的签订，给英国侵略者强占香港岛披上了一层“合法”外衣，即拥有永远据有香港岛的“法律依据”，这是英国在《南京条约》中所摄取的最大“成果”，标志着这片中国领土从此被英国殖民统治。

一句话点评



《南京条约》完全是英国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是在英国用大炮、军舰威胁要攻占南京城的武力要挟下逼签的。事实证明，从第一艘英国商船到达中国东南沿海至《南京条约》的签订的全过程，无一不反映出当时英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

“总督的地位仅次于上帝” ——香港殖民体制的初步确立



璞
鼎
查

关键词

关键时间 1843年4月5日

关键人物 维多利亚女王 璞鼎查

关键词汇 《香港宪章》 《致璞鼎查训令》

背景扫描



1842年8月29日《南京条约》签署，英国正式占领香港岛，开始其对香港长达150余年的殖民统治。香港成为英国殖民地后，英国殖民当局的首要任务就是建立起一整套殖民统治机构及其制度，为香港的未来体制和发展方向绘制蓝图。

实际上，早在1842年2月27日，当时的英军司令璞鼎查就将其大本营从澳门迁到香港，开始亲自处理香港政务。由于绝大多数香港居民是中国人，他担心居于少数的英国人难以实行有效统治，便听取在港英商的建议，向伦敦外交部提出在香港采用权力集中、控制严密的皇家殖民地制度，总督是其政府首长，并兼任驻华全权代表和商务监督的方案。1843年1月，英国政府初步决定将香港划为属殖民地部的“直辖殖民地”，同时决定由负责对华贸易和外交事务的驻华全权代表和商务监督兼任香港总督。1843年4月5

日签署的《香港宪章》，就是英国在香港实行殖民政治制度及宪法的蓝本。

脉络纵横



《香港宪章》，是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签署的正式宣布香港为英殖民地的法令，通称《香港授命状》。

1843年4月5日，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签署《香港宪章》，并以《英皇制诰》名义颁布，宣称香港从此成为英国殖民地，确定了香港的地位和政权性质。与此同时，规定设立香港总督职位，授予其广泛的统治权力，主要包括：有咨询立法局后制定香港法律和法例的全权；有权召开行政局会议（行政局的任务是提供咨询，协助港督制定政策）；有执掌和使用香港殖民地公章的全权；有代表英王授予私人或团体土地的全权；有委任按察司及太平绅士之权；有将任何香港官员停职之权；有赦免罪犯或减刑之权；有豁免50英镑以下罚金之权；香港所有文武官员和居民都应服从港督。《英皇制诰》规定了英国政府及香港总督统治香港的权限，对设立行政局、立法局也作了原则规定。

4月6日，英国战争及殖民地部大臣士丹利致函护理港督璞鼎查，命令他按《香港宪章》和该函的指示组织香港政府。这是英国建立香港政治体制的最早执行指示，主要为有关香港行政和立法两局的组成、权力和程序的具体规定，如两局成员的任命、行政局议事种类、总督咨询行政局的责任以及总督反对行政局意见的权力，同时对立法局成员的资格、选举事宜、议事种类，以及该局通过法例的形式和不通过法例的种类等作出规定。这封称为《致璞鼎查训令》的函件是对《香港宪章》的补充，二者具有同等效力。《香港宪章》和《致璞鼎查训令》是英国把香港列入它的直辖殖民地的最早官方文件，分别成为1917年《英皇制诰》和《皇室训令》的原始蓝本。

香港政府的政治体制模仿英廷。三权并立，最高行政长官是香港总督，总督由英国理藩部任命，在总督下设议政局、定例局。对于行政局，规定行政长官6人：陆军将军、辅政司、律政司（法官）、库务司（财政司）、华

民政司（最初称抚华道）、工务司。立法局规定官守议员6人；非官守议员5人，任期为6年。此5人中，英国人占其二，1人为华人，其余2人由公众推举：一由西商会，一由太平绅士（太平绅士是香港有名望之人，曾为公众服务、对香港有功者，如曾担任东华医院总理、保良局总理等），俗称华人代表，其后或捐或益，因时制宜，有所改变。如开埠不久，即增加教育司、卫生总监、警察司、劳工司等等。曾任定例局非官守议员的香港人，有何东、何启、何棣生、罗旭和、周寿臣、周少岐、周俊年、周锡年、刘铸伯、曹善允等等。但是中西议员名额相比，华人占少数。因此在议例中，华人代表只能唯唯诺诺，唯总督之命是听。

根据《英皇制诰》和《皇室训令》，香港总督是英女王的全权代表，由英女王根据外交大臣的提名任命，具有领导香港一切政务的最高权力。港督之下设5个系统：①两个带决策性质的咨询机构——行政局和立法局；②以布政司为首的行政部门；③以首席按察司为首的司法部门；④以驻港英军司令为首的军事部门；⑤总督特派廉政专员公署。

总督担任行政和立法两局的当然主席，独揽立法和行政的大权。总督作为香港最高行政事务负责人，日常的政务交由布政司具体负责，总督通过布政司向各部门负责人传达有关行政和政策方面的重要指示。所有在香港实行的政策决定，都必须经过总督，或通过行政局以总督名义批准。行政局向总督提供意见，以备总督发出指



>> 维多利亚女王

示。立法局通过的任何条例，也须经过总督最后批准才能成为法律。总督可以任命局、委员会和各部门的人选。经公务员铨叙委员会建议，委任文职人员。虽然高级官吏如布政司、财政司、律政司须经伦敦国务大臣批准，但总督的意见具有决定性作用。除最高法院和地方法院法官外，总督还有权对所属官员下令停职、免职和给予纪律处分。

总督还有宽恕特权。对于判刑的任何罪犯，总督可以对其实行赦免，或者减轻刑期、罚金等。总督对于法院已经判处死刑的犯人，可以要求将案件交由行政局复查，但是可以不受行政局建议的约束，执行、决定任何

赦免或缓期执行决议。

香港总督在名义上还是香港的三军总司令。他虽然不直接指挥正规部队，但是他有权取得一切文武官员的“服从、援助和帮助”。英军驻港司令应向港督提供部队的兵力和在香港的防务情况。1859年以前，香港总督还兼有英国驻华全权公使和商务总监的职务。虽然在军事防务、国际关系等重大问题上仍然要由伦敦决定，但是伦敦英国政府对于香港地方政策事务向来较少干预，所以，香港总督有很大的相对独立的权力。

当然，总督的行为并非不受任何限制，他的权力受以下几方面制约：不能违反殖民地部训令；英皇对香港法律享有否决权；英国国会或英皇会同枢密院，可以为香港立法。此外，他处理问题时还需要考虑公众舆论（主要是英商和华人上层人士的意见），防止因公众不满而引起英国政府的调查和议会的质询。一百多年来，曾有两任港督因滥用权力引起英商和华人强烈不满，被迫在任满前“辞职”。一个是第二任港督德庇时（1844—1848年在任）。他同在港英商政见有分歧，又同新任的首席按察司争权。英商抵制他征收财产登记费和人口登记费，同时支持首席按察司共同反对他，结果他只好“辞职”。另一个是第九任港督宝云（1883—1885年在任）。当时法国侵略中国，发生中法战争。香港华人，特别是工人声讨法国侵略行径，拒绝为抵港的法国船只服务，港英政府却处罚工人，引起罢工和暴动，接着港英当局又出动了军警镇压工人。由于当时英国同法国也有矛盾，因而最后由港英当局同华人团体谈判而平息罢工。宝云不得不以健康问题为理由，任期未便提前“退休”。

1843年6月26日，《南京条约》的换文仪式在香港举行，仪式结束后，璞鼎查宣誓正式就任香港总督，并于次日宣布正式成立行政局和立法局。从此，香港被英国人视为海外殖民地，揭开了150余年殖民统治的序幕。早期香港总督兼任驻华全权代表和商务监督，受殖民部和外交部的双重管辖。从1859年开始，香港总督才专一管理香港事务。香港总督的任期没有明文规定，惯例一般为五年，但也有例外。如首任总督璞鼎查任期只有一年多，而第22任总督葛量洪与第25任总督麦理浩的任期都长达十年多。从1843年璞鼎查就任第一任港督，到1992年彭定康上任，香港前后共有28任总督。

历史回响



自《香港宪章》签署后，香港总督作为最高权力的代表统辖香港，无论在行政或立法方面都集大权于一身，在司法方面也拥有一定的权力，凌驾于一切之上，其他任何个人与机构都无法和他平起平坐，堪称地地道道的“无冕之王”。他们的决策对香港历史进程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初期总督甚至对英国的远东政策也有重要影响。正如英国学者迈乐文在《香港的政府与政治》一书中所说：“港督的法定权力达到这样的程度：如果他愿意行使自己的全部权力的话，他可以使自己成为一个小小的独裁者。”看到这一点，便抓住了19世纪香港政治制度的中心环节。

一句话点评



第22任香港总督葛量洪（1947—1957年在任）在其回忆录中曾说：“在这个英国直辖殖民地，总督的地位仅次于上帝。他每到一处地方，人人都要起立，在任何情况下都遵从他的意见——永远都是：‘是，爵士’‘是，阁下’。

人头税引起大罢市



约翰·德庇时

关键词

关键时间 1844年8—11月

关键人物 约翰·德庇时

关键事件 《人口登记条例》的通过

背景扫描



1844年，约翰·德庇时继璞鼎查之后出任香港第二任总督。刚就任，他便面临香港犯罪案件日渐增多的难题。

早期香港的人口迅速增加，究其原因，部分是由于许多罪犯、歹徒从中国内地潜逃到香港。而警察力量方面，一部分是由欧洲籍的水手和士兵构成，成分复杂，而且听不懂中国话；另一部分中国籍的警察又被认为懒惰，且不可靠。故整个警察力量实在不足以应付香港的犯罪活动。当时街上的拦路打劫时常发生，港内不时有海盗骚扰。

针对上述情况，德庇时想通过增加税收来增强警力，同时更普遍地进行人口登记，以便将可疑和妨碍治安的人物递解出境。于是，1844年8月通过了《人口登记条例》，但这一条例却成为香港中外市民罢市的导火线。

脉络纵横



1844年11月发生的香港大罢市，是指在关于征收人头税一事上，香港总督德庇时与香港华洋商民之间的冲突。

德庇时原是东印度公司的代表，曾参加过1817年英国特派访清大使阿美士德的使团，同马礼逊一同担任过使团的译员。1835年，他担任驻广州的英国商务监督。德庇时是一位中国通，熟悉中国情况，也熟悉在华英商。1844年，他出任香港第二任总督后，为改良香港的社会秩序和治安环境，授意立法局于8月21日通过了第16号条例——《人口登记条例》。该条例规定：全岛居民，不论华洋贫富，一律每年一次到港英政府总登记官处办理姓名、住址、职业登记，领取登记证；洋人每人每年收费5元，华人每人每年收费1元；从条例颁布当年11月1日起实行。

这一项条例所采用的是类似今日香港所用的身份证办法，不分中外都要登记，而且登记时每人要纳税，政府就用这笔税收来增强警力。这一出发点是很好的，但德庇时对于开征这一项有关香港中外全体市民的税目，事先从未向任何方面征询意见，而且讳莫如深。因此，条例公布之后，便引起了香港市民的强烈不满。在港英商认为此条例不征询民意，不啻是人头税，而且违反英国立法征税“无代表不征税”的传统原则，他们又从种族的优越感出发，认为这样收费降低了他们的身份，觉得洋人与华人仅是几元钱的差别，有失体面，所以一致反对。在港华人方面，更因《香港政府公报》公布中文译本时，将每人每年登记、纳税一次的办法错译成每人每月要登记、纳税一次，认为此条例不公平，这样繁重的苛税对于他们收入的剥削，简直比国内的厘捐还要厉害，而他们正是为了逃避厘捐才来到香港的。于是他们酝酿罢市，反对这一税目，同时表示如果真的实行，则准备离开香港返乡。

这年10月28日，香港英商在一位名叫卡特的人家里召开了居民大会，主要讨论此事并表示他们的愤怒。这是香港开埠以来的第一次居民大会。大家一致反对这一纳税登记条例，并成立了委员会，起草了一份意见书呈

交总督德庇时及立法局，同时提出选举议员代表和都市自治的要求。华人方面则决定罢工以反对。10月30日，香港华商全体罢市休息，商店关门，运货和售物的船只停止开行，仆役罢工，一切生意都陷入停顿。仅一天之内，因罢工、罢市而返回广东省的就有3 000多人。10月31日，港英政府及私人雇用的中国工人几乎全部罢工。英籍居民鉴于香港市面情况严重，在这一天又开会起草了一封呈文，指出市面商业停顿，人心惶惶，要求政府应有所表示，借以安定人心。

11月1日，全港店铺、街市同时关门停业，香港有史以来第一次大罢市由此爆发。瞬间，香港市面显得萧条凄凉，食品供应随之中断。之后，华人因拒绝将粮食运往英军兵营，遭到港英当局的拘捕和鞭笞，致使事态进一步扩大。为了支持市民罢市，香港从事水陆运输的工人也开始了罢工，穗港交通因此中断。同日，华人代表上书抗议。但是，港督态度傲慢，表示在停止罢市、罢工之前，不接受任何条件。港督的这种态度，深深激怒了华人，罢市、罢工继续进行，香港市面陷于瘫痪。11月2日，有一家洋行的买办召集中国居民开会，措辞与英籍居民所采用的差不多。德庇时总督认为其有唆使中国居民与政府为难之嫌，于是下令加以申斥。但是英籍居民仍继续召集会议，表示对于这样苛刻的条例难以承认，主张如果政府坚持执行，他们决意迁到澳门去，认为在澳门反而可以享受到若干他们认为与生俱来应享的个人自由。后来港督召见居民委员会的代表，表示条例虽然公布，但无意在一两月内即予执行，并表示将来即使执行，也将是针对部分居民。其实，这是缓冲的办法。当旅居广州的英籍商民知道香港公布了这样的人头税条例后，他们也在11月6日向德庇时总督递交了一封强硬的抗议书，指出这样的征税登记方法，不仅违反英国立法精神，侵犯了女王赋予臣民的自由，并且妨碍殖民地的发展。同时又有人向伦敦上书，表明殖民地居民对当地这样的政府已失去信心。

鉴于局势的日趋严重，港督为了尽快恢复市面的繁荣，不得不宣布暂停实行《人口登记条例》。11月13日，香港立法局重新修订了该条例，并通过了第18号条例，即《人口登记及调查户口条例》。新条例首先免除了收取登记费用一项；其次，规定凡是公务人员、军人、专业人士、商人、店员、厂主、房东，或每年收入达500元的人士，无论中外，一律免予登记。该条

例放弃了全部居民的纳税登记，只有那些贫苦大众、收入微薄的居民，才必须办理人口登记，登记的内容为姓名、地址、职业等。《人口登记及调查户口条例》于1845年1月1日正式生效。这样，由港督抽人头税引起的大罢市才告平息。

历史回响



约翰·德庇时，这位深通中英商务关系的中国通，在就任香港总督之后，其施政竟极不得香港市民的拥戴。不仅中国市民反对他，闹成罢市风潮，就是英国籍的市民也一再开会书反对他的施政。这场由于总督抽人头税而引起的大罢市，最终由立法局通过关于居民登记法令的修正案，放弃了全部居民的纳税登记而平息。修正案的规定本是德庇时总督的原意，可惜他当初不曾与居民纳税代表人磋商，以致闹出了这场大风波。

一句话点评



香港华人的罢市斗争，终于迫使港英当局接受了华人的要求，此后这场风波逐步平息。在罢市过程中，华人开始意识到团结的力量。虽然香港初年华人的地位十分低下，但是，华人首次从罢市、罢工斗争中为自己赢得了地位和尊严。

南北行——混沌时期的开拓者



南北行街景

关键词

关键时间 19世纪50—60年代
关键地点 文咸西街
关键人物 高楚香 陈焕荣
关键事件 元发行、乾泰隆行的创设

背景扫描



1841年6月7日，义律宣布香港为自由港。虽然自由港政策实行后，早期香港的经济有所发展，但并非一帆风顺。1843年底，上海、宁波等五口开放通商后，许多外商都把生意转移到上海等地，驶进香港的商船比以前大为减少。1843年下半年，香港又流行瘟疫，很多外商染病身亡。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商人对香港前途的信心动摇了。

但是，由于香港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它仍然按照经济发展的规律继续往前发展。这一时期，有两起事件使香港的经济向前跨进了一大步。第一件，19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美国西部及澳大利亚分别发现金矿，需要大批人力开采，因此，一批华工经香港乘船赴美国、澳大利亚当淘金工人。第二件，1851年1月，洪秀全发动的太平天国运动，很快从华南迅速席卷大半个中国，华南一带的一批有钱人带着财富连同家属躲到香港“避难”，其后清朝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一批太平天国的起义人员又躲到香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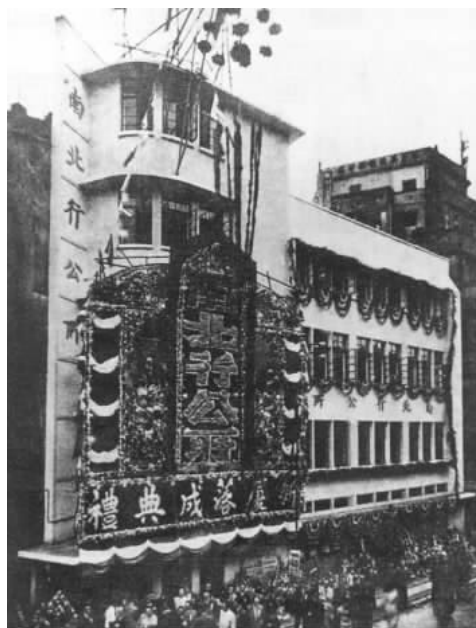
这样，不仅给香港带去了资金，也带去了一批劳动力，给香港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

脉络纵横



南北行是香港历史最悠久的行业之一，19世纪50年代开始发迹，至60年代成为香港华人商业经济中一股强大的力量。该行业主要是代客买卖，收取2%的佣金，这种方式当时称为“寄售取佣”或“九八扣佣”，故这一行业又称“九八行”。

航运业——这一标志香港早期经济发展的行业，在19世纪50年代有了较大的变化。善于经营的华人，充分利用香港的航运业，开展商业贸易活动，沟通香港与美洲、南洋、中国内地南北方的经济联系。由此涌现了将北方（包括华北和东北）出产的花生、大豆、药材、丝绸运到南方，再将南方出产的海味、大米、白糖、木材运往北方的“南北行”。南北行主要经营南北两线货品。南线以经营东南亚各地土产和食品为主；北线则以经营中国内地出口货品为主，兼营日本产品。经营东南亚贸易的有南洋庄、暹罗庄、越南庄、缅甸庄和菲律宾庄等，而经营北美贸易的则称为“金山庄”（因主要贸易对象在旧金山而得名），整个行业总称南北行。由于文咸街一带是新填地，该处接近码头，方便起落货物，故经营南北行业的商号大多集中于文咸东街与文咸西街，也分布于永乐西街和高升街，香港市民至今仍称文咸西街为“南北行街”或“南北行”。这些新兴的行业，由于适应形



>>1954 年落成的南北行公所大厦

势的发展，方便人们的需要，因此很受中国内地同胞和国外华侨的欢迎，行业发展迅速。

在港岛西区的中国商人中，南北行商人很具代表性，且发展最快。据史料记载，当时南北行的业务，主要是从事南北货物的交流，分成几个集团：广州帮是广州人所设的行庄，当时代表性的商号有裕和隆行、公发源行、佑兴隆行、广茂泰行等；代表山东籍商号的称山东帮，代表性的商号有义泰行、利源长行等；代表潮州和福建人开设的商行称潮福帮，计有聚德隆行、厚德行、源发行、元发行、金裕隆行、乾泰隆行、荣兴隆行等，其中，以潮籍人居多。善于经商的潮汕商人看准了香港这块地处华南要冲，外通五洋，连接内地，洋船出入的贸易宝地，很快从各方聚拢而来。最早开创香港南北行的是原先从事中暹贸易的潮商，高楚香和陈焕荣就是创业时期两位典型的代表人物，他们都是广东澄海县人。

高楚香（又名高满华、高廷楷），农夫出身，略通文墨。他在鸦片战争之前远渡暹罗（今泰国），曾做苦力、火头。后来有了积蓄，便购红头船（广东属远洋船）航行于潮州至暹罗，自任船主，被人称为“满华船主”，



>>20 世纪20 年代的文咸街

从事中暹大米进出口生意。1856年前后，潮州人高元盛于1850年在文咸西街创办的元发行经营不善，就将其顶让给高楚香。高楚香接手元发行后，在暹罗创设元发盛，拥有碾米厂五家，并将白米运来香港交元发行销售，同时兼营南北土产和轮船货运。元发行就是高氏中暹贸易的中转基地。1882年，高楚香逝世，香港元发行由其次子高舜琴继承，高舜琴在潮州考中举人，1892年曾任东华三院主席，元发行在他继承后继续发扬光大。

陈焕荣（字宣衣，外号佛），原本在红头船上当船工，后自购帆船穿行于国内沿海及东南亚各埠进行贩运，成为著名的红头船船主，人称“船主佛”。他与他的兄弟决定效法高氏家族的做法，于1851年在元发行附近创设乾泰隆行（注册是乾泰隆公司），作为其经营南北洋贸易的中转站。乾泰隆行做的就是原先熟悉的“南北洋贸易”，可以说是比“红头船”贸易更高一层次的转口贸易生意。它除开展一些替海外华侨返家赡养亲人的中介活动外，主要的业务是把中国的土特产如大豆、食油、杂粮、糖等出口到南洋群岛和东南亚各国，再进口南洋群岛、东南亚各国的土特产如大米、海味、木材等，部分批发给香港的华洋商人，部分转口到中国华南和日本等国。乾泰隆行是香港早期的进口大米主要供应者，也因为大米进口及转口往广东、日本等地方，乾泰隆行才得以财源广进，生意兴隆，成为香港最早的进出口大公司之一。正由于众多的南北行老板多数为潮汕人，以至于给后人留下了“南北行即潮商行”的说法。当时在香港流传这样一句话：大米靠进口，进口靠潮商。

当时迁徙香港的华人几乎清一色是为谋生而背井离乡的贫民，做生意的也尽是小商小贩。除极少数依附于洋人的鸦片商，可以说没有什么大富人，也没有什么像样的商店，元发行、乾泰隆行的创设，首开了香港华人大企业的先河，为华商投资香港树立了榜样。看到他们生意那么好，一批南洋、广州等地的商人也动了心，纷纷转移到香港，就在他们附近落脚开店，于是以元发行、乾泰隆行等为中心形成了一个热闹的商业区。

到了1868年，南北行庄越开越多，形成一个庞大的行业。同业之间常有业务上的纠纷，客商之间亦时有贸易上的纠葛，因此同业们就发起建立一间会馆，仿造广州十三行的制度，成立了“南北行公所”。自此，南北行一路风生水起。

历史回响



元发行和乾泰隆行犹如混沌时期的拓荒者，首开了香港华人南北行业的先河，为香港成为转口贸易港奠下了一块基石。资料显示：1870年，南北行街一带商人所缴纳的税款占香港税收的九成，成为当时香港当局主要的税收来源；在19世纪后期，南北行的贸易额占了当时香港贸易总额的1/4。可以说，南北行对促进早期香港经济繁荣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见多识广、头脑敏锐的南北行商人亦为香港华资的崛起起着不可估量的影响。南北行公所的成立，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在行业自律与监管方面亦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一句话点评



历史学家李欢称：“南就是香港的南面，面向南货就是南洋生意；北就是北望神州，就是祖国大陆。这个就是我们南北行，就是起到中间的作用。137年前我们祖辈已经开始做这个生意，当年这个地区比现在的中环（港岛闹市区）还厉害。”

毒面包案



关键词

关键时间：1857年1月15日

关键地点：裕盛办馆

包 关键人物：张亚霖 包令

令 关键事件：四百多名英国人食物中毒

背景扫描



1856年10月，英国借口“亚罗”号事件炮轰广州城，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因英兵烧毁广州西濠口民房，群众也于12月15日把英商馆烧掉以示报复。为抗议英军侵入广州、火烧广州民房，愤怒的在港中国居民纷纷离开香港返回内地，许多华商也关门返回乡下。当时香港的市面上经常贴有许多告示，号召为洋人做工的中国人尽快返乡，并警告那些继续卖粮食给英国人的商人，如果他们仍然不思悔改，还为英国人提供粮食，便要将他们乡下的祖屋烧毁，捉拿他们在乡下的亲人。1857年香港的毒面包案，即是在这种中英敌视的氛围中发生的。

脉络纵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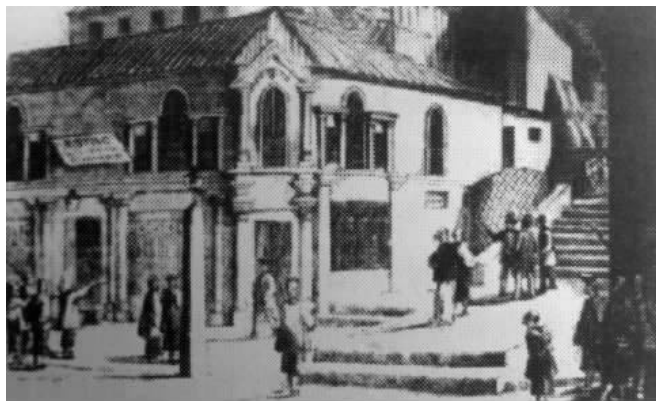
毒面包案是一百多年前在香港发生的最严重的一起集

体食物中毒案。由于以面包为主食的都是英国人，所以中毒的几乎都是英国人(包括当时的总督包令的夫人在内)。因此，虽然并未有人因此丧命，这一宗毒面包案仍被当作是大案。

1857年1月15日早上，居住在香港岛的四百多名英国人像往常一样食用由裕盛办馆提供的早餐后，发生集体中毒，腹痛、呕吐不止，包令总督的夫人也陷于昏迷状态。英人立即报警，并把中毒者送往医院救治。全港的外国人都陷入惊恐之中，来自四面八方的呼救声使香港乱作一团，死神的幽灵在这些英国人的头上徘徊……

经医院化验结果证明，当天裕盛办馆供应的面包中，含有大量烈性砒霜。

由于这次食用面包中毒的人中包括了一些高层人物，所以案件发生以后，香港警方十分重视，立即立案调查，并且很快查出出售这批面包的是位于港岛湾仔的裕盛办馆。裕盛办馆是一家专门承接在港外国人伙食的商店，包括供应全港外国人每天食用的面包，当时已颇具规模，甚至连驻港部分英军的粮食也由该店参与包办，可谓生意兴隆。店主张亚霖，广东香山县人。当时，由于香港许多商人受到警告后，已陆续结束在港营业返回乡下。而张亚霖却认为，商人只管做生意，不必介入国事，于是趁机扩大生意规模。他的这种行为，激怒了一些有血性的中国人。不久，张亚霖在广州的一间商店被警告者付之一炬，但为了赚钱，他仍然继续为英人供应粮食。



>>裕盛办馆

案发后，张亚霖成为该案件的首要嫌疑犯，警方立即派人前去拘捕。当警方赶到裕盛办馆时，只见51名工人还在工作，而张亚霖这一天一早便与他的父亲、妻子、孩子一起乘“皇后”号客轮到澳门去了。

根据这一情节，警方判断一定是张亚霖投毒后畏罪潜逃，于是立即拘捕了51名工人，并派出战舰追赶“皇后”号客轮。

次日，张亚霖被递解返港。香港的英国人十分愤怒，要求严办裕盛办馆。法庭于2月2日正式开庭审理。其实，张亚霖并不是畏罪潜逃，一家人一起乘船回澳门是早已定下的计划，他们打算从澳门转船回香山县祭扫祖坟。由于张亚霖自己家人也食了面包中毒，而且主动要求“皇后”号驶回香港（据当时的一位同行旅客说：“我听到张亚霖说，他必须返回香港。如果他愿意，他完全能够率领全家上岸逃走。”），因此也就有理由证明面包中放毒药他并不知情。值得注意的是，在此之前的1月13日，他曾签约租了一幢房子，并预付房租3个月；他又分别从外商福斯特和爱德华兹处购买过大批面粉，准备扩大生产。如果预谋放毒，他又何必这样做呢？51名工人中因为没有查到确实证据，所以只有8人涉嫌被控。张亚霖又力保这8名工人是他的好伙计，因为他自己要包办英国人的伙食，已被中国政府通缉，这8名伙计也就不可能返回乡下。

对于这些效忠于英国的人，如果在中英战争期间判他们有罪，则对香港当局不利。2月5日，审讯结束，陪审员以5比1的票数，宣告张亚霖等人罪名不能成立，予以释放。

张亚霖等人的被释立刻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当时，英方有人主张宁可抓错人，也比承认聪明能干的英国人不能查明真相为好。有些曾中毒的英国人则扬言要用私刑将这些中国人一律处死。于是，包令援用1857年第二号法令《维持本港安全和平条例》，再次将张亚霖和他的全部工人拘捕起来，并向英国方面报告。

港英当局的做法激起了当地华人及一部分英国人的反对。2月7日，在港华人集会，要求总督准许被告等自由离境。鉴于各种原因，包令只得将张亚霖以外的51名被拘捕者释放。

经过激烈的辩论，英国殖民地部于5月8日复函，称在找不到投毒证据的情况下，将全部被拘人员一律驱逐出境了案。同年7月底，由总督包令签发递解令，允许张亚霖自由离境。张亚霖于被释次日即乘船离港，到越南的西贡经商去了。

这件事发生之后，港岛的洋人再也不敢到中国人开办的面包店购买面

包，都转向西方商人开办的面包行购买。但不久，英人的面包行又遭火灾，烧毁面粉1 000余包，损失惨重。

历史回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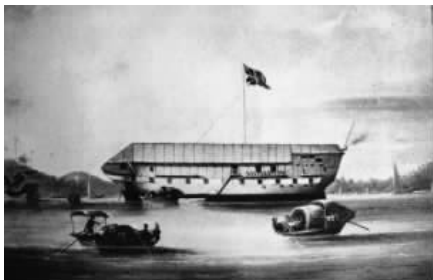
毒面包案中，究竟何人投毒，真相如何，迄今仍是一个谜。百余年来，对此案件作评介的华文著述汗牛充栋。大部分著述视不知名的投毒者为民族英雄，称其大长国民志气，大灭英寇威风；少数著述认为，不管投毒者动机如何，至少食毒面包的妇女儿童是无辜的，不可以抗英壮举称许。对于当时的面包为何含有大量砒霜仍然存在争论，其中一个较为让人信服的说法是，裕盛办馆购买的面粉在轮船运送的时候被同仓的一批砒石所污染。毒面包案的发生，对于在香港久受英国殖民统治压迫的华人而言，确实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但它也使英人、华人之间的对立加剧，导致香港经济一度停滞。

一句话点评



恩格斯曾在毒面包案发生之后，作过十分精辟的评论：“我们不要像骑士般的英国人那样去斥责中国人可怕的残暴行为。最好承认这是保卫社稷和家园的战争，这是保存中华民族的人民战争。”

港岛——19世纪不沉的鸦片走私基地



伶仃洋上的鸦片走私船

关键词

关键时间 19世纪中叶

关键地点 伶仃洋

关键词汇 鸦片走私

背景扫描



在传统的中英贸易中，中国一直处于出超地位，中国所产的茶叶、瓷器、丝绸在欧洲市场上广受欢迎，而英国对外输出的工业品如纺织品等则门庭冷落，这是因为19世纪初中国并没有对这些东西的需求，人们日常所需的一切都靠自己生产。正如踌躇满志的乾隆皇帝所说：大清帝国地大物博，什么都不缺，哪里需要与欧罗巴蛮荒之地通商。然而他太自信了，哪知在中英贸易中屡屡碰壁的英国人终于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这就是鸦片。至此，鸦片从西方源源不断地涌入中国，而香港就成为鸦片输入的基地。

脉络纵横



从19世纪初开始，鸦片贸易就开始了，那时主要的形式是非法走私。地点在香港附近的伶仃洋上，那里有利于

走私的得天独厚的条件——位于珠江口外，离广州市场非常近，同时又是一个三不管的地方：中国政府将此处视为外洋，因此鸦片走私者可以逃避中国政府的管制；那里也不受英国东印度公司驻广州大班的约束，更不受澳门葡萄牙当局的牵制，海盗也不敢深入此地活动。于是，伶仃洋成为走私者的天堂。当时走私的主力是以怡和洋行、宝顺洋行等为首的外国商行。这些洋行做代理业务，从中提取佣金。那些真正的货主们在印度、土耳其收购到鸦片后，就将其交给洋行代为销售。

走私的大体情形是这样的。第一步，洋行在伶仃洋上设有走私基地——趸船，这种船简直就是一座海上仓库。洋行将鸦片从印度等地用飞剪船运来后，就暂时堆放在趸船上。第二步，在广州，外国商行拿着鸦片样品开始兜售，与他们接洽的是中国鸦片批发商的掮客们，即所谓的中间人。（中国批发商一般都躲在幕后）业务谈妥后，就由掮客将货款一次付清，洋行则出具一张提货单。然后烟贩自己雇佣一种称为“快蟹”的走私船去趸船提货，接着开箱、验货、上船，偷运进各口岸，鸦片就以这种方式源源不断地走私到中国。

对伶仃洋的鸦片走私，广东地方政府其实是十分清楚的，但却听之任之。一方面是管不着，那是外洋，即公海，不在管辖范围内。而大清帝国水师又仅仅相当于一支搜捕海盗的“海岸警卫队”，对走私船无能为力。另一方面是懒得管，由于清朝官员的腐败，对鸦片的走私不仅不进行认真的查禁，反而默许甚至参与这种非法交易。虽然鸦片走私是非法的，但这种非法活动在珠江口却是公开进行的，非法的鸦片走私反而比合法的贸易要好做得多。

香港被割让给英国后，港督德庇时以鸦片贸易已在中国沿海普遍展开为由，放纵鸦片进口，并对鸦片实行专卖，每年由专卖商竞标承办鸦片专卖。因此，走私都转移到了香港本岛，再不必冒着风高浪急的危险在洋面上进行了。如怡和洋行就将总部迁往铜锣湾，这里建有办公楼、仓库、造船工厂、维修工厂等一系列走私活动的配套机构，成为鸦片走私的总指挥中心。在广州、上海、厦门的怡和分行，往返于印度和香港间的飞剪船，从珠江口到吴淞口沿岸数目繁多的趸船，每天的交易活动都执行着来自于这里的指令。而鸦片走私带来的滚滚财源，也使铜锣湾成为当时东方最繁

华的商业中心。

烟贩们是不会满足于这种非法的走私活动的，自从有了鸦片贸易后，他们就一直期待着这种活动的合法化，为此甚至不惜发动战争。他们不停地对清政府软硬兼施：“如果中国决定对鸦片输入课以关税，使之合法化，同时税率之低足以使走私者放弃设法偷税输入的念头，这样，英中两国的友好关系似乎将更加巩固，中国政府的税收显然会获得大量的增长。”他们清楚，腐朽的清政府是不可能禁止鸦片走私活动的，更清楚在经历了一系列内外打击后的清政府财政已是捉襟见肘，正千方百计寻找着财源。1856年10月，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清帝国在节节败退的情况下，为了早日达成和议，终于同意鸦片贸易合法化。在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中规定：洋药交纳关税后即可进口。这个所谓的洋药就是鸦片，是清政府自欺欺人的提法。英国梦寐以求三十多年的鸦片贸易合法化的愿望终于得以实现，从此，英政府和它的子民再也不必为走私感到愧疚和耻辱了。

鸦片就这样在中华大地上泛滥开来，清帝国被洋人称为鸦片帝国。据估计，在当时中国成年男子中，有1/3的人吸食鸦片。以香港为例，获得牌



>>正在吸食鸦片的瘾君子

照经营的鸦片专卖的公白行有三十多家，至于零星的售烟处更是多如牛毛，在各俱乐部、酒楼、妓院等服务场所都设有鸦片出售点，各大公司如银行、保险公司、米行、南北商行等都为客人设有烟床、烟枪等鸦片吸食工具。

鸦片贸易合法化后，在高额利润的刺激下，走私的队伍更加庞大了，人员也更加复杂了，甚至一般的平民百姓也加入到走私鸦片的行列中。从香港出发的船只，几乎每艘都有走私的嫌疑，方式也是花样百出。据清海关估计，自清朝同治十四年到光绪四年，每年运到香港的鸦片在8.4万箱到9.6万箱之间，而报关的仅为6.5万到7.1万箱之间，故实际上还有两万箱走私进入了内地，清政府因此损失的关税每年多达白银300万两。鸦片的泛滥造成了近代中国的积贫积弱，严重地毒害了中国人的体质。泱泱大国竟被西方列强蔑视为“东亚病夫”。

历史回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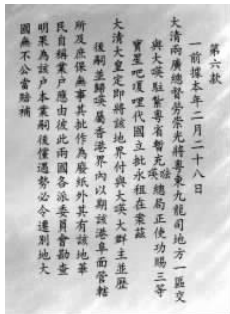
由于鸦片的罪恶，世界上要求禁绝鸦片的呼声日益高涨。英国国内的正义人士也组织了“禁止鸦片贸易会”。英国议会于1891年通过了谴责鸦片贸易的法例。1898年，美国获得菲律宾的统治权后，率先在那里采取了取缔烟馆、禁止鸦片输入的政策。1909年2月，关于禁毒的首次国际会议在上海召开，标志着人类正式向鸦片宣战。在强大的世界舆论压力下，港英政府于1931年宣布禁烟，撤销鸦片专卖制度，进行了一个多世纪的鸦片贸易终于开始走入了末路。

一句话点评



一个有良知的英国传教士曾告诫英国政府：“如果由于使用鸦片造成了摧残与死亡……如果是由于英国政府的行为，那么造成罪恶的责任便落在我们全体人身上，我们每个人都对中国负有责任。”

再一次得逞——英国割占九龙半岛



中英《北京条约》节录



关键时间 1860年10月24日
关键人物 巴夏礼
关键词汇 中英《北京条约》

背景扫描



英国攫取香港后，发现这个地方热疾流行，驻军和商民的死亡率非常高，而且香港岛可供建筑的平地极少，而对岸九龙有大片的平地，更适合城市发展。“香港应该保留，但更适合私人居住的地方是九龙而不是香港”已成为殖民者的共识。

九龙半岛的地理位置极其重要，半岛的岬角尖沙咀隔着很窄的海面与对岸的香港岛相望，九龙半岛和香港岛之间的海域是世界上少有的天然深水良港，可供巨轮自由停泊。英国为图谋占据这个海港，对九龙半岛早有染指之心。

由于九龙半岛距离香港实在太近，对面中华帝国的火炮如剑在颈上，时时搅得殖民者心神不宁。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侵略者就曾无理要求撤掉尖沙咀上的炮台、军士，以免“吓着该处洋面及香港地方”。九龙半岛对于殖民者无疑是一个钉子，但更是一块肥肉，无论如何都必须占为己有。正好此时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为侵略者提供了一个

绝佳的机会。

脉络纵横



英国强占九龙半岛采取的伎俩是：先军事占领，再强行租借，而后强订条约割占，最后通过所谓的授土仪式完成。

对《南京条约》不满足及借口清朝不能履行条约规定的义务，英国一直希望进行一场更大的战争，而1856年的“亚罗”号事件为英国提供了最好的战争借口。该年10月，广东水师接到举报，前往广州珠海炮台附近对一艘涉嫌走私的中国船只“亚罗”号实施搜查，拘捕该船华人水手12名。此事本与英国无关，但是英驻广州领事巴夏礼却横加干涉，说什么“亚罗”号是一艘英国船，当时船上悬挂有英国国旗，中国水师上船搜人是侵犯了英国的利益，同时还无端指责中国兵勇上船扯毁了英国国旗，是对英国的侮辱。虽说该船曾经在香港注册过，但是已过有效期，巴夏礼所谓的那面英国国旗，后来证实是一面信号旗。“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蓄谋已久的侵略者以此为借口不断扩大事端，巴夏礼对当时的两广总督叶名琛发出措辞强硬的照会，要求赔礼道歉，释放所有人犯，并要求在24小时内给予答复。



>>19世纪中叶的九龙半岛全景

为了尽快平息事端，当时的广东地方政府不得不妥协退让，在通牒最后限期前一小时，叶名琛将逮捕的12名人犯全部交回英领事馆，但巴夏礼拒绝接收。事态照着侵略者设计的发展方向发展。巴夏礼随即赶往香港，在与港督包令与海军方面商议后，决定对黄埔和广州城之间的炮台采取军事行动。

当时的两广总督叶名琛在对外交涉中采取的是“不战、不和、不降”方针。自从上任以来，他处理外交事务，表面上比较强硬，对侵略者的各项要求都不予答应；在处理方式上更是摆出一副天朝大国的姿态，极其傲慢。但是在强硬的外表下，却又没有什么有力的对敌防卫措施。10月23日，英舰越过虎门，攻占广州，叶名琛以为这是英军虚声恫吓，不以为然，下令如敌船深入内河，清军不可炮击。于是英军相继攻陷中流沙炮台和海珠炮台，并炮轰广州城，一度攻入广州城，在两广总督衙门内肆行劫掠。英军的侵略行为激起了广州人民的极大愤慨，纷纷组织进行反抗，英军终因兵力不足退出了广州。

“亚罗”号事件传到英国后，国会随即通过了扩大侵华的议案，并任命额尔金为全权代表，率领一支军队来华，法国也趁火打劫伙同英国共同出兵。1857年12月，英法联军对叶名琛发出通牒：要求英国人能自由进城，赔偿在去年火烧洋行中英商的损失，且要占据珠江以南及沿江炮台。叶名琛虽拒绝了英法联军的要求，但仍未采取任何有力措施。15日英军偷偷占领珠江以南，清军未战而撤，当时叶依旧认为这只是敌人恐吓逼和之举，他甚至迷信地说什么15日后广州必然无事，对战争极其消极。28日英法联军开始进攻广州，31日广州全城沦陷。英法联军占领广州后，即成立了巴夏礼为首的占领委员会，由于自身精力不够，也因为广州人民的强烈反抗，侵略者便让原广东巡抚柏贵恢复原职，充当统治工具。正是这个地方政权，为九龙半岛的割让创造了条件。

侵略者占据了广州后继续北上，不久即攻占了大沽炮台，进逼天津。此时，英国外交大臣命令额尔金，要竭力从中国政府手中割占九龙岬角和昂船洲，至少要割占九龙岬角。但是，接到命令时，《天津条约》已经签字，错过了割占时机。不过蓄谋已久的侵略者总是能够找到机会的，1858年为交换《天津条约》批准书，英国公使卜鲁斯武力进攻大沽炮台惨败，英国决定采取更大规模的武装行动。卜鲁斯提出对九龙实行军事占领，理由极其荒唐：因为是中国政府迫使我们派来更多的部队，但在香港不能妥善地接纳他们，这样只好寻求另一个地方来驻军，所以强占九龙完全是中国的责任。1860年3月，英军第四十四特遣队强占了尖沙咀一带，当时几乎每天都有舰船运送侵略军抵港，这些军队大多驻扎在九龙半岛上。从当年



>>1860年3月英军侵占九龙半岛

拍摄的一幅历史照片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在阡陌纵横的半岛上，军用帐篷星罗棋布，九龙与香港之间的海港内，联军军舰密密麻麻，中国领土——九龙半岛成了英法联军的大本营。

接着侵略者就施行割占九龙的第二步——强租。1860年3月20日，巴夏礼照会两广总督劳崇光：由于九龙半岛离香港岛非常近，而九龙地方当局对当地的治安又疏于管理，使得该地成为强盗和亡命之徒的集散地，九龙半岛的混乱状态给英国的利益带来了损失。因此他提出了两种解决方法：一是由中国派遣更有力的部队来维持该地的治安；再就是中国划出一条界线，将界线以内的地方割让给英国政府。第一种方案不过是巴夏礼虚晃的一枪，因为当时英军已经占领了该地，是不会允许清军驻扎的；而第二种方案，巴夏礼知道，广州地方政府是无权割让土地的。最后他暴露出了真正的意图，即将九龙半岛租给英国，并以不容置喙的口吻说，劳崇光唯一可做的就是做出“同意”的答复。以劳当时的处境看，他是不可能有任何反对意见的，因此从提出到最后签订租约，巴夏礼总共用了不到两天的时间。按照租约的规定，实际上是将九龙半岛永远租给英国。巴夏礼对此非常满意：“我毫不怀疑，下一步的事情就是把九龙半岛完全割让给我们。”

1860年，英国政府再次任命额尔金为全权代表，前往中国以武力解决

换约问题。10月初，英法联军攻占了北京，为了给中国政府一点颜色，他们放火烧了东方的凡尔赛宫——圆明园。当时咸丰皇帝已逃往热河，留守北京的是恭亲王奕訢。在英法两国的军事和外交压力下，10月24日，中国与英法两国再度签订城下之盟——《北京条约》，规定：九龙半岛今界限街以南的部分包括昂船洲在内割让给英国。至此，英国完成了对九龙半岛割占法律上的程序。

侵略者为了庆祝他们的胜利，还煞费苦心地进行了一场领土移交仪式。1861年1月19日下午，驻港两千多名英军官兵前往九龙，额尔金在巴夏礼、港督罗便臣夫妇的陪同下抵达会场，新安县令、九龙巡检司等清政府官员也被迫前往。首先，巴夏礼将一包装有九龙泥土的纸袋交给清官员，而后由他转交给英国特使额尔金，以象征领土的移交。授土仪式完成后，巴夏礼发表了一份声明：九龙半岛及昂船洲已经割让给英国，经中英双方交接完成，并划定界线互相遵守。在英军的礼炮声中，英国王室旗帜冉冉升起，日不落帝国国旗又一次感受到了东方的太阳。

历史回响



割占九龙半岛是英国对华侵略的一个重要步骤，至此，港岛与九龙半岛之间的维多利亚海域成为香港的内湖，英国在香港的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与此同时，中国的门户进一步被打开，也刺激了各国瓜分中国领土的欲望。

一句话点评



1840年英国议会讨论对华战争议案时，保守党议员詹姆士·古拉哈姆强烈驳斥战争主张，他说：“这样不义的战争，即使胜利，也不会得到任何光荣。”

汇丰银行——香港最大的商业银行



20世纪60年代的汇丰银行

关键词

关键时间 1865年3月2日

关键词汇 香港最大的商业银行

背景扫描



1858年中英签订《天津条约》，其中规定长江流域大片腹地向外国开放，广阔的贸易前景展现在洋商面前。形势的变化要求金融机构更及时、灵活地提供贸易需要的资金，而当时香港仅有的几家银行总行都设在英国或印度，根本无法适应这种需要。因此，洋商迫切需要一个自己创办的地区银行。恰在这时，传言有孟买商人计划在香港成立一家总行位于中国的银行，消息传来，香港洋商立即闻风而动，赶紧召开会议，商讨制定对策，决定建立一家总部设在香港的银行。

脉络纵横



汇丰银行成立于1865年3月2日，即汇丰银行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的日期，也是汇丰支付第一张票据的日期。银行

正式开业日期则是1866年12月29日。汇丰银行的英文名字是The Hong 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即“香港上海银行”，表明其主要业务范围在华南、华东和香港。最初它的中文名字叫“汇理”，19世纪70年代中叶才有“汇丰”其名，但仍以“香港上海”行名发行钞票，到1888年才统一改称“汇丰银行”。

汇丰银行是香港历史上第7家银行，成立时资本额为1 500万元，实力雄踞当时香港各大银行之首。银行成立的第一年，香港财政赤字高达9万多，港府即以年息8厘为条件，向汇丰借款8万应急，其实力由此可见一斑。汇丰银行实际上是个国际性的机构，董事中有英国人、美国人、德国人、印度人和犹太人等，而且几乎网罗了当时香港商界炙手可热的人物，如董事会的首任代表崇利是颠地洋行的代表；苏石兰是大英轮船公司的香港首席代表，公认的权势人物。该行第一任经理是法国银行家。汇丰银行因此炫耀它的“赞助者实际上可以说代表整个香港社会”。

19世纪的香港是中国与西方贸易的转运中心，大部分进出口贸易操纵于各洋商，因此汇丰占有天时地利优势，业务发展非常迅速，不久即在上



>> 汇丰银行早期职员

海及各通商口岸开设分行，它发行的纸币曾经在这些地方广为流通。

从19世纪60年代成立至19世纪末，汇丰银行的发展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865—1875年）为艰难立足时期。1866年由于西欧经济危机波及中国，给香港金融贸易界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受此风潮影响，港岛原有的11家银行有6家倒闭，汇丰大股东如颠地洋行宣告破产。汇丰银行在这次风潮中也受到了巨大的冲击，1865年银行赢利为20万元，1875年则减至19万元，下跌5%，每股收益下跌44%。但凭借其雄厚的实力，汇丰银行最终还是渡过了难关。第二阶段（1875—1900年）为快速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汇丰银行的发展势头首屈一指，其分支机构增加了一倍，与此同时，该行业务网从香港扩展至华中、华北、沿海及东南亚一带。1885年汇丰还只是中国沿海的大银行，10年之后，已被公认为世界级的大银行了。汇丰银行的发钞额在1874—1892年间增加了3倍多，资产总值由1870年的3 805.3万元上升到1890年的14 968.6万元，20多年间增加了将近3倍，而同一时期，它的存款额由939.9万元上升到10 311.3万元，增加了10倍多。

汇丰银行是香港的主要发钞银行，也是香港政府的出纳银行，同时又是香港其他银行的结算银行，有时还充任最后关头的贷款银行。按惯例，汇丰银行主席一向被委任为港府行政局成员。因此，汇丰在竞争中能战胜同行，就因为它一直得到了香港政府的支持。如以发钞为例，按照英国惯例，殖民地银行必须经英国政府特许才能发行钞票。汇丰仅获得香港立法局和殖民地部的同意，就取得了和特许相同的法律效力，同时银行向立法局施加压力，要求按公司登记，在未获特许之前就可以先行营业。因此它实际上是按香港公司法组建的一个商业机构，故汇丰银行又被称为银公司。1872年，汇丰银行发行的面额为1港元的钞票面世，成为香港最早的纸币。另一方面，香港政府曾在汇丰成立之前，宣布以港元为基本货币，目的是统一香港当时复杂的币值，方便金融流通。汇丰的成立有利于此项币值改革，在其发起书中，就以此作为宗旨之一。可见，港英当局和汇丰银行从一开始便是相互支持、相互依赖的。

在业务上，汇丰银行采取了许多灵活便捷的方式服务客户。以延长票据预付的时间为例，丽如、渣打等行以预付票据时间过长会鼓励投机、增加竞争为由，主张将原来6个月的预付期缩短为4个月，但汇丰以适应特定



>>1972 年汇丰银行发行的一元纸币

行业的需要，坚持6个月预付期限，受到中小商人的普遍欢迎。1885年5月汇丰储蓄部成立，这是香港银行首次成立储蓄部，其目的主要是为华人服务。1872年汇丰提出比丽如更加优越的条件，取代丽如，代

管港府基金。汇丰还是港府的财政金库，举凡公务员薪金，士兵、海员饷银，都由汇丰代存代发。因此汇丰银行获得了广泛的客源，除一般储户外，还包括洋行、公司、港府各单位、英领事馆，甚至还有为数不少的中国官吏。这是汇丰胜过同业的优势所在。

汇丰银行不但在香港金融界以及支配香港经济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通过单独或联合其他国际银行为清政府提供融资，对晚清中国的财经、政治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晚清数十年中，清廷凡遇经济困境，每每求助于汇丰银行。左宗棠收复新疆急需经济上的救援，在1877年以海关税为担保，向汇丰借贷白银5万两。慈禧太后为修建颐和园，也以海关税作担保，向汇丰银行借款1 600多万两白银。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军节节失利，元气大伤，而此时国库空虚，形势危急，又向汇丰银行借款白银1 000万两。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后，清朝为赔偿日本白银，再向汇丰银行借款300万英镑。汇丰银行还在内地广泛投资铁路、矿山、航运等工商业。值得一提的是，1887年清政府在九龙设立海关，对鸦片征收关税，而关税保管机构即为汇丰银行。

汇丰银行在19世纪最后二三十年中，已经发展成为外国在华银行中实力最雄厚的一家，它的迅速崛起，集中反映了英国以香港为据点向中国内地进行经济扩张的强大势头，它是为英国资本对旧中国进行经济侵略并控制中国金融市场服务的机构。

历史回响



今天的汇丰银行已发展成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最大的本地注册银行，也是香港三大发钞银行之一。该行所属的汇丰集团是世界最大的银行及金融服务机构之一。汇丰银行在亚太地区的2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有600多家分行和办事处，此外还在亚太地区外的8个国家设立了23家分行和代表处。汇丰银行及其关联金融公司共有员工36 350人，其中24 870人为汇丰银行职员。汇丰银行已从以当年的上海、香港为中心走向了全世界。

一句话点评



2000年，香港汇丰银行被《亚洲周刊》评选为亚洲区内最赚钱的银行。汇丰银行的首席执行官约翰·邦德说：“汇丰银行没有太多新颖的策略，最重要的是银行的前线执行力，而它的前线就在香港。”

大清海关“封锁”香港



19世纪的维多利亚港

关键词

关键时间 19世纪60—80年代

关键人物 两广总督瑞麟 总税务司赫德

关键词汇 《香港鸦片贸易协定》

背景扫描



1858年，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打击后的清政府无奈地同意鸦片贸易合法化，这样一来，清政府还可获得一笔为数不少的税收，对于当时捉襟见肘的清政府来讲，无异于雪中送炭。

然而让清政府意想不到的，是，鸦片走私不但未减少，反而愈演愈烈。据广州海关统计，1865年年报关鸦片为2 371担，这仅占实际进口量的10%，而其他90%都是通过走私进口的。1869年，输入香港的鸦片有8.8万箱，而进口报税者仅有5万箱，走私进口了3万余箱，让清政府损失税银45万两。清政府辛苦建立起来的关税征收体制形同虚设，滚滚财源就这样白白流失，实在让清朝官吏们心痛不已。

脉络纵横



1866年，两广总督瑞麟因辖区内变乱频繁，军需膨胀，

以至于财政拮据，于是宣布对现行鸦片贸易秩序进行局部改革，开放东莞、新会、顺德、香山和开平，凡是本地民船载运鸦片，只要交纳了低额厘金，就可以行销内地。这种措施在实施后成绩斐然，财税果然大大增加，瑞麟本人因此深受鼓舞，进而将抑制走私作为开源节流的不二法门。1868年7月，瑞麟组建了一支机动快速的小型汽船巡逻队，在香港外海中国洋面的三个要道——东边的鲤鱼门、西边的汲水门和北边的九龙城，对往来香港与广东沿海的一切中国民船实行截停检查，同时征收厘金，每箱鸦片16两。对于那些以香港为基地，靠走私牟取暴利的鸦片贩子来说，瑞麟的缉私措施无疑对其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因此，他们上书港督麦当奴，诬蔑广东当局的行动妨碍了香港正常的自由贸易，是对香港进行军事“封锁”，如果任其发展，将对香港产生极其严重的影响。麦当奴也否认香港存在着走私活动，反攻击两广总督就像“海盗”一样无耻地对过往船只进行“敲诈勒索”。

封锁与反封锁的摩擦随即引起了中英两国的共同关注，双方试图通过谈判予以解决，经过几个月的交涉，双方达成了两项共识：一、中国委派领事驻扎香港，以监督香港的鸦片走私；二、鸦片进口关税增至每百斤税银五十两。对于这两点，香港殖民当局表示强烈反对，认为中国派员驻扎香港将会威胁到香港的经济安全，而提高关税则会影响到英帝国及香港的财政收入。英国政府权衡利弊后最终否决了该协议，解决封锁的初步努力遂告流产。

谈判陷入僵局后，清政府有意识地加强“封锁”。1870年，清政府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提出，扩大对香港的封锁，增加关卡，加强缉私力量，并由总税务司协同征缴关税。这个建议被清政府采纳，但由于税务司为洋人把守，清政府对其不放心，于是命令两广总督瑞麟、粤海关监督崇礼按照赫德的提议自行办理。1871年，广东洋面六个税站全部筹建完成并投入使用，其中四个针对香港：一个设在九龙城，控制香港通往内地的陆上要道；一个设在汲水门，扼守珠江进口；一个设在通往澳门和西海岸的长洲，检查港澳往来船只；最后一个设在紧靠鲤鱼门的佛头洲，管理从东海岸进口的货物。这些新建税站都配备有专门的缉私舰队，向过往船只征收鸦片关税，对香港通往内地的海上通道形成了更严密的“封锁”和控制。新措施

成效显著，粤海关1871年的鸦片税收总额从头一年的168 909两急剧上升到223 147两，净增54 238两，而鸦片走私数量则以每年递减50%的速度急剧下降。

对此“封锁”行动，香港华洋商界感到十分恼怒，尤其是那些从事鸦片走私的商人，不断向港英当局和英国政府提出控诉，强调粤海关监督及其属下所采取的行动将会破坏香港贸易。此外，在封锁过程中存在的敲诈勒索现象，也引起了从事正当贸易的华商的不满。越积越多的不满和抱怨给港英当局及英国政府造成了极大的压力，不得不再一次寻求外交努力以获得事态的妥善解决。

1875年，为解决“封锁”问题，中英两国重开谈判，双方在签订的《烟台条约》中达成几点共识：一、将鸦片进口税和厘金合并，一律改由洋人税务司主持的海关征收。二、鉴于粤海关所设的缉私舰队有侵扰华民商船之嫌，因此，由中、英和香港殖民当局各选派一人组成三方委员会负责解决争端。这个条约还确立了解决粤港摩擦总的原则：保证中国合法税收的征管，但不得有损香港地方事宜。对于该协议，清政府深感满意，但由于对委员会的人事安排及鸦片税厘具体数目等问题迟迟不能达成共识，“封锁”问题的解决再度搁浅。

19世纪80年代后，国际舆论对鸦片贸易的罪恶进行广泛讨伐，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相继宣布禁止对华输出鸦片，同时英国国内一些正义人士也组织了禁烟会，强烈呼吁禁止对华鸦片贸易，国际形势朝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英国政府在国际国内的双重压力下，被迫作出妥协和让步，1883年英国外交部照会中国驻英公使，就《烟台条约》关于鸦片征税问题进行谈判，在随后签订的《烟台条约续增专条》中，英国同意鸦片厘税并征每箱白银110两，并再次强调建立三方委员会以解决“封锁”问题的必要性。

1886年三方委员会成立，中方苏淞太道邵友濂为首席委员，同时总税务司赫德协同会商，英方委员为英国驻天津领事璧利南，港方委员为香港殖民地法官劳士，三方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封锁”问题的解决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6月28日，三方代表举行第一次会议，劳士同意香港可以协同中国打击鸦片走私，并提出了几点建议：所有鸦片到达香港时必须报关，

所有离岸、挪动、装船的鸦片都必须有出货单；鸦片专卖必须以整箱交易，不得拆零售卖。劳士的方案比较具体且易操作，但他同时又为香港协助查禁鸦片设置了一个前提，即中国也必须让澳门接受相同的协定，这为解决“封锁”问题增添了一个新的困难。

1886年7月，总税务司赫德赴澳就澳门协助查禁鸦片走私与澳门总督展开谈判，在赴澳之前，赫德建议清政府将澳门永远租给葡萄牙，并以不收取任何租金为条件，换取葡澳当局的支持。当时的澳门虽然已被葡萄牙窃居了三百多年，但主权一直属于中国。清政府为了关税问题的早日解决，默许了赫德的要求。8月10日，赫德与澳门总督罗沙达成初步协定：一、中国与其他各国签订的条约，葡萄牙“一体均沾”；二、中国同意澳门归葡萄牙永远驻扎及管理；三、葡萄牙同意会同中国在澳门对鸦片征收关税。从此以后，澳门沦入葡萄牙政府的殖民统治下。

鉴于最后的障碍已经清除，1886年9月11日，委员会的三方代表共同签署了《香港鸦片贸易协定》。根据该协定，中国海关税务司将接管粤海关监督的巡逻工作及九龙、汲水门、长洲和佛头洲四个关口；中国海关将在九龙设立税务司，对往来于香港和中国内地的船只进行管理，并代收厘金；为申报关税方便，香港同意中国海关在维多利亚设立办事机构。与此同时，香港也开始履行义务。1887年，港英政府通过了第22号鸦片条例，规定没有港务处处长的签字，鸦片不得在香港移动或出口；所有鸦片商都必须设立账簿，将货物的去向记录在案，以备政府缉私官员检查；禁止帆船夜间私自出港。新条例的实施，使香港鸦片出入境都受到了严格的限制，民船走私得到了有效的控制。这样，持续了近二十年的粤海关“封锁”香港纠纷最终获得解决。

历史回响



“封锁”香港问题的实质，是清政府为维护自己的海关权益而采取的有限度的拼争，是正当的行为。虽然可能在执行的过程中对香港正常的贸易产生了一些消极的影响，但香港走私集团和港英政府的“封锁”叫嚣，目

的完全是为了自己的私利而无视中国的正当权益。清政府为了解决鸦片税收问题，竟然让葡萄牙永远驻扎并管理澳门，使中国的领土主权受到严重侵害。同时，清政府在谈判解决“封锁”争端的过程中，屈服于英、港官方和商界的压力，同意由英国人所掌握的税务司负责鸦片税厘征收，便利了列强进一步对中国的渗透，使大清海关的半殖民地色彩进一步加深。

一句话点评



张之洞在获悉将粤海关移交税务司后，致电清政府：“粤海大关之咽喉全归洋人掌握，其弊不可胜言。”

赌、赌——香港的一颗毒瘤



第六任港督麦当奴

关键词

关键时间 1867年7月1日

关键人物 麦当奴

关键词汇 《维持社会秩序及风化条例》

背景扫描



从19世纪中叶开始，香港就成了赌徒的极乐世界，五花八门的赌博比比皆是，这条街上有“牌九”“翻推”，那条街上有“字花”“麻将”。花花绿绿的招牌下面是一张张疯狂而贪婪的面孔及一双双赌得发红的眼睛，骰子声、搓牌声和赌徒们的吆喝声此起彼伏，整个香港就是一个大赌城。

早在1844年，港英政府就已制定了《禁止赌博条例》，但收效甚微。究其原因，是条例对于开赌及赌徒只是予以罚款，于是开赌者遇到警方抓赌，就代赌徒缴纳罚款了事，而警察也乐于向赌馆收取贿赂。发展到后来，警方和赌馆达成了默契，警方例行公事每月查赌几次，但事先都通知赌馆做好准备，等候警方的光临，事后赌馆如数上交贿赂。于是警方可以经常破获不大不小的赌案，以掩盖收受贿赂的事实，而赌馆在交了必要的费用后也就可以安安稳稳地营业，致使赌风日益猖獗，严重影响了香港的治安。社会

各界反应强烈，迫切要求港府采取更有力的措施来对付赌风。

脉络纵横



到了1867年，也就是第六任港督麦当奴在任时期，情况愈来愈糟，立法局开会讨论禁赌问题，认为警方虽然不断拘控违法者，但赌风仍然无法禁止，很明显《禁止赌博条例》没有发挥效力。麦当奴认为华人嗜赌成性，要想禁绝赌博是非常困难的。另外，香港的警力有限，且警员的待遇不好，易于贪污受贿，政府又没有充足的资金用来扩充警力和提高警员待遇，这样警赌勾结就不难理解了。基于这种情况，他提出了所谓“寓禁于征”的办法，即允许赌馆在先缴纳一定费用的前提下，取得牌照合法经营，将赌博业置于政府的管理之下，这样政府既可以获得一笔不菲的赌税，用以增强警力和改善警员待遇，甚至用于其他的公益事业，还可以打击地下黑赌馆，达到一石二鸟的作用。

麦当奴的提议很快得到立法局的批准，1867年6月17日即通过了《维持社会秩序及风化条例》，任何人绝不会想到这部道貌岸然的法例竟会与赌博合法化有关。这个法例的第18条规定：香港的非法赌博极其盛行，严重影响社会秩序与风化，但是政府的法例又不能有效地遏制赌博之风，因此为了取缔非法赌博，本法例授权香港总督有权采取任何措施来禁绝地下赌博业。

新法例于1867年7月1日生效，政府在7月1日开始放号开馆。由于当时政府规定只发12张牌照，采用竞标放牌，因此竞争非常激烈，最高价达到了每张牌照1万元。这12家赌馆分布在西营盘、上环、中环、湾仔一带，新开的赌馆都有一个非常堂皇的名字——“防务馆”，表明它是为了打击非法赌业而成立的，而且每家防务馆都设有打击黑赌的武装“更练”。麦当奴的设想可谓完善之极，但是否真的如其所愿，达到了打击地下赌博业的目的呢？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这些防务馆本身就是那些地下赌馆的老板出资开办的，昔日他们经营的地下赌馆仍然存在，还可以用贿赂来获得包庇。更让政府始料未及的是，原来在赌博非法的情况下，一些赌徒还

有所顾忌，现在则可以堂而皇之地出入赌馆了，以前一些胆小怕事的人，现在也可以放心地进去试试手气，因此一些平素不赌博的人也加入了赌博大军，这个本用来禁赌的法令却使香港赌博业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

那么这部改善社会风化的法例对于社会风化又产生了什么影响呢？这可以从史美尔的报告中找到答案。史氏在当时的按察史司供职，审理过多宗刑事案件，他说：“自从公开赌博以来，本港的刑事案件以及犯罪的人数与日俱增，社会秩序并不见得有所改善，风化也未见良好。政府这种开赌政策，必须重新检讨。”原因是显而易见的，赌红了眼的赌徒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大西洋大班家里的一只失踪的手镯在“防务馆”里失而复得，原来是大班家的仆人偷了去做赌资。“防务馆”成了藏赃的地方，靠它来

改良社会风气，那岂不是痴人说梦吗？

难道说港督提议、立法局通过的这部法例一点作用都没有吗？也不尽然。赌博合法化最大的好处是给港英政府带来了一大笔财富：1867年第一次放牌所得的12万在当时就是一个很大的数字，随后港府扩大经营，牌照从12张增到16张及更多。牌照费也是逐年上涨，1868年为15万余元，1869年为22万余元，到了1870年更是达到了27万余元，这种滚雪球式增长的牌照费后面，隐藏的是赌博业高额的利润。这还只是合法的赌税，是港府巨额收入的



>>>开赌后香港的赌馆迅速增加

冰山一角。为了获得牌照、得到政府的保护等，那些赌馆给港英当局的钱不知是这个数的多少倍。赌博业的兴隆必定导致其他行业的萎靡，特别是工商行业。1871年赌馆竞标时，赌商何亚锡以每间赌馆5 800元的高价竞得，全年共需缴纳赌税19万元，资金流向赌场可见一斑。商行职员、政府公职人员挪用公款赌博的事也屡屡见于报端。当时香港是中西货物的中转站，众多的华商、洋商聚集在这里交易，巨额的资金流失造成了中转贸易的日益萎缩，因此，华商、洋商都对赌博合法化极为不满，一场浩浩荡荡的反赌博运动就逐渐开展起来了。

华商先是向港督提出抗议，在未得到答复的情况下，只好向伦敦提出申诉，要求英国国会采取行动制止香港的公开赌博。与此同时，一场请愿活动也在全港市民中展开，香港所有的商号都在请愿书上盖章，然后转呈英国殖民地部，强烈反对开赌。洋商也采取行动力陈赌博的巨大危害。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特别是经济利益受到侵害的情况下，英国殖民地部终于答应训令港督取消开赌政策。1872年1月12日是新一轮的赌馆竞标日期，赌商们突然接到通知，要求赌馆必须在1月20日合约到期之日结束营业。特别有趣的是，港英当局关于新政策的解释是，因为警察受贿及盗匪盛行，所以政府才开放赌业，并且成效显著，盗窃雇主之事已很少发生，地下黑赌也已绝迹，社会治安大大好转，再也没有执行这个政策的必要了，因此必须再一次禁绝赌博。

赌博合法化4年后再一次转入非法，一切又回到了从前。然而，既然已经放开，再一次禁绝又谈何容易，不久即发生了轰动香港的“赌场贪污案”。这个案件的主角是一个姓岑的地下赌馆的老板，岑老板的总机关设在上环的华里东街，而众多的赌场则分布在东街、西街、长兴街、四方街等一带。赌场雇有专门招揽生意的人，即我们今天所说的“赌托”，黄昏以后，这些“赌托”就在大馬口、水坑口、大笪地、荷理活道、文武庙等街上拉客。为了让赌徒放心去赌，岑老板的赌馆还向客人保证，凡是在赌场内遇到警察搜查，一切损失都由赌馆如数赔偿。因此，岑老板的生意红火就可想而知了。这个岑老板到底是何许人也？竟有如此大的胆。原来，凡是与岑老板赌馆有关的部门，如警务部门上自总警司下到华洋帮办、英警、印警、华警，管理牌照的登记官署上自首席书记官下到信差，他都已经一

一买通，甚至清洁局、灭火局等他认为有关的部门也都一一孝敬好，故岑老板可以稳坐钓鱼台，放心地经营他的赌馆。然而，由于分赃不均，岑老板遭人告密，最终被查办，与此案关联的一百多人被开除公职，这其中包括华民政务司首席文案奥斯孟。

历史回响

类似的，赌博合法化也在其他地方推行，如澳门于1870年也开始招商开赌，一直延续到今天。英国议会在讨论香港赌博合法化问题时，议员丹顿说：“香港公开赌博，有没有考虑这是违反了文明的政策？赌博有害，文明人都知道。”是的，赌博是一颗毒瘤，文明人都知道，但怎么医治，并不是每个文明人都知道的。赌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问题，触一发而动全身，任何简单的处理方式都只会令问题变得更遭。

一句话点评

“寓禁于征”的政策无疑让本已十分糟糕的情况变得更加棘手，放开了赌博业如果要再次禁绝已不可能。

保良局——香港三大传统慈善机构之一



保良局正门

关键词

关键时间 1878年11月8日
关键人物 卢赓扬 冯明珊
关键事件 保良局成立
关键词汇 保赤安良

背景扫描



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英国凭借武力侵占了整个香港地区后，香港成为中西方交汇的中心，地位日益重要，许多内地省份的民众迫于生计到港谋生，香港人口急剧增加。于是，教会医院、育婴堂等慈善机构也开始建立，而后华人慈善组织亦相继建立，香港社会的慈善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地发展起来。综观香港慈善事业的发展进程，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60年代初期，这是华人民间慈善机构兴起的阶段；第二阶段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这是港府参与慈善福祉活动、民间慈善组织蓬勃发展的阶段。

脉络纵横



19世纪中期，在英国的统治下，香港社会的慈善事业

走过了艰难曲折的发展道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港英政府对当地的社会福祉、慈善公益等事业基本上是不闻不问的。在20世纪初期，仍只有少数几个由教会兴办的慈善救济团体和华人建立的慈善机构。香港创办较早、影响较大的慈善组织，如东华医院、保良局和乐善堂都是由华人创办的。这些民间慈善机构在推动香港社会慈善事业的发展，为有困难的群体提供救助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

19世纪末期，香港色情业泛滥，买卖妇孺有厚利可图，导致拐风日盛。据官方报道，19世纪90年代，当时3岁至10岁的女童，每名卖价约50元，10岁至14岁每名150元，15岁以上貌美少女每名300至400元。若贩至外洋，价格更高。如在广州开价为50元的女孩，在旧金山售价可达1 000元。而香港法律规定，船舶运载20名以下妇女出境，无须取得移民官同意，这无异为拐卖妇女出洋大开了方便之门。据官方统计，从1865年至1891年，香港拐卖妇女案共1 481宗，平均每年54.9宗。从1893年至1900年，香港被拐失踪的妇女共1 527人，平均每年191人，即每两天便有一人失踪；16岁以下儿童729人，平均每年91人，即每4天有一名儿童失踪，其中尤以女性为多。

当时歹徒诱拐妇女，每每骗她们说是当女佣，然后就被卖给妓院。在妓院里，她们毫无人身自由，每时每刻都处在鸨母及其打手的监控之下，经常受到极端残酷的虐待，稍有反抗，便会遭受鸨母的毒打，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

有鉴于此，一群热心华商于1872年9月面见港督，要求立例禁止逼良为娼，保护妇女。次年5月，经港督同意，东华医院使用暗差，缉拿拐匪，并特设平安、福寿两楼收容被拐的妇孺。其后，由于拐案日增，东莞县驻港客商卢赓扬（1874年曾任东华医院总理）、冯普熙（1872年及1879年曾任东华医院总理）、施笙阶、谢达盛等于1878年11月8日联名上书港督轩尼诗爵士，请求集资悬赏捉拿拐匪，以保善良。此后每年的11月8日便成为保良局的创立纪念日。同时全港绅商再行商议，督促政府顺应民情，批准设立“保良公局”，专门防止诱拐，保护妇孺。轩尼诗总督将此提议转交英国殖民地部，得到批准。同年11月12日，轩尼诗又督令香港警署和抚华道成立委员会，与请愿华商领袖合作，商议查禁拐带及筹办保良公局，并起草方案。保良局筹建初期，由冯明珊等暂时充任总理。当时经费不足，又无固定办

公地点，幸好获得东华医院绅商大力帮助，借出东华医院的平安、福寿两楼上层，作为办公及收容妇孺之所。

1879年5月，香港绅商为建保良公局再次集会讨论，议决先行拟定开捐值事22名，向香港绅商发动募捐，



>>悬挂在东华医院的“爱众亲仁”匾

如果募捐卓有成效，则另外再推举办事7名。1880年8月15日，88位绅商齐集公局，一致通过了由定例局议员伍叙负责起草的保良局章程与组织制度。

1881年8月2日，经伍叙及柯马理修订完成的保良局规章共16款，送与局董查阅。新订章程写明保良局的宗旨为“禁除拐带及拯救被拐之妇女幼童”，并制定组织制度，如值理人数、任期、选举等。1882年8月5日修订后的保良局规章17款终获批准，刊于宪报，名为《保良局条例》。

保良局成立之初，与东华医院关系密切，两者常同室开会，彼此合作，因而有“东保一家”之说。保良局的经费，除该局同仁募捐外，主要由东华医院、文武庙、街坊公所提供。在许多年内，东华医院总理常从保良局卸任总理中得到补充，反之亦然。保良局的局址，最初亦并入东华医院，借用东华医院平安、福寿两楼作为收容所。至1896年，才兴建新局于新街，由港督罗便臣主持开幕。1932年3月4日，该局又迁入铜锣湾礼顿道。

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香港经济的迅速腾飞，港府对社会福利政策也作了相应的调整。以此为契机，香港的慈善事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呈现出欣欣向荣的繁盛局面。随着香港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作为香港三大传统慈善机构之一的保良局也力求与时俱进，适应时代的需求，为港民提供尽可能多的服务。保良局创立之初，主要是把被收容者资遣回籍，或招人抚养，或择配成婚，或代为寻找工作。现在，保良局的服务已拓展为包括住宿服务、儿童之家、孤儿助养、弱智儿童培育、扶幼、安老、医疗、康复、康乐、中小学教育等等，项目日趋多元。

保良局和香港其他福利机构一样，受港府监督和资助。该局除靠绅商出钱出力作为支援外，亦通过义演、义卖、餐舞会、卖旗等方式向社会筹募善款。如现在保良局每年都要开展二十多次筹款活动，如打保龄球、跳舞、歌星演唱会、卖月饼、卖抽奖券，都可借以募捐。香港每一幢楼都有业主委员会，负责上门劝募，甚至热门电影的首映式，也可以高价出售门票的方式来筹款；还有举办万人跑步运动，坚持跑至终点者获证书，持证书向承诺捐助者取款。总之，保良局不拘一格，营造仁善氛围，培养博爱心志，引导捐款投向，服务弱势群体。

历史回响



一百多年来，保良局在香港为遏止诱拐妇孺之风，为受害者提供庇护和教养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现在，它已成为多元化的慈善服务团体。保良局秉承“保赤安良”的宗旨，收容由社会福利署转介来自问题家庭的儿童，适龄者安排入学，并提供医疗、辅导服务，最终希望孩子能尽快与家人团聚。无亲人的幼儿则获领养，并使之能自立于社会。另外，还成立妇女保护中心，为被虐或面临个人或家庭问题的妇女及其子孙提供一个安全的临时居所，让她们离开暴力环境，解决即时危机，并通过专业服务、心理康乐活动以及其他社区教育，防止暴力问题的发生与蔓延。

一句话点评



保良局体现的不仅是爱心的传递、慈善的赓续，更为香港社会的稳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保良局目前共有200余个服务单位，遍布港九新界。香港回归以来，与内地的联系日益密切，保良局的慈善事业必将获得更大的发展。

华工的血与泪



海外华商父子

关键词

关键时间 19世纪50—80年代

关键事件 卖“猪仔”

背景扫描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将中国变为他们的商品倾销市场和原料产地，使得中国传统的手工业和农业逐渐破产。不断激增的鸦片输入，造成白银大量外流，物价飞涨，同时为了支付各种赔款，清政府也加紧了对人民的搜刮，加以灾荒连年，这一切都使人民陷入失业、饥饿、死亡的困境。走投无路的人们只好揭竿而起，太平军、捻军等相继起义，局势因此变得更加动荡，苦难的人们正在寻找着任何可能的生机。

在国际上，随着非洲本土的开发、废奴运动的兴起及世界舆论对奴隶贸易罪恶的不断批评，到19世纪初，奴隶制度基本上被废除了，而美洲那些长期使用黑奴劳动的种植园，普遍出现了劳动力危机。19世纪中期，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和澳大利亚相继发现金矿，随之而来开始了大规模的兴建铁路、开垦农田、采伐森林等，使得国际上劳动力短缺的情况变得更加严重。

脉络纵横



清朝历来是禁止国人出洋的，清律规定，凡有私自出洋者一律问斩。即便有人偷偷成功出了洋也被斥为“弃民”，从此只能客死他乡，不得再回国。这样的规定对急需中国劳工的西方是极为不利的。虽然西方殖民者转运华工出洋很早就开始了，特别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外国商人、洋行、海盗拐卖华工出洋更是肆无忌惮，被打怕了的清政府也慑于列强的淫威，只能默许。但是这毕竟是非法的，也远远满足不了西方世界对劳动力的需求，因此关于华工出国合法化一直是列强的一个目标。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占领了广州，并成立了占领委员会进行殖民统治，强迫当时的广东地方政府承认：如果华民自愿出国，则政府不加阻止，并成立了招工工所具体负责招工事宜。第一批合法劳工于1859年11月10日开始招收。广州华工出洋的合法化使殖民者期望着这一制度推广到全中国。1860年英法联军攻陷北京，强迫腐朽的清政府再一次签订城下之盟——《北京条约》，其中关于华工问题的规定与广东地方政府上述规定大同小异，即华人自愿出洋，政府不得干涉。

对华工出洋有一个非常恐怖的说法，叫卖“猪仔”。当时，若某国雇主有劳动力要求，就委托在华的洋行作为代理的经纪人负责招工。这些洋行较大的有德记洋行、合记洋行、怡和洋行等，主要为英商所开。洋行再雇佣一批苦力掮客或称为拐子的中国人，由他们直接负责招收苦力。于是在金钱的刺激下，这些拐子就开始四处活动，他们拿着洋行的宣传单，向人吹嘘出洋的种种好处，假惺惺地为一些生活无着落的人提供食宿，或者诱惑人去赌博趁机讹诈，或者诱惑去喝酒然后下蒙汗药，或者干脆明目张胆地直接绑架。

这些通过各种途径弄来的苦力即为“猪仔”，他们被层层转手，最后卖到雇主手中。这些“猪仔”先存放在“猪仔”馆里等待着出洋。进入了“猪仔”馆就如同进入了监狱，里面肮脏不堪，一间几平方米的风子里关上十几个“猪仔”，外面是全副武装的看守们把守。这些“猪仔”必须遵守馆

规，特别是当被问起出洋原因时，必须回答是因为穷，自愿出洋谋生，如果说是被人强迫，就会遭到毒打，所以“猪仔”馆里终日哀号不绝，因不愿承认“自愿”出洋而被打死者不知有多少。最终迫使苦力们在卖身契上按下手印。



>>等待出洋的华工

“猪仔”们被押上船后，为

了防止其逃跑或反抗，船上都有荷枪实弹的水手巡逻，稍有不顺就是一顿毒打。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各船都进行改装，如将原舱内两排通铺改为4排，以便塞进更多的人货，据当时一家美国报纸报道：“每只船所载都超过法定载客数的几倍甚至十倍。”船舱内长期缺乏日光、空气窒息、饮水食物稀少而恶劣，因此船上疾病丛生，再加上鞭笞、毒打及种种虐待，所以华工在途中死于疾病或者不堪忍受而自杀者，比例奇高。据统计，1847—1857年从香港出发的华工中，途中平均死亡率为30.44%。把这种惨绝人寰的罪恶航运称为“浮动地狱”，真是一点都不过分。

到达目的地后，这些华工就被视同货物，整船整船地售与雇主，或在市场上公开拍卖。他们被剥光了衣服，像牛马一样让人挑来挑去。挑中的华工被送往工地，从事极为繁重甚至危险的工作。他们每天工作12小时或更长时间，每周必须工作7天，还可能随时遭到监工的鞭打。非人的待遇和繁重的劳动使华工自缢、投水的事司空见惯。据估计，出国的华工应在300万以上，而其中1/3失去了生命，另外还有30万受伤残疾。所以说，一部华工的历史就是一部血泪史。

英国政府和港英当局对于这种罪恶贸易一直感到非常矛盾。刚刚废除黑奴贸易的英国却又参与到另一种更为恶毒的黄奴贸易中，岂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特别是当华工的悲惨命运不断被披露后，在世界的强大舆论压力和英国国内善良民众的不断呼吁下，英国和港英政府不得不作出一系列的姿态，先后出台了《中国乘客法》《禁止苦力船从香港出口法案》等法律，以改变出国华工的非人待遇。如规定中国劳工的住宿空间不得少于

12立方英尺，必须配有足够的粮食、医疗等设施，出港前必须经移民官员的检查等。但是港英当局又担心这些措施实行后，这一赚钱的生意会被澳门或者其他地方得到。当时香港首席法官司马里指出，因为苦力贸易固有的残暴，任何改良的尝试都会失败，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完全禁止这门“可耻的行业”，港督麦当奴的答复是：断绝香港向外供应移民劳工，不仅对于想要出洋的中国人不公平，对于需要这种劳动力的英国殖民地也是不公平的，而且当别处正在使用种种不当办法进行移民的时候，香港却要禁止，这也是不合理的。当道义和利益需要权衡时，麦当奴总督当然不傻，还是利益更重要。

由于香港经济的发展，贩“猪仔”在税收中所占的比例不断下降，特别是国际劳动力市场对华工的需求量已大大减少，因此19世纪80年代后，苦力贸易的高潮逐渐平息了。

历史回响



横贯美国东西的太平洋铁路，参加修筑的华工有四五万人，而这其中就有一万多人长眠于铁轨之下。说太平洋铁路是用华工的白骨铺就的，一点也不夸张。1964年内华达州宣布每年的10月14日为“向华人先驱致敬日”，并立下纪念碑：“华人先驱，功彰绩伟；开矿筑路，青史名垂。”华工的贡献当然应该铭记，但他们的苦难更不应该忘却。

一句话点评



一位去过古巴，亲眼见过华工的传教士这样写道：“萦绕于我的脑海，至死都忘不了的，最令人难受的事是苦力们的神色。在我看来，似乎人类的不幸遭遇不可能沉沦得更深了。可怜的中国人，他们的命运比奴隶坏得多。”

乐善好施的东华医院



东华医院正门

关键词

关键时间 1872年2月12日

关键人物 麦当奴

关键事件 义祠丑闻

背景扫描



香港原本是一个荒岛，气候湿热，蚊蝇滋生。英国殖民者占据该地后，经常爆发痢疾、疟疾等传染病，导致人员损耗严重，英国人都视香港为畏途，称那里是地狱。因此在1848年，英国政府从本土调派了一批医护人员组建了国家医院，这是香港的第一所医院，主要为英国军队和行政人员提供医疗服务。

香港的土著居民主要为农夫和渔民，常住居民并不多。但自从开埠后，这里成为中外贸易的集散地，特别是很多内地的穷苦大众迫于生计前往香港卖苦力，人口增长极为迅速，到19世纪60年代已达到11万余人。当时中国传统的医学为中医，国人大都不相信西医，另外由于国家医院的收费较高，远非一般的家庭所能承受，因此，华人有病去医院者极少。其实早在1866年就有华人要求建立一所华人医院，但港督麦当奴以有国家医院为由加以拒绝。短视的他根本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抑或是意识到了，但认

为华人的生命远没有女王的子民高贵，因此华人没有医院的情况一直持续着，直到发生灾难为止。

脉络纵横



“义祠丑闻”的发生再一次将兴建华人医院提上了日程。何谓义祠呢？原来，内地来港谋生的贫民大都是单身在外，他们一旦身故，无法通知其亲人来港办理后事，只好由同乡捐款草草埋葬，于是香港各坟场就有了各种义山。叶落归根一直是中国人的希望，华人死后，得有个地方来供奉他们的灵位，以便其亲人有朝一日能带着他们的灵位回到老家，所以出现了专门存放灵位的地方，这就是义祠。由于义祠是不收费的，且没有姓氏和籍贯的限制，慢慢地性质就发生了变化。因为香港没有华人医院，一些病重的穷苦大众，或是自己，或是由别人送到这里来等死，义祠就成为他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最后一站。因此，义祠经常住满了病重的穷人。由于缺乏必要的卫生设施，义祠内非常污秽。出事的这个义祠叫“广福义祠”。1869年4月20日那天，义祠里死去的人很多，平日来收尸的人刚巧几天没来，导致祠内臭气熏天，附近居民极为不满，向港府发出抗议。有记者前去采访，称这里为人间地狱。港督麦当奴深感事态严重，随即派人调查。

此事对香港的震动极大，一些华商巨绅纷纷倡言建一所华人医院，并为此展开了募捐，短期内即得捐款3万余元。港英当局此时也不好再次否决建华人医院的提议，麦当奴拨出上环普仁街12英亩的土地作为院址，并从赌税中拿出11万作为建设费用。新院于1870年奠基，到1872年2月12日正式落成，即是今天的东华医院。立法局也制定了《华人医院则例》，规定东华医院以免费为华人提供医疗服务为宗旨，设董事局为该院的最高管理机关，董事局由6至10名总理组成，总理由局内同人中选举产生。所谓局内同人即是那些为东华捐资10元以上的人。从东华医院的建立及其宗旨中，可以看出它已不单纯是一个医疗机构，实际上是一个慈善机构。

东华医院成立后，主要工作是为华人提供免费的医疗、救济、丧葬等服务。但因为香港的地理位置特殊，天灾人祸不断，在没有其他社会福利

机构的情况下，东华医院责无旁贷地发挥了这一功能。1874年、1895年、1906年台风相继肆虐香港，造成了极大的人员伤亡。特别是1906年，香港遭受了史上最严重的台风灾害之一。据统计，此次天灾，致使香港地区80%的船只被毁，房屋倒塌无数，仅从海中捞回的尸体就达1 800多具。灾后的香港像一座死城，满目疮痍。救灾工作展开后，港英政府将全部工作都交由东华负责。收容灾民、打捞尸首、殓葬死者……东华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赈灾工作，海内外为赈灾所筹的款项也都转交东华处理。

1918年对于香港又是一个多事之秋。当年正月初三，正是中国人的新春佳节，人们都还沉浸在欢乐之中，香港发生了地震。不久，又发生人祸“马棚火灾”。2月26日，香港赛马场的看台垮塌了，看台下熟食摊的火炉引发了火灾，马迷们恐慌、逃命……600多条生命就这样消失了。面对灾难，东华冲在最前面，将伤者送往医院，为死者具棺收殓，无不体现了高度负责的精神。

可以这样说，在香港，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东华的身影。东华医院的善举甚至越过了地域的限制。如1908年广州、肇庆发生洪灾，受灾民众超过百万，东华医院成为救灾的领导机构——救灾公所的发起者之一，除



>>1910年东华医院高层合影

了直接派人救济外，东华还在海内外华人中发动募捐，共为灾区筹得善款42.7万元。在当时清政府已经衰微，国贫民穷的情况下，民间的慈善机构无疑是救灾的主力，这其中东华功不可没。

东华医院因此在香港华人中赢得了广泛的尊重。另一方面，东华的领导层在香港都是有身份的人物，他们中有各大洋行的大买办、商行的老板、立法院的议员、太平绅士，甚至一些还拥有清廷的官爵。故东华在华人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一些华人之间的纠纷都去找东华调解、仲裁。有人说：“东华医院主席可以被认为是香港华人的非正式的市长。”东华医院同港英政府的关系也非常密切。由于港英当局想拉拢华人上层，因此东华医院的总理可以直接向政府提意见，这样东华医院就成为港英政府和香港华人之间的纽带。东华一方面是华人利益的代言人，另一方面政府的政令也通过东华传达、宣传。甚至中国内地同海外华人的联系也通过东华。东华医院实际上已经超越了慈善机构的性质，成为一个半政治组织，是华人的精神领袖。

东华医院在为华人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自身也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在东华成功的经验下，1907年，在九龙成立了广华医院，不久又成立了东华东院，这就是延续至今的东华三院。

历史回响



东华医院成立后，很长时间都采用中医中药，随着香港逐渐融入世界，东华也开始引进西方的医疗体系。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今天的东华医院已成为享誉海内外的一所综合性的医疗机构，但乐善好施的东华精神一直延续着，除了为香港民众提供优质的医疗服务外，东华医院还设有小学、中学、老人护理院、弱智庇护工场等众多社会福利机构。

一句话点评



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为东华医院题词：“德被众人。”
东华自成立以来的一百多年，立足华人，服务华人，为香港和内地的慈善福利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得此评价理所当然。

沧海变桑田——中区填海计划



20世纪
60年代
初期
开始
填海
计
划
时
的
湾
仔

关键词

关键时间 1889年

关键人物 保罗·遮打

关键事件 中区填海

背景扫描



香港之所以能有今日的经济繁荣，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它“海港”的地理优势。俗话说得好，“靠山吃山，靠海吃海”，香港这颗镶嵌在南海上的明珠，真是与“海”结下了不解之缘——日常生活来源于海，工业生产需要海，外贸发展更靠海，甚至开拓用地还是靠海。尤其是那工程浩大的开山填海工程，成了香港开埠以来的一项重大而长期的事业。它的成就连同香港的经济奇迹，令世人所瞩目。香港地区的最大特点是多山多岛屿，平地只占总面积的16%，近八成土地都是呈三四十度倾斜的山坡，因此给城市用地造成了很大的障碍。而香港的人口及经济活动又主要集中于维多利亚港两岸的九龙、新九龙和港岛北部地区，该地区的人口占整个香港地区总人口的绝大部分，这就更加剧了这些地区本来已经很紧张的土地供应，扩大用地面积已迫在眉睫。因此，开山填海就成了解决中心地区地皮不足的重要手段。

脉络纵横



由犹太富商保罗·遮打发起的香港中区填海计划，东自海军船坞，西到屈地街，将港岛中、西区一带长达两英里的海岸填为平地。1890年开工时，正逢英国王子干诺公爵夫妇路过香港，就请干诺公爵行奠基礼。工程完成后得新填地59英亩，新海边的大道便命名为干诺道。干诺道后面的一条电车路以当时的港督府命名，另一段马路就以遮打命名。

香港之所以能取得今日如此成功的开山填海业绩，主要是因为其本身具有可供利用的自然地理条件。首先，香港海岸线曲折而又多浅湾，方便充填成陆地；其次，维多利亚港的潮差不大，海港两旁近岸地区水深大多维持在10米之内；再次，由于海港为鲤鱼门、汲水门及群山所阻，水流缓慢，非常利于填海；最后，由于香港地质以火山岩及花岗岩为主，易于风化，方便开采。正是由于香港的开山填海所具有的这种可能性与必然性，



>> 中区填海计划工程。堤岸即今干诺道中

因此英国占领香港后不久，便逐步开始实施了庞大的开山填海工程。

从1851年起，港英政府就开始了早期的开山填海计划，接着又在1857年开始部分实施湾仔的填海工程。这都是香港最初的填海工程。当时的港督宝灵为了要在立法局会议上通过他所拟订的填海建筑码头预算案（因为这项工程损害了当时海旁产业所有人的权益），一再与当时的大商人集团发生争辩。争辩一直持续了许多年，先后经过了好几任总督，直到1889年港英政府通过《填海建筑码头法例》，规定工程费用应由海旁地段的产业所有者分担后，这才告一个段落。

虽然香港从1851年就开始了填海计划，但由于反对之声众多，挫折重重，直到1890年遮打爵士建议填海计划，才开始了真正意义上大规模的填海工作。这次规模最大的填海计划，目的完全是为了解决当时逐渐严重起来的屋荒现象。因此此项计划除了填海筑路外，并建议将海军船坞、陆军军营以及若干政府建筑物从市中心迁移，以便空出地方作商业民居之用。

在遮打爵士藏有的关于早年香港的图片中，有1幅是根据3幅先后时间不同的地图所构成的香港海旁地图，揭示了从1845年至1923年海旁地形经历了历次填海工程所起的变化。这3幅地图，最早的是科宁逊在1841年所测绘的香港地图。图中显示，当时的维多利亚城一带都保持着最初的原始状态，海岸线弯曲，沿岸都是沙滩。当时皇后大道就在海旁，那儿大商行的建筑物都面临海滨，各家商行都筑有自己的私家码头，这些码头正是后来屡次在填海计划中发生争执的源头之所在。第二幅图是阿尔费斯在1862年测绘的，彼时今日德辅道一带的地面已有了雏形，但仍是荒芜的海滨不毛之地。第三幅图就是遮打所提倡的中区大规模填海蓝图，这幅图反映了1923年的情形，在这幅图上不仅出现了德辅道，而且还出现了干诺道。

填海计划推行后，保罗·遮打与洋行大班们集资成立置地公司，在新填的海上陆地大兴土木，依山傍海创造出了一个缤纷的海港城市。一栋栋维多利亚式的商业大厦，如太子大厦、公主大厦、亚历山大厦等等，如同雨后春笋一般拔地而起。这些濒岸林立如石笋般的大楼群，已成为近代香港繁荣兴盛的标志，从远处望去，如同一个搭建在海上的贸易舞台，演绎着香港的繁荣与富庶。

此外，港英政府在1941年以前，即在北角一带开始了填海工作，战后

又继续进行，因为那里海滨荒地居多，所以工程状况不大受人注意。另外，远在香港岛背面香港仔方面的田湾村同时进行填海工作，据说5年的时间已经填得新地达7万方尺，计划要填海至20万方尺，以便供应当地渔民扩充渔业生产之用。

港英政府还曾在1948年邀请市政专家来香港调查，提供香港城市设计规划。计划报告曾极力主张迁移海军船坞等军政建筑物，将海岸线自东区至上环拉直，实行大规模的填海计划。

目前正在进行中的中环和铜锣湾填海工程，可说是自1923年以来最大的一次。在中环方面，这项工程计划包括填筑海面，东起海军船坞，即美梨道域多利体育会，向西直至皇后码头与天星码头之间，所填海面宽935尺、长415尺，将来填成后共有新土地约38.8万千方尺。将来拟在这新填地的海滨修建两座码头，一大一小，小的做公众码头，大的则替代今日的尖沙咀轮渡码头。这一填海计划第一步工程的掘泥铺沙工作，现在已经完成。

另一个填海计划，即填塞东区铜锣湾避风塘另建新塘的工程，也已开工。将来工程完成后，旧塘地面预定开辟为运动场和建筑部分房屋，新的避风塘则在原来旧避风塘之外，面积约为200万方尺，有1 000尺长的防波堤与今日海中的加列岛相接。据悉，新避风塘的东堤工程已完成了总工程的40%。

根据整个计划的安排，目前皇后码头一带的填海工程完工以后，天星码头将迁往新地段所指定的地点，衔接之后再逐段向西依次填过去，填至三角码头为止。这个计划如果能够全部实现的话，今日的干诺道之外又将增添一条新的沿海公路，以致整个中环海旁的风景将大为改观。

历史回响



弹丸之地的香港之所以能创造出令世人惊奇的经济奇迹，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优越的海港条件是其取得经济成就的重要条件。然而，光有优越的海港条件是远远不够的，狭小的腹地已经严重制约了香港城市的发展，因此，近代港人为了拓宽城市发展空间，创造了沧海变桑田的壮举，

大大扩展了城市用地面积，在寸土寸金的香港，这极大地缓解了用地压力，扩大了城市发展和市民生存活动的空间，在香港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如今的香港仍在不断吸取前人的经验，积极进行开山填海工程，香港国际机场便是开山填海工程的结晶。

一句话点评



开山填海，开出的是不毛之荒山，填出的是生存之希望！

皇仁书院育英才



理雅各博士

关键词

关键时间 1862年 1894年
关键人物 罗便臣 理雅各 史钊域
关键事件 教育局成立 中央书院成立
关键词汇 英语教学

背景扫描



港英政府统治香港以来，在政治、经济等各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对香港的教育一直采取不干涉政策，因此，香港早期的学校一般都是教会创办的西式学校，或者由私人以及慈善团体创办的学校。然而多年之后，港英政府有意挑选当地华人早已开办的中文私塾，对它们提供一些经济补助，将它们置于政府的管理之下，这就是香港早期的官立学校，当时翻译成“皇家书院”。早期，这些官立学校主要开设中文课程，从1853年秋天开始，其中的两所学校开始设置英语课程。到了1854年，当时的教育委员会向港英政府建议，尽可能地鼓励华人学生学习英语。但是，由于当时官立学校师资条件不具备，因此在培养华人学生学习英语方面效果并不是很理想。由于当时教会学校在香港占有很大的比重，因此教会势力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香港教育，不少早期官立学校也受其影响。至罗便臣就任港督时，官立学校才开始逐渐摆脱教会的束缚，并开始向世

俗化教育发展。

脉络纵横



皇仁书院，历经维多利亚书院和皇后书院等几个发展时期，是香港历史上最悠久的官立中学之一，位于港岛高士威道120号。皇仁书院最早创办于1862年，最初名叫中央书院，又称大书院，是香港第一间官立学校，其办学等级相当于欧美等国家的初级小学。1894年，学校更名为皇仁书院，一直沿用至今。1860年1月，港督罗便臣宣布组成教育局，用以取代先前的教育委员会，这是香港世俗化教育发展迈出的重要的一步。

理雅各博士是当时教育局的重要成员之一，他虽然是一名传教士，但是由于教会学校培养当地传教士的尝试遭到失败，加上他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性格逐渐加深了理解，开始成为香港教育改革的鼓吹者，并一手设计了为华人而设的官立英文学校的模式。理雅各的教育改革计划极力主张强化英语教学，使英语教学在官立学校的教育内容中成为比以前更加重要的一环。从此，港英当局确立了在港岛推行英语教学的教育体制。理雅各博士同时建议要改善官立学校的管理和组织制度，主张在维多利亚城修建一所中央书院，将分散在各处的几所官立学校集中在该处，并且只在此书院



>>1900年的皇仁书院校舍

内讲授英语，由一名欧籍教师负责组织和 管理英语班。港督罗便臣对理雅各的计划表示支持，并赞成把所有官立学校置于拟议中的中央书院的校长监督与控制之下。

1861年3月23日，香港立法局同意拨款两万余元购买在歌赋

街的一处房舍，作为中央书院校舍。由4所官立学校合并而成的中央书院，于1862年2月开学，其第一任校长由毕业于鸭巴甸皇家学院，年仅24岁的史钊域担任。中央书院建立后，未并入该校的官立学校成为中文小学，主要讲



>>学生在苦读

授《三字经》《千字文》《幼学诗》和《大学》等。这些学校主要为中央书院提供学生来源。1864年，中央书院共有120名学生，起初分为中文部和英语部。中文部学生主要学习《中庸》《论语》《孟子》。只有通过中文口试，他们才能进入英语部学习。中央书院特别重视英语教学，英语部主要让学生学习英语，此外还要学《五经》和《史记》等。除了这些课程之外，中央书院的课程还有算术、历史、地理等。港督麦当奴曾建议在中央书院讲授西方自然科学常识，比如化学和物理等。正是在他的推动下，中央书院在1869年开设了化学和几何课，在这一年，该校实验室也正式启用。

中央书院创办之初只招收中国学生，然而到了1867年起开始招收外国学生入学，但中国学生仍然占大多数。1865年开始，中央书院的学生需要缴纳学费，英语部的学生每人每月1元，中文部的学生每人每月50仙（即5角）。尽管学费对于当时的华人来说有点偏高，但他们仍踊跃送自己的子女前去读书，甚至还有已婚青年也前去就读。当时的一些中国学生在学校刻苦学习，他们不仅学到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还接受了西方的一些民主政治思想，这就使得他们比内地同龄青少年眼界更为开阔。如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以及其他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些知名人物如何启、胡礼垣、唐绍仪等，都曾在皇仁书院学习过。皇仁书院不仅为中国培养了一批政治精英，还培养了一些社会名流，如原全国政协副主席霍英东先生就是毕业于皇仁书院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攻占香港，皇仁书院被逼停办。校舍先是

成为日军总部，后又完全毁于战火，仅留下两门大炮和中央书院第二任校长胡礼垣的雕像的上半身。战争结束后，皇仁书院自1947年起，曾在坚尼地道的临时校舍重开。1950年9月22日，迁到位于铜锣湾邻近维多利亚公园的新校舍，并沿用至今。

历史回响



皇仁书院历经一个世纪的沧桑，如今，书院秉承百年办学传统，形成了深厚的历史积淀，在新的世纪焕发出新的光彩。目前在香港，皇仁书院是家喻户晓的名牌学校，其办学规模和教学质量在香港中学中仍然名列前茅，许多香港市民把孩子送往该校学习。同时，皇仁书院凭借其过硬的教学质量为香港培养了大量的人才。一百多年过去了，皇仁书院有得有失，有喜有悲，在新的世纪，皇仁书院站在新的起点，开始新的征程，它将以新的面孔、新的辉煌，去迎接第二个百年华诞的到来。

一句话点评



皇仁书院的悠久历史和沧桑岁月让我们深深体会到中国的一句古话：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突如其来的人间悲剧

——1894年香港大鼠疫



1894年香港鼠疫横行

关键词

关键时间 1894年

关键事件 《香港治疫章程》的颁布

关键词 鼠疫

背景扫描



近代中国多灾多难，天灾人祸如影随形，“一年一小灾，五年一大灾”可以说是最真实的写照。1894年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灾难最为深重的年份之一。在这一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国内外局势空前严峻，民族危机日益升级，中华民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也就在这一年，穗港地区爆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天灾——鼠疫。这场骇人听闻的大鼠疫给当时的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它夺走了数万人的生命，同时也造成了社会经济的大萧条。

清末时，香港地方狭小，建筑十分拥挤，基础设施简陋，卫生条件极差。加之地处亚热带，温暖潮湿的气候尤其利于致病微生物的生长繁殖，这就为各种传染病的爆发提供了适宜的土壤。此外，清末穗港地区之间频繁的人口流动以及港英当局对城市公共卫生的忽视，都是1894年香

港大鼠疫爆发的重要原因。

脉络纵横



香港这次爆发的鼠疫主要源于广州。早在1894年农历二月下旬，广州就出现了鼠疫并开始流行。由于香港自开埠以后工商业日益发展，与广州的经贸非常密切，不断有大量居民移居香港。因此，当大量疫区人口移居香港后，他们将疾病带入了香港，使香港也开始流行鼠疫。广州和香港两地的病原相互交叉传染，导致香港地区鼠疫横行，难以遏制。

香港地区是在广州鼠疫爆发流行两个月之后开始盛行的，最初流行于华人居住稠密的太平山一带，当时每天染病人数高达一百人之多。此后，在吉祥街、棋盘街、皇后大道、九龙等地也开始有疫情发现。染上鼠疫的人，通常发高烧，精神萎靡不振，脉搏快而微弱，全身疼痛，时常还伴有焦虑、恐惧等精神状态。由于这种病传染性很强，死亡率也很高，不论是中医还是西医都显得束手无策，力不从心。

这场前所未有的大灾疫给当时的香港地区带来了空前严重的社会灾难。因为这是一场瘟疫，所以最直接的后果就是致人生病或死亡，人口损失严重。最保守的数据，当时香港地区受传染的病患达2 679人，其中死亡人数为2 552人。

这场严重的疫灾，不仅造成人口的大量死亡，劳动力锐减，而且给社会生产力带来严重摧残，使社会经济遭受了极大的损失和破坏。鼠疫蔓延时，港人畏其如洪水猛兽，避之唯恐不及。不仅洋人纷纷离港，连华人也多往他处逃避，每天迁徙者络绎不绝，当时约占1/3的香港人口都离去躲避瘟疫。大量人口离港，其结果便是香港商业凋敝，市面萧条，工作乏人，连最繁华的皇后大道也人迹罕见，凄惨荒凉。此外，港英政府在宣布香港为疫埠后，各地都严格执行检疫制度，不论是华东地区的上海还是近在咫尺的澳门，都对来自香港的货船和客船进行严格检验，以防鼠疫病毒乘虚而入。正因为如此，各地航运公司的轮船都不愿载运香港的客货，这无疑对香港的转口和对外贸易是致命的打击，香港经济一派颓势。

突如其来的鼠疫给港英当局的统治也造成了相当大的压力。人口的大量死亡，给香港市民带来极度的恐慌，人们承受着在短时间内失去亲人和朋友的痛苦，再加上对这种疾病还没有十分有效的对策，因此人们面对鼠疫感觉非常恐惧，惶惶不可终日。这种过度的紧张心理，容易使人失去理性。于是，在鼠疫流行、民众心焦不安的时候，谣言四起。由于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华人长期以来形成了对洋人的猜忌和仇视，当时就有人说鼠疫是因铁路而引起的，并由此迁怒到外国人头上，使得外国人只好尽量避免与华人接触。由于人们对鼠疫的恐惧，加之当时医疗条件有限，民众利用烧香拜佛、延僧超度、赛会迎神等各种迷信活动求神祈福，希望对疫情有所控制。但是祈禳不仅对疫情于事无补，反而耽误了疾病的及时治疗，造成了大量民众染疫和死亡。

面对如此猖狂疫情的横空劫虐，香港各界采取了诸多相应对策。港英政府颁布并实施了《香港治疫章程》，这使得香港的救治工作有了明确的指导，对于最终控制鼠疫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另外，政府还加强了对公共卫生的控制和管理，进行大规模的捕鼠活动。除此之外，港英政府还对疫区进行集体消毒，不给病毒生存的空间。由于受传染的人很多，医院设施已不能满足需求，所以政府积极设立医院，免费治疗感染者，同时对感染者进行严格的隔离监控，以免交叉感染。为了进一步防止瘟疫的传播，政府还建立了一套疫情汇报制度，即迅速掌握其他地方鼠疫发生情况的制度，这样就能够准确地知道疫情的发展情况，为下一步治疗方案的制订提供必要的情报信息。最为重要的是，这种传染病情报的汇报制度推动了香港公共卫生制度化的进程。在疫情蔓延的关键时刻，香港的华人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他们纷纷投入到抵抗疫魔的



>>瘟疫最严重的上环太平山区清理后的情景

活动中。作为香港华人最大的慈善机构——东华医院，与政府一道，悉心治疗患者，为当时疫情的有效控制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当然，香港毕竟是弹丸之地，光靠自身的努力很难应付如此严重的瘟疫，所以港英当局向国际社会求助，希望借助外部力量来缓解灾情和香港的压力。这样，各方同心协力，最终控制了疫情，使香港避免了一场更大的灾难。

历史回响



1894年的香港大鼠疫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历史虽已过去，但我们不仅要记住这段历史，更重要的是要从历史中吸取经验和教训，为今天的社会提供借鉴。2003年春天的一场“非典”再次袭击人类时，人们再也没有表现出当年那种盲动和无知，而是采取科学有效的治疗方案，井然有序的治疗步骤，从而迅速控制了疫情，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损失。

一句话点评



清末香港鼠疫从发生、蔓延到根治，人类为之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只有相信科学，依靠科学，采取科学有效的措施，才能最终战胜一切瘟疫。历史最终证明了这一点。

孙中山在香港的革命活动



学生时代的孙中山(约18岁)

关键词

关键时间 1895年2月21日 1911年4月27日

关键人物 孙中山 陈少白 黄兴

关键事件 兴中会香港总部成立
1895年广州起义
1911年广州黄花岗起义

背景扫描



19世纪末20世纪初，清王朝在中日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相继失败，进而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中华民族的危机日益加深。而腐朽无能的清朝政府竟“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对帝国主义侵略者摇尾乞怜，这些都深深地刺伤了每一个炎黄子孙的民族自尊心。他们深知清廷已经彻头彻尾地沦为了帝国主义的走狗，要想挽救民族危亡，维护民族自尊，必须推翻清王朝的黑暗统治。而此时，由于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民族资产阶级要求在政治领域反映自己的心声，其中的激进者主张走资产阶级革命的道路，推翻清政府的封建统治，结束两千多年的帝制。孙中山——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四处奔走，宣传革命思想，创立革命组织，从事革命活动。他于1894年创立了兴中会，也就是后来著名的同

盟会的雏形。他还积极策划了一系列反清起义。辛亥革命的爆发，结束了清王朝的统治，废除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然而，这一切都与香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尽管它当时沦为他国统治之下。如今，我们回顾这段历史时，不能抹杀孙中山在香港的革命活动对辛亥革命的推动作用。

脉络纵横



早在19世纪，香港就已成为当时先进的中国人汲取西方先进的革命思想和寻求强国御侮之道的重要场所，到辛亥革命时期，它已成为资产阶级革命的重要策源地。孙中山更是与香港有着不解之缘，以香港为其从事革命活动的重要场所。

1883年下半年，孙中山由广东香山县翠亨村来到香港，并于1884年4月考入香港中央书院，此后又于1887年考入香港西医书院学习医学。由于深受其老师何启、康德黎等人的影响，他不仅学习西方先进的医学技术，而且潜心钻研西方先进的民主政治思想，并且理论联系实际，高度关注当时国际和国内的形势。1890年1月，陈少白经孙中山介绍也进入西医书院学习。他们经常畅谈革命理想，并且结识了其他许多志同道合的优秀革命青年，这些青年以推翻清王朝，挽救民族危亡为己任。从此，孙中山、尤列、杨鹤龄及陈少白四人常常在一起商议推翻清朝政府大计，在当时被称为“四大寇”。孙中山在香港的这一系列经历，对他的民主革命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最终促使他放弃行医而走上了“医国”的革命道路。

1894年11月，孙中山在美国檀香山创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并提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和“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纲领。由于美国距中国遥远，不利于革命活动的开展，次年1月，孙中山返回香港，与当地的爱团辅仁文社合作，于2月21日在中环士丹顿街13号设立兴中会总部，推举黄咏商为会长，用乾亨行名义作掩护，进行革命活动，并修订了《兴中会章程》。杨衢云、陈少白、黄咏商、谢纘泰等人均是早期兴中会的主要骨干。从此，孙中山等革命志士以香港兴中会总部为革命大本营，开展了一系列的反清斗争。



>>同盟会成员

香港兴中会开展的第一次反清义举便是1895年的广州起义。是年3月1日，孙中山前往日本驻香港领事馆，要求给予武器援助。3月13日，孙中山等人在香港兴中会总部策划攻取广州。事隔几日，兴中会又召开会议，决定用青天白日旗作为革命义旗。由于兴中会长期频繁的革命活动，引起了港英政府的察觉，不久港英政府就查封了乾亨行。但是这并没有使孙中山等人中断革命活动，他们仍然紧锣密鼓地准备攻取广州的计划。经过长时间的准备，兴中会联络了广东各地会党、营勇和绿林，筹集了起义经费及武器，决定于是年九月初九即传统节日重阳节这一天发动起义。但因消息走漏，引起清兵的警觉，从香港运往广州用于起义的军火被海关查获扣留，清兵还加强了广州的防范和保卫工作，整个广州戒备森严。此外，清兵还破坏了广州城内的革命机关，大肆搜捕革命人士。一共有40多人被捕，其中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家陆皓东不幸被俘，英勇牺牲。孙中山等人侥幸逃回香港，为避免清廷迫害，他不得不离港赴日本避难。就这样，广州起义还未来得及付诸实践就被清兵扼杀在摇篮里了。广州起义虽然失败了，但

它毕竟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希望用武装斗争的方式反抗清王朝统治的第一次尝试，唤起了千千万万的革命志士继续奋斗，续写中国革命的篇章。

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流亡海外，逃至日本避难。孙中山虽然漂泊海外，但是他仍然关心国内的革命形势，由他组织的以香港为基地或与香港有关联的武装起义从未间断：继1895年广州起义后，比较重要的有1900年10月的惠州三洲田起义、1907年5月的潮州黄冈起义、同年6月的惠州七女湖起义、1910年2月的广州新军起义和1911年4月的广州起义（亦称黄花岗起义），其中以4月的黄花岗起义最为英勇悲壮。

1910年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后，孙中山于同年11月从美洲赶到马来半岛的檳榔嶼，召集黄兴、赵声、胡汉民等人举行秘密会议，决定在广州再次发动武装起义。会后，黄兴、赵声等人先后赴香港，并在跑马地35号秘密设立统筹部，作为第二次广州起义的领导机构，并派人分别前往长江中下游各省联络，策动响应。1911年4月8日，香港统筹部召开会议，制定了起义的周密计划，并组成了一支800人的敢死队，拟订了十路进攻广州的作战计划，但是由于内奸告密，消息败露，以及经费、武器未能及时送到，加上革命志士温生才在广州咨议局门前击毙广州将军孚琦，引起广州地方当局惶恐万分，加强了戒备，故广州起义未能在4月13日如期发动。23日，黄兴由香港潜入广州，重新成立起义指挥部。在形势危急、准备尚未就绪的情况下，4月27日临时发动起义，义军与清军经过激烈的巷战后，由于敌强我弱，力量悬殊，起义不幸失败。黄兴等人负伤脱逃，返回香港，但有近百名革命志士在起义中英勇牺牲。事后，革命党人潘达微将72具烈士遗骸（即著名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葬于广州东郊黄花岗。这次起义，给了清王朝一次沉重的打击，烈士们英勇战斗、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激励了全国人民的斗志，推动了武昌起义和辛亥革命高潮的到来。

历史回响



虽然近代香港早在鸦片战争之后就脱离祖国的怀抱，但那里却是近代中国资产阶革命的重要策源地。兴中会和辛亥革命对近代中国的命运产生

了极为重要的影响。今天当我们再次谈起这段历史的时候，切不可忘记香港在这段历史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孙中山早期与香港结下了不解之缘，从某种意义上说，香港成就了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孙中山也从这里踏上了革命的征途。

一句话点评



香港——南海之滨的一块弹丸之地，燃起了近代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火种，功不可没，永载史册！

港英政府强租和接管新界



参与香港新界「划界」的中英官员

关键词

- 关键时间 1899年3月27日
关键人物 王存善 骆克
关键事件 港英政府接管香港
关键词汇 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

背景扫描



19世纪末的中国在经过中日甲午战争的沉重打击之后，日益颓废腐朽。正因为如此，各帝国主义国家纷纷以划分“势力范围”和强占“租借地”等主要形式开始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华民族的危机日益加剧。占领香港新界的企图在英国军界早已存在，继1860年通过中英《北京条约》割取九龙半岛南端后，英国又于1898年迫使清政府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强行租借新界，完成了对中国香港地区领土的占领。1899年3月27日，英国政府派港督卜力赴香港开始了接收新界的序幕。

脉络纵横



所谓“新界”，就是今天界限街以北、深圳河以南的大

片中国领土及其附近岛屿。1898年6月9日，中方被迫同英方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于是年7月1日“开办施行”。自此，英国将沙头角到深圳湾之间最短直线距离以南、英国九龙割占地界限街以北的广大地区，以及附近岛屿和大鹏、深圳两湾水域强行租借99年，陆地面积达975.1平方公里，较原香港行政区扩大约11倍，水域较前扩大四五十倍，约占广东省新安县面积的2/3。

《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签订后不久，英国政界、军界、商界一些人对条约中保留中国对九龙城的管辖权等内容表示不满，并极力要求扩大租借范围。英国海军要求将陆界向北推至北纬22°40′。港英政府还主张按照山脉河流的自然界限，即以新安县北部界山为界，这实际上是要将整个新安县置于英国的控制之下。当时的英国殖民大臣张伯伦也主张“适当”扩充租界地北部陆界，积极主张逼迫清政府同意将深圳镇划在租借地范围之内。

1899年3月11日，中英在香港举行了“新界”北部陆界定界谈判，中方主张应当信守《专条》的约定，而英方却无理地提出从深圳湾起经深圳迤北山脚到梧桐山，迤东到沙头角北面一线为界。在3月14日的谈判中，中方代表主张“深圳设有炮台，沙头角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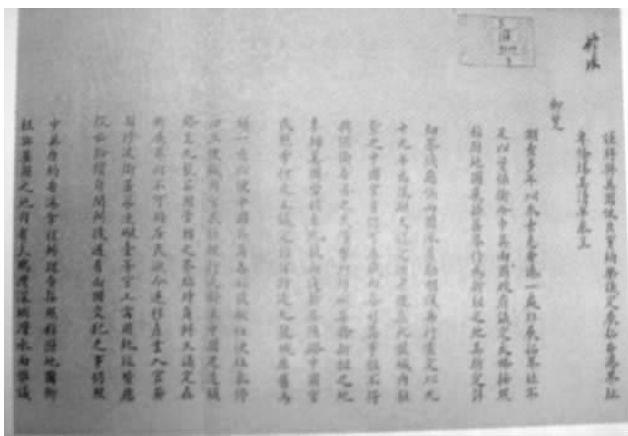


>>1899年4月16日进占新界的英军举行升旗仪式

个大墟市”，不能接受英方提出的界线，建议以“深圳河南边支流为界”。英方却对此表示不满，并以拒绝谈判相威胁。最后在英方的强力逼迫下，中方不得不抛出了第二个方案：“从深圳河口直到该河河源，再到沙头角，将深圳及沙头角留在中国领土以内”，并声明这是中方让步的最低底线了。英方无理主张应以深圳河北岸为界，其目的是将整条河流划在英方界内，并说索取深圳一事可留待北京讨论，中方屈于武力压力，被迫表示同意。3月16日至18日，中方代表王存善与英方代表骆克等人沿深圳河河源至沙头角一线勘定界址并树立了木质界桩。1899年3月19日，王存善和骆克在香港签订了《香港英新租界合同》。这个合同严重违背了《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关于“新界”北部陆界的规定，扩大了对华领土侵略的范围。英方自己也厚颜无耻地承认，通过该项合同，英国完全控制了《专条》中没有包括在英国租借地内的河流——深圳河。

新界北部陆界的定界为英国正式接管新界创造了条件。与此同时，部分港商趁火打劫，利用新界居民担心英国占领后将没收他们土地的心情，趁机成立规模庞大的置地公司，大肆廉价抢购土地。港督为此忧心忡忡，担心今后新界公用土地的价格飞涨，心急如焚，于是致电张伯伦要求尽快接管新界。香港总督和两广总督原来商定于1899年4月17日交换“新界”租借地，但英国方面迫不及待地要求提前行动。3月27日，港督卜力派遣港英政府警察司梅轩利前往新界大埔墟搭设警棚。而当时的新界租借地尚未办

理交接手续，梅轩利事先并未通知清政府，也没有告知地方官员就派兵前往，确实有“先肇衅端”的意味。梅轩利此举激怒了世代劳动生息在新界这片土地上的中国居民，他们在爱国乡绅的带领下，组织起来反抗英国武力接管新界。他们向英国侵



>>1898年《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原文抄本

略者投掷石块，于当晚将警棚烧毁。但最终在英国帝国主义的武力镇压下，民众的正义反抗还是以失败而告终。

新界中国居民反抗英国武力接管的斗争是香港史上光辉的一页。他们表现出的高昂的爱国热情和勇敢无畏的斗争精神，给中国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英国强租九龙新界的历史，是一幅活生生的弱肉强食的图画。英国侵略者一再违约侵越，恣意妄为，血腥镇压当地人民的正义反抗。腐朽的清政府软弱无能，忍气吞声，逆来顺受。最终导致祖国大片领土丧失，让英国实现了其占领香港地区的最后一步。

历史回响



自古以来，香港（香港岛、九龙、新界）一直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英国强租新界，使得中国的领土受侵，主权遭到严重破坏。1984年，在邓小平同志“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下，中国政府同英国进行了长期的艰苦卓绝的谈判，两国最终达成一致，于1997年7月1日中国开始恢复对香港地区行使主权，这其中包括1899年被英国强租的新界。至此，香港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中国人民雪洗了百年耻辱，圆了世纪的梦想。

一句话点评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了民族独立和富强，综合国力大为提高，最终洗刷了民族耻辱，收回了包括新界在内的香港。

泰山北斗——香港中华总商会



香港中华总商会原主席霍英东

关键词

关键时间 1896年1月17日 1900年 1913年12月22日

关键人物 古辉山 冯华川 刘铸伯 霍震寰

关键事件 中华会馆成立

背景扫描



被英国占领之前的香港，人口比较稀少，居住也很分散，除港岛南面赤柱一处设有善安公所处理当地公众事务外，再也没有其他正规的为华人服务的社会群体了。鸦片战争后，英国通过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开始对香港实行殖民统治。由内地迁居港岛的华人，由于没有本国政府做后盾，饱受西方殖民者的歧视与压迫，生活十分艰难。迫于当时的形势，华人们自发地按照中国传统，以血缘、地缘和业缘为纽带，陆陆续续地结成各种社会团体，希望通过这些社会团体保障自身的利益不受侵害。

19世纪70年代，香港华商经济开始超过英商，这是华人经济发展的一大飞跃。随着华人经济的发展，阶级关系不断改组，加上西方国家近代社会思潮的影响，华人社团组织逐渐由传统走向近代，组织结构也日臻完善，组织形式与活动内容不断丰富。

脉络纵横



19世纪中后期，香港的商品经济有了较快的发展，华商经济更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当时香港华人中已涌现出一批拥有经济实力，并且被同业认同、有一定号召力的殷商富人，他们是初期商人行会的主要发起者和领导者。早期华人商业社团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便是19世纪60年代成立的南北行公所。南北行公所是当时香港商界实力最强、组织结构最完善的跨地缘关系的同行大联合。由于它的组织形式与其他同业公会并无大的区别，仍是传统商业行会的延续。但南北行公所因其成员都是较早采用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新式商人，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近代商人团体的某些属性，如谋求改进经营方式，提高经营水平等。所以，南北行公所在香港华商社团发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香港华人总商会的诞生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最早出现的是1896年1月17日揭幕的中华会馆，这是香港历史上第一个近代意义上的华人商会。当时，部分美国华侨陆续回港，看到华商居民呈一盘散沙状，极为惊讶，便积极鼓励香港同胞学习美国华侨，组织中华会馆，以增强联络和团结，并应承捐款修建馆址。于是，宝隆金山庄经理古辉山等十多名华商知名人士便热心发起组织香



>>香港中华总商会大厦

港中华会馆，目的在于“联乡谊而通商情”。1896年1月，中华会馆终于在般含道落成，当时由何亚美主持会务。香港的华商总会终于诞生了。中华会馆的主要成员是买办、金山庄商人和长期接受西方思想教育的上层知识分子。它以由外商组织的香港总商会为蓝本，但会员限于对华贸易有关的商号和商人，故仍残留有同业公会的色彩。中华会馆成立后，在调解华人商务纠纷、举办社会公益等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不过，由于会馆的主持者热心公益甚于关心会务，加以馆址偏离商业区，活动不便，不久会务便陷于停顿。

1899年，大买办何东发起成立华商会所，它以中华会馆馆舍为会址，会员以个人为单位。1899年2月中旬举行第一届同人大会时，有会友七十多人，大多是从事洋行贸易生意的。该会成立的目的，就是要作为华商的荟萃之所，以便联络感情，推进华侨商务。华商会所会员多时曾达240人，但发展有限，会员反逐渐减少。1900年，买办冯华川、陈庚虞及何泽铭等为推进商务，增强团结，提议将中华会馆扩大发展为全香港华商统一的团体——华商公局。当时得到四百余人响应，并集资在商业区德辅道中购置楼宇作为会所，冯华川被推选为主席。虽然港英当局以其商会组织尚不完备为由而不同意注册，但是，华商公局毕竟是代表香港多数华人利益的团体，它的成立，表明华商已逐渐成为香港政治上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民国初年，华商公局主席刘铸伯认为：自从辛亥革命以来，香港各邑商会纷纷成立，若仍用华商公局的名义，则显示不出华商公局是一个总商会性质的团体。于是倡议改名，得到众人附议。1913年12月22日，香港华商总商会应运而生，其宗旨是代表华人向政府方面传达下层民情，为华人排忧解难。起初，会员总数不过六七十人，均属当时香港华人社会的殷商名流，刘铸伯当选为主席，叶兰泉出任司理。经过数年惨淡经营，渐渐才有侨团会员参加，会务亦日益扩大，入会者达上千人，广泛代表港商各大公司、行号及行业商会。1919年，香港华商总会还创办了《商报》。1929年，又创设华商总会图书馆。

此后，香港华商总会已日益发展成为香港华人的轴心团体，它不仅为香港华商分忧，为香港华人解难，还大力提倡社会慈善、社会教育事业。同时，督促港英政府改善对港商的相应政策。正因为香港华商总会急香港

华人之所急，想香港华人之所想，很快便在香港华人中获得很好的口碑，人们都赞颂其“成绩卓著，领导侨团，堪称泰山北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华商总会改为理监事制。1952年3月，又改为会董制，并定名为香港中华总商会，此名一直沿用至今。现任的总商会会长是香港著名的实业家霍震寰。

历史回响



香港华商公局的成立，加强了本埠华人社会的沟通互助及其与乡梓的联系。它借助中国人传统的注重联络感情（包括血缘、地缘、业缘）的因素，又采纳了近代商会的组织形式，因而成为联系、团结全体华商的牢固纽带。事实证明，香港华商公局是有凝聚力、有效率的。香港中华总商会是香港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爱国华商社团，成立百余年来，秉承促进工商发展、繁荣香港的创会宗旨，坚守爱国爱港立场，在国家发展的各个时期和香港回归祖国的历史进程中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句话点评



一个华人商业社团能持续一百年而不衰实属不易。香港中华总商会之所以能走到今天，更多的还是靠人心，因为它在兴办之初就以维护在港华人的利益为己任，切实为在港华人着想，是在港华人的避风港。

中国百货公司的先驱 ——香港先施公司



上海南京路上的先施公司

关键词

关键时间 1900年 1910年 1917年

关键人物 马应彪

关键事件 先施香港总公司成立
广州、上海分公司成立

关键词汇 一口价交易 售货小姐

背景扫描



自从香港被英国强占以后，英国殖民者就宣布将该地辟为自由港。由于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再加上自由港这一特殊的港口地位，香港便大力发展转口贸易。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至19世纪末，香港已成为东方最大的转口港。东西方文明在这里交汇，香港已逐渐发展成中西合璧的城市。

香港的发展，华人作出了巨大贡献。从香港开埠起，华人就充当了主力军，为港岛的建设提供了必要的劳动力、资金和各种生活服务。到19世纪70年代末，华人在经营转口贸易等方面已取得巨大的成绩，其实力开始赶超英商。华人所缴纳的税款占了港英政府税收的九成，这足以显示出华人在香港经济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港督轩尼诗也不得不承认，华人已成为香港最大的业主。历史发展到20世纪

初的时候，香港的人口已超过30万，此时的香港业已成为远东转口贸易的重要港口，人们对生活用品的需求越来越大，加上社会文明的进步，人们开始关注服务质量，而传统的杂货贸易已无法满足市民的日常消费。由于西方商业文明的冲击和影响，香港华商也开始进军现代百货业。

脉络纵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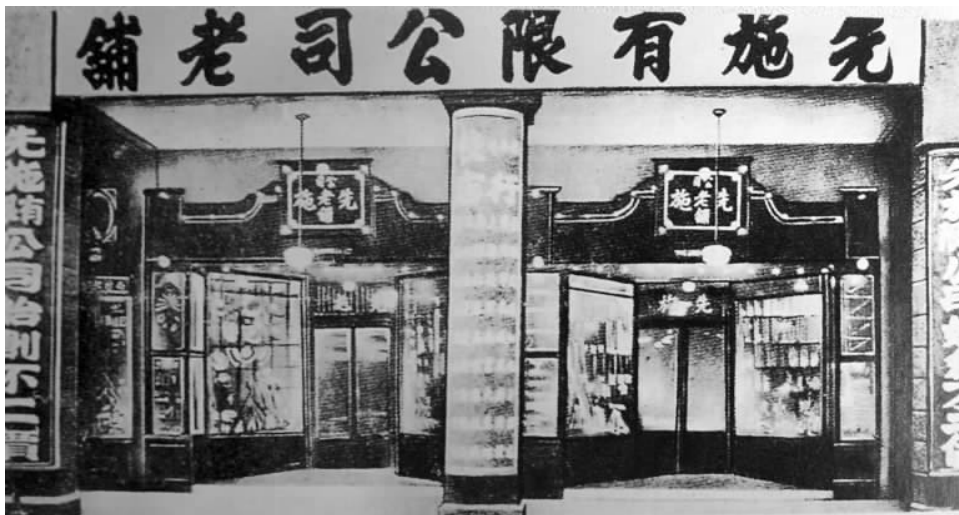
先施公司是香港历史上最早的百货公司，也是中国百货商业的先驱。它由澳洲华侨马应彪等创办，经过一番苦心经营，一跃而成为当时国内商品种类最丰富、经营管理方法最先进的百货公司之一。如今一百多年过去了，先施公司仍然是名副其实的百年老店，在现代竞争激烈的百货市场上仍稳稳地占据一席之地。

近代香港是一个典型的靠移民发展起来的城市，既有海外华侨，也有中国内地移民，其中以广东籍人为主，他们接受了西方许多先进的商业经营观念，并积累了一定的资本，于是选择生活文化各方面和广东非常相近的香港作为发展基地，马应彪便是其中的佼佼者。马应彪是地地道道的广东中山籍人，小贩出身，19岁时便离乡背井去澳洲做华工。他天生就有经营做买卖的天赋，早在1892年，便开始和友人在悉尼华埠合资开办永生公司，经营中国土特产，生意十分兴隆。马应彪在经营永生公司的时候，发现国外的百货公司顾客络绎不绝，门庭若市，场面极为红火，这促使他萌发了开办一家中国人自己的百货公司的念头。言必行，行必果。自从有了这一想法后，马应彪便从澳洲移居香港，独自一人开起南北行，经营转口贸易。马应彪积累了一定的资本后，逐渐向现代百货业进军。1900年，他与华侨蔡兴、马永灿等人，集资12股，累计资金2.5万港元，在港岛皇后大道中172号开设先施公司，经营各国百货用品。他之所以将公司命名为“先施”，其中含有深刻的寓意。“先施”一词源自《中庸》的“先施以诚”的理念，其主要含义是：如果一个人或组织不能以诚实之道施于人，则他很难取信他人。从英文的角度说，“先施”英文翻译为Sincere，Sincere一词在英文中也正好是诚实、诚信之意，恰恰与中文“先施”一词音义相同，这

足以看出当时马应彪经营这家公司的初衷和宗旨。

当时香港的华商仍然以南北行为主，经营方式主要为传统农业社会那一套旧方法：首先，柜台上所售商品都没有明码标价；其次，做生意靠的是讲情面，顾客与老板每做一笔生意，买主与卖主之间经常上演长时间“砍价”拉锯战，既费时又费劲。马应彪为了改变这种不良的经营方式，将西方先进的管理理念和经营方法引入香港，从而更好地经营先施公司。首先，先施自诞生之日起，就非常注重自身的外在形象和内在品质。它的门面华丽气派，店堂富丽堂皇，让顾客一进门就有宾至如归的感受。这打破了华商从前只开地面铺，并且铺面窄小阴暗，不讲究门面和装潢的旧传统。其次，先施公司开中国零售业之先河，首次规定顾客光临先施，不论其购物多少，都会开具发票，作为顾客退货易货的凭证。并且，先施还一改过去讨价还价的不良经营习惯，首创“一口价”机制，即在先施购物，不讲价、不还价。除此之外，先施公司打破了当时中国旧式庄行一律灰色短打小伙计站柜台的旧例，学习西方聘请售货小姐，这在当时可以说是一个惊人之举。香港虽然很早就开埠通商了，但是在那个年代，华人社会仍然是封建意识起主导作用，女子抛头露面是当时社会的主流意识所不允许的。先施公司这一举措已经超出商业经营的意义，它更多的是对当时的社会风气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先施培养出了中国首批职业女性，为中国女性步入社会，自力更生、自食其力起了重要的开拓作用。据说，先施公司开业当天，马应彪夫人亲自率领售货小姐迎送顾客，其场面轰动了整个香港地区，各地的人们纷纷前来捧场。从那以后，许多百货公司都仿效先施公司的做法，售货小姐也逐渐被社会所认识和接纳。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近代中国女性解放运动。

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先施公司积累了一定的资本，规模也进一步扩大。1917年，先施公司在中环德辅道中环先施公司原址上兴建了一座楼高六层的商业大厦，作为先施公司的总部。新大厦模仿美国纽约百货大厦的设计模式，店内南北两端都安装了直达六楼的现代化电梯，同时将楼顶开辟为游乐场，设有饮食部、茶点部等娱乐场所，晚上还可以听歌跳舞。这些都迎合了香港上层人士的消费需求。为了进一步提高公司的档次，先施率先引进当时纽约刚刚流行的霓虹灯招牌。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五光十色的



>>先施有限公司老铺

霓虹灯熠熠发光，将先施公司的店面点缀得缤纷璀璨，让顾客流连忘返。

20世纪初，香港的消费市场很有限，市区面积仅仅局限于香港岛中环和九龙半岛，繁荣程度远不如同一时期的上海和广州。为了进一步拓展先施的发展空间，先施公司董事局决定向人口稠密、经济发达的广州和上海地区开拓市场。1910年，先施向埠外投资发展的条件已经成熟，在这一年年初，先施首先向毗邻的广州进军，在广州广为集资并在闹市区长堤大马路一带购买了大约4 000平方米的地皮，并参照香港先施总部的建筑模式，在这块土地上兴建了一座五层楼高的商业大厦。这是先施公司进军内地市场的第一步。从此，先施公司在中国内地市场便占有一席之地。之后，先施又于1917年开始进军号称“东方巴黎”的上海，希望在当时中国最大的城市能够拥有一片自己的天地。是年，在当时全国最繁华的上海南京路上，先施公司上海分公司隆重开业。上海先施公司集购物、娱乐、休闲为一体，适应了各阶层人士的消费需求。先施在国内扩大投资的同时，还积极向海外寻求市场空间。从1920年开始，先施公司以百货销售业为主，在日本、新加坡、英国以及世界其他地区设立分支机构，在世界各地设立连锁机构，其业务遍布全球。这标志着先施走上了国际化营销的道路，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做大做强。

历史回响



如今，先施公司成立已经有一百多年了，香港也已经发展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大都市，是世界重要的金融、商务流通中心之一。在百货商业竞争如此激烈的今天，先施作为一个百年老店，历经了一个世纪的沧桑，仍然不减当年雄威，并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在新的世纪，先施公司与时代同行，注意摆脱“老牌”形象，不论从经营到包装，都开始迎合市场的年轻化，并根据香港市场行情及时调整销售策略，尽最大努力满足顾客的消费需求，争做百货业的常青树。

一句话点评



先施公司历经百年沧桑，铸就世纪辉煌。支撑先施走到今天靠的是诚信立人、诚信兴业！

广九铁路话当年



第一班在广九铁路上行驶的火车

关键词

关键时间 1898年 1907年 1911年
关键人物 盛宣怀 周馥 唐绍仪 詹天佑
关键事件 签订《广九铁路借款合同》
关键词汇 广九铁路 怡和洋行

背景扫描



19世纪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后，纷纷向帝国主义过渡，由于生产的极大发展，列强们强烈要求向海外进一步扩大其商品销售市场并拓宽生产原料供应地。此时，腐败无能的清王朝在中日甲午战争中遭到惨败并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使得中华民族进一步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无穷深渊，也进一步刺激了帝国主义国家瓜分中国并向中国输出资本的欲望。而牟取暴利，争夺对华铁路的投资权，便是列强对华输出资本的主要方式之一，也是巩固和扩大其在华势力范围的重要手段。其中，特别是以英、俄、美、德、法、比等国对芦汉、粤汉、京奉、津镇等线的争夺最为激烈。更令国人气愤的是，英国于1898年8月又正式向清政府提出了修筑九龙—广州、天津—镇江、浦口—信阳、山西—河南—长江沿岸、苏州—杭州—宁波等五条铁路的贪婪要求，广九铁路便是英帝国主义掠夺中国铁路权，进行侵略扩张的重要一环。

脉络纵横



所谓广九铁路，顾名思义是指从广州至九龙的铁路，这是一条将广州与香港紧紧连接在一起的陆上交通大动脉。它北起广州，南迄九龙红磡，全长181公里，途中以深圳罗湖桥为界，将整个铁路线分为广深路段（147公里）与港英路段（34公里）。在全国数万公里的铁路线中，广九铁路是那么的渺小，那么的不足为奇。然而它却有一段令人难以忘怀的辛酸历史。追溯到1888年，当时，香港的一些华商为了加强香港和内地的贸易联系，筹划修建一条广州至九龙的铁路。时任两广总督表示赞同，一些开明的中国人也主张修建广九铁路。然而英国早怀有修筑广九铁路的打算，在强行租借新界之际，他们就参与了广九铁路的勘测活动，在随后的租借新界的条约中，英国对修建广九铁路的计划作出了安排。1898年6月9日，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强行租借新界的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其中便规定，“将来中国建造铁路至九龙英国管辖之界，临时商办”。1899年3月28日，英国还未正式接管新界，便对清政府施加压力，强迫其接受由怡和洋行与当时清政府督办铁路总公司大臣盛宣怀签订的《广九铁路草合同》。这份合同首先规定了修筑广九铁路必须遵循1898年5月13日签订的《沪宁铁路草约章程》中的苛刻条件，另外还设想了将来广九铁路与粤汉铁路的衔接问题。

至于资金，由于清政府财政空虚，根本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修筑铁路，唯一的办法便是向帝国主义国家借款。当时，帝国主义在中国的铁路投资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贷款给清政府修筑铁路，这种借贷附有极为苛刻的政治条件，通过借款抵押，列强可以控制中国的多项主权。此外，帝国主义通过贷款还可以获得巨额的经济暴利：首先，通过贷款索取高额的利息；其次，贷款并不是十打十的满额贷款，而是带有很大的折扣，如九折，也就是说借款给中国100元，实际只付给90元，而且还要以所修铁路财产作为担保，并要求参与铁路的建造与管理。可见帝国主义国家积极贷款给中国修铁路是不怀好意的。广九铁路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修筑的。从签订《广九

铁路草合同》至正式订立借款合同，整整持续了8年之久。

各帝国主义国家在争夺中国铁路修筑权的过程中既矛盾重重，又狼狈为奸。他们对中国铁路权的任意践踏激起了国人的强烈抗议，中国人民极力要求维护国家的铁路主权。正因为如此，在后来的《广九铁路借款合同》中，英方作出了非常有限的让步。

腐败至极的清政府在英国方面的谎言诱逼下，于1907年3月7日由当时清政府的邮传部左侍郎兼署外务部右侍郎唐绍仪，与英国正式签署了这份借款合同。该合同强迫清政府以高额利息向英国借贷150万英镑（九四折）。另外清政府还必须以铁路作为抵押，重金聘请英国工程师参与修筑广九铁路在华路段，这足以看出该合同具有严重的不平等性。

广九铁路于1907年8月正式破土动工，港英段和广深段同时开工建设。历经4年的艰辛施工，于1911年全线通车。刚刚建成的广九铁路，始于广州大沙头，终于九龙尖沙咀，全长共计178.6公里，其中在华路段为142.8公里，港英路段为35.8公里，两段路长度之比约为4:1。但是，由于从修建到通车都由英国人控制，因此，铁路营业收入分配竟然是港英段占35%，而在华路段只占65%，可见其收入分配之不合理。1932年，



广九铁路罗湖站

中国和港英双方开始就收益分配问题进行谈判，谈判历时一年多才达成初步协议，规定直通快车的收入分配，改为在华路段占72%，港英路段占28%。

自20世纪40年代开始，港英路段共设有九龙、油麻地、沙田、大埔、大埔墟、粉岭、上水、罗湖等8个车站，行车时间大约需要1小时。到了80年代时，设有九龙、旺角、九龙塘、大围、沙田、火炭、马场、大学、大埔墟、粉岭、上水、罗湖等12个车站，全程大约需要36分钟。除此之外，起讫站点也有所变化，原来一直使用的尖沙咀火车站，于1975年11月迁到红磡现址。而广州方面则早在1974年就将火车总站从大沙头搬至三元里现址，形成了目前的火车站、汽车站、民航站、交易会、流花宾馆、邮政大楼等紧相毗邻的现代化建筑群，成为当代广州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也是广州重要的闹市区之一。

历史回响



新中国成立初期，广九铁路广深段回到新生的共和国手中，铁道部门对广深线进行了全面的改造，充分发挥了铁路的经济效益。改革开放后，深圳罗湖口岸成为我国最大的边境口岸，经这里入境的旅客年均1 000多万人次，由内地输入香港的转口货物近30%是通过广九铁路运输的。1979年4月4日是穗港两地人民的重要日子，中断了近三十年的广九直通火车恢复通车，旅客出入境往来更为方便，广州与香港之间的距离进一步拉近了。1987年，耗资4亿人民币的广深铁路复线电气化工程竣工，改造之后的广九铁路，在支持深圳特区建设，加强内地与香港的联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95年11月16日，京九线全线通车，它与广九铁路布吉站相接，直达九龙，全长2 360公里。这把香港与内地连得更紧、更亲了，密切了首都北京与香港地区的联系。从此，香港与内地更加融为一体。

一句话点评



如今的京九线是贯穿南北的交通大动脉，它连接广九线，将香港和内地紧紧地连在一起，成为香港与内地政治、经济、文化、贸易交往的重要纽带。随着香港的回归，广九铁路也最终回到中国人民的手中，民族的耻辱终被洗刷。

香港大学

——英国远东殖民地第一所大学



港大校徽

关键词

关键时间 1912年3月11日

关键人物 卢押

关键词汇 香港历史最悠久、影响最大的大学

背景扫描



早在香港大学建立前40年，英国安立甘会牧师哈钦森就曾经提出在香港创办大学。1880年，轩尼诗总督任命一个委员会研究是否可将中央书院（即后来的皇仁书院）改为大学。委员会认为，建立大学是奢望，香港所需的只是商业学校，于是这个建议被搁置起来。

到20世纪初，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英国的高等教育迅速发展起来，在20世纪开头的五六年中相继创设了伯明翰、曼彻斯特、利物浦、利兹、谢菲尔德等大学，这股势头无疑对建立香港大学是有利的。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废除科举，采用新学制，有大批学生希望出国留学。然而出国的费用十分昂贵，于是英、美、德、法等西方国家纷纷来华开办大学招收中国学生，以便扩大本国在华的影响。有人计算过，在港念书的费用只是到美国留学费用的约

1/5，所以在香港建立大学对中国学生是有吸引力的。

1905年12月15日，香港《德臣西报》上刊出了该报经理唐纳的一篇社评《在香港建立帝国大学议》，该文从英国同日本在远东和中国角逐的角度，阐述了在香港创建一所大学，对英帝国在中国扩大其思想文化影响的重大作用。

脉络纵横



1907年7月，英国政府派卢押来港就任第十四任港督（1907年7月至1912年3月在任）。卢押到来之后，对同年10月《德臣西报》的再次呼吁建立香港大学的建议极为赞成。他认为，英国应该在香港建立一所大学，一来便于与其他列强竞争，二来让中国人（尤其是香港人）认同英国的价值观，便于英国在华南拓展势力以及巩固在香港的统治。在1908年1月17日圣士提反书院的颁奖典礼上，卢押致词表示希望香港成为远东的牛津和剑桥，并且指出这会给香港和中国都带来利益。有趣的是，革命党人和清朝高官一致支持港大的建立。当时两广总督和省港工商界也觉得成立大学有助于中国人学习西方的科技，使中国自强，于是出钱支持成立香港大学。

建校工作面临的最大困难是经费不足。据估计，港大每年的维持费用至少需要7万港元，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费用。港英政府和英国政府都表示不能拨付这笔款子，但是卢押并没有放弃，为了实现计划，他下令成立



>>香港大学

了一个筹备委员会，研究全部计划以及计算各项开支。1908年9月，筹备委员会向卢押提交了一份计划报告书，认为所需经费庞大，无法筹措，因此不主张设立香港大学。但筹委会中唯一



>>香港大学

的华人何启却认为，创立大学的经费不足忧虑，因为只要大学设有中文科目，海外华侨及国内绅商、香港华人，都会全力支持。本来卢押准备在不需华人捐款的情况下，办一所只有医科

和工科的大学，但在此情况下不得不改变初衷，决定办一所有文科和理科的大学。很快，筹委会就得到了一位富有的商人幕迪的热心赞助，捐资15万港元作为建校经费。两广总督张人骏也认为在香港建立大学可使中英关系更加密切，因此积极支持募款，并在1909年夏天送来捐款20万元。解囊乐助的还有北京邮传部尚书等一些清朝高官。到1909年底，内地捐款已有65万元，为当时已募集资金的一半左右。

更广泛的赞助来自海内外的华人社会。在香港成立了以何启为主席的华人筹集委员会，捐助人士包括轮船公司、银行、金山庄、南北行等各行各业的商界人士，还有医生、教师等自由职业者，所捐款项从5元到20元不等。不久就筹集到了大笔的资金。

港大主楼于1910年3月16日奠基兴建，实际耗费28万多元，比幕迪原来的捐款几乎多出了一倍，但是他仍然承担了所有费用，可惜的是，他在1911年6月病逝，未能参加开学典礼，无从实现他亲见港大落成的愿望。

1912年3月11日，香港大学举行开幕典礼。卢押在开幕典礼上的讲话申明了港人办学的宗旨，指出要效仿伯明翰、利兹等大学重视应用科学，要向不同种族、不同信仰的学生开放，要以英语为教学语言，以扩大英语在远东的影响，还要通过接收中国内地学生，以增进中英间的互相了解。1912年9月，港大正式开学，聘请原谢菲尔德大学副校长、东方学家伊律为副校长，由于校长例由港督兼任，伊律实际上担负起校长的日常职责。在学院设置上，初时有医学院（何启创办的香港西医书院合并到港大，并成为医学院的主干）和工学院，次年成立了文学院。

香港大学的校徽是根据英国纹章学院的建议而设计的，并于1913年5月14日确定了现在的盾形徽章和校训。从徽章的设计中，我们可以看出早期的大学兴办者对香港大学的期望，希望将大学发展为一所中西合璧的大学。1981年，在香港大学建校七十周年时，向纹章学院申请一个完整的大学纹章，添加部分包括冠顶及扶持盾牌的兽形，此项申请于1984年获学院审核批准。香港大学亦因此项批准而成为香港唯一一所拥有完整纹章的大学，显示出港大历史悠久的一面。

在创立香港大学时，港督卢押曾提出“为中国而立”的主张，认为当时中国社会不适宜接触西方的人文价值观，所以在最初，香港大学模仿英国利物浦大学的制度，重理工而轻人文，只设三个学院：医学院、工程学院及文学院。1916年12月，学校举行了第一届毕业典礼，有23名毕业生及5个荣誉毕业生。1926年省港大罢工结束后，港英政府认为学生需要认识中华文化，于是便邀请中国内地的国学大师到文学院开设中文学院。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香港大学的学术水平已在国际社会占有一席之地。1939年，学校增设理学院。从20世纪50年代起，又续增建筑学院、社会科学院、教育学院、法学院等。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香港大学也被迫停办。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学校于1946年10月复校，并开始进入较快发展时期。为适应人口急速增长的形势，学校不断提高招生人数及聘用更多高素质的教师。1961年学生人数为2 000人，是1941年的4倍。1989年后，由于政府推行大专



香港大学

教育本地化，大幅增加大学学位和课程种类，使得香港大学的学生人数倍增，至2001年已有学生14 300名。

历史回响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国际贸易的转型，香港从以中英贸易为主体的转口港地位扩展成为欧美及亚洲各地贸易的枢纽。各项建设、行政及管理上人才的需求，都有赖于这所大学的培养。港大中文系的设立，把中国文化的精华部分介绍到这个华洋杂处、面向世界的通商口岸，这就为香港大学开创了一个促进中西方文化交流的理想的新途径。

香港大学培养出了一大批对祖国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作出过重大贡献的人才。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曾经有一批内地青年通过公派或自费前往香港大学读书，打下较好的专业知识基础后，再前往英美等西方国家深造。这批学生人数虽不多，但学成归来后多数成为国内文教、卫生及科技界有影响的人物。他们中间有原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理事长、清华大学副校长刘仙洲教授，原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理事长、铁道部副部长石志仁教授，原中华医学会会长林宗扬教授，著名美学家、原中国美学会会长朱光潜教授等。

一句话点评



香港大学作为香港历史最悠久、影响最大的一所大学，一直秉承优良的传统。由于自身的努力，港大目前已经是一所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综合性大学，相信它会更加辉煌。

黄大仙祠——香港香火最旺的地方



黄大仙祠

关键词

关键时间 1925年

关键地点 啬色园

关键人物 梁仁庵 黄初平

背景扫描



黄大仙原名黄初平，约公元328年出生于浙江省金华县兰溪市。他本是一个牧羊童，相传15岁在家乡赤松山牧羊时，巧遇一位仙翁，仙翁将他引领到一个石室，教他医术炼丹之学。他在此地潜心修炼，终于得道成仙。40年后，他的哥哥黄初起得到一位道士的指引，在山上重遇失散多年的弟弟。此时，黄大仙已法力高强，能够把众多的白石变为白羊。其兄若有所悟，决定和他一起修道，两人终于并列仙班。黄大仙以“普济劝善”为宗旨，善业范畴包括兴学、赠医、送药、安老、扶幼、救灾、恤难等。因为他隐居于赤松山，故又称为赤松仙子，当地民众还在金华赤松山为他修建了黄大仙祠。后来黄大仙云游四海，救助贫苦大众，劝善济世，故民众修祠纪念，渐而远近驰名，得享“有求必应”的美誉。

随着黄大仙的“骑鹤南天”，广州成为黄大仙在南方的首个落脚点。广东道教的信奉者梁仁庵于1899年修建了

奉黄大仙为主神的黄大仙祠，它位于广州城外西南面的花地大幽尾，在建成后至1913年的二十多年间，黄大仙祠的香火一直十分旺盛。

脉络纵横



1921年，处于军阀割据时期的广州政局混乱，黄大仙祠在战乱中屡遭破坏而逐渐衰落，其主持梁仁庵目睹社会动荡，于是携黄大仙像到香港，在九龙狮子山下的竹园村附近找到理想地点，开始建黄大仙分庙。1925年，香港黄大仙祠在啬色园竣工。1937年啬色园开坛乩示，经过仙师的乩示，说如果要想此园长久地存在下去，建筑就要配合五行相生的布局。于是在1938年按照五行相生的布局原则重建了道堂。日本人占领香港时，曾试图侵占黄大仙祠，但是慑于黄大仙的名气，终未采取行动。日本战败投降后，香港重建，黄大仙祠的香火也随之日盛，并于1956年对外开放。1959年，成立建设基金保管委员会，之后对祠堂不断加以增修和重建，如1968年建成了山门牌坊，1972年建造了啬色园主殿，终于具有今日的规模。



>> 黄大仙祠

黄大仙祠又名“啬色园”，啬色二字的解释是：啬者，少费也，有慳吝之义；色者，所好之物、有欲之类也。亦即如果一个人沉溺于物欲之中，就会受到这种欲望的控制，容易丧失人的本性。所以“啬色”二字，实有爱精神、致虚静、省思虑、寡情欲的要义，含有导人悟道修真的意思。

啬色园占地18 000平方米，别具宁静平和的气息，是都市中的净土。黄大仙祠正门前方立有一座石质山门牌坊，牌坊上方雕刻有“金华分迹”四个大字。在经堂门前，坐落着一尊白色大理石牧羊群雕。这些建筑布局隐含着黄大仙同“金华”“羊群”之间的内在关联。黄大仙祠的建筑雄伟，外观设计色彩丰富、金碧辉煌，可视为中国古典寺庙建筑的典范。红色石柱，金色屋顶，配上蓝色的中楣，黄色细工格子设计，色彩多样的雕刻，让整座建筑更显辉煌。其建筑特色集中体现在当年仙师乩示的“五行布局”上：整个正殿及经堂建筑宏伟壮观、雕刻精细，都是采用全木结构，暗合五行中的木；在左侧建有五形中的火形盂香亭；院落中间建有象征土形的“朝佛”壁照；西边建有金形的鸾台；在经堂正前方，建有玉液池以配合五行中的水。至此，五行皆备。

黄大仙祠的一个特色就是融儒释道三教神祇于一祠。在中国传统宗教中，老百姓的祭祀活动，大都有尊祖祭孔、进香礼佛、敬奉诸神的信仰特点，儒释道三大宗教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一体，经千百年演化，早已深入民间。香港黄大仙祠的建筑，也如实反映了中国传统宗教信仰的特点，迎合了民间信仰的需要。虽然黄大仙一直都被作为是道教的神明，但是在黄大仙祠大殿内，不只是供奉黄大仙，在其右侧还供奉有观音像，在主殿右侧临近山门处建有“麟阁”，供奉万世师表孔子及其弟子，在麟阁前面还有一座称为“孔道门”的长方亭。进入大门后的左侧高台建有“三教同源”的殿庙。此外，在三圣堂供奉有吕祖（吕洞宾）、观音和关帝，挂有孔子画像，祠内藏有道教、佛教、儒教典籍。可以说，黄大仙祠是儒释道三教合一的道教官观，正如庙内盂香亭的石碑所述，该亭之修筑，“同以供奉圣佛，阐扬佛法，以成三教同源之本旨”，凸显了中国文化有容乃大、兼收并蓄的精神。这也显示了香港民间信仰之杂陈。

黄大仙祠的另一特色是其主办机构啬色园的免费医药服务。自19世纪80年代开始，啬色园发扬黄大仙“普济劝善”的精神，大力兴办医疗、教



>>黄大仙祠

育机构。如早在1924年就开办了中药局，为贫苦群众赠医送药，扶危济困，现在还办有5所中学、4所小学、7所幼儿园以及1座天文馆，从而使得其声望日益上升，在港的社会影响力日渐增强。游客在参观这座道教名祠时，除了可以领略其建筑特色外，还可以享受免费医疗服务。祠内还建了楼高数层的啬色园医药局，专门为各地来客提供免费中西医服务。

香火鼎盛的黄大仙庙，是香港人的精神寄托。人们无论是保平安、求事业还是问姻缘，或者有任何疑难杂症，喜欢来这里请求指点迷津。来这里膜拜的不仅仅有老头、老太太，还有20多岁的年轻人，他们都非常虔诚。农历过年前后，香港的善男信女纷纷前来求问一整年的运势，他们为争得头彩，蜂拥而至，抢烧“头炷香”，场面热烈，是香港城中一年一度的贺岁盛观。每年上香的次序也是很有讲究的。第一炷香是留给特首的，他的香是祝愿国泰民安、香港经济繁荣。正是由于人们对黄大仙的信奉，近年，政府批准可以在祠内举行婚礼。该祠为新人办理注册事宜，一对对新婚的夫妇从这里走向生活的殿堂。

历史回响



黄大仙文化作为我国道教文化一个极具活力的分支，在香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香港现有黄大仙区、黄大仙村，还有以黄大仙命名的道路、公交车站等，甚至是在繁华的商场也会见到黄大仙的牌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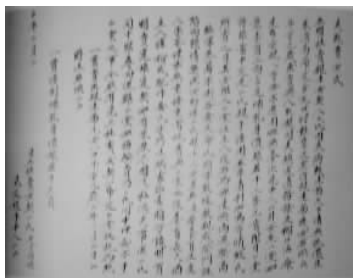
如今，黄大仙不仅仅在香港有着广泛的影响力，其声名已远播海外，在南洋以至美国都有黄大仙庙。

一句话点评



在香港这样一个有着世界级建筑、快节奏生活、时尚摩登元素的魅力城市，坐落在高耸的市民住宅和华厦之间的黄大仙祠，无疑成为繁华都市中的一片净土，或多或少成为人们的心灵寄托之所。

移风易俗废婢令



19世纪末的一张卖女契

关键词

关键时间 1921年7月 1923年2月15日

关键词汇 婢女（妹子）

反对蓄婢会

背景扫描



辛亥革命后，香港奴婢阶层趋向消亡，奴婢的专指范围渐渐缩小，到民国初年已经成为家内婢女的代称。这些婢女被卖入有钱人家，协助主妇做家务，如缝缝补补、烧火做饭、打理家务琐事等。这些如同女奴的华人婢女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劳动时间长，生活待遇低，没有人身自由，随时都可能被主人打骂、玩弄，甚至买卖。她们当中不少人被折磨致死，有的被逼寻短见，或被卖为娼，年老体弱者只好流浪街头乞讨，处境极为悲惨。

在英国侵占香港之后的三十多年里，港岛上的婢女制度与英国在港推行文明化的进程一度并行不悖。首先打破这种平衡的是港督轩尼诗时代的正按察司斯梅尔，他思想激进，支持港督提高华人的政治地位，主张严禁苦力贸易和拐卖妇女儿童，认为婢女实际上是另类奴隶，蓄婢有违香港法律。婢女制度的存在成为香港严重的社会问题，引起香港各界进步华人的极大关注，他们掀起了一场“反蓄

婢运动”，亦称“废婢运动”或“禁婢运动”。

脉络纵横



1919年，英国开明人士希士路活偕夫人抵港接任英国驻香港的海军副司令。在港期间，希氏夫妇目睹了香港婢女的悲惨遭遇，深表同情。希氏夫人曾经写信给各大报纸，激烈抨击香港的蓄婢习俗，引起了香港上流华人的不满。在港督司徒拔多次委婉提醒希士路活先生遭到拒绝后，希士路活被调离香港。然而，希氏夫妇的离去并没有消弭香港的废婢之争，他们回国后，仍积极为解决香港受压迫的妹仔（粤方言对婢女之称）而四处活动。希氏夫妇的活动唤起了英伦开明人士的关注，国会议员频频向殖民地部提出质疑，要求解释并对香港妹仔风俗采取必要的措施。仅1921年与1922年，来自国会的质询就多达8次，殖民地部不得不想尽种种理由进行搪塞。此外，许多重要人物的署名来函和各类社团代表的来访，也使得殖民地部疲于应付。这让港英政府陷于更为被动的境地。英国殖民地部在各方的压力下，终于通过决议，要求征集居港华人对于华人蓄婢旧习的意见，以便港英政府酌情处理。

1921年7月22日，香港定例局的华人议员刘铸伯、何泽生首先发出通告，邀请各界人士集会商议研究婢制问题。7月30日下午，香港历史上第一次研究婢制问题的大会在香港太平戏院召开，出席大会的各界人士有300多人。会上，由于各自的利益和立场不同，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以基督教人士为代表的华人进步力量主张废除婢女制；以刘铸伯、何泽生等为首的上流社会华人与港英政府方面则认为婢女在富人家极为“安乐”，不同于奴隶，并以婢女数量多，难以安置为由，反对废除蓄婢。双方各持己见，争论相当激烈。会后，持两种不同意见者分别建立了相应的组织，即主张禁婢的“反对蓄婢会”和反对禁婢的“防范虐婢会”，各自加紧活动。

1921年8月8日，反对蓄婢会召开了第一次筹备会，通过了成立反对蓄婢会决议及《反对蓄婢会简章》，并申明：“本会以维持人道、废除婢制，使婢主得觉悟、婢女得解放为宗旨。”同时通过了《反对蓄婢会宣言书》。

《宣言书》回顾了香港婢女问题的由来，揭露了蓄婢的种种流弊，指出婢制必须革除，养婢恶习尤当禁止。《宣言书》还提出了今后开展禁婢运动的根本办法：一是要大力宣传，制造舆论，使社会各界明白蓄婢的危害性；二是要求政府立例注册，取消契约，使婢女获得人身自由；三是设立监护人，由政府委任加以监督；四是创办教养院等公益场所，收留无依归的婢女。会后，反对蓄婢会的全体会员分赴各地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广泛发展会员，筹集活动经费等。到1922年2月时，会员已经发展到1 360人。

在香港开展禁婢运动的同时，孙中山领导的广东军政府也积极开展禁婢运动，并通过了禁婢决议案。1922年2月24日，孙中山大总统发布了严禁蓄婢令，这对于香港的反蓄婢运动是很大的鼓舞和支持。此后，内地和海外华侨也都先后开展了禁婢活动，有力地推动了香港禁婢运动的深入开展。

香港反对蓄婢会与英国进步力量遥相呼应，英国殖民地部在各界的诘难中四面楚歌。国务大臣丘吉尔如坐针毡，终于决定在1922年向港督发出一份语气强硬的电报，表示只有采用行政手段才能使婢女获得自由，并建议成立一个包括赞成改革人士在内的委员会，以调查有关妹仔的问题。港督在收到电报后，立即指示华民政务司在全港范围内设立布告栏，通告在港禁止蓄婢的消息，同时港督还要求成立委员会，对妹仔问题进行调查。

1922年3月13日，华民政务司委托反对蓄婢会与防范虐婢会合拟条陈办法。委员会最终拟就了《禁婢新例草案》，决定用法律形式取缔蓄婢，但是该草案遭到防范虐婢会的反对。1922年12月举行二读会之时，主持会议的律政司表示只是代表英国政府以及殖民地部而颁布此令，在不改变取缔蓄养婢女的前提下可以将条例改动。这表明港府颁布禁婢草案，实属无奈而



>>近代香港的妹仔(婢女)

为之。与此保守态度相反的是，反对蓄婢会以及在香港海员罢工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工团组织却积极参与草案的调查与讨论，宣传蓄婢危害的主张。1923年1月10日，东华医院召开全港街坊叙会，会上各工团代表痛陈婢女所受的虐待，有些代表还现身说法，使防范虐婢会的观点不攻自破。工团参与反对蓄婢运动，意味着香港妹仔的父母群体已经从默默忍受命运摆布的后台，走上奋力抗争的前台。这进一步促成了废婢运动的浩大声势，为香港全面禁绝婢制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

在香港反对蓄婢会与各工团、基督教会人士的共同压力下，港英当局不得不颁布禁止蓄婢新例，对香港婢制采取前所未有的改革。1923年2月15日，香港立法局三读顺利通过了《取缔蓄婢新例》（即《家庭女役则例》），规定从此以后，无论何人都不得买卖婢女；无论何人不得雇佣未满10岁的女仆；婢女不得由一主人转卖给别的主人；凡是在港婢女都必须在限定日期内注册。

历史回响



1923年颁布的《取缔蓄婢新例》，成功地化解了此前围绕香港蓄婢习俗的各种矛盾，改变了港英政府在英国国会以及香港社会的被动局面。《新例》既维护了上流社会华人的利益，又调和了英、港两地进步力量废婢的主张。港英当局颁布《新例》，纯属迫于本国殖民地部以及各方进步势力的压力，在一段时间内，对蓄养婢女习俗并无多少实质性的约束，香港社会蓄婢风俗依旧。香港废婢运动虽然取得初步的胜利，但这一胜利宛如美丽的光环，掩盖不住内中的空洞和无助。

一句话点评



《取缔蓄婢新例》虽然不够完善，但毕竟有利于长期生活在人间地狱中的婢女获得人身自由。《新例》的颁布，标志着香港禁婢运动的一个胜利，是提高香港妇女地位斗争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近代罢工第一怒潮 ——香港海员罢工



香港海员罢工

关键词

关键时间 1922年1月12日
关键人物 苏兆征
关键词汇 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
关键事件 沙田惨案

背景扫描



香港海员是中国工人阶级重要的组成部分，他们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外国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比起其他行业来讲，有过之而无不及。由于职业的原因，整天与狂风恶浪搏斗，香港海员形成了团结勇敢和大无畏的刚强性格。香港海员常随轮船到国外，有机会看到欧美各国工人阶级为争取自身解放而进行英勇斗争的情况，因而易受世界革命潮流的影响，富于革命精神。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帝国主义对其殖民地变本加厉地进行压榨。香港物价飞涨，平均价格比战前上涨一倍多，而工人的工资却毫无增加，因而生活越来越困难。加上当时中国海员还要受外国资本家、包工头的欺负与盘剥，生活境况非常糟糕。

在实际斗争中，香港海员日益感到团结起来的重要性和必要性。1921年3月，经过苏兆征、林伟民等积极分子的串联发动，香港海员工人的组织——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在香港正式成立，简称香港海员工会，这是中国海员工人的第一个真正的工会组织。

脉络纵横



香港海员工会成立后，鉴于当时物价上涨，而海员们工资低微，生活极度困苦，改善生活待遇成为海员们的迫切要求，因此决心组织海员为提高工资、改善生活进行斗争。1921年5月17日，香港海员干事部召集海员积极分子开会，就此事征求意见，大家一致表示赞成。之后海员工会还积极进行了罢工的各种准备，组织了“征求队”“宣传队”和“防护破坏罢工队”等机构，并且在广州设立办事处，准备罢工成功后接待返回广州的罢工海员。与此同时，海员工会加紧在海员中进行宣传和发动工作，号召大家齐心协力，一致行动，争取达到罢工目的。此外，海员工会还联络运输等其他行业工人和外国海员，争取他们的支持和援助。

经过一系列的准备和酝酿之后，香港海员工会于1921年9月正式向轮船资本家提出三项要求：第一，增加工资；第二，工会有权介绍海员就业；第三，签订雇工合同时工会有权派代表参加。然而，轮船资本家对海员工会提出的这些合理要求却不予理睬。同年11月，海员工会再次向轮船资本家提出要求被拒绝。资本家这种蔑视中国海员正当要求的行为激怒了广大海员，使他们认识到，不采取强硬的斗争手段，资本家是绝不会接受自己的要求的，因而决定举行罢工。1922年1月12日上午，香港海员工会第三次向轮船资本家提出增加工资的要求，同时限令在24小时内给予圆满答复，否则将举行大罢工。

轮船资本家对此毫不在意，他们以为海员们并无实力，罢工断难实现，因而对海员工会的最后通牒仍然置之不理。受尽了资本家剥削的香港海员工人，这时再也抑制不住长期埋藏在心头的怒火，1922年1月12日，在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苏兆征、林伟民等的领导下，开始举行大罢工。

海员工会发表罢工宣言，号召全体海员必须同心协力，勇敢战斗，争取胜利。为了保证罢工的顺利进行，海员工会公布了罢工规则，宣布海员“停工之后，非得本会许可，不得私自复职”。从1月12日下午5时开始，所有从香港开往广州、江门、梧州等地的内河轮船，以及从外埠开到香港的英、美、法、日、荷等国的海洋轮船，船上的香港海员都相继举行罢工。最初参加罢工的轮船共90多艘，人数约1 500人。随后，罢工的怒火越烧越旺，在短短一个星期内，参加罢工的轮船便增至123艘，人数增至6 500人。罢工还蔓延到汕头、北海、琼州（海口）、江门等地，并且影响到上海、新加坡等港口。

港英当局采取离间、恫吓、威胁等手段对付罢工海员，宣布海员工会为“非法团体”，派出武装军警实行戒严，封闭海员工会会所，逮捕罢工领导人，这一切更加激起了海员和广大工人群众的义愤。



>>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部分成员

为了更有效地对资本家施加压力，2月1日，香港工人群众联合起来，组成纠察队，奋起反抗。在广东人民的支援下，他们驻守在九龙边境一带和从内地到香港的陆上交通要道，对香港实行封锁。后来随着斗争的深入，纠察队组织进一步扩大，分头到广东境内的一些港口驻守，进一步实行封锁，禁止粮食以及其他物资运往香港。与此同时，还对内河和沿海轮渡实行严密管理，规定广东境内内河航线要经海员工会批准和监督才准通航。罢工海员采取的这些措施，发挥了很大威力，使港英当局很快尝到了苦头。由于航运的停顿以及对香港的封锁，香港日用品及日常所需来源几乎断绝，严重影响了香港的供应。

从2月27日起，香港各工会陆续开始罢工，到3月初，罢工人数激增到10万以上，邮局和银行职员、仆役、厨役、轿夫等都参加了进来，罢工浪潮席卷了整个香港。罢工从要求增加工资的经济斗争，发展成为反抗帝国主义压迫的政治斗争。港英当局对日益高涨的罢工浪潮深感恐慌，进行了野蛮的镇压，大批罢工工人毅然离港返穗。3月4日，数千名罢工工人徒步经沙田返回广州，港英军警竟向手无寸铁的工人开枪扫射，当即打死6人，打伤一批，造成震惊中外的“沙田惨案”。帝国主义的暴行，激起了广大工人和各阶层群众的义愤，纷纷提出强烈抗议。随后，工人纠察队封锁了通往香港的所有口岸，香港的供给断绝引起市民恐慌，秩序大乱。在广东革命政府及各地工人的支援下，终于使港英当局于3月6日答应海员工会复工条件，下令取消查封海员工会的命令。

3月8日，在广东省省长陈炯明、英国驻粤领事和广东省总商会的调停下，港英当局被迫答应增加工资15%—30%，恢复海员、运输两工会，释放被捕的工人领袖，抚恤死难者。港英政府亲自送回并挂上被拆去的工会招牌，解除对工会的禁令。罢工于是结束，全市通宵达旦燃放爆竹，以示庆祝。同一天，广州各工人团体10万人，在广州东较场欢送香港罢工海员返港，会后有30万人参加示威游行。海员们怀着万分激动的心情，离开广州返回香港。香港方面，成千上万群众聚集码头和火车站，高举“欢迎罢工工人回港复职”的旗帜，等候在码头或火车站，迎接罢工工人的胜利归来。这样，从1月12日起至3月8日，历时58天的香港海员大罢工以取得重大胜利而宣告结束。

历史回响



此次海员罢工对香港所产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首先，大罢工使港英政府第一次切身感受到了香港对内地特别是广东的严重依赖性。香港的劳动力绝大多数来自邻近的广东，海员罢工期间，工人纷纷返回内地，致使香港百业凋零，商务陷于停顿，经济上蒙受重大损失。罢工委员会对香港的经济封锁，更使得香港的食品来源中断，居民日常生活备受影响。其次，罢工直接打击了港英当局的殖民统治。在海员罢工期间，香港的广大华人团结一致，对港英当局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这种华人民族意识的觉醒，令英国殖民统治者大为恐慌。港英当局在写给殖民地部的报告里疾呼：“随着斗争的持续，种族因素日趋显著，该因素在整个事件的背后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为了强化对华人的统治，海员罢工结束后，港英政府对警署和情报机构进行了重大改组，大幅度裁减华籍警员，而代之以英籍及印籍警员。然而，罢工对港英当局触动最大的，还要数广东革命政府对香港的巨大影响力。如何处理与广东革命政府之间的关系，成了海员罢工后港英当局考虑最多的一个问题。

一句话点评



20世纪20年代香港工人运动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香港，在中国以至世界工人运动史上都有着重要的意义，1922年的香港海员大罢工就是其中具代表性的一次。这次罢工的胜利，鼓舞了武汉、上海、广州、澳门等地工人群众的斗争，成为我国工人运动史上第一次高潮的起点。

“臭港” “饿港” “死港”



省港大罢工

关键词

关键时间 1925年6月19日至
1926年10月10日
关键人物 邓中夏 苏兆征
关键事件 沙基惨案 封锁香港

背景扫描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推动了国民革命的开展，大大激发了工农群众的革命热情，广东的革命形势日渐高涨。香港工人一直具有反帝爱国传统，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邓中夏等共产党人就在香港工人中间开展了有效的组织和革命宣传工作，极大地提高了香港工人的阶级觉悟。1925年5月30日，上海工人、学生为抗议日本纱厂资本家枪杀顾正红举行示威游行，英国巡捕竟在上海南京路公然屠杀群众，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消息传来，香港工人极为愤怒，勇敢地投身于反英斗争之中。

脉络纵横



“五卅惨案”后，中华全国总工会和中共广东区委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决定组织省港工人联合大罢工。他们决

定派邓中夏、杨殷等到香港做协助工作。邓、杨抵港后，召集党团员和积极分子会议，传达中华全国总工会和广东区委关于组织省港工人举行联合大罢工的指示，同时对发动工人罢工的有利条件和存在的实际困难，对各个工会领袖的态度，都作了具体分析，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制定了罢工实施方案并着手操作。

6月19日晚，如大地震一样，香港罢工爆发了。海员、电车工人和印务工人首先发难，接着是洋务、起落货、煤炭以及其他行业的工人相继而起，人数约有15万之多。罢工工人纷纷乘火车、轮船分道返回广州。同时，广州沙面租界的洋务工人亦举行了罢工。驻沙面的英、日、美等各国领事目睹此情形，大为恐慌。22日，列强将沙面东西桥铁闸完全关闭，并派水兵登陆，在所有重要地点高筑沙包，如临大敌，先后驶进白鹅潭及珠江河面停泊的日、英、美、法、葡等国军舰达10艘之多。显然，帝国主义者对于镇压中国人民的反帝运动早有预谋，并已做好了军事部署，准备随时对广州人民实行大屠杀。但是帝国主义的武力恫吓并没有使省港工人屈服。6月23日，广州工、农、商、学、兵各界人士约5万多人举行示威大游行，一路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援助上海‘五卅’惨案”的口号，当游行队伍行至沙基时，英军竟然开枪扫射，军舰同时开炮示威，顿时弹如雨下，游行队伍猝不及避，伤亡惨重。据事后统计，共有50余人被打死，170余人受重伤，轻伤无数，这就是震惊中外的“沙基惨案”。

帝国主义血腥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更加激起了广大省港工人的愤慨，增强了他们反帝斗争的决心。不少以前未参加罢工的工人，也纷纷加入到反帝斗争的行列中，从而使罢工的规模不断扩大。从大罢工开始，前后约有25万香港工人参加罢工，返回广州（当时香港总人数为80万人）。

为了回击帝国主义的血腥屠杀，省港工人成立纠察队，封锁海口，对香港实行经济制裁。纠察队的任务是截留粮食出口，缉拿洋货入口，逮捕工贼走狗，维持罢工秩序。港英当局自恃武力强大，不断派遣军舰在广东海面游弋骚扰，袭击执行封锁任务的罢工纠察队，并进行武装走私，偷运粮食。纠察队与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在封锁香港期间，香港的情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罢工领导人邓中夏曾撰文揭露：香港街上垃圾粪秽，堆积如山，楼居者以纸裹粪，抛掷

街中，加以炎日蒸炙，臭气熏天，故群呼香港为“臭港”。交通既绝，内地肉食菜蔬，无从运至。猪肉涨至一元余，鸡蛋涨至五角多，牛肉几乎绝迹，街市等于虚设，故又称“饿港”。轮船阻滞，船坞停废，商店歇业，银行挤兑，一时社会秩序纷纷大乱，孤悬海中，呼救不至，故香港又变为“死港”。

本来香港洋行、商店林立，市面繁荣。特别是入夜以后，到处灯火通明，呈现出不夜天的情景。茶楼酒店，顾客满座，欢歌笑语，生意兴旺。但是省港罢工爆发以后，罢工工人和学生纷纷离开香港返回内地，其他居民也相继离港，走避他处。再加上航运中断，货物运转不灵，贸易受到了严重打击，各洋行、商店没有顾客光临，顿时变得生意冷淡，门可罗雀，只好关门闭店。同时，由于供电部门工人参加了罢工，供电照明系统瘫痪，每到夜晚，香港便变得死气沉沉。

长期以来，香港日常所需粮食和猪牛、家禽及蔬菜等各种副食，主要靠内地供应。罢工以后，罢工工人实行了封锁香港的政策，粮食和副食品的来源几乎中断。由于有出无进，库存日益短缺，日常供应骤呈紧张。当



>>省港大罢工领导人合影

年参加过省港罢工的一位老人生动地回忆起当时的情景：“罢工封锁后，香港粮食和物资来源断绝，供应十分紧张。居民纷纷跑到街上抢购各种粮食和食物，连咸干湿菜、咸什酱料等东西，都抢购一空。在香港，从未有见过英籍妇女背着孩子上街购物的情景，如今却经常看得见了。因为洋务工人罢工了，她们没有人服侍，只好自己下厨房，背小孩，上街买东西。她们的样子真是狼狈极了。”

往常，香港的街道、市场和公园等公共场所，每天都有工人打扫，由于工人罢工，街头巷尾到处堆积着像小山一般的垃圾。当时正值炎夏季节，气温很高，垃圾极易腐烂，臭气熏天，蚊蝇滋生，疾病极易传染，香港因而发生了疫病，特别是痢疾相当严重，不少人患病死去。

1926年10月10日，中华全国总工会省港罢工委员会发表《停止封锁宣言》，广州工、农、商、学各阶层人士30万人举行大会，热烈拥护。11日，广州国民政府和省港罢工委员会在海关附近设立机构，对洋货征收附加税，列强各国被迫予以承认。至此，坚持16个月之久的省港大罢工宣告结束。

历史回响



省港大罢工是中国工人运动史上一次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反帝爱国运动。由于省港工人的英勇斗争，给了当时英帝国主义沉重的打击。据统计，每罢工一日，港英当局至少损失350万港元，总计损失达16亿以上。与此相反，广东的经济却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到1925年12月，广东革命政府每月收入达400万元，比罢工前两年的月平均收入多了五六倍。罢工工人还积极支援国民政府东征、南讨和北伐，组织运输队给国民革命军运送物资，组织卫生队抢救伤员，组织宣传队宣传鼓动，并且积极支援农民运动和学生运动，团结社会各阶层坚持开展反帝爱国斗争。罢工工人为打击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嚣张气焰，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推进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成为广东革命政权的坚强柱石。

一句话点评



邓中夏在1926年4月28日的《工人之路》上指出：“省港罢工……十个月长久奋斗，是很光荣的！因为纵观古今，横览中外，未有如此长久的罢工。有之，则自我们省港罢工开始。”

“一碗饭运动”



宋庆龄

关键词

- 关键时间 1941年7月1日
关键事件 “一碗饭运动”开幕典礼 餐券义卖
关键人物 宋庆龄

背景扫描



1937年8月，上海沦陷，宋庆龄移居香港。在香港，她团结国际友人，支援中国抗战，先后领导成立了保卫中国同盟（简称“保盟”）和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简称“工合”）国际委员会，以推动香港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前者成为海内外友好人士支援中国抗战的桥梁。后者主要利用后方的丰富资源和从敌占区来的难民，建立规模不等的工业合作社，生产工业和生活用品，供给军需民用。同时还发动国际捐款，救济中国难民，特别是将募集得来之捐款兴办工厂，实行“以工代赈”。

脉络纵横



1938年，美国医药援华会等团体首倡“一碗饭运动”，宋庆龄对这一行之有效的募捐模式深表关注和赞赏。随着

日军的步步侵入，大后方的难民与日俱增，宋庆龄决定以保卫中国同盟的名义，在香港发起“一碗饭运动”，为“工合”募捐，以扩大“工合”规模，救济难民伤兵，支援前线。她认为，在香港发起这样的运动，对激发150余万香港同胞的爱国救亡热情，募集救灾救难的经费具有重要的意义。根据宋庆龄的倡议，保卫中国同盟于1941年5月6日成立了香港“一碗饭运动”委员会，宋庆龄任名誉主席，香港立法局华人首席议员罗文锦律师任主席，保卫中国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名誉书记克拉克夫人任副主席。委员会决定：发出1万张售餐券，每张两元，持券者可到参加赞助、提供炒饭的餐馆吃一碗炒饭，募集到的款项全部赠给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作为救济伤兵难民之用。各界代表纷至沓来，参加“一碗饭运动”开幕典礼。

1941年7月1日华灯初上，香港湾仔庄士顿道179号英京大酒家门前车马云集。8点整，典礼开始，主持人宋庆龄以富有感情的话语，发表了即席演说，阐明了“一碗饭运动”的意义：“一碗饭运动的目的，是用募捐的经费来帮助中国的难民进行生产自救，用工业合作的办法来帮助中国的斗争。‘一碗饭运动’不但是募了捐去救济受难的人们，并且是要节饮节食，来表示牺牲的意思，这是我们做人的美德……香港的‘一碗饭运动’更含着一种深远的意义，因为这次捐款要帮助工业合作社去组织及救济难民和伤兵。这是巩固经济阵线，是生产救国，是帮助人们去帮助自己，是最妥当的一种救济事业。工业合作社是民主性的组织。用这样富有民主性的‘一碗饭运动’，来使工业合作社完成救济事业，岂不是很愉快而值得提倡的吗？”宋庆龄的讲话，不时被雷鸣般的掌声打断。

“一碗饭运动”得到了港英当局的支持，英国驻港陆军司令佳乃西、海军司令哥连臣、辅政司史美夫人等，都出席了开幕典礼，香港总督罗富国也发来了贺信。

运动开展后，许多酒家、饭店、餐室纷纷表示捐献炒饭，参加义卖。他们不但表示无须收回



>>> 报纸报道“一碗饭运动”

每碗饭的成本费两毫，而且竞相提高认捐数。威灵顿街丽山餐室业主温梓明首先认捐500碗，取名为“救国饭”。温梓明一带头，其他酒家茶室纷纷响应，不甘落后：英京酒家捐3 000碗，小祇园捐700碗，金星酒家捐500碗，金门酒家捐500碗，北极餐室捐500碗，广州酒家捐1 000碗，天燕餐室捐1 000碗，怡安茶居捐500碗等。市民到这些酒家，以港币2元买餐券1张，便可以食用炒饭一碗。所有售券所得，都捐献给“保盟”转给“工合”，用作筹办工厂，以工厂生产的收入作为赈济之经费。

8月1日开始销券，本来就很繁华的香港街头，那天显得更热闹，人潮如流，鼓乐齐鸣。只见一大群人簇拥着一个大碗的模型，喊着“多买一碗饭多救一个难民”的口号，穿梭行进在闹市区。车站、码头、机场、大街小巷、娱乐场所乃至行驶着的电车和公共汽车上都张贴着“大家来吃爱国饭”“为祖国无家可归的难民请命”等标语口号。各认捐炒饭的酒家餐馆更是精心策划，把厅堂门前布置得新颖别致，有的餐室门口挂出“爱国之门”“光荣之门”的横额，有的张贴着“欢迎来吃爱国饭”“欢迎来吃救灾饭”的巨幅标语，有的在店堂墙上悬挂孙中山遗像或张贴宣传画，有的还展出了抗日将士英勇杀敌、“工合”社员努力生产的图片等。英京酒家特地在二楼开辟出一室，专门接待“一碗饭”顾客，并免费供应香茗。乐仙酒家经理庞永棠更是别出心裁，特意设计了一碗大型的“爱国饭”，碗内有白米饭1斤、鲜虾肉4两、鸡肉4两、炒烧4两、鸡蛋6个，售价为港币100元，吸引了不少人争相慷慨解囊。

许多团体认购了餐券，然后分发给内地涌来香港的难民。当天到各酒家、饭店去购券吃饭的香港市民极为踊跃。不少人一家几口专门去吃炒饭，作为自己对抗战争献出绵力的表示。其中一些做家庭工的低收入者，也省下零用钱买一碗炒饭，略表自己的爱国心意。更加动人的是一群群小学生，中午放学时涌到酒家、饭店，用自己向父母讨来的两元钱买炒饭，还自豪地表示爱国义举小孩也不落后于人。为了援助中国的抗战，到饭店去吃饭的外国朋友也不少。义卖原定3天，但许多市民认为时间过于短促，未能满足居民之需，所以部分酒家饭店决定将义卖延至8月底才结束。上述种种，构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使得本已深入人心的“一碗饭运动”更加显得声势赫赫，轰轰烈烈。

9月1日，“一碗饭运动”胜利落幕，在英京酒家举行了总结典礼，宋庆龄颁发奖品，把有她题写“爱国模范”的旗帜，授予认捐炒饭的13家优胜餐室；又向英京、小祇园、乐仙三家业主高福中、欧阳藻棠、庞永棠赠送了孙中山先生的遗墨“努力前进”，以资特别鼓励。接着，何香凝给个人捐款最多的唐谭美、韦少伯，及劝捐最多的马坤等赠送纪念品，纪念品是一双象牙筷，上刻“保卫中国同盟赠，纪念一碗饭运动”字样。

历史回响



轰轰烈烈的“一碗饭运动”净收入港币22 144.95元，法币615元。后来，英国赈华分会香港分会将捐款凑足成25 000元港币，全部捐赠给“工合”国际委员会作为救济基金。这一运动犹如一曲爱国救亡的颂歌，不仅生动地体现了宋庆龄实践全民抗战路线的精神，同时也是宋庆龄全力以赴支援人民抗战事业的一个重要举措。

一句话点评



克拉克夫人在香港《华商报》的“一碗饭运动”特辑的题词中写道：“买一张一碗饭运动的饭券不仅是做了一件慈善的事，还可以使中国的难民有工作、能生活。帮助他们吧，使他们以合作来自助。”新西兰记者、作家詹姆斯·贝特兰也深情地写下了富有感染力的题词：“你，中国的朋友，在香港的饭店里买一碗炒饭，那黄河边上千千万万无家可归的人民就可以一起工作，过着快乐的生活。”

“文化沙漠”生“绿洲”



邹韬奋

关键词

关键时间 抗日战争时期
关键人物 周恩来 茅盾 邹韬奋
关键事件 文化救亡运动

背景扫描



抗战爆发后，随着平、津、沪、宁等大城市及东部沿海港口的相继沦陷，香港这个被英国长期占领的南方港口城市，逐渐成为中国共产党与外国交往和中国与海外华侨、华人联络的主要通道。战时香港战略地位的提升，对中国共产党在港开展各种抗日救亡活动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与此同时，抗战前后香港的政治形势也朝着有利于中国共产党统战活动的方向发展。

港英当局对香港一贯实施殖民地的文化政策，对待民众运动的态度非常严苛，民众完全没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自由。抗战爆发后，由于英日矛盾和香港民众的民族情绪，港英当局的态度开始转变，文化控制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放松。

香港的自由港性质，也有利于各种政治力量在这里以商业活动为名进行政治角逐，有可供中国共产党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宽松环境。当内地硝烟弥漫、战火纷飞之际，

香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仍是一块安静的乐土。在战争的特殊环境下，香港成为内地人的最佳避难场所，内地大批的文化名人纷纷转移到香港避难，从而造成战时香港文化的空前繁荣。

脉络纵横



战前的香港文坛常常被人们遗忘，有人形象地称之为中国文坛的“弃儿”和新文化的“沙漠”。抗战爆发后，内地政治环境恶劣，进步文化没有发展的有利环境，加之“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反动派采取了严厉的文化专制和特务统治，更加阻碍了文化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各种民主及进步文化人士纷纷赴港，促进了香港文化事业的迅速发展。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随着平、津、沪等重要城市的相继陷落和沿海港口城市被封锁，香港逐步成为中国对外联系的主要渠道，这对中国共产党在港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1937年底，周恩来在汉口会见英国驻华大使卡尔，面商在港设立八路军办事处事宜，并派廖承志担任办事处主要负责人（在事实上成为中国共产党在香港的最高领导人），以开拓工作局面，即开展统战工作、争取外援、建立文化宣传基地、扩大中国共产党的影响等等。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内地沪、宁等沦陷区的一批民主、文化人士陆续被转移到香港。宋庆龄就是在接到毛泽东、周恩来的两次电报后，于1937年12月23日悄然离开已沦陷的上海，在12月27日抵达香港的。

文化人士抵港后，中国共产党有关组织除安排他们到各有关文化部门工作，以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外，还通过各种座谈会、读书会、个别联络等形式，关心和帮助他们。如廖承志曾通过从事文化联络工作的杜埃与茅盾建立起了联系，杜埃经常转达八路军驻港办事处对茅盾在生活上、政治上的关心。

对一些小有名气的文学青年，中国共产党在港组织通过种种途径关怀、培养他们。例如，黄文俞曾回忆中国共产党香港市委书记杨康华（虞焕章）是如何培养他入党的：“1938年起，我在香港开始了写作生涯，颇有点小文化人的味道。那时开始有几个比我年轻几岁的文艺青年经常同我接触，说是向我请教，称我为‘先生’。我观察他们的言行，认定他们是共产党



>>茅盾

员，还认定他们之所以与我接触，是听令于虞焕章的。其后，又有一位诗人每周和我约会，我认定他也是虞焕章派来的。1941年6月2日，我被吸收入党，是日举行宣誓仪式，以监督人身份出现的就是虞焕章。”

“皖南事变”后，国内政治形势进一步恶化，在国统区的重庆、桂林、昆明等地的数百名民主、文化人士遭到了国民党的迫害。南方局书记周恩来运筹帷幄，将一批文化人士转移到了香港。文化人士转移到香港，既是对当时政治逆流的抗议，对文化人士所深受的种种压迫的坚决控诉，也是为了让这些文化人士到海外更好地从事民主运动和进步的文化工作。当时的邹韬奋从重庆到香港即为典型的一例。“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反动派对邹韬奋主持的生活书店的迫害更加猖狂，邹韬奋不时被便衣特务暗中监视，成都、桂林、昆明、贵阳分店相继被封或被勒令停业，贵阳分店全体职工被捕。对此，邹韬奋万分愤怒。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在国统区实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对生活书店和邹韬奋的离开作了周密、妥善的安排，邹韬奋在愤然辞去国民参议院的职务后，决意离开重庆，出走香港。1941年3月5日，邹韬奋在桂林地下党的安排下顺利抵港。蒋介石发现邹韬奋出走后，表面上假惺惺地命王世杰以国民参政会主席团名义，发电至桂林表示“挽留”，暗中却密令桂林国民党特务探询邹韬奋的踪迹，准备将其扣押起来。邹韬奋感慨万千地说：“为了尽快给国民党顽固派以反击，最好是办报，还要复刊《大众生活》，为民主而战斗。”

到1941年上半年，旅港之民主、文化人士已有数百人，此外还有一大批流亡青年知识分子，可谓是“群贤毕至，老少咸集”。其中，“皖南事变”前就已经赴港的有柳亚子、乔冠华、许地山、欧阳予倩、蔡楚生、羊枣、郁风、陈炳权、司马文森、端木蕻良、陈君葆等人；“皖南事变”后，经周恩来和南方局部署转移到香港的文化名人有茅盾、夏衍、邹韬奋、胡绳、胡风、章泯、宋之的、近乃华、廖沫沙、戈宝权、高灏、范长江、千家驹、黄药眠、梁漱溟等等。

众多的文化人士云集香港后，创办了不少的报纸，如《华商报》《大众生活》《立报》等，此外还成立了保卫中国同盟、文协香港分会、国际

新闻社香港分社、虹虹歌咏团、旅港剧人协会等。通过各种文艺组织和文化活动，丰富了香港的文化生活，加强了香港与内地的文化交流。

历史回响

民主及文化人士转移到香港后，与为数众多的内地文化机构和文化精英人士一同宣传抗战，呼吁民主政治，在政治、文化等诸多方面对香港产生了巨大影响。从政治上来说，抗战爆发后，各种政治势力都希望利用香港这一阵地传播自己的政治主张，“汪伪”势力也极力争夺这一阵地，他们在香港收买报馆，当时的《南华日报》《天演报》就是臭名昭著的汉奸报。由于各种势力竞相渗透，难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所幸的是，有大批赴港进步文化人士主持正义，尤其是1941年，他们借助各自的传媒宣传抗战救国，反对分裂独裁。总体上看，当时的香港是一个沟通海内外、宣传中国人民正义声音的窗口，内地文化人所办报刊在唤醒香港民众的民族意识，号召海外华人同赴国难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从文化上来说，内地文化名流云集香港，从整体上提高了香港的文化品位。香港也在本地文化与外来文化相互交汇过程中经历了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黄金时期。

一句话点评

茅盾说过，战时香港由“文化沙漠”变成“文化绿洲”，主要表现在由“富丽物质生活掩盖贫瘠的精神生活”的“商业畸形儿”，变成华南地区抗战救亡运动的“文化巨人”，由英国殖民统治下的贸易自由港及与内地新文化中心上海、北平缺少联系的“文化孤岛”，变成全国性乃至具有国际意义的反法西斯文化基地。

“万金油大王”与《星岛日报》



胡文虎

关键词

关键时间 1938年8月1日
关键人物 胡文虎
关键词汇 “万金油大王”

背景扫描



胡文虎是南洋华侨，原籍福建永定县，出生于缅甸仰光，精明勤奋，胸怀鸿鹄之志。他继承父亲的药店“永安堂”，在此基础上创出可治百病、价廉物美、便于携带的虎牌商标“万金油”。过去东南亚一带的人，常因天气炎热而头痛发晕，服用“万金油”后很快就好了，因此，永安堂的“万金油”声名日盛，胡文虎也成了东南亚颇有名气的人物——“万金油大王”。

胡文虎对办报的兴趣，源于推销永安堂的虎标良药。20世纪20年代中期，永安堂在上海设了分行，为了推销虎标万金油，胡文虎花巨资在上海各大报刊上登载大幅广告宣传万金油，使万金油在江浙地区畅销起来。当时胡文虎在华侨巨富陈嘉庚创办的《南洋商报》上刊登自己的橡胶制品广告，取得了很大的成效。精明的胡文虎意识到，药品的销路不仅取决于其疗效和价格，同时还取决于宣传推销。他想，与其花那么多钱请人家登广告，还不如自己办

份报纸来得经济。如果有了自己的报纸，既可以大登特登自己的虎标良药，又可以兼营印刷业，还能节省每年用于印制大量包装袋及说明书的开支，原来需支付的广告费和印刷费就变为了报社的收入，同时还能提高自己的声誉，真是一举几得。

脉络纵横



1929年1月15日，胡文虎在新加坡办起了《星洲日报》。办报的目的除了提高侨胞的爱国意识外，也是为了促销其药品。《星洲日报》及相关产业的创办，使胡文虎的生意日益兴隆，此后他一发不可收拾，相继在中国内地和香港、马来亚（现马来西亚）等地大办报业。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南京、上海、广州等主要城市相继沦陷。东南沿海一带受到日寇封锁，香港居民和大批从内地撤退到香港的人士，以及东南亚广大华侨都十分关心国内战事的演变，加之香港既是文化中心，又是交通枢纽，胡文虎决定到香港创办《星岛日报》。

1938年8月1日，《星岛日报》创刊，胡文虎在创刊号上发表《创办本报旨趣》一文，提出办报宗旨：一是协助政府从事于抗战救国之伟业；二是倡导新闻，兼为民众之喉舌；三是提倡学术，发扬科学之精神；四是改良风俗，善导社会之进步。胡文虎为该报定下了几项原则：一是所办的报纸要永远有建设性、有容忍的精神，但对人间不公不正之事要迅速作出不平之鸣；二是所办的报纸永远要昂首独立，绝对负责；三是不因强权压迫而转变，不因邪恶威胁而低头；四是提供最佳服务。正如1939年他在欢迎著名作家郁达夫参加《星岛日报》创刊庆典时所说：“文虎办报，虽然含有商业性质，但是目的是维护华人权益地位，发扬中华文化精神。”“就当前而言，抗敌救国，匹夫有责。因此，星系各报目前最高旨趣是为国家服务，为抗战努力。”

《星岛日报》机构庞大，董事长下设经理，管编辑部、营业部、印刷部及秘书、会计、司库、庶务等部门。编辑部设总编辑，总理日报、晨报、晚报、周报编辑事宜。各报另有主笔，主持笔政。编辑部下设17个科，负

责通讯、译电、国内外新闻、美术摄影、图书资料及校对工作。

为了便于向内地销售报纸，胡文虎还在广州设办事处，凡国内订阅的《星岛日报》多由办事处转递，以省邮资，减轻读者的负担。接着，他又在香港设立办事处，以处理本港订阅及送寄外埠的报纸，并且接洽广告业务。

胡文虎在报社的用人方面有独特方法，不惜重金招聘人才，报纸办得生动活泼，不断改革编务和管理方法，使华文报大放光彩。他只委派报社社长与主笔（主编），具体编辑、报务人员由社长、主笔全权负责。《星岛日报》创办不久，聘请国际问题专家金仲华担任总编辑。金氏把报纸办得很有特色，编排新颖，内容充实，做了不少抗日救国的宣传工作，团结了一大批奋发有为的青年作家，赢得了众多的读者。胡文虎还聘请上海著名作家戴望舒主编《星岛日报》副刊，杨潮（羊枣）为军事记者。后者参加该报编辑工作，还写社论以及以“羊枣”的笔名在报上发表关于抗日战争的军事评论，其评论内容翔实，笔调明快，立论有据，见解独到，给海内外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星岛日报》创刊之际，正是武汉会战激烈进行之时，通过来自各新闻社及该报记者的大量电讯，以及该报特派记者及特约记者从前线发来的详细战地通讯，为香港同胞和海外侨胞提供了抗战的大量消息。此外，还特别开辟“侨讯”专栏，专事报道侨胞参与抗日救亡活动的情况，呼吁广大的侨胞参与到抗日救国的斗争中来。

历史回响



香港《星岛日报》是胡文虎创办的第5份报纸，亦是他一生创办的16家报纸之中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强的一家。本着“唤起民众，争取最后胜利”的宗旨，《星岛日报》积极宣传抗战，广泛报道国内外政治、军事战况，这无疑对扩大抗战宣传，激发侨胞的爱国热情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成为香港动员民众奋起的一块重要舆论阵地，被海内外誉为“特别响亮的宣传抗日号角”。

一句话点评



一度以“万金油大王”闻名的胡文虎，在民族危难之际创办《星岛日报》，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实现了其“对于忠字，鄙人以为忠于国家为先。所以爱国观念不敢后人”的铮铮誓言，为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黑色圣诞夜”的降临

——1941年底的香港保卫战



日军派人到香港劝降

关键词

关键时间 1941年12月8日—25日

关键词汇 香港沦陷 历史上最悲惨的圣诞节

关键人物 酒井隆 杨慕琦

关键事件 日军空袭香港 十八天攻防战

背景扫描



1939年9月，欧洲大战爆发，英国向德国宣战。1940年9月，日本与德国、意大利缔结军事同盟条约。这样，英国与日本实际上处于对抗状态，只是还没有开战。香港的上空已是战火密布。

日本人垂涎香港已久，对香港的作战准备，早在1940年7月便已经开始。日本大本营首先调遣重兵至华南，驻扎在广州至深圳附近，之后又先后调兵至广州，并做好了海上支援的准备。与此同时，日本人还加强了在香港的间谍活动，他们分散在各行各业，对港九地区进行了详尽的调查，详细掌握了英军的兵力、装备以及布防情况。而此时的港英政府，虽也开始进行了战争准备，并加强了防卫措施，但这种措施是缓慢的、犹疑的，这是因为当时对日本存在着幻想，甚至抱着“亚洲人不敢随便冒犯大英帝

国”的态度而放松了警惕。同时，英国受到了德、意、日等法西斯列强的严重挑战，其首要任务是确保本土安全。至于香港，在英国首相丘吉尔看来，充其量只不过是一种象征性的表示而已，故不愿在这遥远的殖民地增加兵力。

1941年，日本政府开始从香港撤侨，这是个不祥的预兆。下半年，日本进攻香港的形势已经十分明了。为解燃眉之急，英国运来一支仅2 000多人、战斗力一般的加拿大军队进驻海防，而日军立即调来重兵对抗。12月8日，日军司令官接到攻击香港的电报，空军随即开始空袭香港，“战争已降临大英帝国统治下的香港”。

脉络纵横



1941年12月8日上午9时左右，日本轰炸机群突然对启德机场及港九各处的战略要地进行猛烈轰炸。在短短的5分钟内，英国皇家空军仅有的5架老式飞机及其他民用飞机均葬身火海。日本舰队同时从海上对香港进行封锁，迅速掌握了对香港的制空、制海权。在空袭的同时，大量的日本步兵也在大炮轰鸣声中越过深圳河，分两路向香港新界发动进攻，最终因双方力量悬殊，防线于12月11日被攻破，英军被迫退到九龙。

而此时日本第五纵队在九龙的活动和破坏，也加速了英军的失败。第五纵队的特工人员，在英军从新界退出时，在九龙半岛最南端的最高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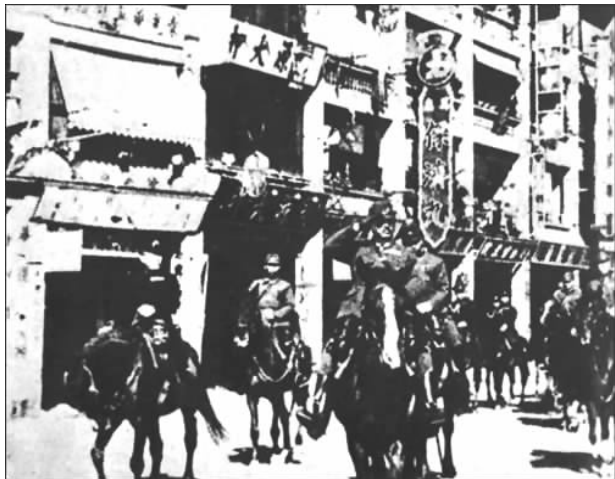
>>1941年12月8日日本空军轰炸香港

筑——半岛酒店的楼顶，竖起了日本的太阳旗，并在楼上不断施放冷枪。英军以为日军兵临城下，因而丧失了斗志，惶惶然渡海退到了港岛。12月13日，日军在没有受到任何抵抗的情况下，长驱直入，尖沙咀、九龙以北地区全部落入日军手中。

英军在撤出九龙半岛时，炸毁了交通设施和一些重工业工厂。维多利亚港两岸陷入一片火海之中。与此同时，日本海空军也全面出动，飞机在港岛上空盘旋扫射，军舰在港岛四周游弋示威，港岛处于日军天上、地上、海上的全面包围之中，四面楚歌。日军几次派人前来劝降，但始终未能成功，于是日本指挥部决定发动强攻。

17日晚，日军派出小股部队组成敢死队强行登陆，但由于英军之前已在沿岸布置了100支高强度探照灯照射海面，在海岸堡垒设置的机关枪猛烈扫射，顽强抵抗，日军的偷袭未能得手。次日晚，日军趁天气恶劣，能见度差的机会，派数百名士兵泅水偷渡登陆，炸毁了供电电源，使得探照灯全部失灵，之后日军凭借优势兵力，迅速攻破了港岛上的各道防线。英军投入了很大兵力，与日军展开殊死搏斗，但经过4天激战，被日军逼到泥涌山峡和跑马地一带的狭小圈子里。

圣诞节之于香港，犹如内地的春节。在12月25日圣诞节来临之前，狡猾的日寇运用四面楚歌的战术来涣散英军军心，日军出动飞机在港岛各处抛散劝降传单，以瓦解英军的斗志。25日上午，港督杨慕琦和英军马比尔少将分别向英军发表圣诞文告，鼓励英军作战到底，抵抗日军进攻。但大势已去，香港政府的部分军政人员冒险突围，乘快艇逃离港岛。



>>1941年12月25日香港沦陷，日军通过皇后大道

港督杨慕琦看到英军继续坚持抵抗已经没有意义，不可能挽回大局，而

且英国政府事先也曾指示，如迫不得已可权宜行事，于是便挂出白旗，渡海到九龙半岛酒店日军指挥部向日军司令酒井隆投降。是役，日军伤亡2 700余人，英军死伤达4 000余人，不少港岛军民也死于无辜。驻港英军余部9 000人，连同港督杨慕琦，都成了日军的阶下囚，历时仅18天的香港保卫战至此宣告结束。黑色圣诞日降临香港，从此之后的三年多时间里，香港沦为日本的占领地。

历史回响



1941年12月25日，这个黑色的圣诞节，对许多上了年纪的香港人来说，是一个终身难忘的日子。这一天，日本军队攻占了香港。从这天起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香港人民在日本军队的刺刀下度过了三年零八个月的苦难岁月。

一句话点评



不少上了年纪的香港人说：“这个圣诞节，是我有生以来最黑暗的圣诞。”在香港的街头，饿殍遍地。

百载繁荣一梦消

——太阳旗下香港的悲惨岁月



日军占领下的香港民不聊生

关键词

关键时间 1941年12月25日

关键事件 香港沦陷

关键词汇 日本的殖民政策 法西斯统治

背景扫描



经过十八天攻防战之后，1941年12月25日，香港迎来了历史上最黑暗的圣诞节。清晨，在当时港岛最高的告罗士打大厦上挂起了一面白旗，港督杨慕琦于当日下午渡海到九龙半岛酒店向日本司令官酒井隆投降。黄昏时分，日军占领了整个香港。1942年2月20日，日本政府正式宣布香港为日本占领地，任命陆军中将矶古廉介为香港总督，平野茂为副总督，总督府下设立了一套完整的殖民统治机构。从此，香港被改名为香岛，公元年号变成了日本年号，1941年被称为昭和十六年。香港的街道也换上了日本天皇的名号，如皇后大道改为中昭和道，德辅道改为中明治道，半岛大酒店改为松本大酒店，等等。总之，一切都日本化了，在以后的三年多时间里，香港再无宁日。

脉络纵横



香港沦陷后的最初几天，是香港居民感觉最恐怖的日子。日本指挥部为了庆祝占领香港，宣布放假3天，纵容士兵去烧杀抢掠、奸淫妇女，肆意屠杀手无寸铁的居民。日军狂歌醉舞，大吃大喝至半夜后，便三五成群闯入民宅，寻找妇女发泄兽欲。在沦陷当天，就有许多妇女遭到侮辱或被轮奸。她们的年龄从十余岁到五六十岁不等。许多妇女不仅遭到日军强暴，还受到其他伤害，有的牙齿被打落，有的鼻梁被打断，还有的甚至身上多处中刀。当时整个港岛人心惶惶，充满恐惧。许多妇女为了保护自己，剃发改扮男装，或者用油墨、泥灰等把脸涂黑，希望能逃过大难。无奈之下，有的市民还想出了“敲山震虎”的防御办法。他们事先商定，任何一家碰到日本兵来都不开门，同时敲响铜锣或脸盆、铁罐、油桶等一切可以发出声响的东西，一家敲响之后，各家一齐响应，以此自卫。虽然香港居民想了许多办法，但面对惨无人道的日本兵，他们仍是防不胜防。许多人被日本兵害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无论是肉体上还是精神上都受到了重大的打击。当时的报纸评论：“日本兵的罪行真是该诅咒。夺去人的生命只不过是一瞬间的事，而给人一生一世的严重精神创伤，却是比夺去生命更可怕的事情。”

当时日本统治香港的策略是“以华制英”“以华制华”和“以战养战”。首先，他们将英美人士宣布为“敌国公民”，所有的外籍人士，包括港英政府官员和商人，以及英军战俘，甚至当时的港督杨慕琦，都被关入集中营。其次，在冻结汇丰、渣打和有利三家“敌国”银行存款后，宣布准许“华人”“中立国和友善国家公民”定量提款，而英美人士则不在此列。另外，在集中营中，也出现了利用华人和印度人去管理英美战俘的情况。在“以华制华”方面，日本人认识到香港是一个华人社会，必须利用华人绅商名流才能稳定社会秩序，于是，他们先后建立了“香港善后处理委员会”“香港华民代表会”以及“香港华民各界协议会”。这些组织均由当时的华人名流担任主席，它们的作用是协助日本统治者来解决香港的社

会和民生问题。

在“以战养战”方面，日本除到处抢劫民财外，还有组织地大规模掠夺香港的各种物资。为了方便掠夺，日本占领军把一切物资都严密控制起来，没有日本总督府有关部门的许可，任何物品都不许移动或买卖。香港当时是东南亚最繁华富庶的城市，而且它作为英国在亚洲的贸易中心，储有从英国本土和澳大利亚等地运来的各种物资及生活用品。日军把这些东西都搜刮起来，分类整理捆扎，用大轮船运回日本。仅在九龙仓库一带，日军抢掠运走的物品总值就高达十多亿日元，其中包括很多极为珍贵的稀有物品如镭等。汽车、五金等也是日军搜刮掠夺的对象。据不完全统计，仅在占领之初的几个内，日军就抢走多达2万辆汽车，而港岛皇后广场上的维多利亚女王铜像、第12任港督卜力爵士的铜像以及汇丰银行门前的一对铜狮子，还有各教堂的铜钟、铜镜等，也都被拆卸下来运回日本，很多都被熔化用来制造武器。

除了明抢外，日军还采取种种手段巧取豪夺香港的民脂民膏。其中，强推“军用手票”来代替港币，就是最主要的手段之一。1941年12月英军投降后，酒井隆即宣布“军用手票”为香港的合法货币，1元军用票可兑换2元港币。矶谷廉介任香港总督后，宣布停用港币。凡拒绝使用“军用手票”的，都要受到重罚，轻则罚款蹲大狱，重则被判处死刑。但“军用手票”没有任何物质储备做后盾，在流通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迅速贬值。至1945年8月日军投降前夕，1 000元军用票只能兑换4元港币。无数香港家庭辛



>>香港沦陷期间推行的日军“军用手票”

一生的血汗钱被日军掠夺得干干净净。据估计，日军利用“军用手票”至少从香港掠夺了1 300多万英镑。

由于日军的大肆掠夺，加上交通断绝、贸易停顿，当时香港百物奇缺，

物价飞涨。为了应付这种局面，日本对全港实行粮食定量配给制度，最后干脆停止了对居民的一切粮食供应，不少人因缺乏粮食而被迫吃番薯藤、花生麸、木薯粉，



>>日军强行遣返香港居民回内地

甚至吃野菜、树叶。当时黑市米价暴涨，由每公斤几块涨至200多块，许多人因买不起高价粮而活活饿死。

日军为了减轻粮食压力，还强行将大批香港居民遣返回中国内地。从1942年1月开始，这个曾经成为内地难民“避风港”的地方，出现了返回内地的新的难民潮。据统计，在日本占领的三年多时间里，被强行遣送回内地的香港居民，平均每天达1 000多人。另外，日军还利用香港青年生活无计，想另谋出路的心理，先后欺骗了7 000多名香港青年到海南岛去当苦力。由于路途颠簸，加上劳动强度非常大，又吃不饱饭，经常有人死去，能够返回香港与家人团聚的寥寥无几。

日本占领者统治香港期间，对香港实行法西斯军事统治，随时宣布戒严，任意搜查民居和逮捕、杀害平民。市民生活在太阳旗下，充满了恐怖和屈辱。另外，日本宣传机构还严密控制新闻舆论，只准登载日方供应的新闻电讯稿，或转载广州亲日报纸的消息。教育事业也是一片凋零。战前全港有中小学1 300所，而1943年初统计，仅有34所复课，学生人数也从11万锐减至3 000多。最高学府香港大学也受到了严重摧残，教学和研究都陷于停顿。

历史回响



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犯下的累累罪行，人尽皆知。在香港也是如此，三年多的沦陷时期，香港惨遭日军摧残。日军不仅夺去了许多人的生命，还带给了许多人一生一世都难以治愈的精神创伤。曾经富庶的香港变成了死港，成了真正的人间地狱。

一句话点评



香港沦陷期间，香港居民流离失所，痛苦不堪，整个城市陷入了被毁灭的边缘。百年的繁华，一夕尽消。

“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抢救运动” ——1942年抢救沦落香港的文化人



关键词

关键时间 1942年1月5日—2月底

关键人物 民主人士 文化名人 港九游击队

关键事件 抢救运动

背景扫描



1941年初，“皖南事变”爆发，国内政治形势更加严峻，国民党除了对中国共产党采取军事行动外，还实施了文化专制和特务统治，如取消各地抗日群众组织，封闭进步报刊，逮捕进步人士等。内地大批民主人士和进步作家、艺术家、名记者、名教授等，为了躲避国民党的迫害，先后流亡到了香港，香港遂成为进步人士聚集，并宣传抗日、反对投降、主张民主、反对独裁的一个战斗据点。当时，香港的进步民主运动空前活跃，如由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郁风主编的《耕耘》、茅盾主编的《笔谈》、张铁生等主编的《青年知识》、宋庆龄主办的《保卫中国大同盟》，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报纸《华商报》等，都陆续复刊或出版发行。这些报刊每天都发表很多内容精辟、分析深刻的文章，呼吁全国人民坚持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

脉络纵横



1941年12月日军进攻香港时，在港的这批民主人士和文化名人来不及撤出而被困。香港沦陷后，日本人大肆展开搜捕活动，封锁港九交通，实行宵禁，并限令文化人前往“大日本军报导部”和“地方行政部”报到。日本文化特务机构在各电影院打出幻灯片，“请”梅兰芳、蔡楚生、司徒慧敏等人到日军司令部所在地半岛酒店会见，甚至用“内山完造”的名字约茅盾去谈话，形势十分危急。有鉴于此，中共中央在日军占领香港后不久，就电示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为了保护我国政治和文化界的精华，必须动员一切力量，立即把他们从香港全部抢救出来！当时任八路军新四军驻港办事处负责人的廖承志收到电报后，立即召集广东、香港及东江游击队的负责人开会，成立指挥部，研究抢救这批文化名人的具体方案和措施。他们决定和日寇抢时间，趁敌人立足未稳，户口管理松散之时，把民主人士和文化名人秘密转移到东江游击区，再往大后方转移。

要把这批民主人士和文化名人救出香港，首先要与他们取得联系。由于他们在日军进攻香港时多次搬家，反复转移，所以很难搞清确切地址。游击队员们想尽了办法，利用各种关系，不放过一点线索，终于和每个抢救对象都接上了头，并告知了他们详细的营救计划。

日军占领香港后，把市内交通严密封锁了起来，在各码头和主要街道都设有哨所，严密监控，行人稍有可疑之处便会遭到日军的逮捕。在这种情况下，要想把几百名文化名人和民主人士护送出去，着实很困难。但指挥部发出命令：要不惜一切代价，动用一切关系，务必将所有民主人士和文化名人安全护送到内地。大家群策群力，制订了周密灵活的行动方案。游击队员们冒着生命危险，往来于港岛和九龙之间，几经周折，建立起了

一条秘密的交通线。

从1942年1月5日起，每天晚上都有一批民主人士和文化名人在游击队员的护送下，神不知鬼不觉地穿过一条条窄街小巷，走到铜锣湾海边一个

不引人注意的地方，登上事先等候在那里的小艇，再由小艇护送到远离堤岸事先准备好的大木船上，偷渡到九龙的秘密据点。

抵达九龙已非常不易，而从九龙再转移到东江游击区就更加艰难。正当游击队员们一筹莫展的时候，正好天赐良机。由于香港当时粮食紧张，难民很多，日军为了减轻负担，开始遣散九龙地区的难民，这就给抢救工作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指挥部当即决定把抢救对象化装成难民，混在群众中离开九龙。考虑到这些民主人士和文化名人一般都缺乏长途步行的经验，指挥部特派出游击队员装扮成同行的难民，帮助他们挑行李，护送在其周围，遇到山路崎岖时，还要背负身体孱弱的人行走。由于日军在晚上实行戒严，不能行走，所以每天早晨6点宵禁解除后，游击队员们便带着被护送的人士由设在九龙的秘密据点出发，绕过敌人的岗哨，渡过深圳河，摆脱日军控制区，进入安全地带。

游击队还建立了另一条秘密交通运输线：从九龙西贡村乘船到小梅河、上洞，再转移到坪山游击队根据地。除了这两条路线之外，还有一批民主人士和文化名人如何香凝、柳亚子等由游击队安排，由鲤鱼门乘船到西贡村，再转船到广东海丰游击区。在护送何香凝女士时，她什么都肯丢下，唯对几大箱收藏多年的字画十分珍惜，怎么也不肯舍弃。但当时即使两手空空穿过日军的封锁线都很不容易，要想把这些字画从敌人眼皮底下弄出去更是难上加难。游击队员们挖空心思，终于想出了一条妙计：他们把字画装进一副棺材里，由十几名负责警戒的同志头扎白布，身披重孝，扮成送葬的样子，哭哭啼啼，吹吹打打，骗过了日军的岗哨，直奔深圳河而去。

这样，从1942年1月5日起到2月底，滞港的三百多名民主人士和文化名人一一脱离了虎口，返回内地。这其中，有许多都是世界知名的人物和各界精英，如茅盾、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戈宝权、胡绳、曹聚仁、胡风、廖沫沙等，他们转移到内地后，继续为抗日民主事业而战斗，为中华民族作出了杰出贡献。而港九游击队奋不顾身抢救这些“国宝”的事迹，也为人们永志不忘。

日寇妄想一网打尽中国的文化名人，在他们的征战史上涂上独具特色的一笔，但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们追捕的手无缚鸡之力的抗日文人们却一个个从他们眼皮底下溜走了。

历史回响



不少文化界的精英和民主人士经过这件事后，同中国共产党结成了心心相印、肝胆相照的关系。抗战胜利后，他们支持中国共产党，反对内战，反对独裁。新中国成立前夕，他们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邀请，冒险从国统区和香港等地赴北京出席全国政协会议和全国文代会，共商建国大计。新中国成立后，他们担任中央和地方的领导工作，尽心尽力地为祖国的建设事业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

一句话点评



茅盾曾在书中称“抢救文化人”运动“是抗战以来（简直可以说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夏衍亦指出：“大营救表明党中央、南方局对知识分子的关怀，说明共产党人和游击区军民在万分困难的环境中，舍生忘死地执行统战政策的史实，这是真正的肝胆相照。”

又见米字旗 ——战后英军重占香港



英军开进香港

关键词

关键时间 1945年8月15日
关键人物 夏悫 蒋介石
关键词汇 重占香港军政府

背景扫描



1941年12月25日，香港沦入日军手中，从那以后，香港人民在日本的统治之下度过了三年零八个月的悲惨岁月。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饱受日本侵略者蹂躏的香港人民欢呼雀跃，恐惧沉闷的气氛消散了，维多利亚海湾又恢复了往日的生机。但又一个问题摆在了人们的面前，谁到香港接受日军投降？是中国军队，还是英国军队？依照盟国协议，香港本为中国战区受降范围，但是老谋深算的英国政府却无视这一事实，悍然宣布香港是英国的海外领地，英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可以不受战区限制。随即派出以海军少将夏悫为司令的一支舰队驶往香港，准备接受香港日军的投降。而在中国方面，蒋介石认为当时的主要任务是消灭共产党。他首先考虑的是，如何派军队尽快从日本人手中把沦陷区和日军的装备接收过来，以免它们落入中国共产党手中。在外患方

面，蒋介石最急切要处理的是大战的和约，以及日本投降后苏军留在东北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根本无暇顾及香港问题，因而也就没有做派军队接收香港的准备。

脉络纵横



1945年8月14日，在日本宣布投降的前一天，英国内阁发出命令，派出舰队开往香港，同时英国驻华大使薛穆会见了当时中国外交部长吴国桢，递交了英国外交部的照会，告知中方英军将进入香港。蒋介石接到英国的照会后非常生气，眼前马上浮现出在开罗会议上丘吉尔对他的傲慢态度。他对丘吉尔不把他看在眼里的态度早就感到很恼火，如今丘吉尔又这么不给他面子，实在让他无法接受，于是他打定了主意：既然你英国不让我顺心，我也就不让你舒服。

8月16日，吴国桢奉蒋介石的指示会见了薛穆，转达了中国政府的意见，要求英方遵守太平洋盟军统帅部第1号命令，在未得到盟军统帅和中国战区总司令授权前，不得派军队进入中国战区的任何地方。同日，吴国桢向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转交了一封蒋介石给美国总统杜鲁门的信。蒋介石在信中说，香港属于中国战区范围，应该由中国军队接受日军投降，英国的做法是盟国的不幸，希望美国出面来阻止英舰进入香港。17日，薛穆再次会见吴国桢，他态度强硬地表示，应由英国收回香港。同时，英国首相丘吉尔也致电美国总统杜鲁门，要求美国支持英国，指示盟国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命令驻港日军指挥部向英军投降。当时的美国虽然已经成为世界头号强国，取得了国际事务的主导权，但战后欧洲事务还需要英国的支持和配合，因此美国不愿意因为香港问题而影响英美两国之间的关系。再加上杜鲁门一贯保守的作风，就更不可能反对英国对香港的要求了。

在得到美国的支持后，英国更加不肯放弃由英军直接接收香港的打算了。8月19日，薛穆又向中国政府递交了一份备忘录，指出英国在接受日本投降问题上，不能同意把香港列入中国战区之内，英国政府希望身为军人的蒋主席能够理解英国的处境，即英国曾在香港受辱于日军，所以必须直

接从日军手中把香港接收回来，以洗雪前耻。英国欢迎蒋介石以中国战区总司令的身份，派代表参加英方在香港接受日本投降的仪式。

蒋介石对杜鲁门偏袒英国人的态度颇为不满，便于8月20日再次致电杜鲁门，要求美国澄清立场，希望不要修改盟军统帅的命令。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蒋介石还提出了一个方案，即驻港日军向他的代表投降，而他以中国战区总司令的身份邀请美英代表出席受降仪式。仪式之后，他再授权英国派兵进驻香港。到这时，蒋介石纠缠不放的仍是他的面子问题，而不是由谁接收香港的实质问题。然而，即使蒋介石争的仅仅是个面子，结果仍让他大失所望。美国再次表示，只要中英双方能够在军事上达成协议，美国并不反对由英国来接收香港。

蒋介石原本指望美国在这件事上会给他撑腰，但没想到希望完全落空。一怒之下，他于8月21日下达命令，指派第二方面军接受广东战区日军的投降，其中包括进入香港受降。中国的这些行动立即遭到了英国方面的拒绝和反对。英国方面傲慢地扬言，谁也不能迫使英国政府放弃香港。而蒋介石的态度本来就不坚决，派军队开往香港也只不过是气头上的冲动。当英国表示强烈的反对之后，他马上就软了下来。

8月23日，蒋介石第三次致电杜鲁门，表示同意让步，但提出由他以中国战区总司令的身份，授权一名英国军官代表他在香港接受日军的投降。这本已是很大的让步了，但仍遭英国拒绝。英国方面认为，既然蒋介石可以授权英军接收香港，那么他也可以继续以中国战区总司令的身份，下令驻英军司令接受他的指示。这样一来，必将后患无穷。因此，英国只能同意蒋介石派代表出席受降仪式，并以目击者的身份在受降书上签字。

8月27日，蒋介石第四次致电杜鲁门，企求美国出面调解，让他授权夏悫为他的代表，在香港接受日军的投降，他称这是最后的让步。但英国随即回应不能接受这一方案。蒋介石最后的希望也泡汤了。

8月30日，夏悫奉伦敦之命，率领舰队在海军航空兵的掩护下，以航空母舰“不屈”号做旗舰，以扫雷舰开道，由鲤鱼门浩浩荡荡开入了维多利亚港。8月31日，英国政府单方面宣布，由夏悫少将主持驻港日军的投降仪式。他将同时代表英国政府和中国战区总司令蒋介石在日军投降书上签字。

面对英军已经接收香港的既成事实，蒋介石只好退而求其次，派出代



>>1945年9月16日，在中国代表潘国华少将、英国代表和其他同盟国代表的陪同下，夏悫少将在总督府正式接受日本的投降

表与夏悫达成协议：中国政府同意英国方面接受驻港日军的正式投降，中国方面协助英军办理受降事宜。英国政府则同意自协议生效之日起，到1947年8月15日止，国民党军队可以从广州进入香港，由香港乘船北上到内战前线。九龙塘的部分民房也租给国民党政府作为北上部队的临时兵营。同时，驻港日军的武器装备也将移交给国民党军队。

香港日军向英军的投降仪式，原定于1945年9月12日举行，但由于中国政府的抗议，改为9月16日举行。仪式由英军将领夏悫主持，他的身份是“英国政府以及盟军中国战区总司令代表”，中国、美国、加拿大政府的军事代表参加了这个仪式。至此，香港重新落入到英国人的手中，消失了三年多的米字旗又重新飘扬在香港上空。抗战的胜利，未能使香港回到祖国的怀抱，这让香港人民深感失望。

历史回响



香港人民在日军统治之下度过了三年零八个月的悲惨岁月。日军投降后，黑暗香港重获新生，但港人虽然挣脱了日军的奴役，却并未回到祖国的怀抱。英国的米字旗再次得意地飘扬在总督府的上空，中国失去了收回香港的一个大好机会。

一句话点评



战后收回香港本是一个大好的时机，但由于种种因素，中国失去了这次难得的回归契机。忙内战，蒋介石争面子不要“里子”；抢地盘，英国人“里子”、面子全不放。最终，中国国民政府面子、“里子”全失去，香港再次落入英人手中。

从头收拾旧山河

——杨慕琦计划与战后香港的重建



香港第21任总督杨慕琦

关键词

关键时间 1945年9月1日 1946年8月28日
关键人物 夏愨 杨慕琦
关键事件 杨慕琦计划
关键词汇 港英军政府 香港重建

背景扫描



香港自1941年12月25日沦陷之后，在日本太阳旗的阴影之下经历了三年零八个月的悲惨岁月。日军撤退后，香港已经变成了一座百孔千疮、满目疮痍的废墟。由于战争中港民被日军强迫遣散，或者是自己逃离香港返回内地，香港人口从战前的163万多人，降至战后的60多万人。

战火的摧残，使香港的房屋和公用设施均遭严重破坏。英国接收香港后，大约有17万人流离失所。同时卫生环境极其恶劣，垃圾堆积如山，蚊蝇孳生，医疗严重不足，港岛呈现出一片荒凉景色。

战后的香港经济十分萧条，航运、贸易、商业、金融、工业都处于瘫痪状态。有人回忆当时的情景：“庆祝凯旋的礼炮轰鸣，向每一艘进港的战舰致敬，而陆上却是断垣残壁、满目疮痍，一派饥馑和破败的景象。整个社会陷入一片混乱之中，港口布满了被击沉的战船，人口比以

前减少100万。幸存的老百姓，大都没有钱、没有家，也没有食物和燃料。”香港市面上货物奇缺，物价飞涨，尤其是粮食、燃料等生活必需品更是奇缺，人民生活极度困难。

脉络纵横



1945年9月1日，港英军政府成立，由夏悫代行总督职权，颁布了《军政府统治公告》，香港重又恢复成英国的殖民地。面对战后满目疮痍的香港，军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临时性的措施来恢复经济和安定市民生活，使香港的社会秩序逐步走上了正轨。

首先，恢复公用设施部门如自来水厂、香港电话局、中华电力公司、中华巴士公司等，清除战争留下的珠江口附近的浮雷，以恢复粤港内河的航运，并于1945年11月15日恢复广九铁路通车。另外，使一些停产的工厂重新开工，并鼓励部分银行复业，动员农民和渔民恢复生产。为了稳定社会生活，鱼和蔬菜必须到指定的市场统一销售。

战后香港人民生活中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首推粮食、燃料和副食品的供应。军政府在清查日军留下的仓库物资时，发现库存了一批大米，就以每斤港币2毫的极低价格（市场每斤1元至1元4角）配售给市民。市民凭“配米证”，可以按规定每人每天购买半斤米。军政府还与联合国救济署联系，请求支援。结果于1946年第一季度得到了三四万吨的粮食配给额，初步缓解了粮食的紧张局势。



>>英军在清查日军装备

而对于副食品、燃料等日用必需品的供应，采取了“限价供应”措施，即由军政府统一采购后交零售商按规定售价卖给市民。同时，也适当允许非统制交易以及私人采办一些货物，以弥补统制政策下商品供应的不足。如：允许一些米商自己办理进口大米生意，其售价可以比“统制米”高出五六倍；对一些政府无法供应的商品如布料，允许进口商采办；对于当时市场上商贩的黑市交易，军政府也是网开一面。

军政府还采取了过渡性的临时货币政策，使市面货币流通量得以控制。军政府颁布了《延期付款法令》，将香港各银行战前的资金暂时全部冻结，以控制市场货币的流通量。另外，规定大企业、大商行的股票、证券暂时不能流通，对房租、工资等也采取了冻结措施。为了保证市场的正常流通，在宣布日本军用票停止使用的同时，军政府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得战后恢复期的香港货币流通量得到有效控制，既较好地满足了货币需求，又有效地抑制了物价的飞涨。

总之，军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恢复生产的措施。军政府管制香港共8个月，于1946年4月30日结束。此时，香港的生活秩序已基本恢复正常，经济也开始走上发展的轨道。

1946年5月，前香港总督杨慕琦从战俘营中被释放出来后回到伦敦，不久又返回香港，重新担任总督一职。夏悫的军政府宣布结束，香港重又恢复了战前的旧政制。

1946年7月，行政局重开，立法局改组，杨慕琦委任了行政、立法两局的新成员，并恢复了过去的一些机构。在健全政府各种组织机构的同时，又新设立了复兴计划委员会、房屋建设委员会，扩充了海港委员会、劳工仲裁委员会等。杨慕琦在重组立法局等政制架构的同时，鉴于战后民族独立浪潮汹涌，殖民地国家和地区纷纷宣布民族独立的形势，打算推出一套政改方案。8月28日，杨慕琦发表演说，提出其政改方案，并声称征求市民意见。这一方案旨在实行“非殖民化”：其内容之一是成立一个30人的市议会，立法局的部分权力交给市议会，市议会的成员半数为华人，半数为洋人，2/3民选，1/3由各社团提名；内容二是对立法局进行改组，非官守议员分别由新成立的市议会和各社团提名。杨慕琦同时也定下了选民的条件：英籍人士只要在香港居住满一年，便有选举权；非英籍人士，主要是华人，

则要在香港居住较长时间（10年），才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但杨慕琦的方案公布后，并未引起反响。原因在于这套议制方案的实际目的是加强英国对香港的控制，香港的大权仍然由港督牢牢掌握，市议会只不过是形式上多增几名华人议员，以点缀一下民主的门面而已，根本没有实际权力。因此，香港市民对于“杨慕琦计划”反应十分冷淡，几乎无人理会，他们更为关心的是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对于殖民当局所谓的政制改革不感兴趣。随着中国内地形势的急剧发展，英国内部对于香港政制的改革也有分歧。总之，由于多种原因，“杨慕琦计划”最终胎死腹中。

历史回响



战后的香港，由于资金和人力的资源得到及时补充，很快得以恢复和发展，到1946年上半年，香港经济已逐步恢复到一定的水平。这主要得益于香港人民经历大乱之后，迫切要求大治的愿望，同心协力共渡难关的决心，以及所付出的巨大努力，当然也离不开军政府所采取的一些有力措施。

一句话点评



日本的侵占和掠夺，使得香港百年繁华一梦消，历史倒退了许多年。日本战败投降后，香港在短短的时间内，即从一个满目疮痍的废墟中站了起来，显示出强大的活力。

轰动国际的九龙城寨事件



早年的
九龙城寨

关键词

关键时间 1898年6月9日 1947年11月

关键人物 郭德华 葛量洪 王启俊

关键词汇 《展拓香港界址专条》

背景扫描



九龙城寨是香港一处年代久远的历史古迹。提到九龙城寨，常给人一种神秘的感觉。拥挤不堪的杂货店铺和鳞次栉比的牙医诊所，分布在城寨的四周。寨内残旧的楼房，浑浊的空气，狭窄的街道，阴森的气氛，再加上那些神奇的传说和夸张的渲染，更使之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早在1860年的《北京条约》中，英国便割占了界限街以南，包括昂船洲在内的九龙。后来在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又提出了香港扩界的无理要求，并于1898年6月9日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对九龙城寨问题作了专门的规定，仅留靠近九龙城寨的码头一区，准许中国官、兵、商、民使用，但保留九龙城寨的中国文武官员，九龙城寨仍归中国管辖。这样，九龙城寨无异于一个在英国殖民地包围下的小王国，清朝政府依然在此行使行政管理权。对于这样一个“国中之国”，英国人有如骨鲠

在喉，没过多久，英国政府便自食其言，要求撤走九龙城寨的中国官兵，撤销中国对城寨的管辖权，不久，又进一步授权香港占领城寨。1899年5月14日，英国外交大臣张伯伦正式下令占领九龙城寨，两天后，英军强行实行武装占领，驱逐了中国政府派驻城寨的官员和驻兵。中国政府对此表示强烈抗议。同年10月，张伯伦又表示，任何形式的中国政府无论如何都不能在九龙城寨恢复。12月27日，英国发布《枢密院关于九龙城寨之训令》，借口中国官员在九龙城寨内各司其职，已被发现“与保卫香港之武备有所妨碍”，单方面宣布九龙城寨已成为“女皇陛下香港殖民地的一部分”。当时清政府即严正声明，九龙城寨是中国的领土，管辖权仍属中国。其后，英方为了表示不平等条约“有效”，没有派兵在此驻扎。此外，历史上港英当局曾经多次制造借口，挑起事端，企图逼迁九龙城寨居民，但每次都因遭到当地居民的强烈反抗和中国历届政府的严重抗议而归于失败。

脉络纵横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港英政府重新统治香港。他们利用当时国共两党内战而无暇顾及香港之际，再次挑起“九龙城寨事件”，企图将九龙城寨划入他们的统治范围。

1947年11月27日，港英政府通令九龙城寨居民，限两星期内将所建木屋自行拆毁，这是九龙城寨事件的导火索。当时担任中国政府外交部两广特派员的郭德华，立即通过媒体表示异议，认为这是港英政府在干涉城寨居民的生活。12月5日，港英政府针对郭的异议，发表了措辞强硬的声明，强词夺理地声称，他们对九龙城寨历来享有管辖权。16日，港英当局又向法院申诉，要求法庭裁决拆居之事，法庭很快作出裁决，要求九龙城寨居民必须迁出该地。1948年1月5日和6日，港英政府派出大队警察进入城寨，强行拆除木屋70余间。时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次长叶公超特派员的郭德华访问港督葛量洪，向他提出交涉，但事后香港政府却发表声明，否认九龙城寨有管辖权问题存在。1月7日，九龙城寨法定的管辖者、广东省宝安县县长王启俊来到城寨，向当地居民表示慰问，对无家可归者表示关怀。这



>>现在的九龙城寨公园一带

是新界租借后，宝安县令首次踏上城寨的土地，很明显，这也是广东方面向港英政府传递的一个重要信号。但是，港英方面对此并不理会，反于1月12日再次出动大批警察强行拆屋，城寨居民与警察发生激烈冲突，警察当场开枪射击在场群众，重伤居民张忠武等6人。13日，九龙法庭无理判决拒绝拆屋的居民代表朱沛堂、刘毅夫二人服苦役3个月。

九龙城寨事件发生后，2月5日，中国政府发表驻英国大使郑天锡答复英国的照会，照会重申：“中国政府一向坚持其订立于1898年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之解释，认为该专条已明确规定，中国保有其在九龙城寨之管辖权。”照会列举了大量事实，驳斥了英方对中国在九龙城寨管辖权的歪曲。照会表示：“中国政府坚决认为九龙城寨各项不幸事件之责任，显然应该由香港政府负责。”

事件发生后，广州方面也是群情激愤，各社会团体立即组成“粤穗各界对九龙城事件后援会”，众多团体组织慰问团进入城寨慰问。1月16日，

粤穗各界对九龙城寨事件后援会为抗议港英当局侵犯中国主权，伤害九龙城寨同胞，组织全市学生及各社团4万余人在广州中山纪念堂举行声援大会，会后示威游行。当示威队伍来到沙面英国领事馆前时，一批学生冲入馆内，搬出家具当场点火焚烧。

此后，港英政府慑于我国民情激愤，舆论沸腾，才有所收敛，停止了在城寨拆屋的行为。而广东当局也并不愿意看到事态的过分扩大，于是，粤穗各界的后援活动也在当局的压力下无形消散。粤港关系史上的这次重要事件就此平息，但导致当时中英关系极为紧张，并留下了隐患。此后，围绕九龙城寨，中英之间进行了多次外交较量。

历史回响



九龙城寨长期处于无政府状态，导致社会问题丛生。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一直关注九龙城寨的发展情况。1984年12月中英《联合声明》的签订为解决九龙城寨问题提供了良好的基础。1987年1月14日，港英政府宣布在3年内彻底清拆九龙城寨，并将之改建为公园。中国对香港政府的这一举措表示了充分的理解，指出这个决定不仅符合城寨居民的切身利益，而且也有利于整个香港的稳定繁荣。

一句话点评



九龙城寨经历了多年的风雨飘摇后，终于安定了下来。今天，当你再次领略狮子山下这个历史古迹的时候，当你回首九龙湾畔的历历往事的时候，当你置身于那花木掩映的园林美景之中的时候，你可会想起在这里曾经发生过的风云巨变？

震惊中外的两航起义



启德机场工作人员合影

关键词

关键时间 1949年11月9日
关键人物 刘敬宜 陈卓林
关键事件 两航起义

背景扫描



20世纪40年代末，随着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国民党统治已呈山穷水尽之势，其覆灭已成必然。港英当局惊慌失措，不知如何应对这急剧变化的形势，一时间，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当时应港督葛量洪的要求，英国政府从东南亚等地调军以增强香港的防务，香港驻兵顿时增至3万余人，并成立了海陆空三军司令部。除进行军事演习之外，还采取了一些其他的措施，包括建造防空洞、重要建筑物的护墙、空袭报警系统及重要物资的储备库等。此时，美国政府发表声明，表明“不会派遣空军去协助保卫香港”，以免深陷泥潭不能自拔，这对港英政府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除了加强防务外，港英立法局还通过了一系列限制香港华人的条例和措施，如《人口登记法》《驱逐不良分子出境条例》等，并加强港警权力，防备和镇压华人暴动。许多有正义感的中国人，冲破殖民当局的干扰和阻挠，纷纷返回内地，掀起了香港起义的热

潮，其中以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的起义最有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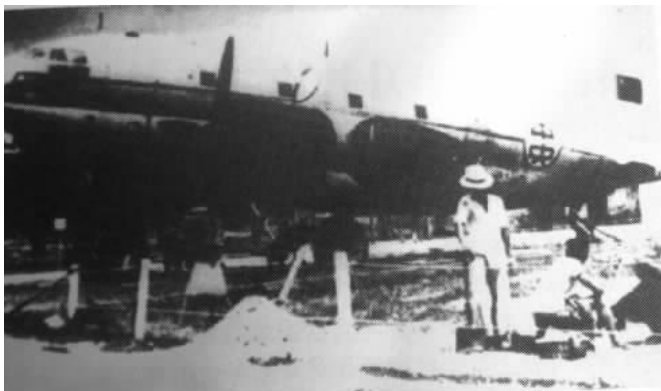
脉络纵横



1948年底，曾经显赫一时的蒋家王朝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统治岌岌可危。面对这种形势，蒋介石除指令上海警备司令汤恩伯将上海银行储存的黄金和珍贵文物紧急抢运台湾，以及命令资源委员会将东南沿海的工厂西迁外，还决定将具有重要意义的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临时迁往香港。为此，“中航”总经理刘敬宜受命让数十架飞机从黄浦江畔的上海机场起飞，“落户”到香港九龙启德机场。随后不久，以陈卓林为总经理的“央航”也紧随其后。两航的大批员工随之抵达香港，至1949年初，总共有70架飞机停在香港机场。

1949年8月13日，港英当局引用紧急条例，征用中国航空公司香港启德机场修配厂，并分别通知中央航空公司和中国航空公司停止使用及降落香港启德机场。同月19日，国民党政府交通部同意该机场修配厂暂与港方共用。港英政府与国民政府的这一行动，引起了两航公司广大职工的密切关注。他们知道，国民党政府与港方的目的不仅仅在于启德机场修配厂，而是在于两航的飞机。早在上海解放前夕，蒋介石就曾打算将设在上海的两航总公司和飞行基地迁往台湾，但两航管理人员以台湾缺乏维修设备为理由，拒不迁台而迁到了香港。

新中国成立不久，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十分关注在香港的数千名两航员工和飞机等资财，周恩来总理特别点将飞行教官吕明，要他前赴香港



>> 滞留在启德机场的两航公司的飞机

去见刘敬宜、陈卓林，希望他们能以大局为重，率领两航起义。吕明千里迢迢将周总理的殷切期望带给刘敬宜，刘为共产党人的诚意所深深感动，他认为起义也许是“中航”通向光明、摆脱困境的唯一选择，但一时又下不了决心。经过促膝长谈，晓之以国家、民族利益，刘终于打消顾虑，同意起义。

而此时的“中航”状况堪忧，大部分飞机集中香港后因无航线可飞，公司陷入困境。当时的营运主要是靠国民党联勤总部包用飞机，为盘踞在云贵等地的国民党残部空运银圆、弹药、食品等。而云贵地区多云，气候恶劣，难免会发生意外。“中航”有一架飞机触山爆炸，带来了很大的阴影。特别是“中航”大部分职工、技师、飞行员赴港后，其家属大多留在上海，他们纷纷写信，言及上海市面稳定，生活安定，规劝亲人回归。这一切给早年即受孙中山“航空救国”思想影响的陈卓林以极大的触动，他深感“中航”在港毫无前途，开始酝酿起义，而与吕明的会晤更使其坚定了决心。

由于当时国民党特务在香港的活动猖獗，因而两航起义的准备工作只能秘密地进行。为此，刘敬宜和陈卓林在取得了4 000多名员工的支持后，专门召开了两航骨干会议，决定以11月9日为起义日期，并确定了第一批北飞人员的名单、先行运回国内的器材以及第一批北上的飞机。

就在这时，潜伏于香港的国民党特务有所察觉，向台湾密报，称两航内有共产党活动，刘敬宜有通共之嫌。蒋介石很不放心，唯恐两航资产落入中共之手，于是急电刘敬宜、陈卓林赴台北。蒋介石的电报加速了两航起义的准备。

1949年11月9日，对两航来说，这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日子。这天，两航的55名飞行员分别驾驶10架中国航空公司和2架中央航空公司的飞机从香港起飞回到天津和北京。当日中午，两航北上飞机降落至北京西苑机场。第二天，周总理在北京饭店设专宴招待两航起义人员，高度赞扬了他们的这一举动。12日，毛泽东主席致电慰勉，并任命原两航总经理继续留职，负责接收在港的飞机资产。关于两航的资产，周总理发表声明，指出“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为我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所有，受中央人民政府民航局的直接管辖”，“两航留在香港的资产，只有我中央人民政府和我中央人民政府所委托的人员才有权处置”。并进一步强

调，“如两航公司留港资财被非法侵犯、移动或损坏，则香港政府必须负完全责任，并将承担相应后果”。声明发出后不久，台湾当局通过美国军人陈纳德，以美国民用运轮公司负责人的身份，于12月19日向香港法院提出诉讼，称这批飞机和资产已被国民党卖给该公司，要求接收。虽然陈纳德最终败诉，但关于两航资产的问题仍引发了一场纠纷，最后在港英当局的庇护下，这笔资产还是落到了美国人手中。

历史回响



两航起义对于日暮途穷的国民党政权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也是对港英当局压迫华人的示威抗议，对于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事业，更是一个推动和促进。在两航起义的影响下，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驻香港贸易处国外贸易所、香港招商局等也纷纷宣布起义，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一句话点评



两航起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周总理曾对刘敬宜、陈卓林讲：“你们这一正义举动的意义和影响是巨大的，抵得上200万大军，将大大缩短全国解放的进程。”

风靡影坛的武打片



影片《黄飞鸿》剧照

关键词

关键时间 1949—1969年

关键人物 胡鹏 李小龙 徐克

关键事件 胡鹏导演《黄飞鸿传》

背景扫描



中国武术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中国的武打片是中国电影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很多外国人知道中国电影都是从武打片开始的。第一部在美国1 000家主流影院同时放映的中国电影是中国香港的《天下第一拳》，第一部在国际最高级别电影节上获大奖的中国电影是《侠女》（在1975年戛纳电影节获综合技术大奖）。

说起武打片，历史可就长了。中国的第一部电影《定军山》，说它是一部武打片，也未尝不可，因为里面拍摄了同名京剧的一个武打场面。20个世纪20年代，中国电影最卖座的类型也是武打片，其中最有名的要算《火烧红莲寺》，一共拍摄了18集。要不是因为日本侵略中国，武打片还会继续成为当时卖座电影的主流。而武打片的衣钵南传，始于新中国的成立，商业电影的中心从上海转为香港，并在香港得以延续和发展。

脉络纵横



武打片在香港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几个时期，其中1938年至1948年是香港武打片的发展期，此间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不少上海影人南下香港避难，为香港电影业注入了新的活力，对香港电影的发展有较大的推动作用。这一批影人包括中国武侠片开山始祖之一的导演任彭年、王元龙，演员有新马师曾、黄鹤声、邬丽珠、郑孟霞等人。发展期的武侠片，内容着重宣扬侠义精神，在形式方面受到舞台表演的影响。

1949年至1969年是香港武打片的兴盛期。1949年冬，胡鹏导演了粤语片《黄飞鸿传》，这无论是对香港武侠电影还是对整个中国武侠电影历史而言，都堪称是一个划时代的标志。此后历经近50年，黄飞鸿成了中国武打片的一个著名品牌。在整个50年代，香港的武打片大体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像《黄飞鸿》之类的民国装功夫片，一种是神怪类武侠片，前者的代表作就是《黄飞鸿》系列，后者的代表作有《如来神掌》等片。

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香港武打片的武打动作受日本武士片的影响，模仿里面的武打招式，题材狭窄，除了剑仙神怪就是学艺报仇。1964年，香港凤凰公司拍摄的《金鹰》，在内蒙古实地拍摄，里面展示了摔跤、套马等传统民族功夫，还有蒙古草原的壮丽风光，是一部创新的武打片。

1965年，长城电影制片公司拍摄的《云海玉弓缘》在武打片的演职员表里面，第一次出现“武术指导”这个名称。该片被认为是武打片的第一部里程碑式作品，武术指导正式成为武打片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此后，武打片的黄金时期来到了。

从1965年开始，邵氏公司的老板邵逸夫对泛滥、老套的武打片感到厌烦，他决心要拍摄新类型的武打片。几经尝试之后，张彻和胡金铨分别在1966年拍摄了武打电影的传世之作《独臂刀》和《大醉侠》。这两部影片奠定了他们在影坛的重要地位。张彻和胡金铨绝对是武打片教父级的导演，他们两人对武打片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在20世纪70年代，港台武打片著名导演除了张、胡二人外，还有罗维、



>>李小龙

楚原等有代表性的人物。罗维一生拍片无数，他的最大贡献就是导演了《唐山大兄》和《精武门》，捧红了李小龙这个国际知名的功夫巨星。楚原在70年代初拍摄了反映社会现实题材的《可怜天下父母心》等名片，后来也加入到武打片拍摄行列，导演了《爱奴》以及一大批改编自古龙武侠小说的影片《流星·蝴蝶·剑》《天涯明月刀》等，均由狄龙主演。一时间，“古龙+楚原+狄龙”，成了古装武侠片的铁三角。楚原的作品情节诡异，悬念重重，布景豪华。

中国武打片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走向国际市场。第一部在海外正式放映的商业性功夫片是1971年邵氏公司出品，郑昌和导演，罗烈主演的《天下第一拳》，该片曾在美国1 000家主流影院同时上映，盛况空前。不过真正使中国功夫在海外发扬光大的是李小龙。李小龙的一生虽然短暂，只拍摄过四部半作品，《唐山大兄》《精武门》《猛龙过江》《龙争虎斗》，还有未完成的《死亡游戏》，但是在他主演的电影里充满了强烈的民族气节和爱国精神，让人看后精神振奋。他自创的截拳道功夫威力无穷，流传至今。

20世纪70年代后期，香港武打片开始走下坡路，这段时间，各种武打片的内容无非是门派争斗、学艺报仇之类。到了1978年，终于出现几部令人眼前为之一亮的影片，出现了几个此后驰名国际影坛的人物。这一年，曾在张彻旗下做过多年武术指导的袁和平，为思远公司执导了《蛇形刁手》，起用成龙做主角。影片情节尽管没有完全脱离老套，但是在武打设计上有所创新，在故事情节和武打中加入大量喜剧元素，开创了武打片的一个新片种——谐趣功夫片。成龙充分发挥了他在戏班里学到的京剧北派功夫，成为功夫片的新偶像。之后二人再度合作的《醉拳》更成为经典。刘家良，正宗南派武术——洪拳的传人，在张彻手下担任武术指导多年，他在1978年导演的功夫片《少林三十六房》里加入了大量描写少林僧人练功的场面，大获成功。此外，他导演的《中华丈夫》《十八般武艺》都是当时比较卖座的影片。他导演的《长辈》让女主角惠英红成为第一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影后。成龙的师兄洪金宝在70年代也已经成名，1976年他第一次独立导演并主演的喜剧功夫片《三德和尚和舂米六》，成为当时很叫座的武

打片。

进入20世纪80年代，香港武打片的年产量已经大大下降，除了《少林寺》《师弟出马》等少数影片，很少有轰动之作。就在这时，徐克出现了，他曾经在美国的大学学过电影，回港后在佳视拍摄的电视剧《金刀情侠》中就使用了电影的拍摄手法，导演的武侠片《蝶变》令人耳目一新。他在1984年拍摄《蜀山剑侠》，聘请好莱坞的特技制作人员，营造出一个奇幻的剑仙世界，使影片大获成功。这一时期，成龙、洪金宝等人的作品也在不断变化，他们拍摄了一系列现代题材的功夫片，如《福星》系列《警察故事》系列和《A计划》等，武打更讲究速度感和力度，中间还加入些幽默元素，为武打片闯出了一条新路。这一时期，成龙在戏班学艺时的“七小福”里面的其他的师兄弟们如元彪、元奎、元华等人，在武打片的表演和武术指导领域也都成为独当一面的人物。

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古装武侠片开始重新为人们关注，胡金铨挂名，徐克、程小东联合导演的《笑傲江湖》，徐克导演的《黄飞鸿》，程小东导演的《倩女幽魂》，徐克、程小东、李会民联合导演的《新龙门客栈》，成为这一时期武侠片的代表作。这类影片的特点是武打设计天马行空，想象力异常丰富。其中，程小东是武打片导演里有代表性的人物，他在80年代初导演的《生死决》已经可以看出他日后的风格。而徐克的《黄飞鸿》系列对民间武林传奇人物题材加以创新，把武林纷争加入到大的动荡时代里，表现出一种忧国忧民的意识，使武打片提高了一个档次。

20世纪90年代的香港武侠片大玩电脑科技：1990年徐克与胡金铨导演的《笑傲江湖》、1991年的《黄飞鸿》大卖座后，武侠片出现一线生机。1992年《笑傲江湖2——东方不败》更创下3 400万的票房，一时间跟风之作频出，大家纷纷争拍古装武打片。然而好景不长，至1994年后，武侠片和功夫片面临着如何推陈出新，开创一番新局面的困境。

21世纪之初，一部《卧虎藏龙》横空出世，不仅引发了海外对中国电影更大的认同，而且使得内地一些文艺片大导演如张艺谋、陈凯歌等人步其后尘，开启了武打片新的创作尝试。我们希望这是一个好的开端。

历史回响



在香港电影史上，有戏曲片、歌舞片、动作片、爱情片等多个片种。在商业利益的诱导下，其中不少片种都经历过兴衰，但是不管在什么形势下，武打片都占有一席之地，并成为雄踞香港影坛的霸主。在外国，武打片几乎就是香港片的代名词。在香港，武打片的演化可以看成是当代电影流变的缩影。甚至可以说，几十年来，武打片像一个晴雨表，反映出香港影业的兴衰更迭。

一句话点评



武打片是中国文化中最具特色的电影类型之一，它不仅阐扬中国的侠义精神，更将中国武艺透过影像作出最佳的呈现，并且不断地推陈出新。论天下谁是英雄，请看香港武打片。

“月儿弯弯照九州” ——1952年以后香港流行曲的发展



电影
《天才与白痴》
剧照

关键词

关键时间 1952年—20世纪80年代

关键人物 徐小凤 邓丽君 许冠杰等

关键词汇 粤语流行曲

背景扫描



香港地区在语言传统上属于岭南的粤语方言区，传统的地方音乐是粤剧、粤剧小曲和广东音乐。至于现在红遍各地的香港粤语流行音乐的蓬勃发展，确切地说仅有20余年的历史，但事实上其孕育、准备阶段还是较为漫长的。香港流行歌曲发展的源头是歌坛，它是20世纪初在广州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所谓歌坛，就是在茶楼大厅门口附近用木板搭成高台，上面放一张茶几和两把椅子，茶几上放着两盅茶，每天轮流邀请两位失明的女艺人坐在茶几旁演唱，台上还有伴奏的乐手坐在唱者对面。这些失明的女艺人被称为“瞽姬”或“师娘”，在1918年之后又有明眼歌伶演唱。当时她们唱的都是古腔粤曲，如《黛玉葬花》《辨才释妖》等。这种“粤曲”是指一种流行在广东、广西、香港、澳门以及东南亚、北美等广东后裔聚居地的广东曲艺。它和广东省内的其他小调、山歌不同，曲式以二

黄或梆子为主，再加入小曲和广东说唱等，演出的语言主要是广州白话。随着广州歌坛的蓬勃发展，香港歌坛也很快兴旺起来。女伶在广州、香港两地穿梭往来演出，组成“省港班”，并以这两个城市为据点向外发展。1937年抗战爆发后，广州、香港先后沦陷，歌坛逐渐走向衰落。

脉络纵横



粤语流行曲是从粤曲中分离出来的，在曲词方面更强调抒情性，同时因为要适应市场的需求，也就更强调商业性。由于在抗战前后来自上海等内地城市的艺人将国语流行曲带入香港，同时香港作为英国统治下的城市，英文流行曲自然也很盛行。所以，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香港，可以听到英文歌曲、国语流行曲、粤语小曲等三类音乐。英文歌被认为是高格调的，地位最高；国语歌代表国粹，地位也不低；而粤语歌则显得很土，根本不能入流。那时新一代青年受英式文化的影响，颇易接受欧洲流行曲。一群音乐人认为，如果用香港人的日常用语来演唱有西欧韵味的曲调，唱者更易表达感情，听者也会更投入，可以使两者更好地结合起来。于是，由一群音乐人发起，将西方或日本流行曲曲调填上粤语词句来演出，形成了以香港旋律演唱的歌曲。这种歌曲刚一问世，便以雷霆万钧之势传播，广为市民欢迎，从而成为香港本域特定的流行文化，很多经典歌曲如《情人的眼泪》《秋水伊人》等即产生于当时。此后电视的问世，更令这种形式的粤语流行曲加速流行起来。所以确切地说，粤语流行曲的真正黄金时代，应该在20世纪50年代，最有代表性的是周璇及白光这两位南来的女红星的作品。她们的歌曲，往往带有北方小调纯朴优美的气息，如《月儿弯弯照九州》等歌曲。因为粤曲通常以五声音阶为主，所以粤语流行曲曲谱大部分也是五声音阶。而且实践证明，这种音阶既方便用粤语填词，也方便用粤语演唱。

到了60年代，周聪、于粼等艺人又将粤剧小曲发展成为早期的粤语流行曲，因此许多粤语流行曲都是从粤曲的小曲中分化出来的，在歌词方面尤其注重追求典雅华丽。同时这也是个煽情剧及黄梅调戏曲大行其道的年

代，国语流行曲都依一些既定的模式写作，所以导致后来逐渐变成陈腔滥调。60年代中期，“披头士”乐队来港演出，给香港乐坛带来巨大影响。美国流行音乐，这种新浪漫音乐文化的主要元素是对美观外形的重视，即强调感官、视觉和听觉的高度享受。歌手新颖的衣着、发型以至化装，都凸显出浪漫的色彩。很多香港年轻人开始仿效组建乐队玩音乐，于是涌现了一批唱英文歌的香港本地乐队和歌手，当时比较著名的有莲花乐队、Teddy Robin和Playboys乐队、Wynners（温拿）乐队以及稍后林子祥的Jade（玉石）乐队、许冠杰、罗文等等。这股热潮对香港本土音乐的发展作用极大。60年代末期，台湾的国语流行曲也曾一度进占香港乐坛，成为香港乐坛的主流。前有姚苏蓉、青山、尤雅、鲍立、刘家昌，后有邓丽君、刘文正等。这时的香港，国语歌极为流行，就连后来粤语流行曲的开山祖师顾嘉辉、黄霑等，也是从创作国语歌曲开始他们的音乐生涯的。在台湾中文歌的入侵和迪斯科舞曲开始风行的双重影响下，香港本地乐队潮很快低落，英文歌虽然仍有一定市场，但许冠杰等人已开始为英文歌填上粤语歌词以吸引更多的听众。

70年代初的香港，经济迅速腾飞。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准的提高，刺激了香港本土文化的觉醒和娱乐业的发展。1973年以后出现了一批在听众中反响强烈的歌曲，这些歌曲形成极强的声势，冲击着香港乐坛，同时也渐渐奠定了它们在流行乐坛的地位。如1974年楚原的《七十二家房客》的成功，引发了粤语电视剧的勃兴，为香港现代粤语流行曲的崛起提供了良好的发展契机。同年，由顾嘉辉创作、仙杜拉演唱的《啼笑因缘》主题曲和许冠杰创作并演唱的《鬼马双星》主题曲和插曲《双星情歌》，以平地一声雷的气势开创了香港现代粤语流行曲的新纪元，奠定了粤语歌的地位，使粤语歌曲与国语、英文歌曲成三足鼎立之势。顾嘉辉、许冠杰也因此被公认为香港粤语流行曲的开山祖师。在歌词内容方面，许冠杰的作品更善于刻画市民心态，市井色彩浓郁，歌词浅白生动，成为香港粤语流行曲中最富生活气息的组成部分。而70年代中期兴起的电子热，更是将香港的粤语流行曲推向一个新的高峰。姚蓉、徐小凤是那个时代的两大天后。港片《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十分真实地反映了70年代香港流行乐坛的实况。那时的粤语流行曲无可争议地成为香港音乐文化的主流。许多台湾歌星都纷



>>歌舞片《桃花江》剧照

纷来港演出，本地原来唱英文歌的歌手也纷纷改唱广东歌，原来唱国语歌的更是早已改唱广东歌，包括陈秋霞、张武孝、徐小凤、甄妮、林子祥等。在他们的努力下，香港的流行乐坛开始真正成熟起来，为以后的辉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除了电视剧

的巨大推动作用外，香港的电台也在全力推动粤语流行曲这种属于香港本地的音乐文化。1979年，香港电台举办了第一届“十大中文金曲”选举，标志着粤语流行曲在香港流行乐坛正式成为盟主，中文歌曲成为香港本地娱乐圈中的重要组成部分。1977年，香港作曲家及作词协会正式成立，它的发起人之一是著名词作家黄霑，这个协会的成立，保障了香港本地流行歌曲作曲人及填词人的权益，意味着他们的作品开始受到尊重。

通过1980年至1982年的继续大力推广，粤语歌曲已深入人心。但在1983年至1986年，粤语流行曲歌词的创作难有新意，创作上的低潮期不可避免地来临了。到了1986年，香港的中文歌曲唱片市场仍处于低迷状态，不过已酝酿两三年之久的乐队组合潮流已成气候。这股潮流的出现挽救了一度陷入低迷状态的香港唱片市场。乐队潮流至少给香港的流行乐坛带来两个重要改变：一是间接引入一批更年轻的填词人；二是建立了乐队应当唱爱情歌曲以外题材歌曲的观念。遗憾的是，乐队潮流很快消退了，能在流行乐坛站稳脚跟的只有“达明一派”“太极”和Beyond三个乐队。他们的很多歌曲都致力于表现当代青少年的失落和对社会的不满，有励志及探索人生目的和生活价值的取向，为流行歌曲开辟了一条较为清新和有思考深度的道路。

历史回响



粤语流行曲在几十年的不懈经营中，经过新中国成立前的萌芽和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充分发展，在七八十年代达到它的全盛期，至今已成为香港地区的歌海主潮。歌曲内容由鸳鸯蝴蝶派的情歌艳曲到描写市民生活、抒发末世情怀，歌手由养生活命到对抗主流歌曲唱成歌坛大腕，听众由欣赏歌手到追逐歌星，音乐人由艺术创作到商业运作，香港流行乐坛经历了不少风风雨雨、是是非非。究其原因，它的繁荣首先是因为当地的社会、经济、科技有了长足的发展。尤其在社会方面，粤语流行曲适应了香港人的需要，反映了香港特有的社会意识形态，发挥了一定的社会功能。

一句话点评



流行乐之所以流行，必因其满足了年轻听众的需要。所以某一类音乐的流行，可反映当时青年的普遍心态和文化状况。流行歌曲都会有一种特殊的语言，香港粤语流行曲更是近代中国都会文化和流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全球华人文化不可或缺的部分。

都是大火惹的祸——“三一事件”



“三一事件”中被截在粉岭站的火车

关键词

关键时间 1952年3月1日
关键地点 九龙城东头村大火
关键事件 “三一事件”
《大公报》案 警民冲突
关键词汇 言论自由

背景扫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英国就开始实行两面政策：一方面承认新中国，但又炮制了“台湾地位未定论”，在台湾保留“领事馆”；另一方面又不断做出限制和封锁中国的行为。英国政府这种自相矛盾的两面政策，也表现在处理香港与内地的关系上。

港英当局除了在20世纪40年代末颁布了一系列限制华人行动自由的条例外，1950年4月又公布了新修订的移民条例，目的在于限制中国内地居民进入香港。同时港英当局还宣布香港与深圳边境为禁区，实行宵禁。1951年5月，又宣布实施《1951年边境封闭区域命令》，规定进出“封闭地区”必须领取通行证。这种敌视行为加剧了粤港边境上的紧张局势。

香港当局在限制华人行动自由的同时，还无理拘捕和递解了一大批华人出境，这些做法进一步恶化了港英当局与华人居民的关系。

脉络纵横



1951年11月21日，一把火在香港九龙城东头村燃起。这把火席卷并吞噬了5 000余间房屋，致使14 000余人流离失所。正是因为这把火，引出了下面的“三一事件”及之后的一系列案件。

火灾消息迅速传到内地，广东省各界对此十分关心，广州市的一些社会团体遂发动各界进行捐款，向香港汇款2.2亿元（人民币旧币），拨米3万斤救济灾民，并组织了“广东省广州市各人民团体慰问九龙城东头村受灾同胞代表团”，即“粤穗慰问团”，准备于1952年3月1日前往灾区慰问、救济。香港居民听到这个消息后欢欣鼓舞，组成了欢迎粤穗慰问团筹备委员会，决定于这一天派出代表200多人赴罗湖口岸迎接。港英政府听到这个消息后，却疑忌万分、如临大敌。3月1日，出动军警在罗湖、上水至尖沙咀一带布防，禁止慰问团来港，并在粉岭拦截欢迎慰问团筹备委员会代表乘坐的列车。粤穗慰问团为了慎重起见，临时决定延期出发，并请香港华商总会转告欢迎群众。筹备委员会负责人莫应淮无奈之下，从深圳返回香港。而此时派出欢迎的筹备委员会代表乘坐的火车已被拦截在粉岭，另有大批欢迎群众自发地聚集在尖沙咀火车站。在莫应淮对欢迎的人群说明情况后，群众对港英政府的行为极为不满，一时间群情激愤。当不满的人群陆续散开归家，在途经九龙弥敦道与佐敦道附近时，与警察发生了激烈冲突。港英当局派出军警进行严厉镇压，开枪射击并投掷催泪弹。纺织工人陈达仪腹部中弹后重伤致死，多人被流弹和硬物所击伤，警方还逮捕了100多人，判处18人有罪，12人被递解出境。因为事件发生在3月1日，遂被称为“三一事件”。

“三一事件”发生后，在内地和香港同时引起了强烈反响。3月4日，《人民日报》针对此次事件发表题为《抗议英帝国主义捕杀香港的我国居民》的短评，对香港当局提出抗议。同时还警告英国和香港当局“中国人民不容任何人任意欺侮”，如果一意孤行，不停止迫害中国人民，将会“碰得头破血流”。紧接着，香港《大公报》《文汇报》和《新晚报》都全文转

载了这篇短评，《大公报》还刊登了粤穗慰问团在广州发表的一篇声明，以及有关李特斯顿在英国下议院发表谈话的路透社新闻稿。报纸上的内容引起了轩然大波，一贯标榜言论自由的香港当局恼羞成怒，居然说这些报刊在英属殖民地内“刊载煽动性文字”，随即对《大公报》的所有人兼督印人费彝民、承印人鲍立初、编辑李宗瀛3人提出了控告。《大公报》诸人在接受传讯的过程中据理反驳，双方争持激烈，这就是继“三一事件”之后轰动香港的“《大公报》案”。

《大公报》的辩护大律师陈丕士形容被告等人是被法庭“蒙蔽着双眼”受审的。因为被告是先被邀请到警察总部，然后在那里被捕的，并且逮捕的依据也不是高等法官签署的逮捕状。另一辩护律师贝纳祺大律师亦指出，由于逮捕状是由裁判署法官签署的，而裁判署法官对于逮捕状的签署是“没有权宜决定之权”的，所以费彝民等人的被捕是非法的。因此这个案件直到审结为止，其所有诉讼程序都应该是无效的。陈丕士认为，《大公报》这样的行为是客观的报道而非存有所谓煽动意图，还力图证明《人民日报》的短评是没有煽动性的。港英当局理屈词穷，但仍然坚持对费彝民、李宗瀛处以了徒刑或罚金。港英当局还根据《管制出版统一条例》，宣判《大公报》停刊6个月，这是香港《管制出版统一条例》中规定的停刊最高期限。《文汇报》《新晚报》也因此次事件被通知候审。费彝民和李宗瀛在被宣判后，以法律程序不当为理由，向合议庭提出上诉，要求撤销控罪及在上诉期间中止执行停刊令。香港高等法院合议庭在5月13日开庭研究，裁定在全



>>“三一事件”中警察和群众在佐敦道口发生冲突

案上诉确定或续颁命令之前，中止执行停刊令。然而，上诉案最终仍被驳回。

“《大公报》案”发生后，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了严正声明。1952年5月10日，中国政府

外交部发表声明，抗议香港英国当局连续逮捕、驱逐和迫害中国居民，并无理勒令香港《大公报》停刊的暴行。同时还指出，1951年11月的大火和1952年4月30日九龙仔2 000间木屋被烧毁事件的发生都是离奇的，“香港英国当局不仅拒绝对这些受灾居民加以救济，反而有意对他们实行种种迫害手段，逮捕受灾人民，抢走救济衣物，使灾民无法生存”。在各方面的压力之下，港英政府对《大公报》的停刊令没再执行，《文汇报》和《新晚报》也没有再被起诉。

历史回响



“三一事件”和“《大公报》案”，是新中国成立后观察中英关系的一个重要线索，从中可以看到当时中国民族主义高涨的情绪。

一句话点评



当时内地与香港的关系显然深受国际形势的影响，东西方对立，壁垒鲜明。香港处于东西方的夹缝中，具有很强的政治敏感度。

聚财散财皆有道

——霍英东首创卖“楼花”



1978年的霍英东

关键词

关键时间 1954年12月
关键人物 霍英东
关键词汇 预售“楼花”

背景扫描



1946年5月，经验丰富的杨慕琦返回香港复任港督，使香港进入一个恢复活力的重建时期。50年代开始，香港出现了一次历史性的转变，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由转口港发展为制造业中心，进入了一个工业化的阶段。

随着经济的发展，香港人口与日俱增。香港地域狭小，居民居住条件恶劣，有人说香港居民像住在白鸽笼里，也有人说香港居民的住所像火柴盒。

一方面是民用住宅楼宇供不应求，另一方面是写字间、办公楼奇货可居。朝鲜战争爆发以后，香港经济处于起飞状态，由于香港作为开放的自由港，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经济条件，使之一举成为远东的“冒险家的乐园”和“投机家的天堂”。各种国籍、各种肤色及各种经济实力的人纷至沓来。三山五岳人马聚集，九州百国商贾齐汇。正所谓：鱼龙混杂，各显神通。办厂经商者有之，买房置地

者有之。

生逢此时，怎能放过这个发财的绝好时机！这个时候，传奇人物，有着“红色资本家”之称的霍英东从海上转战陆地，开始进军香港房地产市场，一出手便不同凡响。

脉络纵横



“楼花”一词最早源自香港，是指未完工的物业。如果把开发公司已建成的房屋看成是果实，那么开发公司的在建工程则可看作是花。由此进一步引申出买“楼花”、卖“楼花”、炒“楼花”等概念。一般称卖“楼花”为预售房屋，买“楼花”为预购房屋。卖“楼花”这一概念，就是已故爱国港商霍英东首创的。

霍英东的祖籍是广东番禺，年少时的霍英东家境贫寒，经历坎坷。家境的贫寒让霍英东很早就进入社会谋生。早年的艰辛和挫折，并没有打垮霍英东，他在不断的失败中取得经验，积蓄起力量，等待着机会，他坚信自己总有崛起的一天！

霍英东先帮母亲打理生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百废待兴，香港经济逐渐复苏，对运输业需求急增，霍氏母子决定把钱全部投资船运生意。

20世纪50年代初，朝鲜战争爆发，这成为霍英东一生的转折点。当时美国控制的联合国对新中国实施禁运，中国政府为突破封锁，联系海外华



>>霍英东

商供应物资，协助抗美援朝。拥有十多艘船和一家修船厂的霍英东，成为国家的重点争取对象。霍英东冒着极大风险，每天指挥船队将物资及医疗用品运往内地。这样，霍英东不仅获得了“第一桶金”，亦与中央政府建立起非同寻常的良好关系。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霍英东预测，香港的发展，必将促进商业及住宅楼的开发。于是他抢先把经营重点转向了房地产开发。1954年12月，霍英东拿出自己的120万港元，另向银行贷款160万港元，

在香港铜锣湾买下了他的第一幢大厦，并创办了“立信建筑置业有限公司”。开始，他买旧楼，拆了后建成新楼逐层出售。这样虽然可以稳妥地赚钱，可是由于资金少，发展比较慢。一个偶然的事件令霍英东得到启发，他决定采取房产预售的方法，利用购房者的定金来盖新房。这一创举使霍英东的房地产生意顿时兴隆起来，一举打破了香港房地产生意的纪录。当别的建筑商也学着实行这个办法时，霍英东已经聚集了巨大的财富。他当上了香港房地产建筑商会会长，有会员300名，拥有香港70%的建筑生意，所以有人把霍英东称为香港的“土地爷”。

1961年，霍英东又与何鸿燊、叶汉及叶德利等人联手，成立澳门旅游娱乐公司。当年即投入大量资源发展配套设施，包括购置快船，方便港澳两地交通，吸引更多客源，同时斥资约7 000万港元，兴建海上赌船及号称全世界最大的赌场葡京赌场等。2002年，霍英东又将价值约60亿港元的股份全数拨入“霍英东基金会”用于慈善事业。

霍英东的前半生，是一部“白手兴家”的致富传奇。从出身寒微的“趸家仔”、渡轮上的加煤工，到发明房产预售的“土地爷”、坐拥数百亿资产的大富豪，如此成功聚集财富的故事，足以成为发家致富的行动指南。霍英东的后半生，是一个“千金散去”的慈善经典。从“一公斤黄金重奖奥运冠军”、捐资兴建体育医疗教育设施，到成立慈善基金会、策划数以百计的资助项目，如此散出财富的动人故事，足以成为善对财富的富人楷模。

无论是聚财还是散财，霍英东念兹在兹的都是国家的富强，民族的振兴。他在内地的投资收益，全都用于内地的再投资和捐赠。他独具慧眼，关注的不仅仅是项目的回报，还有因此产生的深远影响。白天鹅宾馆是内地与香港合资的第一家五星级酒店，他坚持由中国人来管理，从而引领了内地的酒店业走向现代化；兴建洛溪大桥、沙湾大桥，不仅使家乡番禺路通财通，也使新型的融资建桥模式蔚然成风；庞大的南沙开发计划，在珠江三角洲兴建一座面向世界的现代化滨海城市，更是他晚年的最大梦想。他所捐赠的项目，也总是眼光独到。他关注的不仅仅是项目惠及何人，还有因此带来的社会效益。他捐资千万元给广医一院呼研所重症监护室，在抗击“非典”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后来，他又捐出500万港元用于中医药人才的培养，因为他高度认同中医药的疗效；他开始赞助“五羊杯”象棋



>>邓小平会见霍英东

赛，历经二十多年不辍，因为他认为象棋是国粹，是民族瑰宝，值得向世界推广，应该在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

“我不单只是自己赚钱，还帮别人赚钱……我敢说，我从来没有负过任何人！”

作为商人，霍英东聚

财有道而问心无愧，不带保镖只身独来独往，这是多少富豪难以企及的境界！

“我的捐款，就好比是大海里的一滴水，作用是很小的，说不上是贡献，这只是我的一份心意！”作为爱国者、慈善家，霍英东散财有道而淡然处之，乐施好善且不求闻达，这是多么令人景仰的德行！

2006年10月28日，杰出的社会活动家、著名的爱国人士、香港知名企业家、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中华总商会永远名誉会长霍英东先生，因病在北京逝世了。他传奇而经典的一生，留下的不仅是金钱和桥梁、工厂、医院、学校、体育场……还有他的拳拳爱国之心、聚散财富之道，这是弥足珍贵的精神遗产，可谓“霍生已逝，高山仰止”。

历史回响



霍英东先生出身贫穷，早年丧父，少年辍学，虽迭遭厄逆阻滞，但坚毅奋发，创新勇进，最终功成名就，成为受世人尊重的商业巨子。霍英东先生爱港、爱国，受到包括政见不同的香港各界人士的认同和赞扬。霍英东先生一生以振兴中华为志业，以高尚人格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他的梦想就是见到国家兴旺，民族富强。霍老以身为中国人而骄傲自豪，对国家的

前途充满信心，他对国家的爱只讲付出，不计得失。

一句话点评

著名书法家启功老先生曾赠霍英东先生一条幅：“嘉树长垂百亩荫，
育才从古胜赢金；杜陵广厦峥嵘际，最见怀乡爱国心。”确是精当之评。

“毕生的事业与名誉” ——金庸与《明报》



《明报》
第一期

关键词

- 关键时间 1959年
关键人物 金庸
关键事件 《明报》创刊
关键词汇 《明报》 新派武侠小说

背景扫描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报业逐渐复苏，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得以发展。报纸的数量增多，编排手法和印刷技术不断改进，彩色时代已经到来。这期间，香港经济开始发展并日趋繁荣，更为报业的蓬勃发展提供了条件，一批以本地意识为价值取向的商业报纸脱颖而出，成为报业的主流，其中尤以大众化的报纸影响最大。它们以赚钱为目的，奉行“在商言商”的宗旨，迎合读者的需要，提供不少消遣娱乐的内容和社会环境方面的信息，但同时对社会风气和各层次的读者，也产生了负面影响，对青少年影响尤甚。

在香港大众化报纸走俏的同时，严肃报纸也在发展。严肃报纸又称“精英报纸”“高级报纸”。它的主要特色是：办报方针严正，关心社会事务，重视分析评论，热心为读者服务；内容比较严肃，注重政治、经济、国际关

系、社会福利、文教科技内容的采编，不搞煽情内容；在经济上独立稳定，有较高的采编水平，读者多为上层社会人士、知识分子。在香港这样的“花花世界”，“报格”较高的严肃报纸能够生存，主要是因为它们创出了自己的特色，1959年创刊的《明报》就是一个代表。

脉络纵横



金庸原名查良镛，1924年生，浙江海宁人，曾在中央政治学校外文系学习，年轻时的志向是当一名外交官，后曾在东吴大学选修国际法。1946年兼职上海《大公报》翻译，1948年奉调到香港《大公报》，做国际电讯翻译，并编国际新闻，后转至创刊不久的《新晚报》编副刊。他以“姚馥兰”和“林欢”为笔名写的影评，登在《新晚报》的“下午茶座”专栏，很受读者欢迎。1957年，他离开《大公报》进入长城电影制片公司做编剧。1959年与其中学同学沈宝新合股，在香港注册了一份报纸，这就是《明报》。注册资金一共是10万港元，金庸占80%的股权，沈宝新占20%。这样的股权比例一直维持到20世纪90年代。金庸还请当时香港最有名的书法家王植波题写了报名，并一直沿用至今。

初期的《明报》是一份四开四版小报，头版是时事新闻，第二版是娱乐消息，第三版是小说连载，第四版是社会新闻。办报人本想定位在中间路线，但在版面上显得有些杂乱，既有严肃大报正经的社评，又有小报路线的香艳小说，风格很不一致，初期销量一般，经营一度发生困难。《明报》初期全部员工仅有三四人，最困难时只剩下金庸和沈宝新两人惨淡经营。正如香港作家、金庸的好友倪匡所说：“《明报》不倒闭，全靠金庸的武侠小说。”当时金庸的武侠小说已拥有大量读者，许多人为了看金庸的武侠小说，开始关注《明报》。慢慢地，金庸的武侠小说为《明报》打下了基础，加上沈宝新的苦心经营，《明报》的广告业务稳步上升。

20世纪60年代初，《明报》一改风格，从一份侧重武侠小说、煽情新闻和马经的“小市民报章”，提升到一份以读书人、知识分子为对象的报纸。1962年7月，报纸销量超过3万份。到1963年，《明报》平均日销量已



>>1981年7月18日，邓小平接见金庸

达5万份。

基于延续中国传统文化的考虑，金庸于1966年创办《明报月刊》，自任总编。后胡菊人出任总编，长达13年。1968年，又创办《明报周刊》。

1988年，《明报》日销量已达11万份，1989年跃升到18万份。除了《明报》《明报月刊》《明报周刊》外，明报机构尚有一份《明报晚报》。金庸还成立了明报出版社和明窗出版社。1991年1月23日，明报机构注册成“明报企业有限公司”，并于当年3月22日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明报集团1990年度的盈利高达7 000万元，到1991年度接近1亿元。金庸也成为中国历史上“以文致富”的第一人。1991年，他以12亿的身家，被《资本》杂志列为香港华人亿万富翁之一。1993年，金庸已拥有财产24亿港元。

金庸希望将《明报》办成全世界最好的中文报纸，无论是在编辑委员会，还是行政委员会，长期担任家长角色的他都是最高决策者。但在1992年2月，金庸主动将鼎盛时期的《明报》的控股权转让给商人于品海。次年4月1日，于品海取代金庸出任明报企业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金庸主政《明报》的年代到此结束。1994年，金庸又辞去了名誉主席职位。

金庸的成就不仅在于《明报》，还在于其武侠小说的创作。金庸最初写武侠小说时，是在《新晚报》任职期间，报社负责人为了刺激销量，安排梁羽生和金庸撰写武侠小说，二人从此声名鹊起，金庸因此而成为新派武



>>法国驻香港总领事代表法国总统给金庸颁授“荣誉军团骑士”勋章

侠小说的宗师。从1955年开始写作到1972年挂印封刀，金庸创作出了多部受人欢迎的武侠小说，代表作有《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等。封笔之后，金庸对近二十年所写的武侠小说逐字逐句地进行修改。经过10年的修订，一套15种共36册《金庸武侠小说全集》终于出版。

中国武侠小说百年发展的壮丽风景，由“十大宗师”的作品构成，当中最为辉煌的当是金庸、古龙、梁羽生三位大师的新派作品。而其中又以金庸的武侠小说为巅峰，他的作品妙

语生花、情节细腻，不仅风靡全球华语社会，还有英语、日语等多国语言译本。同时，金庸小说也多次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剧、广播剧、舞台剧和电脑游戏软件。

这正是：“武林”至尊，唯数金庸；风行天下，谁与争锋？

由于成就斐然，金庸所获荣誉甚多，包括：1981年英国政府O.B.E.勋衔，褒扬其对新闻事业及小说写作的贡献；1986年香港大学社会科学荣誉博士，表彰其对社会工作及文学创作的成就；1988年香港大学文学院中文系名誉教授；1992年法国“荣誉军团骑士”勋章；1994年北京大学名誉教授；1996年剑桥大学荣誉院士等。

历史回响



金庸曾视《明报》为其“毕生的事业与名誉”，是他“对社会、对朋友、对同事的责任”。如今，无论是在中国台湾还是在海外，无论是在政界还是在文化界，《明报》都保持着较大影响。可以说，《明报》与武侠小说，成就了金庸“毕生的事业与名誉”。

一句话点评



金庸的武侠小说创造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奇迹。上自政府首脑要员、文人墨客、学者教授，下至农夫、民工、小贩，从中国到美利坚，只要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层出不穷的金庸迷。

不愿做人愿做马 ——香港赛马会与赌马



华人参与赛马会

关键词

关键时间 20世纪60年代以来

关键人物 麦理浩

关键事件 香港赛马会成立

关键词汇 香港赛马会 赌马

背景扫描



赌马是香港唯一合法的，也是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最大众化的赌博，它已经成了香港市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香港的赛马，并非当地的“土特产”，它是随着英军的侵入而来的。英国于1842年割占香港后，曾借用澳门的黑沙湾马场举办第一届赛马会。其后港澳关系曾一度冷淡，停赛数年，至1848年才开始在香港本岛举行赛马，但早期只是纯粹的赛马，不以马作为赌博工具。19世纪末开始赌马，起初只是骑师与骑师之间或马主与马主之间赌，赌资仅限于一瓶香槟或一顿晚餐。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赌马仍不普遍，纯属欧洲人和“高等港人”的游乐项目。20世纪50年代以后，赌马才逐渐成为大众化的活动。

脉络纵横



赌马之于香港，是生活中的一大盛事。随手翻开香港的报纸，“马经”比比皆是。酒肆茶楼，谈经论马之声不绝于耳。每逢赛日，马场内外人头攒动，人声鼎沸。转瞬之间，有人千金一掷，全军覆没，倾家荡产；有人马场得意，侥幸取胜，立成豪富。自升斗小民至百万富翁，可称得上“马迷”者估计有数百万人。赛马已成了香港人进行合法赌博、寻求娱乐刺激的最广泛的一种方式，也是香港人最喜爱的一项活动。香港居民对赌马的狂热程度远远超过对任何体育、文艺、娱乐活动的关心。即使是香港最盛的足球运动，一场精彩比赛也只能吸引一两万球迷观众捧场而已。这一切，莫说内地普通大众不易理解，即便是“老香港”也大有今不如昔之感了。

香港最早举行赛马的地方是在黄泥涌，因为英国人在此修建了跑马场，故又有“跑马地”之称。它的英文名称为快活谷 (happyvalley)，这是英国人占领香港后才起的名字。初期的赛马，只是一种带有娱乐性的体育活动，有跳栏等马术竞赛，而且一年只跑一次，称之为“周年大赛马”。这种周年大赛的习惯一直持续到1921年。当年筹办大赛的赛马委员会，只是在赛前两个月才组织起来的临时机构，赛后即停。直到1884年，才成立了永久性的机构——“香港赛马会”，会员177人，都是外国人，其中以欧洲人为主，



>>20 世纪 20 年代跑马地赛马盛况

且多为各洋行的大班、政府要员。因此，马会实际上成了这些高层人物的社交场所。

香港的赌马始于1891年。但是，初期的赌马规模不大，博彩不多，招商承办者连年亏本。由于华人受排斥，于是若干华商和买办发起组织华人赛马会，准备在香港买地建马场。时值省港大罢工，为了拉拢华人绅商，港督金文泰示意马会让华人参加赛马，于是买办何甘棠、容显龙在1927年相继入会。至此，才打破马会会员是清一色外国人的局面，华人马主和骑士就是在这一年开始出现的。但是，直到20世纪20年代末，香港的赌马仍未能普及。究其原因，与马场一切皆用英文不无关系。此外，入场券也很贵。据查，当时的公众棚入场费为每位1元，赌马投注起码金额则为5元，（相当于一个普通市民一个月的伙食费）故一般的小市民多不敢问津。至1934年，全日的投注总额也只有10万左右。令香港赌马趋于发展，并日益引起公众兴趣的，是1931年开始发行的大马票。这是一种用摇彩与赛马两种形式混合投注的彩票，每票2元。彩票上印有号码，先用搅珠的办法搅出几十个号码，作为入围号码，然后再从这些号码中搅出十多个，配上某场指定的赛马的马匹，以跑第一的那匹马所配的号码为头奖。以此类推，再分设二、三奖，其余的作为入围奖。在某方面有点类似于现在“购物有奖”的形式。据该年通过的竞博税条例规定，马会举办的赛马摇彩马票全部收益扣除纳税后，派彩不得少于72%。以1931年为例，中头奖的可获10万元，而当时一般工人的薪金每月仅10元而已，可见数目之大。马会正是利用人们这样一种以小博大、侥幸取胜的心理，使大马票成了最畅销的彩票，直到1977年停止发行为止。

在香港赛马史上，两次世界大战对它产生过很大的影响。特别是日军占领香港，是香港赛马史上的又一个转折点。日本人一反英国人的做法，马匹名称一律改为中文，赛跑制度则改行公制，中文报纸也开始出现“马经”专栏。战后恢复赛马，终于出现中英文并列的制度，一直持续至今。这些变化对后来的赛马深入普通市民中不无关系。

1947年元旦，香港恢复赛马。此后香港的赛马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1951年，马场新建看台，首次安装电子计算机正式启用；1957年马场加建七层高的现代化看台；1959年香港赛马会（慈善）有限公司成立；次年，

香港赛马会加上了“英皇御准”的头衔。

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香港赌马的变化更大，形式也五花八门，无奇不有。马场赛事牵动着数百万港人的心，也造就了新闻史上的奇观——香港的“马文化”。目前，专门报道赛马的各式各样的报纸杂志竟达22种之多，还有30多种报纸辟有专门的“马经”专栏。信手翻开报纸，赛前有预测，赛中有评论，赛后有总结，什么“马场情报”“马国纵横”“马房消息”“马主日记”“马人茶座”“马圈搜秘”等等，不一而足。场外投注站也从20世纪50年代末盛行起来，目前已遍布港九各地达128个。正是所谓“投注站多过米店”，赌马已深入到社会各个阶层。投注形式有位置、连赢、独赢、孖Q、孖宝、三宝、三重彩、四重彩、六环彩等等，甚至有场外电话投注，远居国外的马迷也可用长途电话通过电话户头投注。

香港赌马之风日甚一日，原有跑马地马场已难以满足需要，因而马会提出兴建沙田跑马场。1978年10月7日，经港英政府批准，历时7年，共填海250英亩，耗资近7亿港元，可容纳3万多马迷的沙田马场终于建成启用。是日，港督麦理浩主持开幕典礼，仪式颇为隆重。这个新的大型马场，一切设施都高度现代化。耸立在会员席对面的电子控制的巨型显示牌，能将每一匹马的瞬间变化显示出来。连马厩也装上了冷气设备，除了有专人服侍外，并有闭路电视等保安监视措施，据说赛前还要为马匹播放轻音乐松弛神经，以免马匹过度紧张。不仅如此，还有专门的马医院，马医院内有手术室、X光室、化验室与钉马蹄铁的工场等等，一应俱全，其设备之精良，条件之优越，服务之周到，令人叹为观止。如此“天之骄子”，难怪香港有人在报上撰文，发出“不愿做人愿做马”之感叹了。

历史回响



现在，赛马在香港仍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快活谷与沙田马场经常是座无虚席。以此为娱乐者有之，赌博者有之；毁者有之，誉者有之。赛马会影响很大，俨然成了香港的“统治者”。目前香港赛马会会员已达18 000人，大都是非富即贵的人士。而赛马会董事会的12名董事，则是香港最有

影响的人物。前任港督麦理浩曾经在港府的一次例会上重提这样一句旧话：实际统治香港的是马会、怡和、汇丰和港督府，而且排名分先后。这并非纯属笑话。试想，在香港除了马会和赌马以外，谁还有如此号召力，令数以百万计的市民如此为之投入，如痴似醉呢？

一句话点评

香港回归祖国后，由于其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将保持50年不变，因此“马照跑、股照炒、舞照跳”。快活蹄声，悠悠百年，实在令人感慨良多。

粤港共饮东江水

——东深供水工程的修建与改造



1963年香港旱灾，石硖尾徙置区居民排队等水

关键词

关键时间 1964年2月20日

关键事件 东深供水工程的修建与改造

背景扫描



“月光光，照香港，山塘无水，地无粮；阿姐担水去，阿妈上佛堂，唔知几时没水荒。”这是20世纪60年代初在香港流传的一首民谣。香港地处珠江出海口，三面环海，由于缺乏天然湖泊和河流，年降雨量又不均，以前经常闹水荒，港民饱尝缺水带来的种种苦处。

人民的 life 需要水，工农业生产需要水，社会的发展离不开水。港英政府为了解决淡水资源的不足，曾采取了种种措施，虽有所缓解，但成效都不大。进入60年代以后，要在香港这个狭小之地解决好生活、工业用水及外轮供给，仅靠本地有限的资源已不可能。第23任港督柏立基首次打破依靠本地资源解决用水困难的传统思想，力排“不吃内地水”的荒谬论调，提出了向广东要求供水的主张。

此举实属明智。1960年4月15日，港英政府终于派出以署理工务司方世富、副工商处长巴梯等人组成的代表团前往深圳，就深圳水库供水港九问题与宝安县举行正式会谈。同年11月15日，双方在深圳就供水问题举行了隆重的签字仪式。此后，深圳每年向香港供水50亿加仑。广东省还同意港英当局派船到珠江运水，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香港的缺水状况。

脉络纵横



东深供水工程是为解决香港、深圳特区的用水紧张而建设的，纯净的新丰水汇入发源于江西的东江，经东江左岸的东莞桥头镇太园一级抽水站，穿越石马河进入东深渠道，然后注入深圳水库，再通过涵管进入香港的供水系统。它始建于1964年2月，是一项以供应香港、九龙地区用水为主要目标，同时对深圳地区供水并兼有灌溉、排涝、发电和防洪等效益的综合利用水利工程。

1963年，香港遭遇了六十多年来最严重的一次干旱，6月13日，港英政府不得不宣布“制水”，市民每4天供水一次，每次只供水4个小时，350万



人的生活顿时陷入困境。港英当局关闭了居民家中的自来水，只开通了街头为数极少的供水站，定时定量供水。整个香港经济也面临着巨大灾难。据报道，严重的水荒使许多外国观光客过门不入，纺织业也因缺水减产30%~50%，农业损失了

>>1963年香港旱灾，港府控制供水，居民在街头排队等水

1 000多万港元，134个行业因停工减产损失达6 000万港元，饮食业更是大受打击。

香港的水荒，引起了中国领导人的极大关注。1963年5月25日，广东省省长陈郁发表讲话，表示可以向香港免费提供淡水。此后，广东省与港英政府就向香港供水问题进行了多次磋商。为了彻底解决香港同胞用水的困难，广东省人民委员会决定兴建东江—深圳供水工程，从东江引水供应香港。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也及时过问由东江引水到深圳的供水工程，并给予了极大的支持与关怀。在周总理的支持下，由中共广东省委和省政府负责组织，广东省水利部门以极高的工作效率完成了东深供水工程的设计。

1964年2月20日，东深供水工程全线开工。经过近1年的施工，完成了土石方200多万立方米、混凝土及钢筋混凝土10万立方米，安装大型抽水机设备33台（套）、各种闸门和启闭机设备100多台（套），架设高压输电线路140千米，并兴建了两座大型变电站。

经过万余人11个月的大会战，一条倒流的东江支流，北起东莞市桥头镇，经过八级电力提水，翻山越岭，跳跃而上，然后进入深圳水库俯冲而下，再经过3.5千米长的输水涵管，清澈的东江水流经83千米后，注入香港的千家万户。香港严重缺水的历史终于暂告结束。

其后，为了满足香港随经济发展和人口增加而不断上涨的用水需求，东深工程于20世纪70年代、80年代、90年代分别进行了3次扩建，规模一次比一次大，累计耗资20亿元，开挖的土石方总量可以筑起一道从深圳到北京，10米宽、1米高的道路。至1994年3月扩建工程竣工投产，对港供水能



>>>1963年香港旱灾，由于四天供水一次，市民都忙于排队等水

力已从首期的6 800万立方米增至11亿立方米，相当于首期工程的17倍。

然而，随着香港及工程沿线地区对供水的依赖性增大，历经3次扩建的东深供水工程仍不能满足香港日益增加的用水需求，尤其是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口的大量增加，原河道两岸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结构得以改变，水质污染问题日趋突出。怎么办？2000年8月，经广东省和国家有关部门批准，东江—深圳供水改造工程顺利开工。在中共广东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广东省水利厅擢英选杰，严格遵守各项法律法规，确立了建设“安全、优质、文明、高效的全国一流供水工程”的总目标。经过3年艰苦卓绝的设计施工和科学的管理运作，工程于2003年6月顺利完工，提前两个月正式向香港供水。改造后的东深工程舍弃了原来的旧河道，建造了一条崭新的、接近全封闭的通往香港的河道。这条人工河道宛若东江的天然支流，为香港注入了一脉原生态淡水。人类普遍面临着的缺水与污染这两大世界性难题，在香港地区得到较好的解决。

我国政府一直高度重视东深供水工程，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曾亲临东深河畔。四十多年来，东江两岸人民为了确保香港同胞喝上放心水，避免水质污染，制定了切实有效的保护措施，保证了东江水始终碧绿如初，达到国家地面水的二级标准。

历史回响



提起东江水，香港居民无不自内心发出感激之情，因为自1965年3月东江之水越山流入香港之后，香港从此摆脱了水荒。如今，拥有约700万人口的香港，淡水用量一年高达10多亿立方米，其中70%来自东江水。无怪香港知名人士霍英东曾深情地说：如果没有东江水，就没有香港今天的繁荣安定，香港可能会变成“臭港”。港英统治时代，每任港督到任不久，总要到东深供水工程去拜会一番。前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回忆录中谈到香港问题时，也提到东深供水工程是保障香港居民生存和香港繁荣的特殊工程。

“东江情深，水利港人，同饮东江，粤港共荣。”源源不断的东江水，为香港经济的腾飞提供了无尽动力。东深供水工程的成功建设，是粤港两

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具体表现，对正在开展的泛珠三角合作，极具鼓舞和借鉴意义。

一句话点评



1997年7月1日，香港顺利回归祖国了，滔滔不尽的东江水一路欢歌流向香港。香港和内地一水相连，唇齿相依，这碧绿的东江水就像纽带，把两地人民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我们祝愿香港、内地共同繁荣昌盛，两地人民的友情也像这东江之水源远流长。正可谓：一江碧水，紫荆花根深叶茂；两岸亲情，香江畔花好月圆。

邵逸夫与其影视王国



邵逸夫

关键词

关键时间 1967年11月19日
关键人物 邵逸夫
关键事件 香港无线电视开播
关键词汇 邵氏影视王国

背景扫描



早在1924年，邵氏四兄弟（老大醉翁、二弟仁棣、三弟仁枚、六弟仁楞即逸夫）就在中国第一商业大都会上海创立“天一公司”，从事电影事业。因竞争激烈，1928年，明星公司联合其他五家公司组成“六合影片营业公司”对它进行抵制、围剿。天一的应付之道是，一方面拍粤语片与有声电影，另一方面另谋出路，由三弟邵仁枚远赴新加坡，找寻新的商机。这一走，想不到竟成为日后邵氏王国建立的契机。邵仁枚在新加坡成立海星影片公司，其后六弟邵逸夫从上海前来协助，苦心经营组建戏院，共同成立“邵氏兄弟有限公司”。1934年，邵醉翁到香港设立“天一影片公司”拍摄粤语片，1937年，香港“天一”改为“南洋影业”。

1957年，邵逸夫到香港买下地处清水湾的一块土地，兴建亚洲最大的制片厂“邵氏影城”，次年成立“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1983年后，由于电视产业的兴起，

邵氏兄弟公司基本停止了拍摄电影。邵逸夫本人转而成为香港最大的电视机构的总裁，邵氏的片厂也大半用于拍摄电视节目。

脉络纵横

1967年11月19日，一个电视王国在香港诞生了。40年来，这个王国在渐渐扩张，越来越有力地渗透到华人聚集的地方，濡染着民众的文化，丰富了民众的生活，带给了民众许多乐趣。20世纪70年代初，它渐渐羽翼丰满，制作的节目常年占据着香港电视收视率的八成左右。它有两只巨翼，一是翡翠台，一是明珠台。

时至今日，邵氏影视王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华语节目制作中心。它的业务包括电视广播、收费电视、节目制作、动画代理、卫星电视、杂志出版及其相关业务。其中文全称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英文全称为Television Broadcast Limited，缩写为TVB，在港澳地区及广东人们喜欢称它“无线电视”，因为它是香港首个商营无线电视台。

这个电视王国的产生、发展、成功、辉煌，是与一个人休戚相关的，这个人就是邵逸夫。

邵逸夫是香港十大富豪之一，但在香港的众多富豪中，他可以说是唯一的一位艺术家。他是香港艺术中心和艺术节主席，香港影业协会主席，香港制片人协会主席，香港中文大学董事会董事，香港红十字会及多个文化公益团体的负责人。他还有香港大学和中文大学的名誉博士头衔。由于他在电影文化事业上的突出贡献，1974年英国女王授予他CBE勋衔，在他古稀之年时又授予他爵士爵位。

作为一名艺术家，邵逸夫是怎样构建TVB这样一个庞大的电视王国的呢？

邵逸夫电视王国的传奇，是从邵氏电影王国开始的。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电影业刚刚起步，竞争激烈。1927年，邵逸夫被派往东南亚开拓电影市场。当时，邵逸夫等人带着简单的行李和一架破旧的无声片放映机，在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奔波，放映和推广他们拍摄的国语影片。开始是

在露天放映，后来进放影院，最后建立了完整的电影发行网。

虽然在东南亚取得了成功，但当时他们拍的还都是无声电影，而美国等发达国家已开始风行有声电影，邵逸夫决定赴美留学，学习拍摄有声电影。回国后，邵逸夫拍出了第一部有声电影《白金龙》，此后，他们的有声电影在南洋风行一时。到抗日战争爆发时，邵氏兄弟已经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越南、泰国及我国香港、台湾等地拥有近140家影院和9家游乐场。后来，邵家的电影公司为扩大发展，分离出了一家公司，起名为“邵氏兄弟有限公司”，总部设在香港，邵逸夫成为这家公司的负责人之一。

邵逸夫还首创开拍武侠片，《大醉侠》《独臂刀》《金燕子》《梁山伯与祝英台》等影片在当时都创下了很高的收视记录，蜚声东南亚。1972年，公司拍摄的《天下第一拳》在欧美和亚洲市场引起轰动，成为当年全美7大卖座片之一。《天下第一拳》与其他一些著名功夫片，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学习中国武术的热潮。

敏锐的眼光、开拓进取的精神、多元化的经营是邵氏影业成功的秘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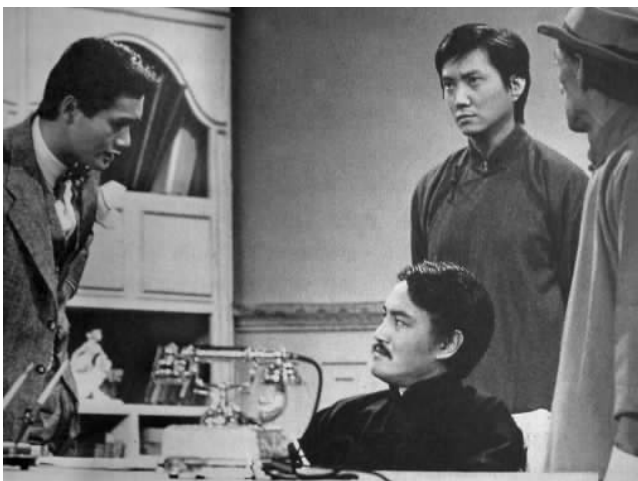


>>20世纪60年代常见在街上集体看电视的场面

早在20世纪60年代，邵逸夫就高瞻远瞩地觉察到，作为一种新兴事业，电视方兴未艾，前途不可限量。香港政府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公开招标竞投无线电视经营权时，他捷足先登，与别人合伙一举夺标，办起了香港无线电视台。起初，无线电视台与亚洲电视台并驾齐驱，难分高下。1980年，邵逸夫以最大的私人股东身份出任香港“无线”董事局主席。随后他集中力量经营所属的明珠台和翡翠台，使“无线”的收视率长期在香港稳居第一，影响扩及全世界华人社会。从TVB创办至今，它吃进了世间亿万财

富，回报以大量的新闻资讯节目和无数脍炙人口的电视剧集，以及一批又一批在演艺界呼风唤雨的明星，让人们得到了视听的享受。

近几年来，随着电视技术的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有线电视业开始兴起。邵逸夫紧追潮流，积极部署向有线电视业进军，1991



>>>无线拍摄的电视剧《上海滩》剧照

年开业的香港有线电视台和有线电视通讯网络，他就占了10%的股份。与此同时，邵逸夫还投资房产物业、股票市场等，开展多元化经营。邵逸夫现已名列香港十大超级富豪榜，曾有记者问他到底有多少财产，邵逸夫自己都说不清楚。不过据知情人估计，他的财产总数当在90亿港元以上。香港素为富商大贾云集之地，但以经营影视业而步入香港富豪排行榜前列的唯有邵逸夫一人。

作为一个有钱的艺术家，邵逸夫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就大量捐助文教卫生事业。他于1958年在新加坡设立了“邵氏基金”，每年都捐巨款资助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文教医疗机构。香港的大专院校，包括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浸会大学、香港理工大学等无一没有接受过邵逸夫的捐助。1987年，他给南京大学、南开大学、西北大学、云南大学、华中师范大学、西南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浙江师范大学等十所内地大学各捐赠1 000万港元，用于兴建图书馆或科学城。1990年，他又捐赠7 000万港元，在宁波修建医院。据估计，多年来，邵逸夫以邵氏基金的名义捐出的款项就达8亿多港元，这充分反映了他对国家、对社会、对同胞的满腔热爱之心。

1990年5月，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将新发现的一颗小行星命名为“邵逸夫星”，这是该台首次以当代知名人士命名小行星。

现在，香港的电影业早已经是群雄并起了，对于曾经在香港电影界呼风唤雨的邵逸夫来说，虽然他的香港电影霸主地位已不在，但他不必为此有任何失落感，因为，他的影视基业在香港这样的商业氛围中运转依然，他的名字也将与辽远宇宙中的群星一样，光辉灿烂。

历史回响



邵逸夫在中国影视史上写下了诸多“第一”和“之最”，他可以说是中国影视业的拓荒英雄。从电影到电视，从黑白到彩色，中国影视的每一步变迁都凝聚着邵逸夫及其家人的心血。从20世纪20年代从事电影业到现在的电视业，邵逸夫经历了不同时代的变迁，目睹了中国影视的成长与兴衰，堪称中国影视史的见证人和中国电影事业的开创人。同时，邵逸夫又是一个杰出的商人，香港学术界曾把他选为“最成功的十大企业家”之一。有人问邵逸夫的成功之道是什么，他回答说：“我这个人对成功的界定是努力工作和灵巧应变。每个人必须努力赶上时代，认真工作，全力以赴，贯彻始终。”

一句话点评



邵逸夫秉承了中国人代代相传的重视教育的传统。作为一个有数十年艰苦创业经验的商人，他深深体会到，中国的发展，教育为本。多年来如此热心于教育事业，源于他常与周围人交流的一个宏愿：“中华民族要繁荣昌盛，扶助教育，启迪青少年智慧，广育中华英才，至关重要。”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是邵逸夫一生的写照。

香港学生保卫钓鱼岛运动



中国保钓船在钓鱼岛

关键词

关键时间 1971年2月14日 1971年4月10日
关键人物 香港学生
关键事件 “四一〇”事件 “保钓”运动

背景扫描



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由于帝国主义的干扰，中国的统一始终是一个未能完全解决的问题。但中国内地在社会主义建设及政治上的发展，打破了不少外界的歪曲谣言，不单日渐受到西方的重视，也使部分海外知识分子增强了民族自信心，以至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回归国土”成为新的话题。另外，由于港英政府改革旧式殖民统治方式，以怀柔手段推广教育。大学生平民化和大学生社会阶层复杂化，也促使大专学生加深了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和对社会不平等的认识。随之出现了一些团体，积极参与校政改革及社会活动，不少学生开始寻找一种自我民族的认同感，民族意识不断增长。

就在此时，纷争已久的钓鱼岛主权问题再一次提上日程。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但日本亦声称拥有主

权。20世纪70年代初，由于钓鱼岛附近海域发现了丰富的石油资源，更激化了钓鱼岛主权的争端。出于爱国热情，1970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台湾留学生首先发动“保卫钓鱼岛运动”，表示“反对美日私相授受”“外抗强权，内争主权”。这一运动随即遍及世界华人社会，也在香港点燃了火花。

脉络纵横



1970年，美日商议归还冲绳列岛时，竟然把钓鱼岛亦列入归还范围。此事为海外中国人得知，他们立即表示反对，而留美中国学生更开始组织大规模的“保钓”运动。1971年1月29日，2 500名中国留学生于联合国总部外举行保钓示威，喊出第一声“中国领土钓鱼岛不容侵犯”。自此，声势浩大的“保钓”运动浪潮传至香港，传遍世界。运动初期，香港的“保钓”运动只有少数团体参与，影响并不大，但在学界的反应却日益明显，“保钓”成为学生间的热门话题，越来越多的大专学生参与进来。

1970年9月，香港《崇基学生报》第142期发表社论——《维护钓鱼岛领土主权》，开放文社，发起公开签名运动“保钓”，并出版刊物作特别介绍。

1971年2月14日，香港《盘古》《生活月刊》的编辑与几位工人、学生、教师及文员组织成立“香港保卫钓鱼岛行动委员会”（简称“保钓会”）。18日上午，该委员会成员、大专学生和工人等40余人，先在天星码头和九龙佐敦道码头向行人散发传单，随后步行到国际大厦。4名代表向日



>>1971年的“保钓”集会

本驻港总领事递交抗议书，抗议书写道：“根据一切理由，七亿五千万中国人民对钓鱼岛列岛及其海域资源，不但权益上享有绝对主权，更在保卫上具有绝对信心。”其他人在楼下列队示威，其中9人胸前挂着

白布，分别写着“反”“日”“侵”“略”“钓”“鱼”“岛”等几个大字。20日上午，又有大约200名大专生及中学生响应《七十年代》（双周刊）的倡议，高举“誓死保卫钓鱼岛”“中国领土不容侵犯”“反对美日勾结”等标语，先在中环德忌笠街基德大厦日本文化馆前集合示威。接着，以“保卫钓鱼岛”横幅大字作为前导，结队游行到国际大厦日本驻港总领事馆示威。1971年4月10日，为了响应“全美保钓会”在华盛顿举行的第二次示威，“香港保卫钓鱼岛行动委员会”组织大中学生约百人到德忌笠街日本文化馆进行了示威。警察在街头排成人墙，阻止学生前进。示威学生高唱《钓鱼岛战歌》，试图冲破封锁线。警方拘捕了21名示威者，驱散了其他人。次日，各大学学生会纷纷发表声明，抗议警方对和平示威者滥用暴力，要求撤销对被拘者的控罪。学联及各大专学生会发动校内示威，以反对日美侵略，重申在港示威的权利。警方血腥镇压，全港舆论纷纷，以往对保钓人士极尽歪曲诬陷的报章亦纷纷指责警方的强硬手段及市政局的拖延无能。舆论的改变，使“保钓”运动的社会性及参与群众不断增加，坚定了同学们的信心。

在“四一〇”示威中，警方的镇压和无理拘捕，使“保钓”运动打破了社会上沉默的局面，“保钓”运动发展成社会性的运动。在不少大专同学的参与和带动下，步伐相对较落后的学界团体也开始正视此事，积极地参与“保钓”运动，推动着香港“保钓”运动一路高歌向前发展。

7月7日，香港数千名学生就钓鱼岛事件再一次举行大示威，反对美日勾结侵占中国领土钓鱼岛列岛。港英当局出动大批警察进行镇压，借口是香港“专上学联”未向官方注册，不是合法团体，并有意制造学生分裂，挑起冲突。但是，香港学生的爱国热情和学运并未因此而消沉下来。9月18日，“保钓会”在维园发动纪念“九一八”“保钓”及反对“两个中国”的示威，并获得批准。此次示威人数多达2 000人。1972年1月28日，“保钓会”组织百余人前往美领事馆示威，反对美日侵略、“一中一台”及“台独”。1月29日，“保钓会”十多位代表先后前往美日领事馆递交抗议书，反对“侵钓”及分裂中国。

1972年5月15日，钓鱼岛依约“归还”日本。面对这种无能为力的情况，“保钓”运动渐渐平息。但它在社会的各个角落已埋下了火种，而在大专界中，更是由星星之火形成一片火海。至1978年4月23日，“保钓会”

仍执著于自己的初衷，并发表声明，表示坚决为保卫钓鱼岛努力到底！

历史回响

经历保卫钓鱼岛行动之后，更多的香港青年开始关注内地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并且参与到香港当地的政制及社会诸问题的探讨中。

香港“保钓”运动唤醒了当地学生对祖国统一问题的关注，使他们开始重视中国的历史和政治现实，对于日后大专院校纷纷设立国事学会，研究中国问题的风气起了先导作用。另外，它带给了群众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教育。示威游行是“保钓”运动经常采用的手法，其次数频密，声势浩大，还发生了警方、防暴队残暴镇压群众事件，引起全港各阶层对香港政府的抨击。港英政府被迫让步，同意市民有集会、示威的权利，并划出5个可以合法示威的地点，这让群众认识到团结的巨大力量。

一句话点评

香港学生“保钓”运动可以说是一场启蒙运动，它引入了一种新的思潮，扩展了香港青年知识分子关怀社会的视野，意义深远。

亚洲最成功的反贪机构——廉政公署



廉政公署宣传海报

关键词

关键人物 港督麦理浩
关键时间 1974年2月15日
关键事件 警官犯案 引渡葛伯
“警廉冲突” “廉政风暴”

背景扫描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英国在香港建立殖民统治，香港成为英国政府管辖下的自由港。由于制度上的缺陷，港英政府成立之初即存在严重的贪污隐患。廉政公署成立前，港英政府虽然采取了不少廉政措施，但收效甚微。至20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香港经济的腾飞和财富的迅速积累，官场特别是警察部门因缺乏内部约束和惩治机制，贪污现象急剧增加，甚至出现了不少集团式、有组织的贪污。当时香港有一句流行语：整个香港的活动，都是以佣金为基础的。行贿已成为香港市民办事的潜规则：到医院看病需向救护员支付茶钱；发生火灾要给消防员“开喉费”。而“贪污在香港警察队伍中已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就像晚上睡觉、白天起床刷牙一样自然”。

瘟疫一样蔓延的贪污贿赂之风严重阻碍了香港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侵犯了市民的权利并危及香港社会的稳定和港英政府的统治。自20世纪60年代始，香港市民尤其是青

年知识分子的抗议活动此起彼伏，给港英当局造成了极大的压力。港督麦理浩决心整顿警纪，反腐倡廉，平息民愤。1971年5月出台了新的《防止贿赂条例》，其中规定：如果公务员所拥有的财产与其公开收入不符，而又不能对财产来源做出合理解释的话，即构成犯罪；另一方面，将警察队伍中的反贪机构提升等级，成立反贪污办公室，扩大编制，强化职能。这些措施的出台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未能从根本上扭转社会腐败之风，因为反贪的执法者本身就是并不廉洁的警察部门，“贼喊捉贼”，焉能有效？故而社会各界强烈要求成立独立的机构取代警方专门负责调查贪污问题。1973年，香港总警司葛柏巨贪案曝光，直接促成了廉政公署的诞生。

脉络纵横



葛柏是英国人，1953年起任职于香港警界。葛氏案发时，他已是香港警方的第三号人物，地位仅次于警务处正、副处长。1973年4月，香港警务处收到一份秘密报告，揭露葛柏有来历不明的巨款汇往海外，随即交由属下的反贪污办公室调查。后者很快查出，葛柏至少拥有400余万港元的财产，相当于其26年工资总额的6倍多，明显与收入不符。6月4日，反贪污办公室通知葛柏，必须在7天内说明其财产来源。6月8日，葛氏逃离香港，转道新加坡返回英国伦敦。因港英两地法律有异，英国并没有“财产状况与官制收入不相称”的控罪，港英政府很难以此罪名将其引渡回港审判。

葛柏是新的《防止贿赂条例》施行后香港反贪机构要抓的第一条大鱼，香港媒体和市民一直十分关注，看港英当局是否真的有决心和能力彻底整治腐败。故葛氏在警方眼皮底下公然逃脱的消息传出后，香港社会一片哗然，来自各阶层的市民纷纷上街抗议，要求当局将葛柏引渡回港受审。为平息民愤，港督麦理浩委任高级副按察司百里渠成立调查委员会，彻底追查葛柏逃脱原因并检讨当时的反贪工作。该委员会调查后，在向麦理浩提交的报告中阐述了香港贪污腐败的严重性、普遍性和系统性，以及反贪机构设在警察部门内部的利弊，建议实行更严厉的反贪污法并设立一个完全独立于警察部门的反贪机构。这就是著名的“百里渠报告”。

1973年10月17日，麦理浩在向立法局发表施政演说时，宣布将成立一个新的、独立于警察和政府部门，直属总督的反贪污机构——总督特派廉政专员公署，全面主持贪污案件的侦查。其理由是：公众会对一个与包括警察部门在内的所有政府部门脱离的、独立的反贪机构更有信心。1974年2月15日，香港立法局通过《总督特派廉政专员公署条例》（现称《廉政公署条例》），“总督特派廉政专员公署”（简称“廉政公署”或“廉署”）正式成立，其主要职责为调查、预防及教育。

廉政公署的成立，成为香港反贪工作的重大转折点。经

其不懈的努力，1975年1月7日，葛柏被引渡回港。2月17日，葛柏在维多利亚法院接受审讯。为显示对此案的重视和反贪的决心，港英政府首次从英国聘请优秀的法律人士担任此案的检控官。经过六天半的审讯，葛柏被判串谋贿赂罪和受贿罪罪名成立，入狱4年。葛柏不服判决，先后上诉至香港最高法院合议庭及英国枢密院（港英时期香港的终审法院），均遭驳回，昔日的警界红人最终为自己的贪污行为付出了巨大的代价。1977年葛柏刑满出狱后，隐居西班牙，不知所终。廉政公署还正式向法院起诉，追讨葛柏因贪污所得的400多万元财富。追查工作因葛氏的财富分散于世界各地而困难重重，但并未终止，至今仍在进行中。

葛柏被绳之以法，廉政公署赢得了市民的信任。当年主审葛柏案的杨铁梁法官据此认为，此案不仅成为廉署肃贪倡廉的重要里程碑，也恢复了



>> 廉署总部大楼

市民对香港司法制度的信心。借葛柏案的成功，廉政公署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廉政风暴”，仅1974年2月到1977年10月，三年多的时间里，廉政公署就调查了3 580宗贪污案，并以贪污罪名将260名警官送进监狱，大大提高了香港政府的廉洁程度。

由于香港特殊的环境，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贪污问题主要集中于警察部门、建筑业和金融业，而以警察部门为甚。故廉政风暴之初，以打击警察贪污为重点，众多警务人员卷入其中，引起不少警务人员的强烈不满。1977年10月，数千休班警察上街游行，冲击廉政公署，殴打廉政公署人员，并威胁港督麦理浩，如不削减廉署权力，警察将停止执法。这就是香港反贪史上著名的“警廉冲突”事件。面对失去警察执勤可能导致香港失去正常秩序，或退让导致香港法治倒退的两难处境，麦理浩最初选择了有限度的让步策略，颁布了部分特赦令，指示廉政公署停止追究1977年1月1日前的贪污行为，案情特别严重和逮捕令已发出的除外。不料，警察部门中的一些人得寸进尺，进而要求全面无条件地特赦并即刻解散廉政公署。面对压力，港英当局决定坚决反击，总督召集立法局紧急会议，30分钟内三读通过了一项《警务条例》修正案，规定任何警官如拒绝执行命令将立即开除，且不得上诉。通过这一手段，有效平息了“警廉冲突”。1978年4月，港英当局又在依法不予起诉的情况下强迫118名有贪污行为的警务人员退休。

自此，香港反贪工作一路高歌猛进。廉政公署执法办案坚决果断，先后破获了多起大案要案，如原香港联合股票交易所主席李兆福贪污受贿案、香港首席检察官胡礼达贪污案、立法局议员梁锦濠贿选舞弊案、天天日报社社长何世柱串谋诈骗案等。廉政公署成为香港反腐倡廉的主要支柱，政府和公共服务机构的集体贪污被彻底清除，明目张胆的贪污基本不复存在。私营机构对行贿采取了更为谨慎的态度，建立了较为有效的廉洁机制。更为重要的是，反腐倡廉的社会风气自始形成，香港市民普遍认为贪污是一种不当的行为，是犯罪。香港的反贪成就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承认，在德国的国际廉政研究机构“透明国际”，自1995年始每年发表的廉政排行

榜上，香港一直名列前茅。

历史回响

在香港，“香港胜在有ICAC”这句话家喻户晓、人人皆知。ICAC是廉政公署（Independent Commission Against Corruption）英文名字的缩写，意谓“独立反贪公署”，“独立”乃其精粹之所在。1997年香港回归前，廉政公署的中文名字是“总督特派廉政专员公署”，廉政专员只听命于总督，拥有极大的权力。今日香港之为高度法治和文明的社会，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廉政公署这一独特的反贪机构，后者正因其其在反腐方面的巨大成就，被国际社会誉为“亚洲最成功的反贪机构”。

一句话点评

前香港特首董建华认为：“香港以廉洁的公务员队伍和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称誉海外，廉署实在居功甚傲。”廉政公署在反贪方面的巨大成就，给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反贪工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越南难民涌港和港英政府的 “甄别政策”



船舱内的越南难民

关键词

关键时间 1975年5月 1988年6月16日

关键词汇 开放式政策 紧闭营政策 甄别政策
联合国难民署 “第一收容港”

背景扫描



1975年美国在越南战争中败退，越南全国统一。政府在处理新旧交替时，政策出现偏颇。经济方面，统一后的越南经济千疮百孔，百废待兴。对越南政府的失望和生活的窘困，使越南民众只能拿出自己的积蓄，乘上破旧的船只，驶入风云莫测的海洋，去重新寻找自己理想的生活。而香港恰好有着相对优越的地理位置，它不仅是华南沿海最大的港口、西太平洋地区航运的枢纽，而且仅距越南北部约500英里，从越南乘船北上到香港，是一条比较安全、便利的途径。其次，香港一向有着比较宽容的难民安置和遣送政策。此外，由于西方媒体对于工业化国家美好生活及收容难民等情况夸大及片面的宣传，使得越南难民对西方国家有无比美好的向往和憧憬，而香港就是其进入西方发达国家的“中转站”。

脉络纵横



香港原本就是一个移民地区，并常常自诩为“逃亡者的乐园”，移民、偷渡，对于香港人来说似乎都已司空见惯。

但自1975年5月，首批越南难民3 000多人乘坐“基娜马士基”号货轮抵达香港始，难民问题瞬间成了香港社会的热点和难点问题。

1978年12月，“汇丰”轮又载着5 000名越南难民驶入香港港口。当遭遇暴风、海盗之后的越南人衣衫褴褛地出现在香港大地上的时候，国际社会及香港人似乎都被其深深触动，给予了他们极大的同情。从1975年开始至1982年7月，港英政府对抵港难民采取了人道主义的态度，基本上是来者不拒，实行开放式难民营政策，允许难民在当地找工作。这主要是由于香港当时正处于劳动密集型行业高度发展时期，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此时期，虽然难民源源不断涌入香港，但遣送到西方国家的相对较多，故真正滞留在香港的难民并不多。

但好景不长，自20世纪80年代起，作为“第一收容港”的香港开始面临多重困境：起初大谈人道、接收难民不少的西方国家，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对难民越来越不感兴趣并且开始彼此推托。越南人不愿走，西方国家不愿接，香港几乎束手无策。安置难民问题迫在眉睫，但财政却是一大难题，联合国只出10%的费用，香港社会团体的捐助也只是杯水车薪。为制止潜在的难民继续来香港，1982年7月至1988年6月，港英当局推出了禁闭营政策，即把难民关在难民营里，只许他们在营内自由活动，不允许外出。这一政策虽在短时期内有过一定作用，但却激起国际社会及舆论的强烈抨击，而且还给香港社会带来财政负担加重、罪案增加等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出现第二次越南船民出逃高潮，港英政府面对的越南船民问题更为突出。事实上，这一时期来香港的越南人已经多为经济移民。越南战争此时已过去很久，越南政府也开始改变此前过激的政策，政治难民已经很少。在此种情况下，港英政府遂将原来“越南难民”的称



>>“汇丰”号货轮运载大批难民到香港

谓改为“越南船民”。这批出逃船民以农民和渔民为主，他们中绝大多数不符合西方国家的接收标准，得到安置的希望很少。面对这次出逃高潮，1988年6月15日，港英政府宣布改变安置越南难民的政策，将根据国际难民标准甄别抵港的越南船民身份。甄别工作由人民入境事务处负责施行，联合国难民署监察施行。自1988年6月16日起，新抵达香港的越南船民均须按联合国难民署的准则接受甄别，审定船民是否符合联合国1951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和1967年《难民地位议定书》所指的难民身份，即“因种族、

宗教、国籍或隶属于某一社会阶级或政治团体而恐遭迫害”的人，统称“政治难民”。只有这些人才可以入住难民开放中心，等待西方国家的安置，而不符合资格的船民则视为非法入境者，予以遣返越南。到1994年2月底，港英政府基本上完成了甄别越南船民的工作。

在6.3万接受甄别的船民中，只有19%的人被甄别为难民。但对于非难民，联合国连10%的费用也不愿再承担。本来就不愿再收容越南人的外国政府也有了借口，即只接受政治难民，而不接受经济移民。但香港却推不掉这个大礼包，大量越南船民仍滞留在香港。

甄别政策实施的目的本在于阻吓船民继续涌港，实际效果却甚微。1989年到达香港的船民人数为1988年的两倍，进一步增加了港英政府的财政负担。

港英当局的甄别政策一直持续到1997年6月底“综合行动计划”结束为止，此后对于抵达香港的越南船民不再提供难民身份甄别及移居机会。

历史回响



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越南难民和船民问题一直是香港走不出的困境，甚至被列为最受港人关注的问题之一。难民、船民问题长期困扰着香港，对香港的财政和社会治安造成很大的负担。自1975年起，香港收容了20多万寻求庇护的越南人。香港用于越南难民和船民的直接开支超过10亿美元。近些年来，绝大多数难民按照联合国难民署自愿遣返计划和港英政府实施的有序遣返计划已返回越南。

一句话点评



香港深受越南难民和船民问题困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香港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下，并没有自己实际上的政治决策权，不可能自主地做出符合自身利益的决策所致，从而使香港长期背着此种沉重的包袱。

利便民生的“居者有其屋计划”



20世纪70年代的公共屋邨

关键词

关键时间 1978年2月

关键事件 1953年火灾 1968年火灾

关键词 居者有其屋计划 公共房屋计划 香港房屋委员会

背景扫描



自20世纪60年代经济腾飞以来，香港已发展成为一个颇负盛名的国际化大都市。同时，城市人口的急剧膨胀也带来一个难以解决的现实问题，即如何在有限的土地上提供足够的居民住房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香港普通市民大多住在简陋的木板屋组成的寮屋村落里。1953年圣诞夜，石硤尾木屋区发生了一场罕见的大火灾，此后一年内木屋区火灾不断，近十万居民在火灾中痛失家园，流离失所。1968年九龙的白田地区又发生一场灾难性大火，成千上万的居民顿时无家可归。为了安置这些无家可归的人，港英政府在紧急设置临时住房的同时，也开始适时地发展公共居住房屋，由被动到主动并开始全面规划，逐渐演变成一个长远的公共居住房屋计划。当时香港繁荣的经济，为政府大规模实施居屋计划提供了良好的物质条件。

脉络纵横



1973年，为了统一和协调公共居住房屋的建造和管理，香港成立了独立的房屋委员会——香港房委会。作为世界上拥有最多公共房屋的组织之一，香港房委会主要负责执行香港政府的公共房屋计划。房委会将全社会的居住需求视为一个系统工程，在具体操作时，往往还有廉政公署直接参与，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暴利和不公平现象，从而使之带有较多的社会福利性质。

继使180万住在木屋和贫民窟的居民能搬进永久性独立住宅的“十年建屋计划”提出后，自1978年开始，港英政府鉴于市民渴望早日自购居所，改善居住环境，开始推行“居者有其屋计划”，简称“居屋计划”。这项计划主要是为那些收入超过入住廉租屋的标准，但又负担不起私人楼宇资金的家庭解决住房困难，由香港房屋委员会作为政府的代理人具体负责实施房屋的设计、兴建、销售，直至管理等事宜。具体是由当局兴建或批给私人地产承建商一些设施比较齐备的楼宇，然后优价卖给市民。这些供出售的公屋一般称为“某某苑”或“某某阁”。由于对低收入市民的照顾是建公共住房的宗旨，故居屋的楼价一般只相当于市价的50%左右，并可以获得特惠贷款，所以深受广大市民欢迎。但每年的房源供应并不多，大约只有几千套单元出售，这就需要一种比较公平且容易为人信服的方式来解决这一矛盾，而公开抽签就是一种能为大众接受的方式。为了显示政府对所有符合条件



>>大批市民在九龙湾国际展览中心排队购房

的市民一视同仁，公平对待，将原来住廉租公屋和原来租住私人楼宇的两大类申请者分开抽签。即将资料输入电脑（但对鳏寡老人、残疾人士会有一些特殊照顾），采取抽签办法决定先后，甚至包括楼层、房屋的选定。当然协商原则也适用。如果某人抽到签，而他又不想在这个地区居住，即使协商也令其难以满意，住户就要主动放弃这次机会，重新排队。

1978年2月14日，“居者有其屋计划”首期俊民苑正式动工，同时开始接受买楼申请。18万份申请书一天发完，不得已只得临时加工赶印。由于反应热烈，房屋委员会决定从速加建房屋。

为了杜绝投机行为，政府对居屋的销售对象还有一些限制条件。除了申请人要年满21岁，且没有属于自己的物业，以及工资要在一定限额之下以外，还必须具备在香港居住10年以上的市民资格。另外，属于公屋住户或已获批准有资格入住公屋的住户，在购买到居屋单位以后，还必须交还原来租住的公屋单位，或放弃住公屋单位权利，以确保“居者有其屋”初衷的实现。够资格的市民登记后，大约要等待5年左右。购得公屋的家庭中，约有45%是原公屋租户，他们在购买居屋后都按照规定将租住的房屋退还给了房委会，以供继续出租。

基于“居屋”是政府对市民的优惠和照顾，根据规定，市民在购买到“居屋”以后是不能随便转让赚钱的。1978年2月至1982年2月推出的居屋，在最初5年内不得转售，但可以以原价回售给房委会，5年之后则可以出售给私人。而1982年2月以后推出的“居屋”，前5年只能按原价回售给房委会；5年到10年间，仍然只能售给房委会或其指定人，但价格可以根据当时出售其他“居屋”的价格作比较计算；10年之后，虽不受限制，但须按其时之市值补价，以补偿政府对楼价所付出的大量补助。所以售屋实际上并不会会有太大利润，故出卖者不是很多。

历史回响



香港地少人多，居住问题始终是市民最大的困扰，也是人们最关心的大事。自1978年2月开始推出的“居者有其屋计划”，为香港经济的发展、

社会的安定及居民生活设施的改善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它不但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贫苦居民的居住问题，使香港昔日的房荒得到了缓解，而且由于房委会的专业职员管理，对公屋区社区环境卫生的清洁美化及社会秩序的维持都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一句话点评



香港的“居者有其屋计划”，是针对本港的自身特点“量体裁衣”制定的，并且确实解决了现实问题，收到了比较显著的成效，亦成为香港人称许且引以为豪的大事之一。给内地及其他地区的居住问题也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英皇御准”的合法赌博

——香港六合彩



香港六合彩九龍國際大廈

关键词

关键时间 1976年7月
关键事件 多重彩出现
关键词 政府奖券管理局
“金多宝”奖金

背景扫描



香港的博彩业历史悠久，由于营销彩票的人一般都有钱可赚，故卖彩票的摊点在香港很早就比比皆是了。港英政府于1962年通过一项法律，让赌博与慈善事业挂钩，将赌博形式定名为“政府奖券”，也就是六合彩的前身。法律规定，彩票投注总额的40%划拨“政府奖券基金”，用于社会福利事业，其余的60%为奖金。之后的六合彩也顺理成章地成为香港官办的一种合法赌业。为了吸引市民投注，政府奖券的赌博方式不断进行改革，极力迎合以小博大的侥幸心理，这样陆陆续续搞了十多年，收效却一直不好。为了继续推行这项成本低、风险小、获利大的彩票行业，香港政府在1975年成立了政府奖券管理局。1975年9月，奖券管理局推出了六合彩的雏形——多重彩，古老的彩票开始让位于数字游戏。多重彩开了52期以后，宣布停办。在其基础上经过重新设计游戏规则，以“六合彩”的

名称问世。

脉络纵横

1976年7月2日，政府奖券管理局宣布开办六合彩，同月13日，六合彩正式面世。投注的办法是：买彩票的人在1至36个号码中自选6个号码投注，每注为港币2元。开彩即用“搅珠”的办法，从36个写有号码的球中摇出6个号码及一个特别号码。如果买彩票的人所选的号码与摇出的6个号码完全相同，即中头奖。6个数字只要号码相符就行，不管顺序先后，如果只中得5个号码及一个特别号码，便获二奖。如果只有5个号码与摇出的号码相符，则获三等奖。六合彩一经问世，便采用电脑验票，每周开奖两次，由电视台直播搅珠实况。

1983年，六合彩投注数目由36个改为40个，彩票分为单式与复式两种，同时增设“金多宝”奖金，分别在春节、端午、中秋、圣诞开奖，而复活节、7月、8月、11月，还会举行特殊搅珠。1987年，投注数目增加到42个数字，1990年至今一直为45个数字。1991年，每注金额改为4元，1995年又增加到5元，虽然中奖机会不断降低，投注费不断增加，但市民的投注热情依旧，捧场客络绎不绝。

关于六合彩奖金的分配，由专门机构负责，即1975年成立的政府奖券管理局统筹规划。将原先的官办赌博以为社会福利筹资为主，改为政府抽税为主。按照新的六合彩条例，奖金占投注额的59%，政府要抽取30%的博彩税，其余用作政府奖券基金和马会佣金。奖券基金由社会福利署掌握，主要用来资助民间的各种社会福利团体。自六合彩推出以后，已为港英政府库房及奖券基金带来超过180亿港元的收入，也惠泽了无数的慈善机构。

关于头奖的处置，政府规定把空着的头奖奖金存入“多宝彩池”，与下期头奖合并到一起。所以，多宝彩池的头奖奖金，至少要比普通彩池翻一番。1992年2月11日的“金多宝”六合彩，头奖独得奖金5 741万港元，从而创下六合彩历年奖金史无前例的最高纪录。而这一巨奖，也是香港彩票史上空前绝后的一笔。因为此后由于某些投机行为的出现，政府奖券管理局

决定，将六合彩头奖的最高奖金额限定为3800万港元。

关于六合彩中奖，香港民间流传着“十两黄金赠佳人”的美谈：一位在编辑部工作的胡先生闲来无事常常喜欢买六合彩。一天同事闲聊，胡先生说起头夜梦见投中



>>市民购买六合彩

六合彩，引来众人的一阵讪笑，只有一位女同事告诉他定会中奖，胡先生高兴之余当场许诺，如果中奖，一定会送女同事十两黄金。谁料当晚开彩时，胡先生果然“六发六中”，中得头奖，而胡先生也毫不吝啬，将十两黄金送给了那位女同事。此事一时成为六合彩史上的一段佳话。

但塞翁得马，焉知非祸。朋友反目，因财惹祸的悲剧也是屡见不鲜。而且六合彩毕竟是一种赌博活动，虽然合法，但对那些自制力较弱，嗜赌成性的人却是一种毒药。有个姓刘的六合彩赌徒，就是因为极度迷恋六合彩，终日梦想发财而走上了不归之路。他每星期必买六合彩，而且坚持用他中意的一套数字。有一次他忘了投注，等到开彩时却赫然发现，头奖的中奖号码正是他一贯投注的一套数字，于是后悔莫及，终日恍恍惚惚，最终自杀身亡。另外，在一些比较落后偏远的农村地区，信息比较闭塞，地下“六合彩”一些夸大、引诱性的宣传，常使博彩者处于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状态，误以为收益高于风险，机会大于挑战，从而作出错误的判断和选择。

历史回响



作为一种补充手段，香港政府通过六合彩获得的收入，可以适当解决公共财政的资金短缺，而且对于某些慈善机构、社会福利事业有不小惠泽。另一方面，由于购买彩票所用资金较少，也为社会开辟了一种大众化的娱乐方式。

一句话点评



六合彩毕竟是一种赌博，“风起于青萍之末”，所以政府应该在健全管理，规范运作，增加透明度的条件下，适度地发展推广六合彩。

香港地方政制改革的新产品 ——区议会



选民登记

关键词

关键时间 1982年

关键地点 新界

关键人物 杨慕琦 麦理浩

关键事件 杨慕琦计划 观塘地方行政试验
地方政制改革

背景扫描



区议会作为香港政制咨询体系中的下层机构，是香港历史发展的产物，也是港英政府20世纪80年代推行地方行政计划的产物。它的推出非常仓促，然而其酝酿过程却近四十年。早在1946年，香港总督杨慕琦就曾提出一项改革计划，准备成立由选民、团体及太平绅士提名组成的市议会，以负责政府内政事务，同时还建议改革立法局，以增强非官守议员在立法局的地位等等。“杨慕琦计划”提出后，遭到立法局非官守议员的强烈反对，他们用非公开的反对形式，扼杀了“杨慕琦计划”实施的任何可能性。同年10月，英国下议院宣布这一计划寿终正寝，“杨慕琦计划”终于被迫流产，成为历史陈迹，香港政制改革也因而受阻。直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政制改革重新成为热门话题。港督戴麟趾在1965年起草了一份以“给予一般市民在

基层更多的参政机会”为主旨的内部文件，但高层官员反应却极为冷淡。1971年麦理浩到港任职后，首先从新界开始大力发展咨询政治。20世纪60年代末到80年代，港英政府在新界推行新市镇计划，大量市区居民迁移到新界。1977年10月，港英当局宣布成立地区咨询委员会，到1978年底，各区基本上都建立了地区咨询委员会。1979年3月29日，港督麦理浩访问北京，首次就香港问题试探中国态度，在得到北京不会让不平等条约以“续约”的形式继续下去的信息后，立即返回伦敦报告。此后，开始在观塘区设立地区管理委员会，进行改革地方政制的试验。

脉络纵横



观塘的地方行政试验刚过半年，1980年6月，港英政府便发表《香港地方行政改革模式绿皮书》，建议将这一制度在各区推广，并在每区派代表与区管理委员会主要成员，共同组成区议会。同时扩大市政局民选议员与委任议员的数目，选举产生新界各区议会部分成员，其职权范围大于市区区议会。绿皮书发表后，港英当局仅给市民一个多月的咨询期，并且在接受意见的截止日期前，布政司署已设立特别小组，负责筹备1982年即将举行的区议会选举。所谓的博征民意，只是形式而已。



>>选举区议员的宣传车

1981年1月，港英政府几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表白皮书，将地区咨询委员会改为区议会，同意市区区议会亦设民选议席，投票资格由所需居住年限的3年增至7年，并决定增加选举产生的非官守议员。于是，区议会便成为一种基本的制度，进入了香港基本的政制架构。白皮书发表后，香港各区纷纷开始筹建首届区议

会。但是，第一届区议会带有临时性质，只是体制转换的一个中介和过渡性阶段，因此议员任期都很短。新界各区的议员仅任期至1982年3月底，市区各区议员任期至1982年9月底，故有的书刊就将1982年选举产生的区议会称之为“第一届区议会”。1984年，港英政府提出改革区议会，并相继发表《代议政制绿皮书》和《代议政制白皮书》，开始正式推行代议政制。至此，20世纪80年代的地方行政改革基本完成。

关于区议员的选举，是在区内直接选举产生，根据《1981年选举规定条例》《1981年选举规定（程序）规例》《1981年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进行，它们具体规定了选民登记的条件和程序、候选人的条件和产生、选举的程序以及防止非法行为的办法等。条例规定，凡年满21岁，在港居住达7年的香港合法居民均有资格成为登记选民，但在香港或其他地方曾判死刑、监禁超过6个月而未服刑或未被赦免者，被医生断定为精神错乱者、为英国正规部队成员以及曾犯舞弊及非法行为罪、贪污罪，从定罪日至选举日不满7年者，不具备成为登记选民的资格。成为登记选民者，只要在港住满10年，均有资格成为候选人。选举每3年举行一次。投票人只能在其住址所属区域内进行投票，候选人可以亲自或委托代理人进行选举，不一定要在居住所属区域内进行投票，但只能竞选一个区议会的议席。

区议会作为立法局、市政局、区议会三层咨询体系中的下层咨询机构，是培养市政局、立法局议员的摇篮，主要由委任港英政府官员担任的议员、委任的非官守议员、民选议员和当然议员四类组成。当然议员在新界是指乡事委员会现任主席，在市区则是指市政局的民选议员和若干名委任议员。议员任期也为3年。

区议会的职权范围，除对有关区内居民福利问题，公共设施及服务的供应和使用事宜，政府计划是否充分及优先次序问题，运用政府拨款，以及进行区内小工程及举办社区活动等提供意见外，还可以拨款实行小规模的环境改善计划和举办区内文娱、康乐活动等等。

由于财政经费方面的约束，改善区内环境工作往往难以顺利进行。另外，有关工作的推行也由地区管理委员会负责，故区议会常常只能进行兴建小型公园、处理堆积垃圾、清拆后巷擅自建物等无关痛痒的小事。涉及各方利益较多的大厦擅自建筑天台、花笼等问题，区议会则未必有一致意

见，所以改善区内环境的工作常常举步维艰。

与改善区内环境工作相比，区议会负责的文娱康乐活动则深受市民欢迎，因为区议会30%~50%的财政是用于文娱康乐活动之中的。然而，这些活动有时会和政府部门的活动重复，从而造成浪费。



>> 区议会举行会议

各区区议会比较有特色的是“会见市民计划”，它可以直接咨询居民对现有政策的意见，在了解区内居民所遇到的种种难题的同时，也向市民解释港府的政策及办事程序，这是区议会同区内市民联系沟通的一条直接渠道。

区议会通常以区内政务署为接见地点，由非官守议员轮流值班负责接见。政务署人员协助他们接待市民、记录谈话内容，每周进行一次，如遇到具体的个案投诉，会将之转交有关部门处理。由于区议会处理这些个案要花费四至六个星期，周期太长，故市民利用这一渠道反映问题、进行申诉的热情并不高，“会见市民计划”的推行效果并不明显。

历史回响



自区议会成立以后，主要任务在于咨询，并无实际行政效力。具体来说，其职责是对本区各方面的事务表示意见和举办文体活动，以及进行小规模的环境改善工程等。但由于区议会最接近基层，而且覆盖面最广，所以区议会实际上构成了香港地区最大的法定咨询机构。

虽然区议会的设置只是地方政制改革中微小的改革，对于促进市民参与的作用也并不大，且含有港英政府针对香港前途在内的政治动机，但不

管怎样，区议会仍不失为一种民主渠道，是实践直接选举的初级阶段。而地方行政也是训练公众参与政治的起点，区议会既可以培养一批联系地区群众、了解政府在地区工作中运作政策的优秀人才，又可以使区议员将来有可能进入更高一级的政治机构之中，为立法局注入新鲜的血液。

一句话点评

可以说，区议会的设置及运行，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香港中下层市民对政治漠不关心的局面，提高了普通市民的民主自主意识和参与公共事务、政府管理的积极性。

薪火相传，承先启后 ——香港电影金像奖



关键词

关键时间 1982年3月9日

关键地点 香港艺术中心寿臣剧院

关键词汇 《电影双周刊》 香港的“奥斯卡”

背景扫描



香港是中国电影产量最多的地区之一，同时也是世界上最主要的电影基地之一。1913年，香港电影之父黎民伟拍摄的，完全由香港人创作，香港公司出品的第一部影片《庄子试妻》，开启了香港电影之旅。

1979年，一批新兴导演徐克、许鞍华、章国明等开风气之先，以不可阻挡之势掀起了香港电影“新浪潮运动”，他们突破先前国、粤语片时代的传统框架，开始拍一些具有社会触觉、充满个人风格的影片，表达了他们对香港社会的感觉和情怀。同时，一份日后成为香港电影界权威杂志的《电影双周刊》于1979年诞生，它每年年初都邀请影评人，评选过去一年的十大华语片与十大外语片。1982年的香港影坛，正处于“新浪潮运动”全面开花之际。一大

批成功电影人和令人耳目一新的电影作品不断涌现，如谭家明的《烈火青春》、蔡继光的《喝彩》、徐克的《第一类型危险》等等，迅速将香港电影推入黄金发展期，并在80年代末达到冠绝全亚洲的巅峰地位。

脉络纵横



在香港电影“新浪潮运动”蓬勃发展，一批批优秀电影人和优秀导演层出不穷的情形下，《电影双周刊》为了鼓励新型电影文化的发展，促进香港电影内容和技术的进一步创新，提高电影人的制作水平和观众的欣赏水平，希望通过颁发奖项以刺激电影业不断推陈出新。

1982年3月9日，《电影双周刊》与香港电台合办的首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在香港艺术中心寿臣剧院举行。这个电影奖和世界著名的“奥斯卡金像奖”一样取名为“金像奖”，从一开始就昭示了创办者对这一活动的眼界和雄心，其以后的发展道路也证明了它有实力成为华语影坛自己的“奥斯卡”。此后虽历经坎坷，但在周刊、电影人的不懈努力和坚持下，1993年正式注册成立了“香港电影金像奖协会有限公司”。公司不是营利性的机构，运营的目的就是为了每年举办一次金像奖颁奖典礼，创收的渠道也只有电台和电视台的转播费用而已。金像奖董事局由十个本港专业电影协会派员组成，包括《电影双周刊》、香港影业协会、香港电影导演会等。公司成立后，每届评奖由十个董事属会派员参与，力求以最开明的态度广集多方面的专业意见，令“香港电影金像奖”的结果更为公正且具代表性。

在奖项评判方面，香港电影金像奖评判团由香港资深电影人担任，同时邀请世界知名导演、演员



>> 第25届香港电影金像奖上刘德华、郑裕玲颁奖

担任评奖嘉宾。最初只设立了五项奖：“最佳影片奖”“最佳导演奖”“最佳剧本奖”“最佳男演员奖”“最佳女演员奖”，以后陆续增设了“最佳男配角奖”“最佳女配角奖”“最佳新演员奖”“柯达特别大奖”等，1990年，又设立了“终身成就奖”，以上奖项全部授予香港摄制的影片。另外，为了扩大金像奖的影响和规模，评判团还设立了“十大华语片奖”和“十大外语片奖”。斗转星移，今天的香港电影金像奖，已经发展成为囊括18项电影大奖的影坛盛会，所褒奖的电影工作者包括各个岗位的优秀电影人，成为涵盖极广的电影大奖。每一名为电影做出卓越贡献的电影人，都有可能赢得一项大奖，无形中激励了电影事业的发展，实现了金像奖创办者的真正目的。



>>>2005年，章子怡凭《2046》一片获最佳女主角奖

1996年，第16届香港金像奖制定了新的评奖规则，从所有电影从业人员第一轮投票评出的最佳影片提名奖中，通过第二轮投票确定最终获奖名单，这进一步完善了香港电影金像奖的评选制度。

从奖项的增减、评审制度的完善、颁奖礼的规模来看，香港电影金像奖都在稳步成长，逐渐被大多数电影从业人员与广大市民认同。多年来，它一直被认为是在华人地区最公开、公正的电影评选，亦是最受推崇的影坛盛事。

香港电影金像奖自创办以来，始终坚持着其公允和严格的专业性。正是凭着这样的公允和专业，才使其多年来一直得到观众和电影人的尊重，这也是所有真正热爱电影的人所希望看到和坚持的。它代表着对电影本身最真诚的热爱和关注，不仅对香港电影界一直起着鼓舞和激励的作用，同时也成为香港电影的风向标。

继1986年到1996年香港电影的10年最好时光后，20世纪末，香港电影也走到一个转折点上。产量下降，票房冷清，影市萎靡，一个盛世的背影似乎渐行渐远。近年来，每到香港电影金像奖评选，几乎都会弥漫出一股

香港电影危机的气息。而在2007年金像奖颁奖前，香港电影金像奖主席文隽表示：“香港电影确实不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辉煌，但这很正常，任何行业都会潮涨潮落。比如这次杜琪峰一个人就有两部电影提名最佳影片，这两部电影都很本土化，这也是他多年来的坚持。我认为本届金像奖最大的亮点还有执导《父子》的谭家明，在香港业内大家都知道他是王家卫的老师，他这次能出山，说明了他对香港电影的信心。”

历史回响



由创办到今天，香港电影金像奖已经走过了26个春秋，真实见证了香港电影过去的繁荣、曾经的低落和最近的调整。

香港电影金像奖作为香港电影人心中的“奥斯卡”，是香港最具权威性的电影活动，在举办过程中虽有些许争议，然而在整体上，它塑造了一个高标准的形象。金像奖评委会一直坚持兼容并包的原则，商业电影、艺术电影、另类试验，都各自拥有其位置，尽管有所倾斜，但总的来讲比较平衡，始终紧跟着时代步伐，为香港乃至整个华语电影业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它给了所有执著于电影事业的电影人一种认可和肯定，使他们更有激情和信心去创作出更精彩、更有韵味的作品，赢得了真正的电影爱好者对华语电影的崇敬和信任。现在，香港电影金像奖已经不再只属于香港本土，越来越多的内地和台湾电影人也不断走上领奖台。它冲破地域界限，成为整个中国影坛的骄傲。虽然香港电影昔日的繁华已成往日旧梦，目前陷入一定困境，但是希望仍在。第26届金像奖的主题“薪火相传，承先启后”，就彰显了其对香港电影事业的一种执著和坚守。

一句话点评



香港电影金像奖主席文隽说：“董事局的责任是把金像奖颁奖礼办好，而不是去影响赛果或制造赛果。赛果，是整个行业集体投票的成绩单。”

当“铁娘子”遇上“钢小平”



邓小平与撒切尔夫人

关键词

关键时间 1982年9月24日

关键人物 邓小平 撒切尔夫人

关键事件 中英领导人会谈香港问题

关键词汇 一场激烈的外交交锋

背景扫描



香港问题由来已久，大约可以追溯到鸦片战争时期。今日之香港由香港岛、九龙半岛、新界组成，它们分别在《南京条约》《北京条约》《拓展香港界址专条》三个文件中被割让出去，这些文件就是日后英国在对华谈判中的重要筹码。割地求和，是中国历史上耻辱的一页，从巴黎和会到开罗会议，历届中国政府 and 人民都没有放弃过收回香港的努力，但每一次都因英国政府的强硬、中国政府的妥协而告终。及至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外形势严峻，党和国家领导人为了大局着想，暂时将香港问题搁置起来。

当历史的巨轮前进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时，国内外形势逐渐缓和，中国政府又一次将收回香港、统一祖国的任务提上了议程。与此同时，英国也意识到离《拓展香港界址专条》中所规定的租借期即将到期，与中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势不可免。实际上，英国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就利用各种渠道和方式，打听中国政府关于香

港问题的政策。双方都有通过谈判而解决香港问题的意愿，于是中英领导人会谈香港问题就这样水到渠成了。

脉络纵横



1982年9月24日，中英会谈在人民大会堂的福建厅举行。撒切尔夫人首先到达。邓小平快步走进福建厅，亲切地与撒切尔夫人握手合影。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就此拉开了帷幕。

撒切尔夫人是英国历史上第一位女首相，因其作风强硬、处事果断，被冠以“铁娘子”的称号。当时的撒切尔夫人可谓春风得意，在她的领导下，英国刚刚打赢马岛战争，从阿根廷手中夺回了两国争议多年的马尔维纳斯岛，国际威望上升至战后最高点。凭着这股强劲的态势，撒切尔夫人对中英谈判充满信心，况且，她手中还握有有力武器——“三大条约”。根据撒氏的想法，“三大条约”是有法律依据的，应该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承认，中英双方中的任何一方都不能单方面废约，只能修约。因此，这次会谈，英国的目标是如何维护其1997年后在香港的统治，而不是让中国收回香港。但摆在撒氏面前的事实是，早在1972年，联合国非殖民地特别委员会就已经将香港、澳门等排除在殖民地的名单之外，港澳只不过是占领地，英国不应该再拥有主权。而撒切尔夫人的王牌——“三大条约”是不平等的条约，不平等的一方完全有权力不承认。平心而论，此次谈判的主动权并不在英国一方，因为就算双方谈判破裂，中国依然会依循国际法于1997年收回新界。众所周知，港岛与九龙并不能离开新界而独立存在，中方收回新界无疑就掌握了香港全部的战略要冲，港岛与九龙的发展不仅受到牵制，还暴露在中方的前沿，届时中国无论是用武力还是用外交手段收回香港都是胜券在握的。因此，英国在谈判中的形势并不如撒切尔夫人想象的那么轻松。

再说中国方面，中国领导人邓小平也是在中国革命中千锤百炼的一代政治家、战略家，早前留法的经历也让他对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十分了解。如果说英国对谈判是虚与委蛇的兜圈子，邓小平则直截了当得多了。



>>邓小平与撒切尔夫人会谈

会谈开始了，邓小平与撒切尔夫人寒暄几句之后，会谈正式开始。撒切尔夫人首先发难。她指出，关于香港的三个条约是依然有效的，英国不愿交出香港的主权与治权，此行只为修约而来。邓小平则指出，中国此次谈判只谈三个问题：一是回归问题，二是回归后中国治理香港的问题，三是回归前中英的合作问题。至于主权

问题，邓小平毫不让步地一再重申：此问题“没有回旋的余地”，新中国不承认三个不平等条约，主权归属问题不在会谈的讨论范围之内，双方只就如何回归而讨论。而香港回归指的是包括港岛、九龙的香港全境回归，而非仅新界一地。如果英国没有以上觉悟，则休提谈判。

紧接着撒切尔夫人又提出“香港只有在英国的治理下才能繁荣稳定”的观点。邓小平驳斥道：“保持香港的繁荣，我们希望取得英国的合作，但这不是说，香港继续保持繁荣必须在英国的管辖之下才能实现。香港继续保持繁荣根本上取决于中国收回香港后，在中国的管辖之下，实行适合于香港的政策。这些政策的主要特点，就是基本上保持这个地区的政治、经济制度现状。”邓小平还提醒撒切尔夫人，中国是有权力和能力用武力收复香港的。撒切尔夫人则回应：这样香港会崩溃。邓小平毫不犹豫地说：如果是这样，我们就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

经过激烈的交锋，如此一针见血的谈判辞令，令有“铁娘子”之称的撒切尔夫人大感不支。会谈后，不知道是为英国在往后谈判中的前景而忧心，还是会谈中邓小平的强硬态度令她意想不到，撒切尔夫人带着一脸的落寞走出了人民大会堂。此时，戏剧性的一幕上演了：在人民大会堂最后两级楼梯处，撒切尔夫人的高跟鞋与石阶相绊，突然摔倒在地。走在撒切尔夫人身边的英国驻华大使柯利达和时任港督尤德，以及中方保护人员立即将其扶起。好在摔得并不重。但此画面却被在人民大会堂外等候的中外记者拍了个正着。事后，香港媒体以及国外媒体抓住这个画面大做文章，不断地重播、重播、再重播，平面的媒体还将新闻标题定为“撒切尔夫人

摔了一跤”。至今，每当提起中英领导人会谈香港问题时，香港的媒体依然会播出这个画面。正是媒体如此地大肆宣扬“摔跤事件”，这一事件一时间成为街头巷尾、茶余饭后的谈资，甚至盖过中英会谈本身。更有人发挥想象，认为这是英国在中英谈判中失败的预兆。

会谈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撒切尔夫人不能容忍谈判的前提是1997年香港主权回归，邓小平也不能接受1997年后英国继续管治香港。双方仅仅达成一项关于解决问题方式的共识，即用外交谈判的手段。但是，撒切尔夫人在27日于香港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却继续坚持她的“三个条约有效论”，这遭到了香港中文大学和理工学院两校学生的抗议。此后的一系列会谈就转交给双方的外交官员去进行，中英最高领导人再也没有公开就香港问题进行过面对面的谈判，而是转向在幕后操纵交锋。

历史回响



邓小平和撒切尔夫人，一个是被毛泽东戏称为“钢铁公司”的国家元首，一个是雷厉风行不在男性之下的“铁娘子”，两人同样以作风强硬著称于世，两人同在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熔炉中锤炼。两强交锋，棋逢对手，难免发生铿锵碰撞。尽管此次会谈双方都没有达成既定的目标，但大家都明白香港问题的解决不能一步登天，必须进行反复磋商、谈判。可以说，这一次的会谈为以后香港问题的谈判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香港回归的道路上又前进了一大步！

一句话点评



撒切尔夫人的外交与国防政策顾问鲍威尔勋爵这样评论中英会谈：“两个强力的政治人物，为各自国家的不同利益，从两个完全不同的立场到最终达成一个很好的决议，是很明智的事情。我形容它是非常成功的操作，非常成功的外交谈判和外交模式。”

日出沙头，月悬海角

——沙头角中英街的开放



20世纪70年代沙头角中英街

关键词

关键时间 1899年3月16日 1982年4月30日
关键地点 沙头角中英街
关键事件 中英勘界 “深港协议” 签订
关键词汇 “一街两制” “购物天堂”

背景扫描



位于深圳的沙头角中英街，是深圳特有的一道风景线，以全国独一无二的“一街两制”蜚声中外。1898年，英国以武力逼迫，向清政府提出展拓香港界址问题，并于6月9日，由中英代表李鸿章和窦纳乐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英国强租新界，租期99年。次年3月16日，中英双方代表来到沙头角勘界，以木界桩为界，界桩上写着“大清国新安县界”。沙头角从此被一分为二，形成“新界沙头角”和“华界沙头角”。勘界后不久，就有乡民在两侧搭建房屋，摆摊做生意，中英街已具雏形。

此后直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沙头角中英街（曾因日本侵占而一度易名为“中兴街”）基本上保持了经济繁荣的局面，街两侧的商品琳琅满目、品种齐全，再加上大批劳动力涌入香港市场，沙头角两边的老百姓一直保持着较密切的民间贸易交往。到20世纪50年代，中英两国关系一

度比较紧张，呈对峙状态。广东省政府开始实行边境管理，所有人均须从正式口岸凭公安机关签发的《出入境通行证》进出境。中英街为非正式口岸，开始限制人流往来。1950年始，港英政府在“新界沙头角”实行“宵禁”，给当地居民的生活、交流、贸易等都造成很大不便。从1952年至1979年的27年间，中英街形成了严格的边防禁区。直至改革开放，1979年建立深圳经济特区以后，中英街才又开始兴旺起来。

脉络纵横



在执行近30年的边防禁区政策后，1978年，改革开放带来了新建立的深圳经济特区的繁荣，同时也使沙头角从无人问津的边防禁区小镇一跃发展为经济特“镇”“特区中的特区”，中英街乃至整个沙头角的面貌焕然一新。

改革开放以后，深圳和香港的关系开始呈现合则两利、共存共荣的特征。1982年4月30日，《深圳—香港关于增辟两地之间通道的协议》在深圳签署，其中一条内容就是，增开沙头角陆路口岸，建设沙头角沙河公路桥，作为深圳特区与香港间的专用口岸。《深港协议》标志着深圳、香港官方通道的正式开放，两地经济联系的发展以制度化方式确立，对发展两地的经贸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83年8月，深圳、香港双方又携手合作，共同投资，将沙头角中英街破旧的街道修葺一新，使得这条小街朝夕间迅速崛起，变得寸土寸金，两侧店铺林立，各式商品应有尽有，一派繁荣景象。由于那时



>>>深圳沙头角中英街警世钟亭



>>中英街界碑

内地商品经济还处于相对落后状态，毗邻香港的中英街遂以免税的价格优势成为全国闻名的“购物天堂”。这条长不足一里，宽不足两丈的小街时常被慕名而来的购物人流挤得水泄不通，少时四五万人，多时八九万人，人气极旺。当时民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不去中英街，枉到深圳游。”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内地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来中英街主要为选购金银首饰，一向富有经商头脑的香港商人，看准行情，迅速将世界新潮首饰引进到中英街，漂亮美观的首饰款式和低于内地的黄金价格使中

英街立即成为全国第一条黄金街。

香港回归后，购物已不再是外地游客到此的主要目的，历经中华民族兴衰荣辱百年沧桑的中英街开始作为一个历史的见证，愈来愈多地受来此游览观光的游客所关注。

首先，单是“日出沙头，月悬海角”的美妙画境，就已让游人想入非非。据说，有一位清朝官员出游到这里，面对眼前碧波荡漾的大鹏湾和片片银白的沙滩，一时诗兴大发，随口吟出了“日出沙头，月悬海角”的诗句，沙头角也由此得名。

早在1989年6月29日，中英街就因其独一无二的“一街两制”的人文历史景观而被授予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一街两制”即是指中英街一条小街两种社会制度的现象。1997年香港回归以前，界碑东侧紧邻内地的店铺，西侧簇拥着港方的商场，一边是英国军警，一边是中国士兵，两侧悬挂的国旗不同，巡查的军警服饰不同，两边的商品风格不同，使用的货币亦不

同。中英街上的中国人，虽在意识形态、思想观念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但两侧相对而安，自是风情独驻。

香港回归后，随着“一国两制”政策的实现，“一街两制”的局面仍然存在，中英街也在集购物与参观游览于一体的体制下继续发挥着其窗口作用。

历史回响



沙头角中英街从割占、抗争、沉寂、繁荣到回归的沧桑历程，“一街两制”独一无二的人文景观，都是珍贵的历史资源，它不仅是中国近代屈辱史的见证，也是中国改革开放、香港回归祖国并实行“一国两制”和中华民族走向繁荣富强的历史见证。正所谓：“一街之兴衰关乎国势，百年之荣辱窥于一斑。”同时，“不去中英街，枉到深圳游”的中英街知名度，也在促进深圳城市发展中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沙头角中英街利用了其历史文化渊源的优势，采用免税商品市场的方式，使深圳地区的经济得到迅速发展，成功地创造了文化优势与经济效益结合的例证。

一句话点评



中英街界碑是中国近代社会历史变迁的缩影。贯穿中英街的8块界碑，是中国改革开放、香港回归祖国并实行“一国两制”和中国走向繁荣富强的历史见证。

“黑色星期六”



港币
一览

关键词

关键时间 1983年9月24日
关键人物 撒切尔夫人 彭励治
关键事件 港元贬值
关键词汇 经济牌

背景扫描



1983年正值中英谈判的多事之秋，这场谈判从一开始就充满着火药味。一边是中国坚持收回香港，一边是英国坚持“三个条约有效论”。邓小平与撒切尔夫人，都是不容退让的铁腕人物。中国政府态度强硬，而英国的谈判手段层出不穷，软硬兼施，而且多面围攻。撒切尔夫人看到空谈“三个条约有效论”并不能使中国在谈判中屈服，于是开始打起“经济牌”。

在这样的政治形势下，原本就不太乐观的香港前途，再被媒体一炒作，普通民众不明就里，开始对香港失去信心，在外汇市场上港元被大量抛售，造成币值急速下跌，通货膨胀严重。紧随的就是市场恐慌，市民大量抢购日用品，一副世界末日的势头，更加剧了香港的动荡不安，这场恐慌发生在1983年9月，这就是香港历史上的“九月风暴”。

尽管港英政府曾经加息，以遏制港元下跌的势头，但

无奈行动得太晚，加息已经不能遏制港元下跌。一开始对这场危机袖手旁观的英国坐不住了，本来想拿此事件大做文章，但在遭到国际社会一片质疑和谴责的情况下，最后还是决定先稳定香港，再与中国政府谈判。经过一系列调整后，香港的汇市终于稳定下来，香港一直沿用至今的联系汇率制度也在这个时期被确定下来。

脉络纵横



1983年9月24日，机敏的香港人发现，刚刚出炉的中英第四轮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公报上，省略了公报惯用字眼“有益的和有建设性的”这几个字，其中的含义可谓不言而喻，港人对香港前途的担心又加重一分。这个消息，对原本已经下跌的港元，又是一记沉重的打击，港元兑美元跌至9.6:1，创历史新低。这一天的香港，满街都是抢购日用品和抢兑美元的人们，外商拒绝用港币交易，这天刚好是星期六，后来人们就把这一天称为“黑色星期六”。

港元的下跌并非突然，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就埋下了伏笔。1973年10月爆发了第四次中东战争，由于美国等国家对以色列的支持，有阿拉伯背景的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决定将石油减产、提价、禁运、收归国有，这一系列手段促使美国和西方其他各国发生了石油危机，香港也被卷入其中。因受石油危机的影响，通货膨胀加剧，美元贬值。港英政府宣布，港元与美元脱钩，实行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在这样的大环境下，香港六七十年代高速增长的势头开始受阻，经济飞速增长已到了强弩之末。

从1978年开始，港元终于保不住稳定的态势，开始贬值。当时的贬值，主要是因为政府对货币欠缺管理，外贸连年赤字，信贷过度膨胀，资金大量流入。上述因素首先造就了1981年香港地产、股市的高潮，但这个形势最终导致了市面上港元货币量大幅增加，再加上美元逐渐恢复元气，港币的贬值压力就更大了。

1982年9月，撒切尔夫人访华，中英谈判正式开始。中英谈判可以说是一场“硬碰硬”的谈判，虽然双方的筹码、目的都不一样，风格却惊人地

相似，都以强硬著称。几轮交锋下来，谈判陷入了僵局，一年之内港元下跌了1/3。

1983年9月，政治气氛日渐紧张，各种传言甚嚣尘上。当政治动荡的时候，经济往往也受到冲击。中英谈判僵持不下，人们对香港的前途有诸多揣测，加上英国反复强调香港离开了英国的管治，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将会全面倒退，似乎“只有英国管理香港，香港才会繁荣”。港英政府为了自身统治的需要大肆抨击中国，造成香港民众对内地的隔阂与误解。一时间，外交途径解决香港问题的道路似乎行不通了，民众信心大为下降。

抱着对香港前景的怀疑，大家都不愿意再继续持有港币，转而纷纷挤兑美元。九月风暴的时候，美元在香港市面上几乎被买断了，所有的兑换店已经无美元可兑了，而港元数量却急剧增加，通货膨胀不可避免。东西贵了，民众自然想将港元脱手，换取一些日用品和能够保存的东西。于是，市面上掀起了抢购日用品的风潮。这时的香港哪里还有东方之珠的美态，简直成了世界末日的前夕。

形势危机，英国政府反倒暗自高兴，觉得这又是一个可以大做文章的机会。9月23日，撒切尔夫人发表谈话，说香港“前景不明”，“正面临重大的金融和政治动荡”，此言一出，形势更加恶化。港英当局财政司司长彭励治攻击香港中银集团大量购买美元，“做坏市场”，还发出警告，除非中国“对谈判的进展给予肯定的表态”，否则港元的下跌不可能停止。中国政府随即针锋相对地指出，发行港币是港英政府的事情，本身就与中国无关，市面上流通大量的港币并不是中国发行的；谈判是双方的责任，怎么能单说中国的谈判态度决定了港元的升跌呢？再者，英国借此机会向中方施压，威胁说如果英国不继续统治香港，香港必然会崩溃。中国则质疑，香港如今这个样子，恰恰是在英国的统治下发生的，英国又有什么理由来下这个论断呢？

经过“黑色星期六”之后，港英政府也觉得照此下去，不仅外资、华资企业遭受损失，就连英资企业也会跟着倒霉，于是急忙研究对策。9月25日是星期天，香港汇市休市，港英政府趁机发布一份公告，宣布政府正在积极推行一项新的货币稳定计划，研究一种新的货币发行机制。同时宣布，在香港的任何人使用外汇交易均属违法，并提高存款利息3%以支持港元。

9月26日，香港汇市重新开市，港元终于止跌反弹，上升到8.40港元兑1美元。到港英政府推出“联系汇率”之前，港元已经逐步稳定在八九港元兑1美元之间。

历史回响

“黑色星期六”的危机已经过去许多年了，从这个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出，将政治和经济搅在一起，往往会导致灾难性的结果。尽管政治与经济在一定程度上是有联系的，但是如果将经济从属于政治，仅仅为政治服务，就会本末倒置，最后酿成苦果。由此可见，香港需要相对稳定的局势，才能使国内外投资者对香港的前途充满信心，这对于中英双方都是有利的。

一句话点评

吃一堑长一智，经此一役，世人都明白，在香港回归前夕，英国方面拿经济作为政治的赌注，打所谓的“经济牌”，是极为不明智的。

“谈”回来的香港



邓小平与撒切尔夫人相互祝酒

关键词

关键时间 1984年12月19日
关键人物 邓小平 撒切尔夫人
中英双方谈判代表
关键词 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

背景扫描



自1982年中英领导人会谈以来，中英双方便举行了多达22轮的谈判。谈判前期，两国代表团团长分别为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姚广和英国驻华大使柯利达，后来分别由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周南和英国新任驻华大使伊文思接替。谈判主要分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第1轮谈判到第6轮谈判，主要议题是1997年后香港的安排；第二阶段是第7轮谈判到第12轮谈判，主要议题是英国如何维护其在香港的传统利益和地位；最后一个阶段是第13轮谈判至第22轮谈判，这一阶段的议题有两个，讨论过渡时期的安排和政权交接事宜，研究解决遗留的具体问题和商定最后文件。

从谈判的主题便可看出，英国的立场在不断地转变，而中国则始终坚守自己一贯的立场，当然在某些不妨碍中国收回香港的方面，中国也作了一定的退让。这次谈判是国际谈判中的经典之作，双方都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而据理力争。谈判曾数次面临破裂，但双方最终都保持了最大

的克制，以最大的诚意达成协议。终于在1984年9月结束了全部的谈判，并于同年12月签订了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

脉络纵横



1984年12月18日晚8时20分，一架大型民航客机呼啸着降落在北京机场。撒切尔夫人第二次访华，正式签署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19日下午5时30分，签字仪式正式开始。观礼嘉宾有400多人，另外还有180名中外记者。大家都等待着这一历史时刻的到来。仪式从签名到交换文本，共用了4分钟。当两国领导人互换声明文本时，大厅里爆发出热烈的掌声。邓小平、李先念来到撒切尔夫人面前，举起香槟酒，笑容满面地祝贺中英双方完成了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550万香港市民、10亿中国人和全球无数双眼睛，从卫星转播的电视荧屏上，观看中英关系发展史上这闪光的一刻。蒙在“东方明珠”上的尘垢，强加在中国历史上150多年的耻辱终于被冲洗干净了。

看着令人激动的画面，我们不能忘记，这胜利是历经两年，经过22轮的艰苦谈判而取得的，得来不易。

撒切尔夫人制定了“以主权换治权”谈判策略，即“在承认中国对香港的主权的原则下，由英国继续大体像过去那样管治香港”，他们的“97后模式”是：香港回归，英人治港，而非港人治港。这是英国首相府事前分析的最大让步情况，企图让中国收回名誉主权，英国继续管治香港30年、5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这样就可以以一个新的不平等条约，来代替三个旧的不平等条约。可惜，英国政府的如意算盘打错了。对英国这种“以退为进”的策略，中国的对策则很简单——“任你几路来，我只一路去”，主权、治权一个都不能少。一个能很好反映中国这种策略的例子是，中国前外交部部长助理周南曾回忆，邓小平交待他们谈判的时候，对英国“一点也软不得”。正是凭这句话，中国在中英谈判中一直处于强势。

英国一开始时也是持强硬态度。英国前外交大臣杰弗里·豪和外交部其他官员，原本主张尽快在谈判中向中方表示不再谋求1997年后继续管治香

港。但是，撒切尔夫人认为“没有理由作出这种让步”。她甚至主张，“要把每张讨价还价的牌都使用到最佳效果”。这就是撒切尔夫人抛出“三脚凳”牌的前兆。所谓“三脚凳”，就是在中英开始对香港问题谈判时，港英当局企图以正式成员身份参加，造成中英港三方共室的事实，以达到“还政于港”，使香港成为一个政治独立实体的目的。

1983年6月30日，港督尤德奉召返回伦敦，随同尤德来到唐宁街10号的还有9名港府行政局的议员。显然，铁娘子是把他们与港督作为另一只“脚”来加强英方同中国谈判的阵容。

7月4日，撒切尔夫人在唐宁街10号会见了尤德及香港议员代表。这天晚上，首相府发言人宣布：“首相和外交大臣重申他们对香港承担的义务和他们设法达成的目的。这些协议应该是议会、中国和香港人民都能接受的……”

7月7日，尤德自伦敦返港举行记者招待会。这时记者们已经获悉英国谈判代表团的名单中有尤德，而且排名第二，便问他：中英第二阶段的会谈与第一阶段有何不同。尤德意味深长地回答道：“不同之处是有我参加。”记者们向尤德问了最要害的一个问题：“你是代表英国参加谈判，还是代表谁？”在记者穷追不舍的逼问下，尤德打开天窗说了亮话：“我是以港督身份代表香港市民参加谈判。我不代表他们又能代表谁呢？”这位总督大人到底还是一语道破天机。总督的话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香港的左翼报纸立刻表态说：“你尤德是英国人，怎么能代表香港人呢？”“中英两个国家谈判，把香港人弄进去干什么？”一些头脑清醒的港人马上意识到，这是英国玩的“三脚凳”策略。他们指出：“英国人正在玩一个阴谋。如果中国政府落入圈套，那么就会面对着与自己的同胞——香港人作战的尴尬处境；如果香港落入圈套，就会为英国人尽义务，把辛辛苦苦从内地争来的好处全都让给躲在后边的英国人。”

中国政府及时作出了强烈反应。7月8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发表谈话：“我们注意到了这个消息。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会谈是中英两国政府之间的双边会谈。尤德先生是作为英国政府代表团的一个成员参加会谈的，因此他在会谈中只代表英国政府。”

中国政府的强硬态度，迫使撒切尔夫人放弃“三脚凳”牌。英国外交部急忙发表声明，说尤德“当然将作为英国代表团的成员参加会谈”。

在双方僵持的同时，由于英方散布“香港前途不明”的论调，致使香港发生“金融风暴”，港元汇率及股市急剧下泻。香港经济波动，英方损失也很惨重。不久，撒切尔夫人与港英当局采取了干预汇市、稳定港元的措施，使金融危机得以化解。

就在谈判接近破裂之时，撒切尔夫人终于在1983年10月4日授权柯利达，可以在谈判中向中方表明，英国不再坚持1997年后香港仍由英国管治，也不再谋求任何香港回归后的“权力关系”，谈判得以继续展开。但是英方在会谈中不时提出与其承诺相违背的主张，试图让英国人在1997年后香港新行政体系内继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

到了第三阶段的会谈，中英开始谈判各种回归的程序和过渡期的问题，此阶段谈判最大的分歧是关于中英联合机构的问题。中方表示，如英方同意设立联合小组并以香港为常驻地，该小组进驻香港的时间及1997年后是否继续存在一段时间都可商量；否则，谈判中止。翌日，英国方面的态度果然软化下来，同意建立联合机构。中英双方将机构名称定为中英联合联络小组，1988年开始进驻香港，持续工作到2000年。

由于第三阶段的谈判正值中国某次人民代表大会期间。这次人民代表大会上有大量来自香港和外国的记者，大家的关注重点都是香港问题，因为此次大会即将审议通过包括“一国两制”和1997年恢复行使主权后对香港将采取的一系列特殊政策为主要内容的《政府工作报告》。在此前，驻军问题一直是中英谈判的一个难点。会议期间，邓小平特意对香港采访团重申了中国政府一定会在香港驻军的立场。周南也对英新任驻华大使伊文思表示，中国政府这个立场是坚定不移的，没有谈判的余地。英国政府也无言以对，驻军问题就这样一锤定音了。

至此，谈判所有的障碍都一扫而空，1984年7月30日，双方本着互谅互让的精神，就有关文件的形式和名



>>中英签署《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

称达成一致意见：协议采用“联合声明”的形式，内容包括中英两国政府所发表的互有关联的声明。9月18日，双方就包括驻军、选举、协议文本草案在内的全部问题达成协议。

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是一个历史性的协议，它正式确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香港在阔别祖国150多年后，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中，香港的历史又揭开了新的一页。

历史回响

1984年，撒切尔夫人的外交顾问鲍威尔在中英签署关于香港前途的联合声明的仪式上，再次见到了邓小平。他回忆说，当日签字仪式之后，邓小平和撒切尔夫人又一次会面了。“我记得，正是在这次会面中，他们两人相约1997年香港再见，相约要到香港出席交接庆典。”——这便是脍炙人口的“钢铁协定”。“这次会面气氛可是与前一次完全不同了，两人兴致很高，领袖们的成功感可以从他们的互相祝贺中看出来。”鲍威尔如此评价邓小平和撒切尔夫人1982年和1984年两次会面的差别。很可惜，这次的“钢铁协定”没能实现，邓小平，这位规划香港回归的总设计师，甚至没能到回归后的香港“走一走，看一看”。但是通过香港回归，他“一国两制”的伟大创造已经被证明是正确的、可行的。香港的回归不仅洗刷了中华民族百年的耻辱，更为将来中国解决台湾问题提供了一个可靠、可行、可信的例子，其历史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一句话点评

联合国前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认为：中英两国解决香港问题的方式应该大力提倡，这恰恰是我们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非常需要的。

香港经济恢复元气的三部曲



美丽的香港夜景

关键词

关键时间 1945—1997年

关键词汇 积极不干预主义

背景扫描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香港经历了三年零八个月的日占时期。在这段黑暗岁月里，香港在经济、政治、社会各方面都遭受了无情的打击。日本人将香港作为自己的战略补给地和军事运输港，毫不留情地搜刮香港的一切物资，破坏香港原有的经济秩序。

战争结束后，英国政府利用中国国民政府的无能，抢先占领香港，建立军政府，恢复了对香港的殖民统治。战后的香港可谓百废待兴。

脉络纵横



港英政府恢复香港经济元气的三部曲，第一步就是继续实施一贯的“自由港”政策。在香港被英国占领的早期，港英政府就宣布香港为自由港，对香港经济的管理可

以说是自由放任的。那时的所谓自由经济政策大概可以与亚当·斯密倡导的经济自由主义相提并论，由市场这只“无形的手”主导一切，政府不加以限制和管理。战后，香港仍旧恢复自由经济政策，任何人可以在香港买卖任何物品而免收关税，后来香港也只对烟草、酒类、不含酒精的饮料、甲醇、碳氢油类和化妆品这六类商品收税。自由经济政策，使香港的商品价格比其他地方要低许多，刺激了消费者的消费需求。同时各大商家也愿意将商品放到香港去售卖，一些世界名牌如LV、GUCCI、CHANEL等都在香港设立旗舰店，每个季节的新式服饰都在第一时间出现在香港分店的橱窗上，到了香港就如同到了巴黎总店，各国消费者纷纷涌入，带来了无限的商机。看到香港有利可图、政局稳定，外国资本也源源不断地流入香港。加上香港本身自有的优良地理资本——是世界三大良港之一，靠着传统的转口贸易和新兴的工商业，香港一跃而成为国际大都市，来往香港的各国商人、消费者络绎不绝。

恢复香港经济元气的第二步，是制定“量入为出”的财政政策。20世纪50年代，英国将香港的财政权力下放给港英政府，这时港英政府终于可以自己决定财政预算和使用财政结余了，还可以发行公债和借款，因此拥有充裕的资金大力发展社会事业。与此同时，关于财政方面，港英政府采取了谨慎的“量入为出”的财政方针，也就是说，不搞赤字政策。历届财政司司长都以财政盈余为目标来制定财政预算。这种政策毫无疑问是有效的，从1958年到1997年近40年中，香港只有6年是有财政赤字的。截止到1997年，香港的财政储备高达1 000亿港元左右。富裕程度可见一斑。

香港的金融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1984年港英政府颁布银行条例，规定任何银行只需每年交5 000港元的牌照费就可以营业了，至于银行本身的实力和管理则不干预。港英政府的初衷本是迅速恢复金融，吸引外资，弥补日占时期英资银行被日本强行关闭的损失。但是有的银行根本不具备相应的经济实力，这使得银行业鱼龙混杂，破坏了金融市场的秩序。20世纪60年代，廖创举银行、恒生银行等都发生了挤兑风波，最后只能由政府出面保证或接管。尽管经济自由主义对经济发展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也不必讳言其负面作用，港英政府为改变“自由放任”政策带来的不良经济后果，随后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紧了对经济的管制。比如发布命令禁

止外国银行到香港开设分行，矫枉过正，这在一定程度上阻滞了香港经济的发展。拒绝国际金融准备将香港作为亚洲美元市场，这个事件让香港失去了一次极佳的拓展金融市场的机会。

20世纪70年代，港英政府终于认识到既不能对市场放任

自由，也不能对市场监控过严，应该取中庸之道，适当地管制经济。于是采取了新的经济政策——“积极不干预主义”。它的核心是原则上坚持自由主义，但是政府要在这个基础上“极少地干预”经济活动。这项政策为香港的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因此香港经济在整个70年代都保持着向上发展的势头。同时，它也成为香港97回归前港英政府采取的一项长期政策。

恢复香港经济元气的第三步是维持货币的稳定。香港的货币在外汇市场的兑换值随着港英政府的政策改变而高低起伏。起初的港币是不能在国际市场上自由流通和兑换的，它属于英镑区的一员，只和英镑挂钩，而英镑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就加入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即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货币与美元挂钩的货币体系。这样，战后的港元（日占时期香港主要使用日本的军用钞票）依旧和英镑挂钩，英镑则与美元挂钩，也就是说港元和黄金挂了三层钩，俗称“三挂钩”。为了稳定货币价值，这种固定汇率的货币体制本也无可厚非，但是错综复杂的关系，繁琐的汇兑手续，显然不利于香港经济的发展。20世纪60年代，美国宣布停止黄金与美元之间的相互兑换。英国宣布脱离与美元的固定汇率关系，采用自由浮动的货币汇兑制度，再将英镑区缩小为英国本土、爱尔兰和直布罗陀，对其他原英镑区货币则不再干涉和限制资金流动。于是港英政府宣布港元与英镑脱钩，转与美元挂钩。至此货币不再与黄金挂钩，金本位制彻底瓦解，取而代之的是纸本位制。英国取消外汇管制后，香港立即实行了浮动汇率制，港元按市场规律自由浮动。此后港英政府加强了对汇市的管理，尽管香港汇市波动频繁，但是运作还算基本正常。



>>香港的证券市场

正因为港英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符合市场规律及香港经济发展的货币政策，使香港得以顺利渡过1983年的港元危机，恢复了外汇市场的稳定。

历史回响



港英政府为了迅速恢复香港的元气，在经济上采取的三大措施：继续实施自由经济政策；制定“量入为出”的财政政策；维持货币稳定。这三大政策在迅速恢复经济方面的效果是显著的。除此之外，香港还通过对产业结构的调整，向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发展，使越来越多的西方技术和资金流向香港。优良的地理位置，健全的市场机制，开放自由的经济政策，使得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香港得以迅速发展并创造了奇迹。

一句话点评



由于及时调整经济方针，香港经济化险为夷，赢得高速的经济增长，终于跻身亚洲“四小龙”之列，连英女王都称之为“皇冠上的明珠”。

美貌与智慧并重的香港小姐



1990年港姐冠军袁咏仪

关键词

- 关键时间 1947年
- 关键人物 香港小姐
- 关键事件 选美比赛
- 关键词汇 美貌与智慧并重的选美

背景扫描



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世界各国经历了长时间战争的蹂躏，都身心疲惫。为了激发大家收拾心情、重建家园的热情，同时为了激活被战争破坏的市场经济，各国都相继举办了各式各样的选美活动，选美风潮应运而生。

在中国，有“东方巴黎”之称的上海早就已经对战争感到厌恶。民生凋敝的现实，让上海觉得自己愧对“东方巴黎”的称号，它甚至等不及日本投降，就开始了自己昔日灯红酒绿、莺歌燕舞的都市生活。于是，1945年在上海诞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位选美冠军——“上海小姐”谢家骅。

香港与上海同是亚洲的国际大都会，有“东方之珠”之称的香港当然不能让“东方巴黎”专美于前。1947年，香港宣布举办首届“香港小姐”选举，从此拉开了延续至今的港姐选举的帷幕。

脉络纵横



1947年，李蓝夺得首届“香港小姐”冠军后，就开始步入娱乐圈，她接拍了战后第一部港产片——《情焰》。李蓝在娱乐圈取得了较大的成功，生活也美满幸福。首届“香港小姐”亚军同样成绩不俗，她就是后来风靡全球华人圈的流行歌后——白光。

可以说，无论是李蓝还是白光，选美给她们的生活带来了戏剧化的改变，使她们从普通女孩摇身一变成为家喻户晓的明星。这样巨大的转变，极大地鼓舞了其他梦想“飞上枝头变凤凰”的女孩，选美逐渐成为大多数女孩心目中理想的成名捷径。

1949年，新中国成立了，“上海小姐”选举停止，大量内地移民涌向香港。内战、移民使香港的社会开始不稳定起来，加上对时局的忧虑，“香港小姐”选举也于同年停止了。

再次选举“香港小姐”已是1952年，这一次选举出来的“港姐”冠军，可以直接代表香港参加由美国举办的“世界小姐”的选举。这次的选举有40多人参加角逐。经过一系列紧张激烈的初赛、复赛后，来自上海的岭南大学肄业生——但茱迪，摘下了“港姐”的桂冠。但茱迪在随后的“世界小姐”选举中也取得了第四名的好成绩，令世界第一次领略了东方人的美态。扬名国际后，但茱迪被美国环球影片公司相中，签订了电影合约，并对其进行了长达半年的影视专业训练。但茱迪曾被聘参演好莱坞光头红星尤伯连纳的名片《国王与我》，她在片中饰演国王的一位妃子。此后不久，她便息影嫁人，一心一意在家相夫教子，过着美满的生活。

整个50年代，“香港小姐”选举仅举办过3次。这样断断续续地一直到了1973年，情况开始逐渐稳定下来，由香港无线广播电视公司承办，每年推出一届。经过一段时间的演变，“花瓶型”（指光有外表而内里空虚的人）的选美路线逐渐转变为注重综合素质，“美貌与智慧并重”成了“香港小姐”选举的标准和口号。由于承办单位的特殊性，“香港小姐”除了选举代表香港的美丽大使外，还成为无线电视发掘优秀影视人才之源。无



>>1988 年港姐亚军张曼玉

线电视通常会在众参选佳丽中挑选有明星潜质的佳丽，然后签约为旗下艺人。1973年后，市场化了的港姐选举，既满足了参赛者的愿望，又符合承办者的利益，是一种盈利高、风险低的“双赢”活动。

“空姐”赵雅芝，19岁那年参加了复办后的首届港姐选举，获第四名，随后签约无线。1980年电视剧《上海滩》中冯程程一角将她的事业推向巅峰，赵雅芝凭此剧一跃成为港台地区人人熟知的影视明星。赵雅芝随后又出演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剧集，直到现在仍然有剧集出台，不愧是影视圈的“常青树”！

1983年诞生了一位港姐史上堪称“最成功的港姐”——张曼玉。张曼玉当年只获得了亚军，其后加入演艺圈，赢得华人圈几乎所有电影最佳女主角的奖项，连庄金马、金像的影后桂冠，还是第一位在康城电影节夺得影后的中国人。

张曼玉的成功可以说是前无古人，但却后有来者。自她以后的袁咏仪、郭霭明等，也都事业生活双丰收。

此外，1987年港姐冠军杨宝玲获得了5个选美头衔，包括“环球小姐”第五名；1988年港姐冠军李嘉欣被誉为“最美丽的港姐”；1989年港姐冠军陈法蓉在世界华人圈也是小有名气。

历史回响



起于上世纪40年代，兴盛于七八十年代的“香港小姐”选举，已成为香港通俗娱乐文化的一个符号。从1987年开始到1991年是“香港小姐”选举的巅峰时期，从那以后，“香港小姐”选举日趋走向平稳期，没有太多的惊喜，也没有太多的失望。

一句话点评



经历三十余载，人们逐渐改变了对“香港小姐”选举的态度，不再期望“香港小姐”能代表香港的形象，而更多地视之为民间消遣性的娱乐节目，这正好凸显了香港这个国际商业都市的特征。

芝麻开花节节高

——中银大厦的设计与建设



中银大厦

关键词

- 关键时间 1982—1990年
关键人物 贝聿铭
关键事件 设计、建设中银大厦
关键词汇 东方之珠的代表 香港的地标

背景扫描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香港正处于经济繁荣的“亚洲四小龙”时期。香港的金融机构一来有了充足的资金，二来现有的办公建筑不能满足其日益增长的办公需求，三来为了彰显自己在香港的金融地位，纷纷投资兴建摩天大楼。

老牌英资银行香港汇丰银行是首先发起者。他们的宗旨是要“建造全世界最好的银行”，为此他们开出了一项优厚而又极富挑战性的条件：建筑师拥有绝对自由的权利，不用考虑建设成本，但设计必须体现“高技能”的建筑特性，还要显示出汇丰银行雄厚的经济实力及英国高贵典雅的气质。最后，汇丰银行相中了英国高技派建筑师诺曼·福斯特。

相较之下，中国银行香港分行的启动晚了些。汇丰银行已如火如荼地建设之时，中银大厦的设计才刚刚开始。恰逢20世纪80年代，中国与英国正在进行香港问题的谈判，于是中银大厦和汇丰大厦这场建筑界的较量便被或多

或少地蒙上了一层政治色彩。

脉络纵横



在香港维多利亚港一侧，有一栋被称为香港地标、东方之珠的代表性建筑，它就是节节高升的中银大厦。

设计中银大厦的是著名的美籍华裔设计师贝聿铭。贝聿铭出生在中国的广州，祖上是苏州的望族，18岁时远渡重洋到美国留学，攻读建筑设计。1979年贝聿铭为美国约翰·肯尼迪图书馆设计的大楼，以新颖独特而被公认为美国建筑史上最佳作品之一。因其杰出的表现，1979年被美国建筑界宣布为“贝聿铭年”，他最为经典的作品是法国罗浮宫扩建工程的金字塔。而应邀设计中银大厦，除了可以又一次展示他惊人的才华外，还因为他与中国银行香港分行有着深厚的个人情感。原来，贝聿铭的父亲就是中国银行香港分行的创始人之一、原任中银香港分行的经理——贝祖诒。贝聿铭自幼就经常在香港中银玩耍，正是这份亲切感令贝老选定中银大厦为其收山之作。

中银大厦的设计灵感来自于中国的一句古谚语：芝麻开花节节高。它坐落于香港的中环地带，位于香港中西区花园道与金钟道的交界处，地面积只有8 400平方米，四周被高架路束缚着。这样的条件对设计师来说，无疑是一场巨大的考验。大厦的外观是一个多面体，从任何一个方向去观察它，形状都不一样。大厦底部剖面是一个边长52米的正方形，正方形的两条对角线将正方形分为四个等边三角形，大厦就随着楼层的增高，每个三角形所延伸的三角柱体逐渐消失，25层消失一个三角柱体，38层又消失一个三角柱体，51层消失了第三个三角柱体，最后只剩一个三角柱体延伸至第70层，一直推向天际。大厦只有四角12层高的巨型钢柱支撑，室内无一根柱子。大厦至塔顶的墙体内外，用一系列混凝土和钢筋焊接成三角形，斜撑起整个楼体。这种节节升高的形状，就如贝聿铭自己所说的，就像有着强壮外墙、坚韧圆管的竹子。大厦不仅因为这样的设计而节约了1/3的钢材，还可以有效地防止台风的袭击。

大厦的外墙镶嵌着银色的反光玻璃，凸显出大厦多面体的特色，白天与蓝

天白云相映，夜晚则犹如一颗璀璨夺目的钻石。它流光溢彩，反射着周围城市热闹繁华的景象，华丽非凡。底座则用深浅不一的灰色花岗岩饰面，这样既不与塔楼铝和玻璃的幕墙冲突，也有利于周围环境的绿化设计，一举两得。

由于中国人比较传统，尽管封建迷信破除已久，但对于风水一说人们还是笃信有加的。原本大厦的设计中，有一股泉水，自大厦的后门流入，从前门流出，贝聿铭如此设计是想为大厦增添一丝流动感，让流动的水与不动的墙相映成趣。但在中国风水学中，水为财，水源即财源，让水流走了意味着会让财流走。银行本为蓄财的机构，中银大厦作为中国银行香港分行的总部，怎么能散财呢？于是贝聿铭修改了设计，将水在一个大池中蓄起来，并在池中养金鱼（即蓄养金钱，也是一个好彩头），按风水说，这样就把财蓄住了。此外，大厦设计好后，香港人认为它是不吉之物，因为其尖削的外形，像一把三棱形的刀。刀乃杀生之器，此为一凶；刀会切去阴阳之间微妙的平衡，而大厦的多面体结构造成其多边多角的形状，会殃及所有尖角对应的邻居，此为二凶。因此，大厦刚建造时遭到了不少人的反对，经过中银香港分行和贝聿铭多次向港英政府据理力争、反复交涉后，



>>中银大厦

中银大厦终于在1982年开始规划建设，并于1990年建成并交付使用。

中银大厦像贝聿铭的许多作品一样，将几何造型与形象力相结合，从任何一个角度去观看都令人赏心悦目。建筑界人士普遍认为，贝聿铭的建筑设计有三个特点：一是建筑造型与所处环境自然融合；二是空间处理独具匠心；三是建筑材料考究和建筑内部设计精巧。“他往往在设计中既保留着传统的建筑符号，又巧妙地使用现代的建筑材料和技术，以构思严密、设计精心、手法完全而著称于世。”诚然，综观中银大厦，它使用的是最为简单、传统的几何造型，没有丝毫花哨的设计。但是，就是如此简单的造型却蕴含了复杂的工程力学，既达到抗风的目的，又节约了材料，还扩大了室内空间。外部相同的玻璃装饰，却随着周围环境和观察角度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效果，可以说是简约而不简单，用最平常的材料勾画出最不平常的风景。此外，玻璃幕墙还有效地利用了自然光，增大了采光的程度，把光和空间有效地结合起来，产生变化多端的光影效果，“让光线来做设计”，一直是贝聿铭由始至终贯彻的信念。大厦两旁还参照了古朴典雅的中国园林设计，融入了中国传统建筑的精髓，富有中国山水画的意境，显示了其一直追求的依托传统又超越传统的设计风格。

2001年的“9·11”事件给建筑界带来了巨大的震撼，纽约世贸中心的毁灭给众高楼大厦的设计者敲响了警钟，如何应对恐怖袭击是现代高楼建筑所面临的挑战之一。双子大楼没能逃过一劫的原因是，大楼的建筑主材料——钢，经不起高温的考验。几千加仑的汽油燃烧可瞬间放出1 000摄氏度以上的热量，钢材在这种环境里几乎像黄油一样，更不用说支撑整个建筑的重量。纽约世贸的双子大楼耗钢19.2万吨，当上层遭受撞击后，钢材在熊熊大火中软化，承受不起楼层的重量而造成内爆，最后坍塌。因此，尽管大量使用钢材的建筑在常规情况下可以抵挡一定的冲击，但是面对热量急剧升高的情况，还是有心无力。而中银大厦单纯使用钢材的柱子只有12层楼高，除非使用导弹，否则飞机等是不可能在12层的高度里接近中银大厦的，12层以上的中银大厦主要靠墙体内的一系列混凝土和钢焊接而成的三角形支撑，不仅目标分散，不易被一次攻击，而且混凝土的耐温条件比钢材要好得多，从这个角度而言，中银大厦的防恐怖袭击能力比纽约世贸中心要强一些。

中银大厦的建筑设计糅合了高超的科学技术与卓越的艺术美感，在香

港众多摩天大楼中极富代表性。

历史回响

中银大厦无论在视觉上还是情感上都给香港市民带来一种全新的感受。它除了是香港经济腾飞的见证，其节节高升的结构更是香港人不屈不挠、努力向上形象的最好诠释，而基座的麻石外墙代表“长城”，代表中国，它作为香港的地标是实至名归的。

一句话点评

中银大厦非同一般的几何建筑形态广受赞赏，有人把它比作“一座闪烁发光的金刚钻宝塔”。

彭定康“政改”风波



彭定康

关键词

- 关键时间 1992—1997年
关键人物 彭定康 鲁平 周南
关键事件 彭定康政制改革
关键词汇 后过渡时期的政治变迁

背景扫描



自1984年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签订以后，香港在中英双方的协调下，逐步进入繁荣稳定的过渡时期。根据中英《联合声明》的精神，在1997年之前，香港仍由英国主持行政，中方在不违背《联合声明》和保持香港平稳过渡的原则下，对英方的一切行政管理活动予以最大的支持。尽管有一些分歧和争议，但两国本着互信互利的原则，对分歧和争议都采取了兼容并蓄的政策。但是当历史的车轮行进到20世纪90年代之后，香港进入后过渡时期，随着“末代港督”彭定康上任及其“政制改革”方案的抛出，香港的前途陡增变数。

一方面是英国想利用过渡时期的最后几年，一改以往在香港问题上被动的局面，主动出击，企图在香港培养其“97后”代理人，想将香港的未来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另一方面，中国政府不可能对英国的行动坐视不理，在港英政府颁布“政制改革”的方案后，中国政府也开始针锋

相对地实行自己的对策。双方各行其道，各自为政。在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后，双方举行了17轮谈判，但最后仍然无功而返。就这样，新一轮国际政治的角力、大国之间的博弈又展开了。

脉络纵横



1992年7月9日，彭定康抵达香港启德机场，面对列队欢迎的士兵和人群，显得意气风发，丝毫没有“末代港督”的落魄感。此刻的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苦心谋划的“政制改革”方案，会在香港掀起轩然大波。

彭定康是英国保守党的要员。20世纪60年代开始步入政坛，二十多年间由小小的内阁办公厅文书一直干到内阁成员，1990年更一跃成为保守党主席，政途可谓平步青云。除了自身的努力，良好的人际关系也为他赢得了不少的政治筹码——他与当时的英国首相梅杰、外交大臣赫德等私交甚笃。1992年，彭定康为梅杰连任首相和保守党继续执政，立下了汗马功劳。而彭定康自己，却在苦心经营13年的巴斯选区意外落选，无缘进入新一任内阁。正值政治家黄金年龄的彭定康，遭遇了其政治生涯的第一个瓶颈（第二个瓶颈就是卸任港督后的政治前途）。就在彭定康为政治前途一筹莫展的时候，昔日的好友——英国首相梅杰伸出了援手，任命他为第28任香港总督。按任期来算，彭定康铁定会成为香港的“末代总督”，要亲眼见证“日不落帝国”的旗帜在东方之珠落下。原本这个烫手的山芋谁也不愿意去碰，众人无一不避之不及。但彭定康却不这样认为，他意识到，这是一次今后重返英国政坛的绝佳机会。只要把握好这次机会，在香港最大限度地维护英国的利益，甚至根本扭转多年来英国在香港问题上被动的局面，顺利完成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那么1997年卸任之后，自己在英国本土乃至国际之间的政治地位将会得到一个巨大的提升，重返英国政坛指日可待。梅杰正是看重彭定康这样的处境，认为“哀兵必胜”，任命其在此时担任这个尴尬的职位，他肯定会力求表现，为英国在香港讨回一些好处。于是，彭定康满怀冀望地登上了扭转他和英国命运的航班。

彭定康履任不久，香港媒体即转引官方消息说，新任港督准备着手改

革政治制度。此消息一出，舆论顿时哗然，中国政府立刻警惕起来。1992年9月16日，也就是英国的《金融时报》透露英方可能对香港的现行政治制度进行改革之前的两天，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周南和副社长张浚生，曾经询问过彭定康定于次月施政报告中有关1995年选举的安排，彭定康则以未充分准备为由拒绝回答。直到9月25日，英国外交大臣赫德才在会晤中



>>江泽民与彭定康

中国外交部部长钱其琛时，通报了有关彭定康准备着手改革政制的施政内容。钱其琛当即回复赫德，此举属英国单方面安排选举事宜，违反了中英《联合声明》的原则，恐怕会引起中英的公开争议。次日，英国驻华大使麦若彬就此问题又口头通报了中国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鲁平。10月3日，鲁平再次通知麦若彬，彭定康的“政制改革”违反了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劝英方不要一意孤行。但彭定康仍于10月7日发表了他的第一次施政报告。该报告长达两个多小时，“政制改革”方案完全浮出水面，几乎占去了施政报告篇幅的1/4，可以说是报告的主要内容。从施政报告的发表可以看出，彭定康改革政制是经过充分准备的。从英方自通报中方到施政报告发表期间的态度可以看出，英方完全是支持彭定康的，之前一直对中方的警告熟视无睹，虚与委蛇，以期演成既成事实。

彭定康“政制改革”的核心是争取广大香港民众的支持，大打所谓“民主牌”。其内容主要涉及两项：一是调整行政局和立法局的关系，实行两局完全分立；二是改变（1994—1995年）选举方式。实行行政局与立法局分家，也就是说立法局可以制约行政局，未来香港的总督或特首只能是行政长官，不能插手立法局。此种体制完全是西方分权制衡理论的产物，只要掌握其中一个权力，就能够制约另一个权力，类似于今天西方国家的政权组织形式。香港原本就是一个行政主导的地区，早在英国统治时期，行政局和立法局就是分工不明显的两个部门，两局议员可以互相兼任，议员都由港督亲自任命。行政局向港督提供政策咨询，立法局向港督提供立法

咨询，他们只是港督的最高咨询机构，相当于智囊团，不具有任何政治和法律权力。这是英国为确保殖民地总督的统治意志和地位而设立的一种政治体制，在殖民地社会中是常见的。总督实际上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他只需遵守《英皇制诰》和《皇室训令》就可以了。另外，按“政改”计划，新的选举方式将原有的21个功能组别扩大为30个，全部或部分经过直选。这样的话，港英政府可以借由扶植亲英的民主派掌握大部分区议会和市政局的席位，立法局委员又由区议会和市政局的当选者担任，到时掌握立法局的就是亲英派。

港督集权制在英国统治香港的一百多年间都没有做过任何的改变，为什么临近香港回归的时候，却一反常态，大方地将香港总督的权力下放呢？英国的做法无疑是想在香港另立一个地方政权，将回归后特区行政长官的权力架空。如果彭定康的政制改革能够成功的话，那么未来的行政局任何议案都要通过立法局决定，香港的政治制度从行政主导变为立法主导，届时谁控制了立法局谁就控制了香港政局。此外，还要改革选举，两个改革一环扣一环。再加上中英双方在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中，规定了1994—1995年选举出来的官员，其任期会跨越1997年，1997年后，在官员的任期内将不再举行选举，所有官员都将搭上“直通车”，直接从港英政府过渡到特区政府。这样，回归前的最后一次选举就显得尤为重要，无论是选举的方式还是选举出来的官员，1997年后都将不变。如此一来，港英政府的用意就再明显不过了，只要将1994年至1995年的选举控制住，香港的未来也就在他们的掌控之中了。

英国的如意算盘打得啪啪响，中国当然不会上当。中方打从一开始就反对“政制改革”，希望通过对话解决争端。无奈英国无视中国的反对和呼吁，依旧实行所谓“民主化”香港的政策，实际是想把香港最终从中国分离出去。

面对日益严峻的形势，中国政府发出了外交上最严厉的措辞，鲁平在媒体面前公开指责彭定康是千夫所指的“千古罪人”。英方面面对如此强大的压力，不得不暂缓“彭定康计划”的进程，终于同意与中方谈判。谈判前后进行了17轮，其激烈程度一点也不亚于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由于双方都坚持自己的主张，使谈判非常艰难，进展缓慢。中国有一句形容非

常生气的俗语是“把头发给气白了”，由于鲁平已经满头白发，所以当时媒体戏言：“彭定康此举是要把鲁平的头发给气‘黑’了。”从中可以看出英方态度的强硬和固执是前所未有的。英方尽管暂缓了进程，实际并未停止行动，而是一边谈判一边继续实行计划。1994年，香港立法局经过十余小时的激烈辩论，最终通过了彭定康的施政报告。到1995年底，彭定康的计划已基本实现。

事已至此，中国政府也不再寻求对话解决争端了，而是加快完善香港基本法的步伐。针对选举已完成的既定事实，中方表明，将来香港官员坐“直通车”过渡至特区政府的时候，必须“验票”，符合资格的才许“上车”，不符合的就“下车”；香港未来的政治架构完全按照基本法的规定设立，所有不符合基本法规定的全部无效！

历史回响



香港回归已经10周年了，在这10年间，香港的繁荣安定是有目共睹的。当初彭定康抛出“政制改革”方案时，还有不少港人选择支持，这是因为他们对中央政府不了解和不信任，不相信香港资本主义制度“50年不变”的保证。而今日港人的这种顾虑已打消了，取代的是对中央政府的信任。人们有理由相信，香港的民主进程一定会越来越顺利。

一句话点评



邓小平曾经质疑彭定康在香港推行的普选：“对香港来说，普选就一定有利？我不相信。比如说，我过去也谈过，将来香港当然是香港人来管理事务。这些人用普选投票的方式来选举行吗？我们说，这些管理香港事务的人应该是爱祖国、爱香港的香港人，普选就一定能选出这样的人来吗？”

香港回归与中英交接仪式



香港交接仪式

关键词

关键时间 1997年7月1日
关键人物 江泽民 李鹏
查尔斯 布莱尔
关键词汇 香港主权交接

背景扫描



经过漫长的等待，香港终于在1997年7月1日这天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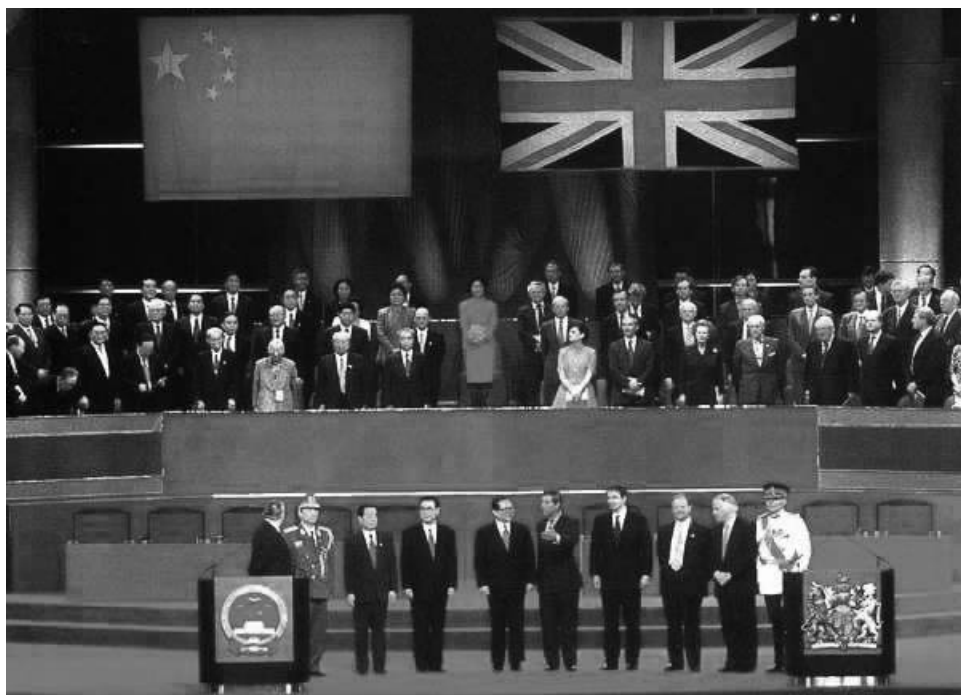
在香港回归的交接仪式上，中英双方领导人的心态可以说是完全相反的。我们现在看到的交接仪式似乎很平静，但殊不知内有乾坤。香港的回归，中国不仅洗刷了近代百年来屈辱的历史，还为将来祖国最终统一规划了美好的蓝图，自是意气风发，扬眉吐气。而对英国来说，经过22轮艰苦的谈判，又经过彭定康的“政制改革”，英国为了延续其在香港的统治寿命可谓煞费苦心，但到头来还是要面对日不落帝国的旗帜永远在香港消失的命运，自然是一万个不愿意。

脉络纵横



1997年的6月30日这天，香港即将回归，天公却不作美，一早就飘起了毛毛细雨，但乐观向上的香港人说这是老天为了洗刷中国的百年耻辱而降下的礼物。这天晚上，宏伟的香港会议展览中心新翼可谓星光熠熠，中英两国的最高领导人、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的贵宾和外交官知名人士齐聚一堂，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国务院总理李鹏，英国王储查尔斯、首相布莱尔、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尽数到场，来自700多家媒体的8 000多名记者云集会场，只为见证香港回归这一历史性的一刻。

面临如此重大的事件，会场的气氛有点拘束，从人们脸上严肃的表情就可以看出，当时大家情绪中都或多或少带有一丝紧张。双方军乐队最先进场。为了缓和会场的气氛，双方轮流演奏了4首乐曲。音乐是无国界的，



>> 香港交接仪式

轻松的音乐立刻让会场拘束紧张的气氛缓和下来，嘉宾们开始相互谈论聊天，还不时发出笑声。

离7月1日凌晨零点还有18分钟的时候，交接仪式正式开始。首先是双方仪仗队入场。中国派出的是三军仪仗队，是中国仪仗队中级别最高的，英国方面也派出了国家最高级别仪仗队——皇家仪仗队。双方礼号手吹响礼号后，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国务院总理李鹏、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钱其琛、中央军委副主席张万年和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步入会场，登上主席台主礼台。英国方面同时入场，登上主席台主礼台的有查尔斯王子、首相布莱尔、外交大臣库克、离任港督彭定康、国防参谋长查尔斯·格思里。待礼宾坐定，英国王储查尔斯王子开始致词。在致词中，查尔斯高度评价了中国的“一国两制”，相信香港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会继续繁荣安定下去，与世界各地都会继续保持频繁的往来。查尔斯表示，英国对中国履行中英《联合声明》充满信心，同时英国自身也会坚定不移地支持《联合声明》的履行。23时59分，大英帝国的米字旗和代表英国王室的狮子旗帜缓缓降下。

当历史的时刻前进到1997年7月1日零时零分零秒的时候，伴随《义勇军进行曲》升起在东方之珠的是五星红旗和紫荆花旗。这一刻，古老的中华大地沸腾了，13亿中华儿女同声欢呼“香港回家了”。不少在场的嘉宾流下了激动的眼泪。升旗完毕后，国家主席江泽民发表了香港回归的简短讲话，再一次指出香港特区政府将按照“一国两制”纲领实行“港人治港”，实现高度自治，中央政府将对特区政府予以全力支持。零时12分，交接仪式正式结束。

这次交接仪式，吸引了海内外社会的目光，一些幕后花絮也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这次的交接仪式，按照国际惯例，应由国家元首出席，但是英国的国家元首——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女王却没有出席。这一点受到了不少人的非议，英国——一个最讲究风度的国家，在这件事情上却是如此大失风度。

末代总督彭定康在交接仪式完成，即将离开香港的时候，捧着英国国旗痛哭流涕，这一场景相信也让人难以忘怀。彭定康为何而哭？是为自己任内“辛辛苦苦”一手操办的政制改革彻底失败而哭，还是为自己回英国



>>风光不再的彭定康



>>英国大兵黯然离开

之后的政治前途而哭？抑或是为英国在香港的统治彻底告终而哭？或许兼而有之吧。

凡是通过现场直播观看了交接仪式的人都会觉得奇怪，为什么英国国旗降下到中国国旗升起中间会有二十几秒的空隙？中国军乐队的指挥于建芳在交接仪式后终于揭开了这个谜团。原来，双方军乐队在刚到达香港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摩擦了。仪式前，中英之间因为乐队奏乐问题又发生了一次“一秒之争”，英国坚决要求英国国歌奏至6月30日的最后一秒，希望中国到7月1日零时零分零一秒再奏国歌。这种临时改变方案的做法又一次激怒了中国，于建芳说，当时火药味很浓，但他接到的命令是一一定要在7月1日零时零分零秒准时奏响国歌。据说英方在一开始彩排的时候很傲慢，但是听过中国所奏的4首乐曲——《茉莉花》《民族团结尽歌舞》《光辉时刻》《歌唱祖国》之后，态度马上有了180度的转变，急急忙忙地更改自己所要演奏的曲目。到了交接仪式当晚，英国军乐队的指挥也不知道是慌张把拍子打快了，还是故意想考验中国，一曲《上帝保佑女王》应该奏50多秒，最后只演奏了30多秒就完了。这个时候离零时零分零秒还有20秒左右的时间，现场一片沉静。中国事先只做了英国拖延时间的准备，万万没有想到

英国居然会加快演奏速度。就在这关键的时刻，于建芳悄声问旁边的联络官张景山“怎么办”，张景山是负责读秒的，他回答：“不管他，一切按原计划走。”说完继续读秒，等到他读到“58”的时候，于建芳把指挥棒举起来，国歌终于在7月1日零时零分零秒准时响起。

历史回响



交接仪式后，香港正式回归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也正式宣告成立。两三个月后，新成立的特区政府立刻受到了一次严峻的考验——亚洲金融风暴。但是特区政府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带领全港人民迎难而上，度过了危机，证明新生的特区政府是有活力和生命力的政府。回归后，香港与内地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民间交往越来越多，内地逐步开放的港澳自由行，拉动了香港的消费需求。中央政府也严格遵守《基本法》的条款，对香港实行高度自治、“港人治港”，但也决不是让香港放任自流、自生自灭，如抵抗金融风暴、香港“入世”和香港官员竞选国际组织领导人，中央政府都动用了自己最大的资源去帮助香港。香港回归10周年了，在这10年里，百姓安居乐业，经济欣欣向荣，政治生机勃勃，证明中国的“一国两制”是成功的，证明和平统一祖国是可能的。

一句话点评



中国军乐队指挥于建芳回忆交接仪式的时候说：“可能我当时太紧张了，耳朵充血，一直觉得国歌的声音有点小。但其他人告诉我，那天的国歌格外的嘹亮。”

参考书目

1. 远东事务评论社，香港问题小组编：《学运春秋—香港学生运动》，香港：远东事务评论社，1983年。
2. 陈谦著：《香港旧事见闻录》，香港：中原出版社，1992年3月。
3. 余绳武，刘存宽主编：《十九世纪的香港》，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8月。
4. 雷竞旋著：《香港政制与政治初探》，香港：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1987年9月。
5. 张晓辉著：《香港华商史》，香港：明报出版社，1998年。
6. 陈昕，郭志坤主编：《香港全纪录》（卷一 远古—1959年），香港：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1997年。
7. 元邦建编著：《香港史略》，香港：中流出版社，1987年。
8. 王赓武主编：《香港史新编》（上册），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7年。
9. 刘蜀永著：《香港的历史》，北京：新华出版社，1996年。
10. 丁又著：《香港初期史话（1841—1907）》，北京：三

联书店，1958 年。

11. 叶灵凤著：《香港掌故》，广州：花城出版社，1999 年。
12. 邓开颂，陆晓敏主编：《粤港澳近代关系史》，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 年。
13. 贺弘景主编：《香港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 年。
14. 王岳川主编：《一生要读知的 100 处世界著名建筑》（下），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4。
15. 程乃珊著：《老香港：东方之珠》，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00 年。
16. 西尔泉著：《香港演义》，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 年。
17.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香港历史问题档案录》，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6 年。
18. 夏历著：《香港中区街道故事》，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89 年。
19. 刘蜀永，萧国健著：《香港历史图说》，香港：麒麟书业有限公司，1998 年。
20. 高添强编著：《香港今昔》，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4 年。